私家相册里的
开国总理

吴志菲　余玮　著

中国摄影出版社
China Phot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COL中文在线

作者介绍：

吴志菲，红色励志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出版有《李菲传奇》《百岁名流》《红舞台下的凡人邓小平》《中国高端访问》《红色之恋》等畅销图书；有作品入选“年度优秀中国传记文学作品”与“中直机关青年最喜爱的一本书”“全国优秀畅销图书奖”。

余玮，红墙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新闻老照片的背后》《讲学中南海》《触摸红墙》《红墙见证》《出入中南海的高层智囊》《私家相册里的红色传奇》等，并有作品入选中学《语文》课文。曾获“全国优秀畅销图书奖”等奖项，多部作品被确定为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

封面摄影：侯波

COL中文在线

私家相册里的开国总理

吴志菲　余 玮 著

中国摄影出版社
China Phot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第一章　十五年的相处和一辈子的感怀 6

一　难忘的第一次见面 7

二　一个伟大而崇高的伯父 11

三　职业选择对自己亦宽亦严 15

四　自己的婚事伯父伯母操心不少 19

五　非常时期的伯父成了一个“非常人” 22

六　最后一次天真的通话与不很在意的见面 26

第二章　人民政协组建的前前后后 32

一　煞费苦心地把各党派民主人士安全地运送到解放区 33

二　废寝忘食的“鏖战” 40

三　开国盛典在北平开幕 49

四　国旗国歌国都国号的诞生 56

五　三十万群众欢庆前的实地演练 65

第三章　抹不掉的红色记忆 72

一　小事之中反衬出的伟大人格 73

二　最后的岁月也难忘遇难烈士家属的生活 77

三　工人雕塑家铿锵地精心赶制墓碑的背后 80
四　每年六盆水仙准时开放 85

第四章　开国总理临终想见的人细述红色往事 90

一　流浪娃从晋绥边区到北平 91
二　见证“改变世界的一周” 98
三　成为周总理最后想见的人 110

第五章　资深外交官见证伟人风采 116

一　翻译生涯见证中缅“友谊树”根植沃土 117
二　毛泽东眼中的“外国人”也是周恩来心中的“老朋友” 128
三　在与东南亚国家建交热潮中成了热门人物 139

第六章　“左右手”感受别样的魅力 148

一　见证“头戴红五星八角帽”经典照片的诞生 149
二　外交生涯的开启 156
三　两位“失踪”者的友谊始于谈判和“交锋” 160

第七章　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 168

一　与同行相约在印尼 169

二　死里逃生后号啕大哭 173

三　“雅加达见”成为破碎的梦 183

四　大家都是总理的警卫员 195

五　3 分钟的拍摄和 18 分钟的激情演说 205

六　出色工作是对死者最好的纪念 218

七　难以释怀的生死情 227

八　记录中国领导人首飞非洲第一站的风采 232

九　果断的声音和共患难的友情 242

十　珍贵合影背后的感动 252

十一　送别前语重心长的三句话 266

十二　中美外交史上的“破冰” 280

第八章　“红墙医师”细诉伟人身边事 288

一　“王医生”尘封多年的红墙秘事 289

二　“吴大夫”与“ckl”的神交 295

第九章　工人收藏家收藏背后的特殊情感 304

一　迎宾时刻成为一辈子的珍贵回忆 305

二　后悔没有目送总理 309

三　不能因一点失误玷污总理的一世英名 314

四　用心去怀念一代伟人 320

第十章　生命的最后时光 326

一　病房内两位老战友常常促膝谈心至深夜 327

二　一生中的最后一次签名 331

三　完全靠输液以维持生命 336

四　佩戴黑纱的政治局委员们依次走进来 340

五　总理悼词诞生的前前后后 346

第一章
十五年的相处和一辈子的感怀

周秉德，周恩来的侄女（周恩来小弟周恩寿的长女）、沈钧儒的长孙媳。周秉德自 12 岁住进中南海，跟随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共同生活了 15 年之久。周恩来夫妇无嗣，周秉德因此成为与周恩来关系最密切的晚辈。在一个午后的专访中，精神矍铄的周秉德向我们谈起在中南海度过的难忘岁月，谈起伯父伯母对自己的关怀与体贴及教诲。访谈中，周秉德显得那么的激动与忘情，时而激昂，时而沉思，恍如回到了西花厅岁月。

一 难忘的第一次见面

1937 年 4 月，周秉德在哈尔滨降生，这着实让三代没有姑奶奶的周家上下很是兴奋了一阵子。周恩溥为这位侄女的出生写下了“吾家添丁，周门大喜”8 个字。周恩寿还特意跑到吉林，找时任吉林省教育厅长、也是周恩来南开的同学帮女儿起名字。这位厅长再三考虑，截取了屈原的作品《橘颂》辞里的“秉德无私，参天地兮”中的两个字作为她的名字。

随着东三省的沦陷，周恩寿带领全家搬到了天津。周秉德接受采访时说：“1943 年全家投奔天津的四奶奶，我在那里念了 6 年小学。在我小学三年级的一天，爸爸在翻阅《益世报》时，看到有关大伯的消息，很是兴奋，悄悄对我说：‘你伯父在共产党内是做大事的。’从这，我便晓得自己有一个是共产党大官的伯父周恩来，也盼望有那么一天能很快见个面道个好。”

1949 年 3 月，中共中央进入北平，周恩来将此函告在天津的弟弟周恩寿。早在大革命时期，周恩寿是黄埔第 4 期学员。但他在 1927 年国共分裂时脱党，且于 1928 年后和周恩来断了过往。1946 年春，周恩来就东北停战问题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政府特使马歇尔的代表在北

平举行谈判。在此期间，他得悉弟弟在天津，曾邀其来北平见了一面。

看到周恩来发自北平的信，周恩寿即偕妻北行，并在香山与兄长晤面。他再次向周恩来提出重回革命队伍的请求。周恩来说：你脱离的时间太久了，情况不熟悉，也不了解现行的各项政策，若要参加工作，必须先学习。于是，周恩寿进了华北革命大学，妻子仍返天津照顾儿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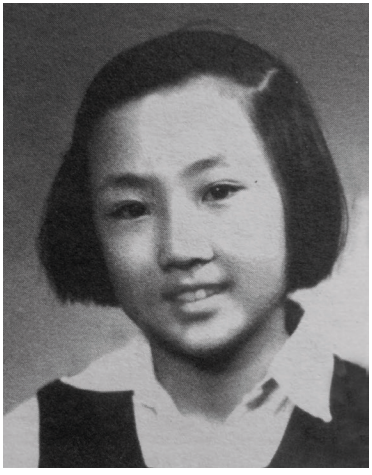
独自在北平学习的周恩寿，有时利用节假日到中南海同兄长团聚。春去夏来，周恩寿在一次和周恩来见面时，说其长女秉德今年小学毕业，想把她接到北平读中学。周恩来知道弟弟在学校住的是集体宿舍，带孩子不方便，便提出可在自己的寓所安置弟弟的长女。

1949 年 6 月下旬的一天，刚刚小学毕业的周秉德在火车的汽笛声中告别了天津，告别了妈妈与弟妹，随爸爸来到北平。“一位清瘦精干的叔叔领我进入中国共产党头头脑脑居住的地方——中南海。进门，绕湖，再进门，不多时我被带到了一个叫丰泽园的院子里，那是四合院式的平房。我当时说不上激动或高兴，只觉得新鲜，自己在院子转来转去。”

“只一小会儿，在外边开会的七伯父周恩来就回来了。高大魁梧，脸庞丰满红润，与爸爸有点像，也有两道浓黑的剑眉。见到我，他亲热地拉到身边，左右端详，笑着说：‘呦，你好像你爸爸，又有点像你妈妈。’”

周秉德（右起）、周秉钧、周秉宜、周秉华姐妹四人在天津合影。

问了周秉德的


早年的周秉德。

妈妈和弟妹的近况后，又寒暄了许久，周恩来才吩咐卫士安顿侄女的住处。周秉德被安排住在一排坐南朝北的房子里，“住在西边，屋里有几个书柜，东边一间是伯父秘书夫妇的住房兼办公室。房子的条件比我家里要好，但绝不豪华。”

当时，邓颖超不在，受毛泽东主席之嘱到上海接宋庆龄去了——迎接她来北平共商建立人民共和国大计。8 月 28 日，周秉德随周恩来到北京站去接邓颖超。周秉德只见火车站内锣鼓喧天，周恩来和其他党政领导人都走到前面去与宋庆龄握手交谈。“你就是小秉德吧！你好！”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把夹在人群中的周秉德领到邓颖超面前，邓颖超便握住周秉德的手笑吟吟地说。周秉德随即向她问好。周秉德在晚年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与伯母相见，那情景至今常常浮现在眼前。”

周恩来夫妇一生无儿无女，多年来一直把自己对儿女辈的感情全部倾注在一批烈士子女身上。亲侄女来到身边，自然疼爱万分，把周秉德看成女儿一样，周秉德也很快适应在中南海的生活，感受到在北平也有一个充满亲情而温暖的家。

周秉德住在书房里，有许多她从未见过的书。“你住的是间书房，可以在那多看些书。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伯父的话，周秉德现在还记得。周秉德常常一个人坐在伯父书房里看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李有才板话》等等好多书都是在那时期看的。

周秉德住进中南海不久，中央领导人陆续从香山搬进来。平时周秉

1950 年夏，周秉德、李讷和李敏（左起）等在中南海。

德不是经常能见到伯父，因为他夜里办公，一般只在上午睡上几小时。白天里，小院常常静得很，除了鸟叫还是鸟叫。看完书后，周秉德往往发呆地望着高处，思念在天津的开心时光。还好，没过多久，认识了李敏、李讷等好多小伙伴，她们或一起看书，或一起唱歌、玩耍、聊天。这时，周秉德才真正适应了中南海的生活。

渐渐地，像伙伴们一样，周秉德跟邻居毛泽东也成了熟人。有一天，她在整理自己的物品时，翻出了小学毕业时精心自制的赠言簿。那是个用彩色打字纸装订的小本子，外壳是垫了一层棉花的硬纸板，还裹了绿色的缎子面。重温簿中那热情洋溢的临别赠言，她突然生出请毛泽东也为自己题字的念头。她捧着小本子找到了毛泽东：“毛伯伯，您帮我写个字吧。”毛泽东望着这个刚刚成为“熟人”的小女孩，答应道：“好，写一个。”他接过赠言簿，稍加思忖说：“给你写个‘好好学习’。”毛泽东题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二 一个伟大而崇高的伯父

那一年秋，周秉德顺利地考上了北京师大女附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进了干部子弟班就读。周秉德平时住校，每个周末回家看伯父伯母，向他们兴致勃勃地讲学校里的事。有一回，周恩来听了对周秉德讲：“你们班是干部子弟班，革命老区来的孩子多，他们身上有许多革命老区传统，你要努力向他们学习，向他们看齐。”

卫士见周秉德从天津来时穿的两身小花衣裙在秋季穿显得有点单薄了，便骑自行车带她到王府井定做了两套秋天穿的衣裤。没多时，第一套蓝色咔叽布衣裤完工了，穿上很精神。吃饭时，周恩来看见了，问道：“不错！哪里来的？”周秉德如实回答：“叔叔带我去做的。”几天后，周秉德又换上了另一套黄咔叽布的衣裤，这下周恩来看见后便皱了皱眉：“怎么又做了一套？浪费！”原来，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周恩来嫌周秉德做多了，多花了公家的经费。

邓颖超解释道：“秉德住校，得要有两身衣服换洗。”周恩来却谈起了自己的住校史：“我在南开上中学，夏天就一件单布长衫，冬天也就一件藏青棉袍，周六回去就洗净晾干。现在国家还困难，我们还是要节省

1950 年春，孙新世、周秉德、周恩来、叶剑眉（左起）在中南海。

嘛。”小小的周秉德并不太懂，但还是使劲地点头，认定伯父说的话一定对，照着办没错。

每逢周六晚上，春藕斋开舞会，中南海的孩子也跑进去玩。“才学会一点‘舞’艺的我们，看许多姑娘排着队等候与伯父以及好些中央首长跳舞，于是也壮着胆子下舞池。我伯父的舞姿很棒，风度翩翩，舞步流畅，舞姿优雅，只要他一到场，几乎再没办法在场外落座。好不容易轮上我同他跳，伯父微笑着揽住我的背，踩着音乐步入舞池。‘跳的还行，你乐感可以。’听到伯父的夸奖，我不免有点飘飘然，不料他又说了一句‘转到那边你就下去吧，让别的同志跟我跳，看好多人在排队’。觉得不太过瘾的我，无奈地点头。这就是我的伯父，宁可委屈亲人也不愿让他人失望。”

1949 年 11 月，周秉德随伯父伯母搬进了中南海最西北端的西花厅。“那时，我妈妈与弟妹也来到了北京，我与大弟秉钧、大妹秉宜一同住

在西花厅的东厢房里，3 张床并排着，彼此中间留点活动小空间。因为北面挨着的是伯父的卧室，他夜里办公、上午睡觉，所以我们在室内不敢嬉戏与大声说话。”

有一回，周恩寿提出把二女儿过继给周恩来，周恩来却另有想法：“如果我要了这个孩子，别的孩子就会认为我这个做伯父的不公平。再说，她也会养成特殊化心理，对她的成长没好处。”在周秉德眼里，伯父总是想得很周全。

周秉德的弟妹在北京八一学校读书，学校里的同学家庭条件稍好的便会有车接送，军区里的孩子坐单位面包车。“弟妹上学放学是卫士叔叔骑一辆三轮车接送，尽管伯父伯母都有车，但从未为我们使用过。‘车是工作用的，小孩不应该享受，你们从小不要依赖家庭关系，不要奢求非分享受，要自己奋斗，要自律自立。’伯父时常给我们这样讲。”

1951 年夏，周秉德与伯父周恩来。 周秉德 供图

“伯父一直是非常俭朴的，平时老两口在家里吃饭都是一荤一素一个汤。有时候一条鱼，两个人这顿饭没吃完，就等着下一顿再吃，不会没吃完的就丢掉，实际也是‘光盘行动’，

那时候不这样叫就是了。一直就是要吃粗粮，那时候大家好像不太喜欢吃粗粮，咱们现在吃一些粗粮好像是一种调剂，是健康、时尚。那个时候，大家都不吃粗粮的，但是他坚持每个礼拜要吃上两三次的粗粮，他不能忘了本——在红军长征的时候，根本吃不上东西，忍饥挨饿的。在饭桌上掉一点饭粒，一定要捡起来的，有卫士回忆因为他的手是受伤的，不可以随意摆动，他吃饭时在手上沾了一个饭粒想舔，赶紧把饭粒拿掉，都很难很难，费了很大劲吃到嘴里，也不能浪费一点点。所以，他节省的意识是非常强的。”据周秉德回忆，周恩来不仅仅在吃方面节俭，在穿上也是这样。“他，26 年的总理，皮鞋只有 3 双，不肯要新的皮鞋。鞋底坏了，经常就是换底换掌，别人给他买了新的鞋他也不愿意穿，就穿以前旧的，衣服也穿得补了又补的，咱们看见照片上的他一直衣着笔挺、整洁——但里面是有很多补丁的，只有袖口和领口坏了的，过一些日子才换一换比较白净的，其实里面的补丁是很多的。他的睡衣、睡袍也是。他过世之后，我专门向伯母要了一件‘破’旧的衣服，也不是破，过去都说‘笑破不笑补’，补的东西就可以，当时他补了很多很多，一件蓝白条的睡袍几十个补丁，上面有手绢、小毛巾、纱布等打的补丁。我看了以后非常震惊和内疚。后来，我送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博物馆。”

三 职业选择对自己亦宽亦严

1950 年抗美援朝的宣传活动热火朝天，周秉德所在的班好几位十五六岁的同学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周秉德非常羡慕，也在报名处拼命地挤。可是因年龄太小，报不上名。

周恩来知道后，不由哈哈大笑：“一个小孩，人家怎么会要你？”见周秉德一脸的不高兴，噘着小嘴巴，周恩来又过来安慰她：“当然愿望是好的，可要立足实际啊！你年纪还小，好好学习，今后报效祖国的机会有的是！再说，留在后方，也可搞宣传发动工作。”本来鼻尖发酸的周秉德，听到这里茅塞顿开。于是，她积极参加了学校业余剧团，在校内、农村和社会上多次开展抗美援朝的节目演出活动。

1952 年，周秉德面临初中毕业。就当时每学期的学习成绩而言，周秉德读高中、考大学或跟潮流留苏，应该不成问题。偏偏在这时，上映了一部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片中主人公瓦尔瓦娜置身乡村，为小学教育呕心沥血的情节深深打动了周秉德。感到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但教育力量还很薄弱，于是一个教师梦时时萦绕在周秉德心底，“当教师”成了一个无法替代的意念。

周恩来夫妇等与三弟周同宇全家合影（前戴红领巾者为周秉德）。

周六，周秉德照例回西花厅。餐桌上，周秉德禁不住把自己择业的小秘密告诉了伯父伯母。“好啊，女孩子选择做教师挺不错的，何况国家现在正需要大批的教师去培养人才参与祖国建设，当教师很有意义。当年我 16 岁，一毕业也是当教师的。当教师，我支持你。”邓颖超一听周秉德“宣布”的“决定”，马上做出欣慰的反应，并转过头向正在举筷吃饭的周恩来说：“秉德不准备考高中，打算报名上师范学校，你怎么不吭一声，表个态？”

周恩来放下筷子，缓缓地说：“这事应该让她独立思考。有你一人说就够了，我讲多了对她成长不好，压力大了。万一有一天她犹豫、后悔，都没办法。况且，她还应听听她爸爸妈妈的意见。”

这一年，周秉德梦想成真，被保送进北京师范学校。当时师资不够，不少适龄儿童无法入学，周秉德意识到师范生得赶快加入教师行列，补充师资力量。于是，她再一次主动放弃了上师范大学的机会。因个人思想上进，师范学校毕业前，刚刚 18 岁的周秉德加入了党组织。不久，被如愿分配到北京东郊区（现朝阳区）第三中心小学，被指派到四年级做班主任，教语文和算术，成了一名乡村女教师。

然而，在教师岗位上工作才两三个月，又被调到区委参加肃反工作。“搞这项工作，要仔细、谨慎、实事求是！作为宣传教育群众的干部，

自己一定要注意领会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这是伯父对她的叮嘱。在区委工作的日子里，周秉德扎扎实实地工作在基层，虽没有任何职务，但伯父伯母常为她这个侄女的良好表现感到欣慰，毕竟她没透露出与他们的亲属关系，更没借用他们的特殊关系为升迁动过脑子。对于伯父的报告、讲话，周秉德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只要能看到的，都细细读，力求读懂。

1965 年，周秉德的丈夫沈人骅被调到西安工作。不久，为了减轻北京城市人口居高不下的压力，中央文件规定：“夫妇双方，如一方不在北京，另一方跟着调离北京。”周秉德说，伯父伯母对自己随夫离京没有半点干预，更没有托熟人照顾她这个人生地不熟的侄女。“你的孩子，

六个兄弟姐妹与七伯母邓颖超在一起（前左起：周秉宜、周秉建；后左起：周秉均、周秉德、邓颖超、周秉和、周秉华）。周秉德 供图

从小要严格教育，不能宠！”这是伯父在周秉德离京时对她的交代。

1974 年 4 月 30 日，周秉德、周秉钧去西花厅看望伯母邓颖超。

被分配在西安市轻工业局人事科不久，“文革”开始了。一时周秉德成了被造反派揪斗的对象——他们要周秉德交出局长们安排的接班人的名单，被周秉德拒绝了。被骂成“死老保”的周秉德，不断被造反派拉去问话、批斗，还关过 3 天。“如果你讲出你是周总理的亲侄女，造反派一定不敢关你了！”看过周秉德档案的人事科长感慨地说，但周秉德无法做到，听后只是连连摇头。让周秉德欣慰的是，不论在哪里，自己依靠的应是组织，相信组织，没有依靠什么关系为自己开脱。

直到 1974 年，丈夫调回北京，周秉德也随他回京工作。去西花厅看伯父伯母时，一见面，伯父听说周秉德已调回，眼一瞪，“秉德，你是不是因我的关系调回来的？！”“恩来，你不要忘了，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还是人骅的妻子，是军人家属。”邓颖超的话刚说到这，周恩来连连摆手：“我放心了，是随军人调动的。”

四 自己的婚事伯父伯母操心不少

当年步入工作岗位后，周秉德面临着谈恋爱的具体问题，邓颖超提醒道：“对方最好工作表现不错，群众关系好，但也要考虑他的家庭可靠。”

周恩来也曾跟侄女讲自己的恋爱故事，用现身说法来启发她。周恩来讲到自己在巴黎的恋爱经历，原来与邓颖超结婚之前，他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那个女孩子叫张若茗，两个年龄相仿，先后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天津的五四运动中，他们一个是男生学生领袖，一个是女生学生领袖，共同组织了觉悟社。那时觉悟社的同志们说，如果今后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的话，他和张若茗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后来张若茗被组织误解，受不了委屈退出了组织，专心读书。而周恩来立志振兴中华，认为自己的人生伴侣也必须得经得起考验。他对张若茗明确表示，两人的关系到此为止。转而与意志坚定的战友邓颖超频繁通信，还向她求婚。

“伯父没讲我谈的对象合不合适，只讲了自己的经历，讲了自己的爱情观。他对我说，找终身的伴侣要志同道合，人生目标要一致，这是最重要的，其余都是次要。我心里不断琢磨着，努力悟着伯父的意思。”在晚年，周秉德回忆说，伯父不仅仅是我的长辈，还像一个知心的友人。

1967 年国庆节，周秉德与丈夫沈人骅在西安合影。

在工作与为人处事方面，周秉德没让伯父伯母操多少心，真正让他们为自己牵挂多的还是自己的婚事。1958 年夏，周秉德母亲的一个朋友将自己的一个亲戚介绍给周秉德。他是在莫斯科留学的大学生，没上过大学的周秉德也希望找个大学生当自己的“老师”，便打算征求一下伯父与伯母的意见。“你的婚姻问题能不能在 25 岁以后解决？我们中国人口基数大，要实行计划生育，从你们这一代开始要提倡晚婚。你看，晚点成家如何？”向来听话的周秉德爽快许应后，伯父的脸上浮现出由衷的笑容。

一次，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和丈夫金山到西花厅，孙维世留苏的妹妹孙熙世夫妇也来了。此外，孙熙世还带来了她留苏时的一个男同学。用意不言自明，是要介绍给周秉德。看到他们来，看到熙世给秉德介绍的朋友，周恩来很高兴，他掏出 100 元钱，说：“我今天有事，没时间陪你们了。维世，你带他们到四川饭店吃顿饭吧。”那是困难时期，他们借此大快朵颐。周秉德回忆说：“好像我与留苏学生特别有缘。但又由于当时的时代原因，我没有征求伯父伯母的意见便主动终止了交往。”

不知不觉，周秉德已是 25 岁的大龄姑娘了。有一天，聂荣臻元帅留苏回来的女儿聂力出于关心，也把自己的同学推荐给周秉德。在接触中，两人谈得很投缘，感觉对方很适合自己。但是，当时中苏关系紧张，邓颖超开导周秉德，语气比较严肃：“现在中苏关系紧张，苏联的克格勃特务机构很厉害，无孔不入，你现在交往的这位朋友在苏联上过学，在那里

有许多熟人，一旦你俩成了夫妻，经常出入西花厅，会不会无意间被苏联克格勃所利用？”伯母的话虽没明确表态反对，但理智的周秉德没有一点犹豫：“您放心，我再也不会同他往来了，再喜欢也断这门亲事。”周秉德只感觉有缘无分，没法因为个人的事情而影响伯父伯母的大局，这次恋情便又被搁浅了。

1963年，已经26岁的周秉德还待字闺中，这可急坏了年近半百的妈妈。无意中，周恩来的老警卫秘书何谦见青年军官沈人骅已30岁出头还没对象，便决意为周秉德牵线。见面后，周秉德的第一印象不错，对方英俊、谦和、稳重、正派、有知识。渐渐的，周秉德了解更多了：党员，有技术，会4国外语，家庭背景好。

周秉德知道伯母经常惦记自己的婚事，认识这位空军大尉后就一五一十向伯母讲了，请她参谋。一听说沈人骅的祖父是沈钧儒，邓颖超脸上露出了笑容：“这家人我们太熟悉了，他的爷爷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他的爸爸是西城区的人大代表、中南海门诊部的内科主任，他本人在部队表现很优秀。这样的人家，用不着再了解。”

第二年国庆节那天，周秉德与沈人骅走到了一块。“伯父欣喜地送我们一件礼物——一张伯母在庐山拍的21英寸的大风景照。画面上的云雾似在流动，两个凉亭在云间若隐若现，十分传神逼真。我接受这礼物，十分珍爱。直到今天，我的床头还依旧挂着这张照片。那天，伯母像嫁女儿一样，准备了好些既漂亮又实用的东西，并不顾身体虚弱，带着秘书张元阿姨登门道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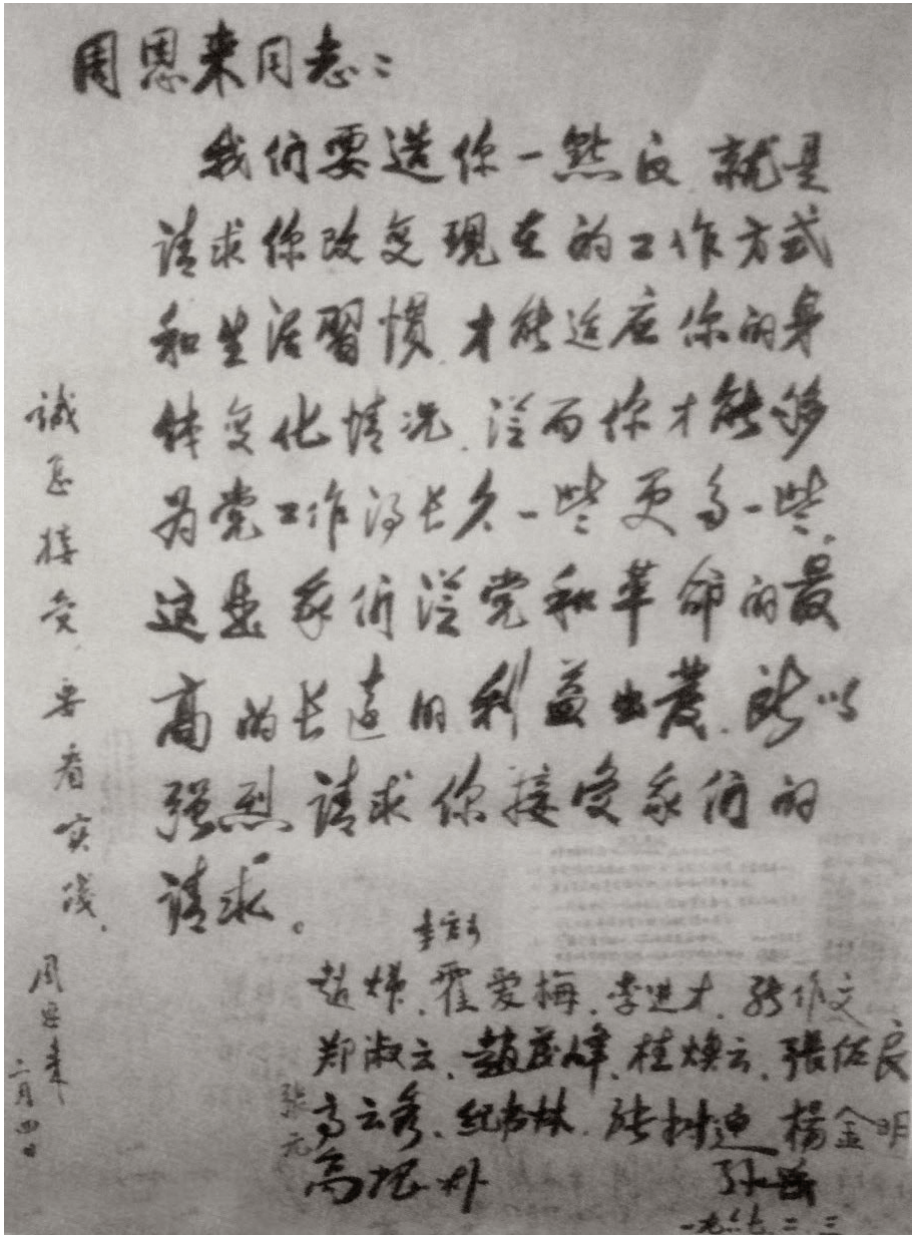
新婚后，周秉德就搬出了中南海，“但伯父伯母的关爱都始终如阳光一般沐浴着我。后来的几十年，我也从未间断去看望他们。”

五 非常时期的伯父成了一个“非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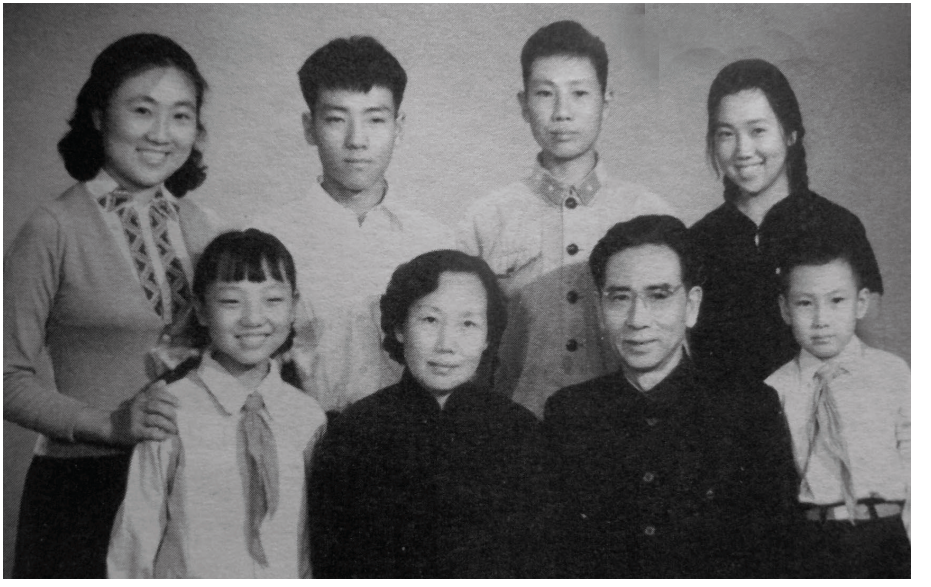
1967 年 5 月，周秉德出差到北京，到西花厅去看望伯父伯母。无意间站在伯父办公室门口，往里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办公桌上、躺椅上、地面上，到处是一沓沓文件。原来，“文革”时各部委受到冲击无法正常工作，全国各地的问题和文件都往西花厅报。于是，伯父睡眠的时间越来越少，夜以继日地工作，一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是家常便饭。

一见面，周秉德果然见伯父的脸变得瘦削了，原本炯炯有神的双眼也布满了血丝。吃饭时，周恩来三下两下便放下筷子，急匆匆地往办公室赶。这时，周秉德意识到：“伯父老了，也更忙了。”

意外的是，周秉德在伯父办公室门上发现了一张“大字报”，是他身边人员写的，还有伯母的 5 条补充建议，内容都是请求他注意休息，改变工作方式与生活习惯，保重身体。细一看，陈毅、叶剑英、李先念也在上边签了字，伯父在上面写了 8 个大字：“诚恳接受，要看实践。”但是周秉德听伯母讲，他还是没兑现，休息得很少。周秉德怀着沉重的心情和恳切的愿望，在伯父的 8 个大字旁写了两行小字：“您的实践做得不够，必须真正实践才行。”



1967 年 2 月，由赵茂峰执笔，给周恩来写了这封特殊的“大字报”。



1963 年国庆节，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全家的合影（前左起：周秉建、王士琴、周恩寿、周秉和，后左起：周秉德、周秉华、周秉钧、周秉宜）。

周秉德回忆那一天，自己被留在西花厅吃午饭，饭桌上她就西安各大学的造反派冲击陕西省委发了牢骚。周恩来耐心引导她，周秉德还是想不通，一次次顶嘴："为什么只相信少数学生，不相信广大的工农兵？""那么多的老干部怎么会都是走资派？"这一讲，周恩来更火了："你是省委、市委派来说服我的吗？""我犯过政治错误，但从来没有犯过组织错误。"这是他曾对周秉德等说过的一句话。

1968 年 8 月，周秉德回北京生第二个孩子期间，打算看看已被关押半年的爸爸。可是不许探望，虽不知是什么情况，但伯父伯母教育周秉德和她的弟弟妹妹们：对这一件事，要相信党，相信组织，事情总会搞清楚，你们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事后周秉德才知道，这是外交部部分红卫兵报到江青那里的一个案

子，讲自己的爸爸参加了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组织的“聚餐会”这个所谓的“反革命组织”。江青批送总理处，伯父亲笔批示逮捕令，指示立即逮捕自己的亲弟弟。当夜，爸爸被秘密抓走。短短几个月，查清了有关来龙去脉，案子水落石出，但上边有命令，人还押在卫戍区，但案子移交给“刘少奇专案组”。因此，此案一拖再拖，周秉德的爸爸被关了整整 7 年多，直到 1975 年 5 月才释放出来。

出狱时，周秉德父女两人相拥而泣。神情似乎麻木迟钝的周恩寿含泪给周秉德讲：“秉德，你莫哭！你爸爸这些年来一直与部长以上的大人物关在一起，我担心那些造反派整我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整你伯父。因此，天大的压力，我也要努力地活下去。你的爸爸没有错，你的伯父更没有错。”

六 最后一次天真的通话与不很在意的见面

1976年，周恩来去世的时候，周秉德正在上海出差。1月9日清晨，她从广播里听到这噩耗时，当时惊呆了。同事给她买了当天的机票，周秉德赶回了北京。在此之前，周秉德曾同伯父通过一次电话，并见过一次面。

1975年5月12日下午，周秉德接到伯父以前的保健护士王力的电话后，赶到她家。王力说："总理有病，可能比较严重。昨天我们几个医生、护士在医院与他见面时，他问：'你说我还能活一年吗？'当时我愣住了。他有病，应积极治疗，带着这种情绪会影响治疗效果的。秉德，你设法去见见你伯父，好好劝劝他。"

可是，邓颖超一再阻拦神情激动的周秉德去305医院见伯父，说中央有规定。于是，周秉德只得拨通病房的电话，通过电话与伯父交流。电话中，周恩来的声音还是那么亲切、从容。周秉德一再打断他的嘘寒问暖，问他是否讲了那句话。"只是开个玩笑，有什么？"他依然是轻松地回答，周秉德急了，"这玩笑也不应讲，我们听了心里不好受，你要长命百岁，再为国家多做贡献。"

“你是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是有那么一天的。说那话也的确没什么，想开点，好嘛？”电话中的伯父，语气时而严肃，时而缓和。

“我不忍多占你的时间，千万请注意休养好，配合治疗。如果不想待在医院里，就回家住，或到南方走走，散散心，好不好？”放下电话前，周秉德一再恳求、劝告伯父甩掉思想负担，保重身体。

1975 年 5 月 20 日，是周秉德最后一次见到伯父，在西花厅。只见伯父进门后微笑地坐在一个小沙发上，双脚搁在一个小墩子上，脸庞更为消瘦，老年斑比以前也更多了。问候之后，周秉德在伯父身边坐下，见他当时气色还可以。伯父还询问了自己的工作和孩子情况，聊了一会儿。怕过多打扰伯父休息，周秉德起身告辞，出门时周秉德提出和他合张影。“你看，家里人很多，下次我们再照吧！”周恩来握着周秉德的手，轻声说。

真没想到，这一天成了永诀。伯父说的“下一次”再也没有了，成了周秉德一辈子的遗憾。尽管他在 6 月 15 日最后一次再回到西花厅，但周秉德却因招待丈夫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放弃了这次见面的机会——一心想着伯父的病，多休息，多疗养会好的。

如今，周秉德想起来，“感觉那时的我太天真了，其实当时的伯父身患膀胱癌 4 个年头了，并早已恶化，小便次次是血尿。但这在当时都严格保密，住院期间，伯母坚持按当时中央的规定，不让亲属探视。若我知道他病情竟如此严重，说什么我也要闯进医院的。”

“其实，1976 年 1 月 8 号中午我伯母就让秘书第一个告诉了我爱人沈人骅，让我爱人赶紧告诉我和在京亲属——其他不在北京工作的就不让他们来参加葬礼。伯母特地嘱咐秘书，给外地拍电报：见报请勿回京。也就是说见到伯父去世的消息，不要到北京来，要坚守岗位，不要影响工作。”周秉德回忆说。

回到北京，周秉德戴着黑纱回到了西花厅。原以为伯母会在床上躺着哭成个泪人，没想到她是在客厅里，而且站着等自己，周秉德抱着她痛哭。邓颖超始终没有眼泪，说：“秉德啊，要坚强啊，不能哭啊！化悲痛为力量，化悲痛为力量！……”

“1 月 10 日，我们一起到北京医院后边的一个小太平间里去参加告别仪式，那时弟弟妹妹和有些亲戚都来了。在条件很简陋的一个小院子里，一个小的告别室，我打头，弟弟妹妹，还有哥哥嫂嫂，跟我伯父做最后的告别。那天很冷，我当时就是没有穿大衣，戴着围巾、手套，可来到伯父躺在那里的房门外，我突然感到戴手套、围巾是对伯父不恭，我就把手套什么的都脱下来，马上往地下一扔，才走进去。看到伯父的面庞消瘦极了，我十分难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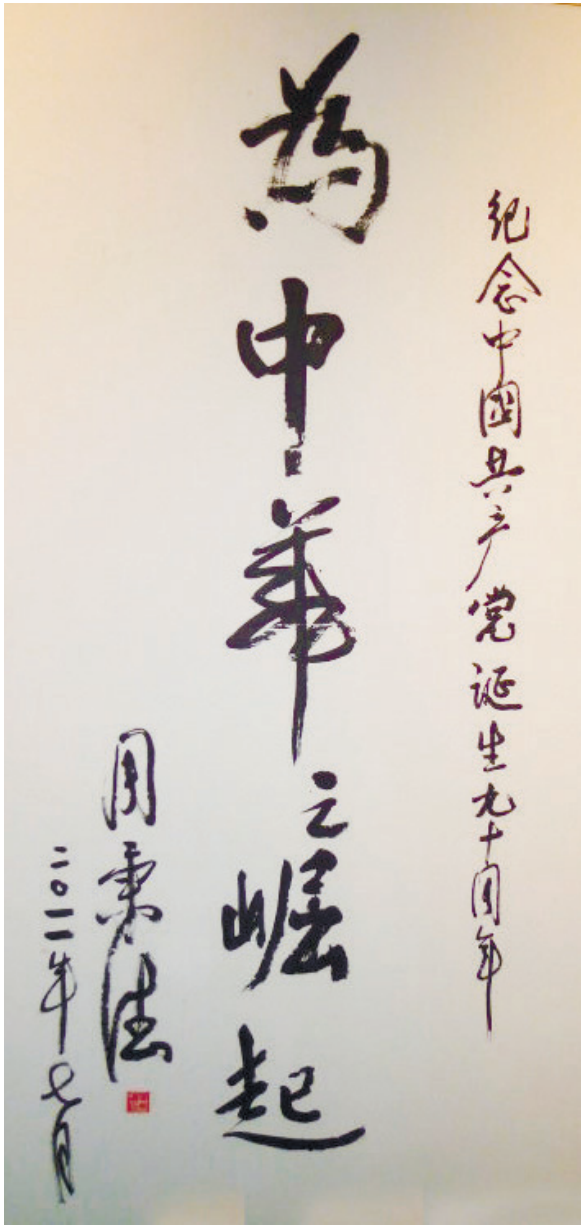
周秉德回忆说，“我们参加了除了撒骨灰外的所有的告别仪式，但伯母特别交代媒体不要报道我们，现在想起来她是在保护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四人帮’还没倒台，她不想让我们多露面。”

“1 月 15 日在人民大会堂开了追悼会以后，伯母在台湾厅召集亲属、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共同开会。伯母对我们讲话，特别是对于丧葬仪式的改革，讲我国几千年都实行土葬，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号召实行火葬，这是一场丧葬革命；现伯父主张火葬不保留骨灰，这又是一场殡葬革命，你们要支持伯父这个主张！就说要撒掉骨灰。另外因为两位老人家一直说他们是党的人，他们的一切行为，他们的葬礼都要由党支部来执行。西花厅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党支部，所以他的事情都交给党支部去做。15 日至次日凌晨，伯父的骨灰由西花厅党支部工作人员罗青长、张树迎、高振普，还有中组部一位领导，4 个人一起坐军用飞机，将伯父的骨灰撒在北京、天津和山东北部黄河入海口等处。”周秉德说，伯父的身体虽

然什么也没有留下，但他的名字，他的形象，他的品格，他的精神，却又装满了亿万人民的心田，在以后的日子，随着岁月渐渐越走越远，她越来越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1992 年 7 月 11 日，伯母邓颖超这位伟大的女性溘然长逝，留给周秉德的依然是无尽的哀思和深深的怀念。

伯父伯母去世后，周秉德一大家及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在每年的 1 月 8 日和 3 月 5 日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毛主席纪念堂或西花厅聚会，给老人家鞠个躬。每每走进西花厅，周秉德不敢多看那海棠、芍药、水仙及园中的小径，说这里分明都有伯



周秉德节录周恩来的少年名言题词。

2009 年 4 月，周秉德（右）出席朱敏遗体告别仪式。

父伯母的身影，都回荡着伯父朗朗的笑声和伯母谆谆的教诲。

周秉德曾先后任职北京首饰进出口公司、北京市外贸局、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8 年到侨办《华声报》担任副社长，后来到中新社担任副社长，直到 1998 年退休。曾任全国政协第九届、第十届委员。退休后的日子仍然很忙，因为一些单位常找她去讲课或做报告，讲她所受的人生教育。掐指一算，她说，怎么也得上百场了！

这些年来，周秉德的记忆里一直荡漾着伯父的音容笑貌，“我觉得他那双眼睛依然在注视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伯父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一切都是人民给的，无论你今后从事什么工作，都要真

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我将铭记伯父伯母的教诲，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第二章
人民政协组建的前前后后

1948 年，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发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周恩来受党中央的委托，具体领导筹备新政协的工作，同民主人士、各界代表共商建国大计。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已由一般的政治联盟上升为具有具体组织形式、共同纲领的政治联盟实体。这段时间里，一向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竟然“失踪”。国号、国旗、国歌、《共同纲领》……一件件开国大事的确立凝结有他的心血。在此期间，周恩来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不仅领导筹备召开新政协，而且建立和健全政协组织机构，为创建和做好政协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 煞费苦心地把各党派民主人士安全地运送到解放区

1949 年春，中国大地两种力量的决战已见分晓，国民党败、共产党胜，已成必然趋势。22 年处于非法状态不得不武装反抗的共产党，终于取得了政权，可这新政权又将怎么组建？是否要经过合法途径？中国大地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在看着。

中国共产党人其实早有筹划，1945 年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提出的政治报告主张：“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毛泽东还为实现民主联合政府设计了两个步骤：一是“经过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二是“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全中国老百姓迫切期盼和平、期盼民主，共产党“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大得人心，中国政治舞台的两大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谈判。与此同时，除原有的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团体外，又新组建了一些民主党派。一时间，召开党派会议，推动民主政治，成为舆论主流。开会总要有个名目，时称“政治会议”，国民党谈判代表提出加上“协商”二字，于是中国有了“政治协商会议”。

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却是命运多舛，开了没多久，惯于独揽大权的国民党就后悔了，随即撕毁民主契约，挑起全国内战。蒋介石挟抗战胜利之声威，依美国支持之实力，在战场上突飞猛进，1946 年 11 月 15 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就在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等党派拒绝参加的情况下，国民党拉拢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无党派人士，通过“宪法”。就此蒋介石立即改组政府，肆无忌惮地大打出手。

蒋介石军队全面发动内战，民主党派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再也无法在蒋管区立足。为了避免迫害，周恩来指示中共地下党组织，尽力协助民主党派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秘密转移到香港去，继续从事和平民主运动与进步文化活动。

国共大战，非两党派人士都在观望，原来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还要不要了？ 1948 年 5 月 1 日，南京国民大会闭幕，蒋介石“高票”当选总统。同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发布“五一口号”，毛泽东删掉“毛主席万岁”，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同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号召发布后，立即得到各方面热烈的响应。

5 天后，在香港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有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以及郭沫若等联名致电毛泽东，热烈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认为这是“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他们还同时发表通电，号召国内外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8 月 1 日，毛泽东致电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者和参加者的范围、会议需讨论的问题等，征求他们的意见。当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香港分局并潘汉年电，要他们按照毛泽东上述电报征询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并把这个讨论推广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去，欢迎他们到解放区来商谈和进行准备工作。次日，他又致电钱之光，嘱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从事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

旅港的李济深、沈钧儒等各个民主党派负责人接到毛泽东的复电后，奔走相告，甚受鼓舞。蔡廷锴作为一个军事家，对蒋介石军队的士气十分了解，因而对战局更加乐观。由于蔡廷锴住在香港罗便臣道 111 号，李济深则住在罗便臣道 92 号，彼此相隔不远，经常来往，多方商讨，决心为促进新政协的早日召开而努力。

为了同各民主党派人士一起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项事宜，周恩来煞费苦心地考虑如何把旅居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安全地运送到解放区，同时设法将分散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民主人士转移到河北省西柏坡附近。

当时，由于战争正在进行，香港与解放区的陆地、空中交通都已中断，周恩来最初曾经试图开辟香港 — 英国 — 苏联 — 哈尔滨的专门路线。可英当局强调不可能很快答复。周恩来当即决定放弃这一设想，而采取从香港坐船到大连或营口，再进入解放区的海上通道。

香港分局书记方方接到周恩来的电报指示后，成立了一个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 5 人小组，由潘汉年掌管全局，夏衍、连贯负责与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联络，许涤新负责筹措经费，饶彰风负责接送的具体工作。

第 1 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和他的秘书林一元等，人数不多。这是由于租来的苏联“波尔塔瓦”货船不大，客房极少。为了安全起见，民主人士的行李先行运走，自己离家时只带一个小提包，还化了装。1948 年 9 月 12 日上午，这艘负有特殊使命的货船，向北驶去。经过 16 天的海上航行，终于在 9 月 27 日早上抵达朝鲜的罗津港，中共代表李富春受周恩来委托，提前到了罗津迎接。29 日到达哈尔滨市。

蔡廷锴除了写信向香港家人报平安外，还致函李济深，建议他尽早北上。随后不久，蔡廷锴还写信给留在香港的儿子蔡绍昌，要他把罗定县老家封存多年的一大批武器送给在当地活动的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

11 月 3 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高岗、李富春电：“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经由新政协会议产生。”因此，“应多邀请一些尚能与我们合作的中间人士，甚至个别的中间偏右，乃至本来与统治阶级有联系而现在可能影响他拥护联合政府的分子，以扩大统战面。”

第 2 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马叙伦、郭沫若、丘哲、许广平、陈其尤、翦伯赞、冯裕芳、曹孟君、韩练成等，于 1948 年 11 月 23 日深夜从香港开赴大连。

每一批民主人士离港北上，都高度重视保密。在这批精英中，郭沫若工作较忙，从这一年的 8 月 25 日开始，他在香港《华商报》副刊《茶亭》上撰写《抗日战争回忆录》，每日一篇。为了掩饰自己离开香港北上，不让连载中断，郭沫若在离港的前 3 天赶写了七八篇文稿，预先交给报社，直至 12 月 5 日才连载完毕；文末有一个《后记》，日期写的是“1948 年 11 月 21 日于香港”。其实，文章登出时，郭沫若已经离开香港 10 多天了。

当时，周恩来特地事先打电报给在大连负责情报工作的冯铉和刘昂，指示说：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安排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负责人要住单间，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具体指定了座位座次）；还指示说北方天气寒冷，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鞋等御寒衣物；并请大连市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周恩来在给大连电示的同时，也给香港钱之光处发了电报，指示说已经走了两批人员，很可能引起外界注意，这次行动要更加谨慎。

第 3 批北上的民主人士较多，护送工作的确要慎之又慎，特别是筹划李济深安全离港的工作，更是大费周章。

李济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除了中共同他联系密切外，港英当局与他常有来往，美国领事馆与他也接触频繁。白崇禧也曾亲笔写信给李济深，请他到武汉“主持大计”。后来由于国民党进步人士何香凝、梅龚彬等的劝说，李济深并没有去武汉。

李济深寓所在中环半山区罗便臣道，港英政治部在马路对面租了一层楼，派了几个特工人员住在那里，名为“保护”，实则监视。中共的 5 人小组经过研究，拟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决定在圣诞节次日的夜间上船，即 12 月 27 日凌晨驶离香港。到了 12 月 23 日，时任香港《华商报》董事经理、代总编辑杨奇接到任务，负责运送李济深的两件行李，并负责护送李济深等人登上苏朝合营的货船“阿尔丹”号。

12 月 26 日，太平山下仍然沉浸在节日欢乐的气氛中，李济深的寓所也热闹非常。像平日宴客一样，主人家居打扮，身穿一件小夹袄，外衣则挂在墙角的衣架上，宾主频频举杯，谈笑甚欢。这一切，对门那几个持望远镜的特工看得一清二楚。晚宴开始不久，李济深离席去洗手间，随即悄悄出了家门，在距离寓所 20 多米远的地方，一辆小轿车戛然停止，

李济深迅速上车，直奔坚尼地道 126 号被称为“红屋”的邓文钊（《华商报》董事长）寓所。这时，那边晚宴才真正开始。

时钟敲过 9 响，当杨奇看到岸边和海面平静如常，就打电话照约定的暗语说：“货物已经照单买齐了。”于是，邓文钊的两辆轿车立即出动，将李济深等 5 位“大老板”送到六国饭店对面停泊小汽船的岸边。这时，负责接送的彭泽民等 3 位民主人士也按时来到。会合之后，坐上小汽船，朝着停泊在维多利亚港内的“阿尔丹”号货船驶去。

这次李济深一行航行了 12 天，到 1949 年 1 月 7 日上午才抵达大连。当时，李济深、茅盾、柳亚子等 30 多人从香港赴大连的轮船，在途中遇到大风浪，耽误了一些时间。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着急，几次去电大连询问情况。直到他们安全抵达大连，他才放下心来。中共中央派了李富春、张闻天专程前往迎接，乘专列到哈尔滨。

按周恩来的指示，事先设法买了御寒的皮货，他们一到，负责接待的同志就送去獭皮帽、皮鞋、貉绒大衣。收到这些物品，他们十分感动，有的人要付款。刘昂等人解释说：解放区实行供给制，衣帽鞋都是送的，这是周恩来指示我们办的。他们连声说：恩来先生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给我们安排得这样好，真是太感谢了。这批民主人士在大连逗留期间，游览了市区，参观了工厂。

1949 年元旦过后，港督葛量洪发现《华商报》发表了一则简短消息，题为《李济深等离港北上参加政协》，这则新闻字数虽少，港督葛量洪却不由一惊。

据美联社香港 3 日讯，李济深离港之所以被人发现，是因为记者去找他，想问他对蒋总统元旦文告有什么意见。葛量洪同样注意到了这条短讯。尽管这条电讯不尽翔实，但报纸披露出来之后，英美和蒋介石的

特工人员才如梦初醒，十分尴尬。他们没有想到，新中国成立前夕，20多位民主精英竟是在他们这些特工人员眼皮底下秘密离开香港、回归祖国的。

二 废寝忘食的“鏖战”

新政协的筹备会议原定在哈尔滨召开，由于形势发展之快，超出人们的预料，就改在北平召开筹备会。1949 年 2 月 27 日，周恩来在西柏坡审阅修改了《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民主人士候选人名单》、《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并批示将它们以《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为名付印成册。

其中，《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的原稿是李维汉于 1948 年秋接受任务后，全力以赴，组织精英力量于当年 10 月 27 日写成的。草稿一完成，李维汉立即上报给周恩来，说：“稿子是勉强凑来的。”周恩来腾不出时间修改，大致看了一遍，便通过中央办公厅分送刘少奇、朱德、陆定一、齐燕铭等人。

李维汉为这个草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尽管草稿条文确实显得比较粗糙，但把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应实行的最基本的纲领、政策都规划出来了，其体现的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立国思想，也大都为后来的各个共同纲领稿本所采纳。

在李维汉《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的基础上，经过各方面人士的共同修改，形成了第二稿。随后，周恩来对第二稿作了文字修改，把它收入《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发给有关方面人士阅读讨论。

自西柏坡到北平后，周恩来则立刻投入紧张的和平谈判之中。但在20天的谈判过程中，他先后5次邀集在北平的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会面，向他们报告和谈进展的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之后又向各民主党派人士报告和谈破裂的经过。

和谈破裂以后，周恩来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新政协会议的筹备中。6月11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预备会议举行，商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单位为23个，共134人，并确定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人选等。

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担任大会临时主席，并致了开幕词，且于次日作了对《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说明。经过讨论和修改，通过了筹备会的组织条例和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的名单。周恩来强调：这次会议期间，“凡是重大的议案不是光在会场提出”，而且在提出之前“总是事先有协商的”，“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

当晚，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周恩来主持下举行，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为了加快各项准备工作，决定在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设立6个小组，分别完成下列任务：一、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单；二、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三、起草共同纲领；四、起草宣言；五、拟定政府组织大纲；六、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周恩来并被推举兼任第三小组组长，负责起草《共同纲领》。

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后，一切筹备工作由筹备

1949 年 2 月，傅作义（右三）等去西柏坡，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1949 年，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国际友人在一起。

会常务委员会和它所领导的 6 个小组分别担负起来。周恩来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协商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名单和起草《共同纲领》上。

新政协首届会议将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有人就说：美国的议员，苏联的苏维埃代表，中国的政协委员！新政协代表如此尊贵，天下英雄尽来北平，其中未免鱼龙混杂。1948 年秋，共产党与到达解放区的民主党派商定，新政协由 30 个单位 180 人组成。后来，新政协增加代行全国人大职责，就需要扩大，以广泛代表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可是，这一扩大，就引来诸多申请。民国以来，中国各地党派丛生，许多组织成员复杂，政治立场模糊。

中国共产党接管各地时制订过一项党派政策：对于在 1948 年 5 月 1 日之前成立的，并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尽了力的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应一律承认其合法地位，加以保护，允许发展，与之协商。各民主党派也赞成以“五一口号”画线，积极响应者可以参加新政协，后来者则需审查资格。新政协筹备会关于代表资格的政治标准认真严肃，有些党派、个人虽然提出申请，却没有被接受；也有些党派、团体、个人，虽未申请却被邀请参加。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单位，除中国共产党及在香港公开响应“五一口号”的 10 个民主党派，又增加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 3 个党派单位。

协商中的代表名单，需要广泛地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区域、人民解放军、国内兄弟民族、国外华侨及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取舍恰当，十分不易，可谓是整个筹备工作中最繁重的工作之一。各单位的代表名单，一般先由单位提名，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反复磋商，

毛泽东、周恩来等与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合影。

再确定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常常为了某一个代表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还、斟酌再三，费时达数周之久。对某些在解放战争中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其组织严重不纯，或是在民主运动中并无实际表现，甚至有过反动行为的，以及由投机分子临时拼凑起来的派别和团体，不邀请参加。但对这些党派和团体中有民主运动历史并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分子，则邀请他以个人身份参加。因为这方面的问题既复杂又重要，许多事情是由周恩来亲自处理的。

在处理复杂的党派问题的同时，新政协还特设“无党派民主人士”一类，以尽量照顾到各个方面。周恩来说：“无党派民主人士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展形成的。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重压迫，许多志士仁人虽然没有组织起来，但却在领导着、联系着很大一批民主人士从事民主运动。因此，严格且正确地说，无党派民主人士是没有党派组织却有党派性的民主人士。”

作为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组长，周恩来在6月18日主持召开了第三小组第一次会议，决定由中国共产党起草《共同纲领》的初稿，组员分为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和其他等5个小组讨论，分别写出具体条文，供起草者参考。他说：“我们的政协会议，加上一个‘新’字，以区别于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决定联合政府的产生，它也是各党派、各团体合作的基础。”

为了保证按时拿出《共同纲领》的草案，周恩来不得不请示毛泽东，暂时放下手头的许多事务，集中一段时间完成这项工作。于是，一段时间里，人们很难见到周恩来的踪迹。原来，他在6月下旬就把自己“关”在勤政殿里，全神贯注、一心一意地亲自动手写作《共同纲领》条文。中南海里，杨柳依依、碧波粼粼，景色秀美，周恩来却已无心欣赏。

经过一个星期废寝忘食的“鏖战”，他完成了起草工作。走出勤政殿后，周恩来活动了一下发酸的筋骨，深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心里感到十分高兴。然而，他没有休息，也没有时间休息，又急忙召开会议，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以后又经过7次反复讨论和修改，其中包括由先后到达北平的政协代表500多人分组讨论2次，第三组自身讨论3次，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讨论2次，广泛吸取各方面的意见。

周恩来所执笔的《共同纲领》以明确而概括的语言，规定了新中国

的国家性质、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其中，明确新中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它的“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为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周恩来在中南海的日日夜夜都是在繁忙紧张的工作中度过的，由于新政协筹备工作中有许多重要问题既要及时到香山向毛泽东汇报，也要经常到六国饭店、北京饭店同民主人士交谈磋商，往返奔走，费时又劳神。有时周恩来一天内甚至不止一次地往返香山与城内之间，因为当时路况很差，每天在路上所花时间也就可想而知。而毛泽东也时常要找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党外的主要代表面谈，交换建立新中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意见。由于他住在城外的香山，工作起来很不方便。于是，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搬进了城内，周恩来就将自己在丰泽园（三进院子）所住的里院让了出来，自己搬到了中院的正房里，并给当时一同住在这里的林伯渠一家另找了房子。不久，毛泽东的家属也要进城，周恩来就又搬了一次家，搬到了丰泽园外院的东厢房。

7月初，中共中央成立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彭真、林伯渠、李维汉任副主任。

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此时还没有一个正式名称。于是，就国号与中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进行了广泛的协商。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致辞时最后呼喊的三个口号中，有一个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在新政协筹备会起草各项文件的过程中，一些代表对这个原拟的国名“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雷洁琼发言说，如果国名太长，用时不用全称即得注明是简称。黄炎培和复旦大学教授张志让的意见被整理成书面报告，他们提出：“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对原拟国名提出质疑，发表了第三种意见。张奚若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

张奚若一副学者风度，语调显得有点激动，继续说：“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两字了，岂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且‘民主’一词 democracy 来自希腊语，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后，从以下角度解释也很容易明白：为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 ‘民主’二字。”

在讨论中，毛泽东却后来支持沿用“中华民国”国号，理由是共产党是救中国不是亡中国，新中国取代旧中国是新政府取代旧政府，不是新国家取代旧国家， 我们共产党反蒋不反孙。后来是何香凝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包涵了‘中华民国’这 4 个字，其实质是一样的，‘民国’的‘民’就是‘人民’，中山先生一生为共和奋斗，这国自然就是‘共和国’了。”毛泽东听了觉得有理。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四小组把关于国名的意见归纳了 3 种名称，留待政府组织法起草委员会去斟酌。经 8 月 17 日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修正，通过了组织法的初步草案。在这个初步草案里，新的国名去掉了“民主”二字，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这时在国号后面仍拖着一个“尾巴”。

在后来提交给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文件中，国号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都带着一个括号，里面写着“简称‘中华民国’”6个字。这很容易使人把它与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混为一谈，造成误解。

8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讨论政协组织法草案时，周恩来提议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人民民主国家中需要统一战线，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有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要合作，就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这个组织就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要长期存在下去”。

三 开国盛典在北平开幕

8 月 28 日下午 4 时 15 分，宋庆龄由邓颖超等陪同从上海到达北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民主党派负责人等到前门车站欢迎。

车刚停稳，毛泽东便走进车厢，握着宋庆龄的手热情地说：“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宋庆龄高兴地说：“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

宋庆龄在毛泽东陪同下走下列车。她身着一袭黑色拷绸旗袍，佩一条洁白的纱巾，盘着发髻，显得十分端庄。周恩来迎上前去握手问候，宋庆龄说：“感谢你派你的夫人来接我。”周恩来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领导新中国的建设。”

此时，蔡畅迎上来，向宋庆龄献花。接着，宋庆龄微笑着与月台上的欢迎者一一握手。

早在这年 1 月 19 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写信给留居上海的宋庆龄：“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

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和汉年、仲华熟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宋庆龄接到信后，因当时身体不适，不宜旅行，暂时未能动身。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6 月中旬，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之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要派一位专使专程去上海请宋庆龄北上。这时，周恩来想到：1924 年孙中山扶病北上，路过天津，邓颖超作为天津人民代表专程到码头欢迎孙中山先生，第一次见到中山先生身旁亭亭玉立的宋庆龄。1925 年孙中山不幸在北京病逝，邓颖超参加守灵和送葬，又看到黑色面纱后哀痛欲绝的宋庆龄。1926 年 1 月，邓颖超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便和宋庆龄、何香凝一起起草了妇女运动决议案。1927 年夏在武汉，汪精卫和蒋介石合流叛变革命，邓颖超亲耳听到宋庆龄是如何愤怒地斥责他们。1938 年秋，邓颖超又专程到香港会见宋庆龄，并和她一起到广州推动华南妇女运动。以后在重庆，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她们也时有往来。于是，周恩来建议选派和宋庆龄交谊很深的邓颖超去上海迎请为好。毛泽东则补充说，曾长期在宋庆龄先生身边工作的廖梦醒一同去迎接更好。

于是，廖梦醒先行一步。因为当年年仅 59 岁的孙中山抱病抵达北京商议国事却不幸在这里病逝，宋庆龄曾对廖梦醒说：“北平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廖梦醒说：“北平将成为红色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你。你打算什么时候见大姐？”宋庆龄说她想好了再通知廖梦醒。

6 月 19 日，毛泽东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亲笔信：“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 4 年。仰望之忱，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

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大安！”

两天后，周恩来也亲笔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庆龄先生：沪滨告别，瞬近 3 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现借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专上。敬颂大安！”

6 月 28 日，邓颖超接到宋庆龄宴请自己的请柬。当天，邓颖超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和许广平、罗叔章一起从北平专程赴上海。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1925 年邓颖超南下广州时曾路过上海，向上海妇女界介绍天津支援“五卅”运动的情况。那时她还是个刚刚入党的 21 岁的青年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她和周恩来曾在白色恐怖下的大上海做地下工作，英勇战斗过 5 年。1946 年，她又和周恩来一起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在上海开展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1949 年 6 月 29 日，她来到了解放的上海，心潮澎湃，内心无比激动。

当天，邓颖超到宋庆龄的寓所。多年不见，胜利重逢的欢乐，使中国这两位伟大崇高的女性拥抱在一起。

邓颖超款款叙说别离后的情怀，宋庆龄非常有兴趣地倾听着。接着，邓颖超介绍了新政协的筹备情况，并从手提书包取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郑重地说：“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在北平召开，中央人民政府也将正式建立。党中央和毛主席恳切盼望您能北上共商建国大计。”

宋庆龄接过两封信，明白其中的分量。她仔仔细细地看完后，认真地思索着，慢慢地说：“这事容我再仔细想一想。”毕竟那里是她的伤心之地啊！邓颖超忙说：“这事不忙马上定下来，先生可以从容考虑再作定夺。”

邓颖超在上海留下来了，一留便是两个月。她去探望了史良、倪斐君等老朋友，了解了上海妇女正在筹备成立上海市妇联的情况。期间，邓颖超又几次去看望宋庆龄，约请她出席有关活动，或自己出席宋庆龄在上海举办的有关公益活动。终于有一天，宋庆龄微笑着对邓颖超说："我决定接受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先生的邀请。"

随即，邓颖超和宋庆龄商量哪一天动身，并立即通知北平。

宋庆龄以什么名义参加政协会议呢？当时有 3 个单位都提出要推她为代表。7 月 18 日，周恩来和李维汉致电中共中央华东局陈毅、潘汉年并转邓颖超，请他们就这个问题征询宋庆龄本人的意见。且在给邓颖超的信中说："接到你的来信，很高兴，盼望得很久了，你除了与夫人（宋庆龄）联络外，就安心静养吧，完成两个月计划，会对你以后的工作有利。"

3 天后，邓颖超复电周恩来、李维汉说："孙夫人表示因身体不佳不能参加任何团体的业务，也不愿参加任何团体，只愿以个人旁听的资格列席新政协会议。"同时，邓颖超提议："以宋为特别邀请代表，请中央决定。"

为此，新政协代表中还特设"特邀代表"一类，其中有宋庆龄、陶孟和、张难先、张元济、张治中、邵力子、程潜、傅作义、周信芳、梅兰芳、赛福鼎等。8 月 6 日，周恩来致电邓颖超："新政协 9 月开会，孙夫人以 8 月下旬或 9 月 5 日前来平为好，并请她 9 月下旬在平参加中苏友好协会筹备会议。"

为让代表进一步了解会议有关情况，便于会议期间的积极讨论，周恩来于 9 月 7 日在北京饭店向已到北平的代表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协几个问题的报告》。

10 日晚 9 时，周恩来在毛泽东处讨论《共同纲领（草案）》，至次

日晨 7 时。

15 日，周恩来作为政协中共党组书记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说明新政协代表成分和比例是根据党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采取和各党派、各团体充分协商的方式确定的。同时，他反复讲解党的统战政策：“民主人士对于孤立蒋介石所起的作用很大，我们必须学会同他们共事。我们不能以为，天下是共产党打下来的，我们是主人，是我们请你们来开会的。都是政协代表，如果你叫同志，他叫先生，不就成了宗派？”指出：革命胜利后“需要动员各种力量参加工作，到处都要碰到合作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强同党外各界民主人士的合作——如果“我们领导得好，可以不流血过渡到社会主义”。

17 日，由周恩来主持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他代表常委会作了关于会议筹备工作的报告，宣布会议筹备工作已经胜利完成。这次会议上，正式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9 月 21 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出席开幕式的各党派、各团体代表 634 人，来宾 300 人。晚 6 时后，与会者陆续入场，每人胸前别着一枚刚刚赶制出来的新政协徽章。

怀仁堂位于丰泽园东北，原为仪銮殿旧址。仪銮殿于光绪时用三年的时间建成，慈禧太后迁入居住并在此殿召见大臣并处理政务。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把从事过变法维新的光绪皇帝囚禁于瀛台，自己就在仪銮殿亲自训政，使得仪銮殿取代了紫禁城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政治中心。后来仪銮殿被焚毁，重建的宫殿名为佛照楼。袁世凯执政时将其更名为怀仁堂，用于办公。人民解放军刚入北平时，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怀仁堂

是年久失修、摇摇欲坠的古旧建筑。在周恩来的批示下得以翻修、扩建。

当晚，怀仁堂门前，彩色气球上悬着墨绿色的飘带，门两侧彩旗迎风招展，会场之内玻璃灯、水晶灯交相辉映，使整个会场显得庄严瑰丽、光彩夺目。经过政协筹备委员会工作人员一个多月的努力，这座古老建筑已被布置得焕然一新。

主席台的上方，悬着巨幅会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台的后幕上悬挂着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会徽的下方，并排悬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画像。由于新的国旗还没有最后确定，两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主席台布置得庄严肃穆。

主席台上坐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程潜、何香凝、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周恩来等。当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时，军乐队齐奏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时在场外鸣放礼炮 54 响。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达 5 分钟之久。

周恩来代表筹备会报告出席会议的各类代表名额和总人数，提出主席团名单和秘书长人选的建议，得到全场一致通过。

毛泽东用洪钟般的声音致开幕词。他以沉稳、缓慢的语调庄严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全场的人眼里都闪烁着泪花。为了这一时刻的到来，数千万人民英雄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取义。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了政协会议的任务。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许广平发言说：“马

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新中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 10 月 1 日定为国庆日。”毛泽东说：“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这年 12 月 2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接受全国政协的建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决定每年 10 月 1 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在政协开幕的当天，新华社发出电讯：“中国人民所渴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于今日下午 7 时半在北平开幕。”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的社论。

四 国旗国歌国都国号的诞生

9 月 22 日，周恩来代表主席团向大会作了关于主席团常务委员名单和设立 6 个分组委员会的报告，并代表第三小组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

23 日，周恩来听取第六小组秘书彭光涵汇报，新政协代表在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时发表的各种不同意见。

自登报征求来稿后，社会上反响强烈，仅 1 个月内便收到数以千计的设计稿件。其中，国旗提案 1902 件、图案 2992 幅，国徽提案 112 件、图案 900 幅，国歌提案 633 件、歌词 694 首。应征者遍及国内外，前 3 名首推东北、北平、上海。另外，美洲及马来西亚、朝鲜、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以及香港和澳门地区也先后寄来了很多应征稿件。来稿者中，既有以文言文写作的老先生，也有工人、农民，还有机关干部，同时也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作家、自由职业者，以及解放军战士、海外华侨，甚至连小学生也以稚嫩的字迹写来了意见稿。周恩来说，这充分说明了全国各族人民和各阶层人民对于人民政权的拥护，对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的诞生异常关心，翘首以待。

周恩来发现，征集的国旗图案大体可分为四类：一、镰锤交叉（或称镰刀斧头）并加五角星。此类图案最多，开始赞成的人也多，如陈嘉庚就专门设计了中国式的镰刀斧头图案，还说：“中国有中国式的镰刀、斧头，不能因苏联用了，我们就不用。这是最好的代表工农建国的图案，许多来稿都说了这个问题。”二、嘉禾齿轮代表工农联盟的图案。三、以两色或三色的横条、竖条加镰刀、斧头、五角星或嘉禾齿轮。四、以红旗上排列五角星图案，或者红旗中加五角星并加一两条黄杠代表黄河、长江等，这类图案也数量不少，郭沫若和朱德就设计过此类图案。

经过反复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前三类不合国体，不能采用。较为可供参考挑选的只有第四类。为了广泛征求意见，又从中评选出较好的几十幅图案。为了评选时不带任何偏见，周恩来指示把选出的几十幅图案按类型编成一册，每幅图案只编号，不写作者姓名。

经过初评复选，38 幅国旗图案闯过一关又一关。其中，上海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图案被编为“复字 32 号”，“复字 1 号”是红旗上方有一颗大五角星；“复字 3 号”是中间加两条黄杠表示黄河、长江；“复字 4 号”是中间加一条黄杠代表黄河。最初，赞成选择“复字 1 号”、“复字 3 号”、“复字 4 号”为国旗图案的比较多，毛泽东也曾是“复字 4 号”的赞同者。

“复字 32 号”，草拟的说明是大五角星表示中国共产党，周围 4 颗小五角星表示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尽管大家比较倾向“复 32 号”五星红旗的图案，但又觉得 4 个阶级的提法不妥。有人说：资产阶级怎么能进入社会主义呢?

后来，毛泽东在勤政殿邀请各方面人士座谈。宴会后，毛泽东拿着放大了的五星红旗图案说：“中国的革命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

农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实际，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大团结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方向。我看国旗是不是就选这个图案？”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25 日晚 8 时，毛泽东、周恩来约请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茅盾、田汉、梁思成等 18 人在中南海开会，协商确定国旗、国歌、国都、纪年等问题。

当时，收到的国歌歌词、歌谱应征稿件中有郭沫若、马叙伦、冯至等知名人士的作品。小组评选了一部分歌词、歌谱印发给大家，有的还组织乐队演奏过，但大家都感到不理想。在讨论时，大家都认识到，要在短时间内创作出理想的国歌词谱，的确比较困难。

但是，新中国诞生之时不能没有国歌。国歌既要有大众性，又必须具有庄严性，如此雅俗共赏的歌曲创作确实不易。而且，国歌代表一个国家，特别是代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的国歌！用一支什么样的歌曲才能充分体现它的特点，反映亿万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心声呢？

大家一时陷入了沉思。这时，一位个子高大、面容清瘦的中年男子站起来发言，打破了沉默：“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表国歌怎么样？”此人就是大画家徐悲鸿。

毛泽东欣赏的目光落在他身上。周恩来立即表示支持，说：“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很好。《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雄壮而豪迈，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合演奏，也适合于大家演唱，用这首歌作国歌是合适的。”

周恩来说完，著名建筑学家、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顾问梁思成站起

来发言：“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我赞成。我想起了以前我在美国时，有一次上街，听见有人用口哨吹《义勇军进行曲》，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骑自行车的美国青年，这说明这首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看用这支歌代表国歌很好。”

接着，大家纷纷发言，提出自己的看法。讨论时，有人说：“新中国即将成立了，中华民族已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而这首歌词当中却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不符合现在情况的句子，是不是过时了？”听后，周恩来说：“这首歌在抗战中起过巨大的鼓舞作用，尽管新中国成立了，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我们还要居安思危。”

商议结果，大多数人倾向于在国歌未制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最后，毛泽东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 毛泽东说完，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大家合唱《义勇军进行曲》。于是，丰泽园里传出了洪亮而激昂的歌声。

当日深夜，黄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马寅初、沈钧儒等在下榻的北京饭店里，收到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的午宴请柬。上面写着：“9 月 26 日上午 11 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请出席。”接到这一请柬的共有二三十位 70 岁上下的老者。

第二天中午，应邀者按时赶到六国饭店，周恩来主持宴会。宴会之前，周恩来叫人关上餐厅的大门，开始讲话。他在讲话中说：“今天请来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我国有句老话，叫作‘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文件时，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

对‘中华民国’这 4 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周恩来说完后，快人快语的民建代表黄炎培首先发言。他说：“我国老百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 3 年一届，3 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孙中山的战友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接着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用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

1912 年 1 月 1 日，在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领导下，为推翻清朝封建王朝，宣布成立共和政府，定国号为“中华民国”。孙中山辛亥革命之本意，是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但是，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革命成果即被大野心家袁世凯篡夺。不久，袁恢复帝制，建立起洪宪王朝，当了 80 天的短命皇帝。后来，“中华民国”又先后被黎元洪、曹锟、蒋介石等篡位，孙中山的民主设想和共和体制根本没有实现。有一位辛亥革命参加者、清朝进士周致祥，对此极为愤慨。他归隐 38 年，从来不用“中华民国”这个国号。问其原因，他认为此国号只是徒有其名，而绝无其实。

周致祥态度坚决，反对用简称，说：“我仍反对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20 多年来更是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紧接着，83 岁的美洲侨领司徒美堂激动地站起来，要求发言。这时，宴会厅里显得很安静，大家等待着听这位老人的意见。他说：“我没有什么学问，但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4 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官国’，与‘民’无涉。22

年来更被蒋介石与 CC 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就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 3 年之后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作‘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用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司徒美堂的话言之成理，掷地有声。一说完，大厅里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曾以痛骂国民党官僚资本而出名的马寅初也站起来，表示说：“我完全拥护刚才司徒先生提出的主张，括号中的简称不伦不类，不像话，应该去掉！”民盟领导人张澜老先生，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当面称赞他“老成谋国”，这时表示：“我也反对用什么简称。”陈叔通也赞成此议。

接着，法律专家沈钧儒从法律的角度对简称问题进行了解释。他说：“如果有些群众还要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如此。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时，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 ‘简称中华民国’。”

于是，会上的态度成了一边倒，几乎都反对用“中华民国”这个简称。

最后，周恩来做小结，介绍了文件草案上有这个括号中的“简称‘中华民国’”的缘由。他表示：“我要把今天大家发表的意见综合送给大会主席团常委会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做出最后决定。”

27 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继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议的主席团执行主席是：张澜、李立三、贺龙、沈雁冰、薄一波、周恩来、宋庆龄、张云逸、陈叔通、赛福鼎。讨论和通过了政府组织法，一致同意和决定：去掉国号后面“中华民国”的简称。政协代表们认为，去掉简称“中华民国”，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革命的历史意义一概抹杀。如辛亥革命、国共合作等都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

同时，马叙伦代表国都、纪年、国旗、国歌方案整理委员会向大会做了报告。

经过讨论，周恩来代表主席团提出了 4 个决议草案付诸表决：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 1949 年；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中的人民大团结。

周恩来的话音才落，掌声如雷，响彻了整个会场，经久不息。以上 4 个议案被全体代表一致通过。遗憾的是因没有合适的国徽，即使在国庆日上也未能用上新中国的标记。

29 日，周恩来作为会议执行主席之一，主持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

30 日上午，全体休会。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怀仁堂举行闭幕会。

会议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张澜、李济深等 180 人当选；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正副主席及全体委员：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

济深、张澜、高岗 6 人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等 63 人为政府委员；讨论和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和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

会上，周恩来提议将“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上。他解释说，之所以这样提议，是因为天安门广场有“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同时这里也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敬仰的地方。这个意见得到大多数代表的赞同。

毛泽东宣布大会闭幕，49 名着新式军装的军乐队员，演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下午 6 时，毛泽东等全体政协代表从怀仁堂来到天安门广场，整好队，开始举行纪念碑奠基典礼，首都各界群众代表 3000 余人也列队出席。

林伯渠在庄严的国歌乐曲声中宣布仪式开始。周恩来在庄严的氛围中，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辞：“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1949 年 9 月 30 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礼。”接着，全体代表脱帽静默致哀。

哀毕，毛泽东宣读纪念碑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尔后，毛泽东跨步向前，执铲铲土，投入坑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其他代表们也都一一铲土入坑，为纪念碑的基石培土，为中国“第

一碑”奠基，表示对革命先烈的崇敬。

当晚，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宴会，庆祝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的胜利闭幕。

五 三十万群众欢庆前的实地演练

成元功在晚年接受采访时回忆说：为了在 10 月 1 日开国大典举行之时，使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全体成员能够安全、准时地到达会场，登上天安门城楼，事必躬亲的周恩来于 9 月 29 日进行了一次实地演练。

“当日上午 10 时 30 分左右，在中南海勤政殿办公的周恩来，走出勤政殿，在门口对我们说，60 多人从会场出来上车需要 5 分钟。他看了看手表，乘汽车按去天安门的预定路线要司机缓慢行驶，出中南海东门，进故宫西门，后出午门，直到天安门城楼后边停下，下了车。他看了看表，走了 7 分钟。这时余心清、李福坤等人早已在此迎候。周恩来说：‘人和车在这里聚齐需要 5 分钟。’并对现场指挥车辆的同志说：‘10 月 1 日，中央领导同志来了以后，一律从西马道上天安门，其他领导同志从东马道上天安门，你们要把西停车的地方留出来。’5 分钟后，他和在场的同志从西马道缓步登上天安门城楼（登天安门的东西马道是对称的，都各有 67 个台阶，马道共分四段，每段都有一个小平台）。周恩来在大家的陪同下，先上一个小坡，登了 16 个台阶，来到第一个小平台停下来休息 1 分钟，然后又登了 17 个台阶来到第二个小平台，又休息 1 分钟，接下来再登了

17 个台阶，来到第三个小平台，再休息 1 分钟，最后又登完了 17 个台阶，到达天安门西大平台上，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就矗立在这里。周恩来看了看，一共用了 8 分钟。然后他对在场的人说：‘朱总司令和几位副主席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需要这么长时间才能走上来。’”成元功回忆说：“周恩来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负责转播开国大典盛况的人也在西平台，他把广播电台负责人叫过来，并站在离台阶 3 米左右处说：‘10 月 1 日，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走到这里时，你们通过广播宣布，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毛主席登上天安门了！这时，广场乐队立刻奏《东方红》乐曲。’”

成元功还记得，周恩来和电台的同志说完，与在场的人边走边说，慢慢走到天安门城楼中间，站在毛主席要检阅的地方，他又看了看表，没讲话，把脸转向左边，见那里有一根茶杯粗细、六七十厘米高的木桩子，顶部还安有一个电开关，一个 30 岁左右的同志赶紧指着那个木桩子介绍说，“这是毛主席升国旗用的电开关，下边附有电线，一直到达广场的旗杆上面，到时候，毛主席只要把开关往右拧一下，五星红旗就会升到旗杆顶，在广场上飘扬。”周恩来问：“你能保证吗？”那位同志答：“我都试过几次了，没问题，一定能保证。”周恩来一连又提了几个问题，到时候停电了怎么办？电线中途出了问题怎么办？……接着对那位同志说：“要保证国旗到时候能顺利升上去，你要做两手准备，一旦停电或是线路出了问题，就是用人也要准时把国旗升上去！”那位同志连连点头称是，并保证一定做到万无一失。然后，周恩来站在中间台阶上，左看右看向李福坤了解天安门广场两侧民房的情况。李福坤说：“东边是公安部和市公安局，没有民房。西边主要是司法部，民房不多。”之后周恩来又对余心清说：“孙中山的像摆得远了，要向这里移近一些，还要抬高一些。”

成元功（左三）陪同周恩来、邓颖超散步。

随后周恩来来到城楼内大厅，中间有高出地面约 20 厘米的木制平台，面积约 30 平方米，上面铺着地毯，三面摆有沙发和茶几。周围用高盆景的松柏、桂花、水仙花和屏风围着。余心清介绍说：“这是主席、副主席休息的地方。”周恩来走上去看了看，没说话。大厅两侧摆有约 15 米长、1.5 米宽拼成的长条桌，上铺白台布，周围有椅子。余心清说：“这是供大家休息、用茶点处。两头有临时医疗点，高大的大厅只用了前半部。”布置既朴素又大方实用，周恩来看了没说话。

成元功回忆说：“亲临天安门城楼实地检查安排完，周恩来从东马道下了城楼。上车前对余心清说：‘还要准备两副担架，何香凝、司徒美堂要坐担架，其他人自便。’在回中南海的路上，我坐在汽车副驾驶

30 万人在天安门广场游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座上，周恩来和何谦坐在后排座上。周恩来又说：‘从勤政殿起步要 5 分钟，路上行车 7 分钟，下车后等 5 分钟，上天安门城楼 8 分钟，从西平台到检阅台要 5 分钟，总共需要 30 分钟太紧了，要留 5 分钟余地给年岁大的老人，几位副主席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留点余地好……’”

按照大典筹委会的安排，开国大典决定在 10 月 1 日下午 3 时在天安门城楼举行。据成元功回忆：“举行前，按照事先预定的议程，下午 2 时先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即宣誓就职仪式，会议很简短，毛主席讲话后，大家鼓掌表示同意。会后集体去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

大典的主持人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总指

挥是周恩来。10 月 1 日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毛泽东和各位副主席及委员们都衣帽整洁地前来参加会议和开国大典。成元功说：“这天下午 2 时 25 分，周恩来宣布，现在大家可以走了。大家兴致勃勃，有说有笑地离开勤政殿，走向各自汽车，去参加开国大典。车队按预定的路线出中南海东门，进故宫西门，然后出午门，直达天安门城楼下。周恩来看了看表，时间还早，便请毛主席等一下几位副主席，5 分钟后大家一起从西马道登天安门城楼。”

此时，天安门已经整修得焕然一新。赭红色的门洞顶端高悬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东西两边是两条横幅标语：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一为“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城楼的九开间大殿上，悬挂着红底黄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横幅，大殿房檐下挂着八盏特大大红宫灯，八面红旗呈水平分别插在天安门东西平台上。

成元功注意到，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神采奕奕地将要走到预定位置时，一向不走在毛泽东前面的周恩来，这一次却例外地从毛泽东左侧快步走到前面，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设在天安门平台上转播的同志挥手示意，早已做好准备的电台播音员，心领神会，立即通过扩音器宣布：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毛主席登上天安门了！

广场上的两个军乐团立即奏响了《东方红》乐曲，随着乐曲，广场上 30 万群众立刻欢腾起来，“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接连不断。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平台上，向欢呼雀跃的群众挥手致意。这时事无巨细的周恩来向后一看，几位年长的副主席没有跟上，他立即要成元功找工作人员去搀扶他们。几位老人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于 3 时前到达了自己的位置。据成元功回忆，开国大典前有三位老人是坐担架抬上城楼的，他们是何香凝、张澜和司徒美堂。

下午 3 时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国大典开始，请毛泽东主席升国旗。这时，毛泽东向左转身拧动木桩上的电钮，新中国国旗——第一面五星红旗在矗立于广场上 22 米高的旗杆上冉冉升起。广场上的军乐队奏响国歌，设在前门内马路两侧上的 54 门礼炮齐鸣礼炮 28 响。

成元功回忆说：“再接下来是毛主席讲话，当他用浓重的湖南普通话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今日成立了！’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广场上响起了兴奋热烈的掌声。当他宣布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时，城楼平台上、广场上再次响起长时间的掌声，有的领导人向周总理握手表示祝贺。再接下来是朱总司令走下天安门城楼，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部队……”

朱德检阅了陆海空三军，并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晚上，北京市民举行提红灯游行，直到 9 时许结束。

为此，在中华大地上诞生了一个空前统一的人民共和国。

第三章
抹不掉的红色记忆

一月的北京，总是天寒地冻。每年这天早上 10 点之前，就会有固定的一群人身着深色素服，顶着凛冽寒风，神情凝重地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默默献上鲜花和水果。每个人怀着烙在心底永远抹不掉的记忆与哀思，绕着纪念碑转一圈，在他们的心里有一个共同悼念的身影——开国总理周恩来。他们之所以选择在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南面，是因为那上面的碑文是周总理亲笔手书的。这群人中有很多与总理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们就是曾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秘书、警卫、司机、炊事员、医务人员，等等。

在这群人中，有一位年逾古稀而不失硬朗的老者，他就是曾在总理身边当过 5 年卫士的韩福裕。笔者在一个炎热的午后，有幸拜访了这位从不接受采访的老人。韩福裕不愿多谈，只说很普通，没有什么，非常的谦和、平易，他不时地说自己这辈子很幸福，能在伟人身边工作。言及悼念活动，这位老人终于打开了话匣子。周恩来日理万机、忘我工作的拼命精神，他那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细节般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韩福裕坦言，总理影响自己一辈子，总理的高尚品德和风范无声浸润在自己日后的每一个脚印里……

一 小事之中反衬出的伟大人格

西花厅总理办公室，简洁、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绿色的旧地毯、一排沉重的旧书柜、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三五只沙发，再就是那张比一般人家昔日所摆设的好不了多少的旧式样写字台——既不是名贵的硬木，也没有任何雕饰，只用普通的板材做成，漆成棕色，抽屉的拉手是由铁片弯成的半圆形，桌面上铺着一块绿色的桌毯，四周用揿钉儿固定住。一只白色的瓷茶杯，一个红盒的清凉油，一把削好了待用的红蓝两色铅笔，一块放大镜，还有一个小闹钟……此刻它们静静地在桌上各就各位，仿佛怕惊醒刚刚入睡的主人，又似乎等待着他的归来。这就是西花厅周恩来的办公室，在这里，周恩来所做的一切，无不关系着国计民生，牵动着世界风云……

在西花厅里，除木板墙围和暖气罩外，人们见不到一点时髦的装饰，它依旧是纯朴的古风不改。让韩福裕记忆犹新、永世难忘的就是在 1959 年工作人员乘总理外出不在之机将房屋修缮这件事。“总理住的这所房子从 1908 年到 1949 年就有 40 年了，他 1949 年住进去的时候因年久失修，已经很破旧了。但他不让修，只是简单地粉刷了一下，一住又是 10 年。

这时大家就提出给总理修修房子，这当然是国务院总务处提出来的，想趁总理和秘书都到南方去了，把房子给修一下。这次修缮叫改善性维修，就是把灰顶棚改钉五合板，墙搞了护墙板，地由砖地改成地板。总理回来后见到了我，对我说：‘韩福裕，这个房子是你们修的吧？干什么修这么高的标准？’我说：‘总理，我在外面搞了这么几年修建，这个标准不高。’他说：‘你好大的口气啊。’他问我外面的柱子漆它干什么，我说老房子都是砖木结构，主要靠柱子支撑，咱这是最简单的做法了，要按老式做法应该是披麻，叫‘一麻五灰’共 13 道工序，才算按规矩做的。总理说你们就是跳不出老框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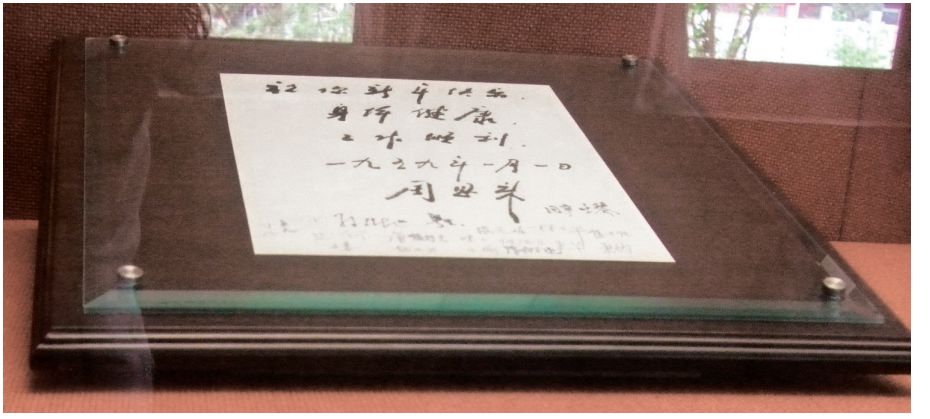
“我们作为他的卫士是保护、照顾他的。总理的右胳膊受伤了，屈

1955 年 3 月，刚做完阑尾手术的周恩来在西花厅休养时，与卫士韩福裕一起散步。由于韩福裕患肠胃病，周恩来认为他不适宜做卫士工作，并建议其调离岗位。

伸不方便，我们协助他穿衣服，就要先穿右手，再套左手，最后提上去。他非常整洁，领子上的风系扣要系好。有一回，总理整理装束，我见他胳膊活动不很灵活，就主动躬下腰打算帮他系上鞋带，但是他说什么也不愿意让你帮他系。他就脚蹬到凳子上，自己弯腰，有点困难地自己系。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总理是非常尊重他人人格的。”韩福裕一边有一些激动地说，一边做着当时总理系鞋带的吃力动作。

“这样的小事，生活中很多。我老伴儿刚到时，在邓大姐身边工作，开饭时给总理也打上一份。总理吃完后，她就端着托盘往厨房走，总理就马上走前两步，帮她把门打开，等她走过去。”韩福裕一说起这些事，感慨不已，“像我才去时，不太清楚总理的‘规矩’。有一次和他去后厅，当时是冬天，后厅门挺宽，挂着棉布帘子。他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总理步伐矫健，走得很快。快到门口了，我就跑前一步打开帘子，他就说：‘放下，放下，我有手，我自己来。’当时周围没任何人在看，就我们两个，我是他的卫士，就是照顾他的，有点眼劲儿的都会这样，而他却真的是表里如一、言行如一，对人很平等，对自己很严格。”说完，韩福裕还不时地感叹：“总理没有一点官架子，但很有气派、很有风度，一看就是领导人，但对人平易温和、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人不能不感动。”

据韩福裕回忆：刚解放的时候，有一次，他随总理到中南海服务处理发、刮胡子。总理坐到理发椅后，屋内地方小，他就把总理的外衣搭在右臂上，退到门外。这时毛主席突然想起一件什么事要找总理商量，秘书们打电话一问，说总理去理发室刮胡子去了。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关系亲密无间，又都住在中南海内。这时，主席就带上警卫径直找到理发室。韩福裕一见主席来了，就要向他行礼，但手里拿着总理的衣裳，不好使，只好成立正姿势，向他行注目礼。主席的警卫就告诉主席，这



1959 年，周恩来及亲属、身边工作人员给邓颖超的新年贺信。

是总理的卫士。主席笑容可掬，很随和地问：“你叫什么名字？”韩福裕赶忙告诉他，叫“韩福裕”。说过之后，考虑到自己的山东口音主席不一定听得清，又进一步补充说：“是韩信的韩、幸福的福、粟裕的裕。”主席一听笑着说：“你这个名字好呀，包含了中国两个大军事家韩信和粟裕，你还比他们都幸福。”逗得在场的人包括总理都笑了。这时，总理听说主席找来了，就打算让理发师停下手中的活，主席连忙制止：“我没有急事，等你刮完了再谈不迟。”

有过这一次“教训”，周恩来就让身边工作人员给他准备剃须刀，一般就自己在家刮胡子，为此在西花厅后厅还准备一面穿衣镜，以便让他刮过胡子后再站到镜子前，照一照有没有“漏网”的胡茬，看一看衣服领子、风系扣什么的有没有理顺，扣好。不过当时的国产剃须刀质量还不过关，经不起周恩来硬胡茬的磨损，一张刀片用了一两次就得换，有的甚至一次还没刮完就卷刃了。他的卫士长成元功就趁随他出国时，从国外多买一些刀片轮换着放进他的洗漱间。周恩来用得最满意的就是美国产的老头牌剃须刀。

二 最后的岁月也难忘遇难烈士家属的生活

八宝山矗立着“参加万隆会议遇难的烈士公墓”的碑座，碑名是周恩来亲题的。当年周恩来所率代表团去参加亚非万隆会议，由于那时中国民航还没有远程飞机，代表团只能向印度航空公司租用一架“克什米尔公主号”载送代表团去印度尼西亚，飞机停到香港启德机场等候。但代表团在昆明时得到情报：国民党特务准备在这架飞机上放置爆炸物。外交部有关部门立刻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告知有关情况，并要他们转告香港当局注意采取安全措施。总理应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将先访问缅甸，代表团又向印度再租用了一架飞机，从昆明出发先到仰光，处理中缅两国之间的问题。但是，香港当局对机场地勤人员没有检查和监督，国民党驻香港特务机关收买一名检修人员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机翼下放置了定时炸弹。飞机飞离香港前往印尼后 5 小时便爆炸，中国先行团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 11 人全部遇难。其中有一位是中办交通科科长、总理的司机钟步云。讲到这里，韩福裕拿出一张珍藏多年的与钟步云的合影，指给我们看钟步云烈士的遗像。

韩福裕讲：钟步云是位江西瑞金出来的老红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

长征。事发后，总理很悲痛，他见到钟步云的妻子高秀英时，握着她的手，痛心地说：“钟大嫂，老钟是替我牺牲的……”高秀英悲痛地说：“您能平安回来，就是全国人民的幸福。”而后，总理知道钟步云有个哥哥是农民，在老家，很穷。钟步云在生前每月寄几十块钱回去贴补。从此，总理就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钱来按那数目不断地寄去。在钟步云逝世 10 周年之际，钟步云的哥哥说家里情况好转了，叫高秀英回家看看。高秀英回来后就告诉总理，家里经济状况好了，叫总理不要再寄钱了。总理又问她这回一趟家来回花了多少路费，因为当时的路费是高秀英从财务处临时借的，总理又直接用自己的钱帮她补上了。

1975 年 1 月，总理进入了他生命的最后日子，他清楚地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尽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就有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作安排。在 3 月下旬，第三次大手术前，总理在秘书的协助下处理住院以来尚未批办的重要文件，其中不少是“文革”以来受到“审查”的许多党政军高级干部的“悬而未决”的材料。总理对专案组认为“能够做出结论”的审查对象的材料一看再看，使这样一批长期遭监禁的革命老同志陆续获释，同时又同“四人帮”继续做斗争。被疾病折磨得憔悴的周总理，还在细致地不停地工作，还是像过去一样对普通百姓的安危冷暖时刻挂在心头，继续为这些事操心。

在“克什米尔号事件”20 周年时，总理躺在病床上已很虚弱，但又想到了高秀英，就派人去看看她，主要问她有没有什么困难，有困难就写封信告诉他。高秀英当时年纪较大，身边 6 个子女都上山下乡插队去了。老人无依无靠，也就告诉总理她身边没有一个照顾的人，有回病了躺在床上，要喝口水都没人端，自己下床时就摔在了地上，希望自己插队的小女儿回来，留在身边照顾自己。总理见到信后，亲自批了一张条叫人

去办。当时一个办事的局长知道了，就责问高秀英说你知不知道总理病了，你还写信干扰总理的治疗。老太太一下急了，非常激动地说：“老钟生前跟你们在一起工作，死了这么多年，你们问过一句没？只有总理想着，派人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我才写了信……”半年多以后，总理就与世长辞了。但目睹这一切的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被深深地打动了，对总理念念不忘。

“在‘克什米尔号事件’50 周年纪念日时，我陪高秀英老人一块去八宝山扫墓，她又深情的向我提起了当年病中总理对她的关怀与件件往事。这事还不见有关媒体报道，今天你们来采访，我就讲讲这不为人知的故事。”韩福裕润了口茶水，顿了顿，又向笔者讲开了。

当年，周恩来因临时改变行程而在“克什米尔号事件”中幸免，但他对飞机因人为破坏爆炸失事而遇难的烈士深深怀念，且对烈士家属的生活常年牵挂在心。与会的死难烈士纪念碑背面刻着烈士的姓名与简历，碑文记载有烈士们殉难的经过。韩福裕曾说：“总理一生中曾遇到过许多次危险，期间身边的不少工作人员牺牲了，他总是说那些烈士是替自己死的，并说自己永远也不能忘记他们。总理总是亲自参加烈士追悼大会，并号召大家永远向他们学习，为革命工作努力，还经常用自己的工资帮助一些家庭困难的烈士家属。让我们十分感动！”

三　工人雕塑家铿锵地精心赶制墓碑的背后

张西曼，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国民党左翼人士、进步的社会活动家，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1949 年 7 月 10 日，因多年革命奋斗积劳成疾，身患肺癌的张西曼在北京病逝，遗嘱“生不能多做贡献于中国受苦的人民，死亦不愿玷污净土”，愿将遗体捐赠给协和医院“作科学上继续解剖研究之用”，“以福利于后之患者”，终年仅 54 岁。张西曼身后由董必武、周恩来、林伯渠等 19 人组成治丧委员会，周恩来应张西曼的夫人魏希昭之请，亲笔题写墓碑“张西曼教授之墓”。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67 年，张西曼的女儿张小曼前去父亲的墓地祭扫时，发现所在万安公墓一片狼藉，好在父亲的墓碑完好无损。1968 年，张小曼再去探望，却发现父亲的墓碑在“文化大革命”反总理的妖风中被毁。张小曼曾回忆说：“当时，我的心在流血。1976 年 1 月 8 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举国同悲。当时，我拿着周总理应母亲之请亲笔题写的张西曼墓碑的卷轴，在总理治丧委员会的门外苦苦等了整整两天，终于在 1 月 10 日晚获得特批同意我陪母亲去灵堂为人民的好总理送行，母亲坐在轮椅上由我推着绕灵一周，望着周总理清瘦的

面庞热泪滚滚而下。在遍寻不到任何其他亲属人力物力支持的情况下，1978 年我以个人名义通过胡乔木老院长转呈国务院邓小平副总理，父亲张西曼的由周恩来总理题字的墓碑才予以修复。”

其实，万安公墓里同时被砸的还有任锐的墓碑。烈士孙炳文的夫人、总理的干女儿孙维世的妈妈任锐的墓碑碑文也是总理题的，在“文革”中被砸毁。1975 年，孙维世的丈夫金山刚从 8 年的牢狱中出来，才知道岳母的墓碑被砸了，就想用国家补发的工资重建。通过韩福裕的讲述，另一个有关总理所题墓碑的故事向我们展现出来：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找到当时在中南海修建工程处的韩福裕，说金山出来了，想请你们看电影，不知道你们肯不肯。在当时政治气候仍未稳定的情况下，与他们接触的人还可能受到牵连，但是韩福裕不怕，心底里说：“组织上都相信他了，把他放出来了，我见见老朋友有什么不可以。”见面时，金山提出了请韩福裕帮忙修复岳母任锐的墓时，韩福裕一口答应了。然后他出面到建筑雕塑艺术工厂找人，但那里的头头说要有民政部出具的证明才行。所谓的证明是看墓主是不是坏人，因为要是好人怎么能砸你的墓。他们就又只好去开证明，但当时组织部没有恢复正常工作，而年轻一辈的负责人根本就不知道任锐同志的情况，最后找到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签字证明才通过。

“他们到了石料加工厂，5 个工人雕塑家一听碑上的字是总理亲题的，二话不说，冲着总理、冲着烈士，他们连夜加班加点，铿铿地很精心地赶制，将总理写的字一笔一画重现在那洁白的大理石上。凿刻完后，加工费说什么也不收，孙新世他们心里很感激，但心里过意不去，钱不收，就请他们吃饭，送烟、送糖，但都被拒绝了。后来我就给他们出了个主意，买了 5 本纪念总理的画册《人民的悼念》送去，他们才收下。”当时的情形，韩福裕记忆犹新。

我曾把这个消息（指修复任锐墓碑的消息）告诉了总理，想让他高兴高兴。周总理说：“进城以后，我应家属的请求，只为 3 个人题写过墓碑：一个是任锐同志，一个是张西曼教授，这两个墓都在万安公墓，都被砸了。还有一个是张瑞芳的妈妈廉维的，因为是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又没有我的题名，才没有被砸……”后来我从万安公墓处得知，那两个墓碑都是在 1968 年的同一天被人偷偷砸毁的，可见当时的斗争是多么尖锐和复杂啊。后经过多方奔走，韩福裕于 1975 年便把任锐墓碑的碑心和碑身全都修好了，但当时不敢立起来，直到 1978 年清明节前才重新安设任锐的墓碑。

“如今，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角，那座由总理题写碑名的廉维墓碑清晰可见。我曾几次拜谒了廉维同志的墓地。她是名伟大的女性，坚定的共产党员，参加过抗日战争，曾被敌人打得右目失明。但坚贞不屈的她，还把自己的子女送上革命前线。”随后，韩福裕找出相关资料向笔者提供了总理同廉维的女儿、著名电影艺术家张瑞芳的一段轶事。

总理生前，曾对廉维的女儿张瑞芳说：“你的母亲是值得尊敬的英雄。她受的苦，比你们兄妹几人加起来都多。”1960 年，廉维因脑溢血去世。总理每天为国事操劳，廉维的子女们自然不愿去打搅他，没有人告诉总理他们的母亲去世的消息。在葬礼后当晚，中南海就来了电话，是总理的，总理在电话里责怪张瑞芳为什么不通知他，不让他去见一面。总理的责备与伤心，让作为子女的家属深深感动。韩福裕说：“后来张瑞芳在全家建议下写信给总理，请总理亲笔题碑，但不署名。总理就题了好几张字，一张张地挑选、一字字地斟酌。”

1941 年春，周恩来在重庆曾作过一次十分感人的露天演说。在演说中，他提到“母亲冷落的坟地还在日占区，自己多么希望能回家乡去清扫坟

上的落叶啊！”淮安距南京近在咫尺，但为什么最终没能成行呢？韩福裕揭开了谜底：1950 年 1 月，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为动员干部过好“土改关”所作的报告中，曾坦诚自己的思乡之情，以及 4 年前没能回老家的原因。周恩来说：“那时我就想从南京到淮安去看看，但我考虑再三，终究没有回去。当时我考虑的有三个原因：一、淮安当时虽是解放区，但我判断蒋介石迟早是要打内战的。如果我当时回去了，一些因见过我的亲友，可能会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二、当时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所属的苏皖边区政府正在搞土改，我回去后，周、万两家我的亲戚中会有部分人因为与我的这层关系而给地方土改带来困难；三、当时时局不稳，我回淮安就必然牵动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地方各级领导，给他们增加安全保卫和接待工作方面的麻烦。”

周嵩尧是周恩来二伯祖父周骏昂的第三子，在周家同辈人中排行第六，所以周恩来一直亲切地喊他六伯父。1897 年，周嵩尧 25 岁时考中了光绪丁酉科第 35 名举人。在清末，周嵩尧曾担任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民国年间，曾先后担任江西、江苏督军专署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文史研究员。可谓历经三代，周嵩尧见证了中华民族的沧桑历程。

1951 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筹备期间，由政务院常务副秘书长齐燕铭推荐，周恩来批准，于这年 6 月正式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名义聘请周嵩尧为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首批馆员。周恩来在聘用周嵩尧这一职务前曾对他说：“民国年间你有两件德政，人民不应该忘记：第一，你在江苏督军李纯秘书长任上平息了江浙两省的一场军阀战争，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战火的涂炭；第二，袁世凯称帝时，你作为他大帅府的一名秘书，却没有跟他走，这是政治上很有远见的做法。现在人民当家作主了，应该考虑你为人民做点事。”

1952 年 3 月，周嵩尧唯一的儿子周恩夔在扬州因病去世，时年才过五旬。周恩来十分体贴周嵩尧老年丧子的哀痛心情，在征得老人同意之后，托人将他最疼爱的曾孙周国镇从扬州接来北京，一边上学一边陪伴老人，并负担了周国镇的全部学杂费及生活费用，以抚慰六伯父的丧子之痛。1952 年 8 月，周嵩尧 80 大寿时，周恩来还按苏北老家习惯，邀集弟弟周恩寿及在京侄儿、侄女们，齐集到西花厅设了简单的一桌家宴，为六伯父做寿。据韩福裕回忆，六老爷子过寿那天，总理很高兴，不仅在桌上带头敬酒，还亲自系上围裙，下厨做了淮安红烧狮子头等六老爷子喜欢吃的家乡菜。

1953 年 9 月 2 日，周嵩尧因患老年性气管炎在北京去世，享年 81 岁。百忙之中的周恩来亲临北京嘉兴寺向他的六伯父遗体告别，并主持了入殓仪式。9 月 6 日，周嵩尧出殡，由他的孙子周华章引棺领穴。据韩福裕讲，周恩来因公务繁忙，无法分身，便托邓颖超代表他前往送葬。邓颖超抱病送灵至北京东郊第一人民公墓，并代表周恩来亲自为周嵩尧的墓穴挥锹铲土，将其安葬。

四 每年六盆水仙准时开放

早在 1956 年，周恩来就同邓大姐共同约定：死后把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周恩来曾这样说：“人生来是为人民服务的。生前的工作、劳动是为人民服务；死后火化撒掉骨灰，落到水里可以喂鱼虾，落在地上的，可以作为植物的肥料，还在继续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人类才是生生不灭的。”

韩福裕说，周总理生前认为，我们中国人从全尸下葬保留坟头到深葬不留坟头只是殡葬改革的第一步；从死后火化保留骨灰算是第二步；只有从火化后不保留骨灰才是殡葬意义上的彻底改革。但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相约火化后撒掉骨灰的做法，周恩来一直有一个担心：不知道他俩谁先去世。周恩来认为，如果邓颖超先于他去世，他保证能撒掉邓颖超的骨灰，如果自己先于邓颖超去世，他担心邓颖超办不到。

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很快向中央打了报告，要求将周恩来遗体火化后撒掉骨灰，并最终得到中央的批准。这样，才有了邓颖超一边抚摸着周恩来的骨灰一边说“恩来，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这句动人心弦的话。

1981年1月8日，曾在周恩来办公室工作过的部分同志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合影（四排左三为韩福裕，前左三为其夫人霍英华）。

在总理刚去世时的有关吊唁活动，如遗体告别、追悼会等等，韩福裕都参加了。日子、每一个时间点，到晚年他都记得详详细细、清清楚楚。我们问他为何他去吊唁时总带上6盆水仙花，他说："1976年1月14号下午，劳动文化宫大殿里的吊唁一结束，邓大姐就捧着骨灰盒坐车到人民大会堂，将骨灰盒放到了台湾厅。总理生前，台湾没解放，他生不能去，是遗憾，那就……"说到这里有点哽咽，韩福裕眼圈也红了，"当时在骨灰盒左右两侧摆了6盆水仙花——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这么多年来我都记得。1月份太冷，也就水仙花开得正好。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养水仙，准叫它1月8号开，很神奇的。那洁白的花，翠绿的叶子，鲜黄的蕊，特别圣洁，总理的人格就像那一样……"

周恩来总理逝世多年，在总理身边生活过的人大多早已白发苍苍或已过世。死者已矣，但活者继续。"1992年邓大姐故去后，我们这群人将悼念场所换到了总理生活与工作的地方——西花厅。屋外的一草一木、屋内的一桌一椅，总理曾走过的地方、曾坐过的地方，总理曾同我们说过的话、曾望着我们的炯炯有神的眼神，一切的一切伴着总理的身影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难了的总理情结，让韩福裕难抑自己激动的情绪，

他说：“我们是长时间与总理直接接触的，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的人，直接感受着总理举手投足间对普通人民的关爱。”

据韩福裕讲：在每年的 1 月 8 日这天，还有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以普通人的身份，率几位高僧，手捧鲜花，肃立于纪念碑前，行最高规格的藏族礼仪向纪念碑献上雪白的哈达，感谢周总理对西藏人民和他本人的关怀。每年如此，直到他圆寂。“到了 1983 年，毛主席纪念堂开放后，我们就挪到了里面的总理纪念室去悼念，在这里我们畅谈过去，相互叙说不同的经历，相互交流自己所参与的社会上的各种纪念总理的活动，探讨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来发扬总理的精神。我们中有的在这天带上下一代、二代的孩子，让他们从这庄严的气氛中感受总理的人格情操，在教育他们奋发向上的同时，树立崇高的人格。”对于追念总理地点的变化，韩福裕向笔者作了补充。

2013 年 1 月 17 日，韩福裕在北京第二医院病逝，享年 83 岁，两天

1999 年 3 月 5 日，在西花厅举行纪念周恩来诞辰活动时韩福裕追忆过去的岁月。

2002 年 1 月 8 日，韩福裕夫妇等在毛主席纪念堂周恩来纪念室。

后即在八宝山举行了最小范围的亲人送别仪式。在送别仪式上，韩福裕的女儿韩迎建动情地讲：“父亲您走过了 83 年的人生，是丰富多彩的，是幸运的、幸福的。您出身贫寒的家庭，却是穷家骄子。您 12 岁背井离乡闯关东，历尽艰辛，但赶上了社会变革的大时代。您 17 岁投身革命，枪林弹雨，却九死一生。您随着东北四野解放大军来到北京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您从中央警卫部队选调来，有幸成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理的贴身卫士，这改变了您一生的命运。革命生涯几十年经历了许多风雨，虽受挫折，您都坚强平安地度过，虽然称不上对党和国家做出过多大贡献，但您为人正直，工作勤奋，善于学习，乐于助人，一生正气，两袖清风，正如毛主席说的，是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她的女儿还讲：“在家庭中做儿子，您是父母最偏疼的长子，您有一对高寿的双亲，给了您做孝子的机会。做丈夫，您有相伴人生 61 年的

1998 年 3 月，韩福裕夫妇瞻仰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时留影。

妻子，特别是在年老多病后，有我母亲十年如一日的细致入微的照顾与陪伴。您虽身患病痛，但您得到了心灵与肉体的最大安抚。用我妈妈的话说，你们相识于西花厅，相爱是从 62 年前您第一次手术的病房照顾开始，又在 62 年后的今天病房陪伴告终。做父亲，您给了 3 个女儿衣食无忧、情浓意暖的家，您是严父，却给了女儿最真挚的爱。试问有几个父亲曾为还是婴儿的女儿以第一人称写过一本日记，60 年前您为我写了。同时您也得到了女儿、女婿、外孙们的尊敬、孝顺与伺候。”

在女儿的眼里，“父亲您是个负责任，敢担当，重情义，有大爱的善良人，没有您真诚的付出，不可能得到了真诚的回报。您的一生，无怨、无悔、无憾。是圆满的一生。”

听韩福裕的夫人霍英华讲，韩福裕退休以后自费走访了周恩来生前去过的淮安、沈阳、南京、延安等地，爱钻研历史的他一直关注有关总理生平事迹与思想理论的文章。如今，可敬的老人走了，或许他正在天堂与自己敬重的周总理聊得正热……

第四章
开国总理临终想见的人细述红色往事

1945 年春，邬吉成被选调延安参加“七大”的保卫工作，后留延安从事中央的核心保卫工作。期间，他分别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站岗。1948 年春，邬吉成随中央前委移师西柏坡，后又随中央机关转至北京。

邬吉成曾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长期从事中央核心警卫和高层外宾的警卫工作，且亲自参与过粉碎“四人帮”。他见证了护卫领袖和国宾鲜为人知的细节，目击了中国政坛的风风雨雨，亲身感受了一代伟人周恩来的风采。在与邬吉成的接触中，一幕幕红色往事将中国人集体记忆中的细节展现在眼前。

一 流浪娃从晋绥边区到北平

1945 年初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中央保卫部门决定从晋绥军区各部队抽调一批军事过硬、政治可靠的人员，补充和加强会议的警卫力量。邬吉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延安的。他这样回忆：“当时我们晋绥六分区忻崞支队刚刚打完山西宁武县东南的日军一个据点，正在做战斗后的调整，我突然接到去军区学习的通知。去了驻在兴县蔡家崖的晋绥军区后才知道，学习是幌子，只为了保密，真实的目的是要送我们到延安保卫毛主席、党中央。”

由于邬吉成政治上可靠、军事技术过硬，各方面的条件好，被挑选为中央警备团警卫战士。于是，从兴县蔡家崖出发，由黑峪口过黄河，经过米脂、绥德、清涧、延川，一路辗转，走过大、小砭沟，来到中央警备团团部所在地——延安枣园的侯家沟。

邬吉成等被分配到中央警备团一营一连（手枪连）二排，连部与营部都在杨家岭。邬吉成在晚年还记得，自己的第一班哨就是站在周恩来院外当警卫，他说：“在延安时期，大家都尊称周恩来为周副主席。而我由于之前一直是在前方基层工作，当时也只是知道党中央有毛主席和

中共七大代表走向会场的时候，邬吉成和他的战友们就守卫在附近。

朱总司令，很少听说有关周副主席的事，更别说亲眼见到他了。周副主席家的院子外面有一口水井，井台上装有辘轳。我第一次站岗时，站了一阵儿，感觉有些困意，就靠在了辘轳旁。这时候，周副主席回来了。他当时并没有像其他首长一样穿粗布制服，而是穿了件根据地不多见的皮夹克。他步子走得很快，后面跟着两个挎手枪的卫士。我当时很犹豫，不知道要不要拦住他。按规定不认识的人应该先拦住询问一下，可万一他就是住在这里的周副主席呢？最终，我还是没有拦住他。这使得我的心里就一直在犯嘀咕。下岗后，班长石玉玺告诉我，那就是周副主席，没有放错人。”

中共七大召开前，中央有关部门和中央社会部、中央警备团专门研

究了警卫工作，作了周密的部署。由中央社会部和中央警备团两家组成临时警卫处，指派警备团团长吴烈和社会部的陈龙为负责人。警卫处下设内勤、警卫和防空 3 个组。邬吉成所在的一连负责会场开大会和举办各种晚会的核心警卫，以及礼堂各大门的入场证件检查，防空洞的检查维护，杨家岭、延水桥的警卫。

周恩来较早地参与了七大的筹备。从大会的早期筹备，到组织大后方的代表到会，从参加整风运动，端正思想路线，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协助代表资格的审查，从参与联合政府的谈判，到准备大会报告，周恩来在中央的领导下，和其他许多同志一起努力，保证了大会的顺利召开。

周恩来作为七大主席团常委之一，参与领导大会及中央日常事务。他在开幕式上作重要演讲；在大会发言中系统总结统一战线历史及其深刻的历史经验，并发扬民主，勇于开展自我批评；耐心解释说明大会选举条例，努力保证选举的顺利进行。历时 50 天的七大，周恩来全力以赴，他和其他领导人、代表们一起，保证了大会的圆满成功。七大开幕式上，全体正式代表表决通过大会主席团人选，并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 5 人组成七大主席团常委会，实际上也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雏形。周恩来在七大期间的 21 次大会中，担任两次会议主席，并在大会开幕式上，周恩来在毛泽东、刘少奇之后作大会致辞。他的致辞回顾了六大以来党的事业发展并取得的巨大成就，虽然简短仅约 1400 字，却真挚感人、很有说服力和震撼力。他指出：“从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现在，已经过了 17 个年头。在这两个大会之间的 17 年，我们党经历了国际、国内、党内多次的重大事变，走过了千辛万苦、艰难曲折的道路，终于锻炼成为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也是一个很强大的很有能力的共产党了。”这样的党是依靠什么力量锻炼成的呢？周恩来

认为，我们依靠了全党同志的共同努力，依靠了数十万党内、党外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依靠了上万万人民大众跟我们的共同奋斗，依靠了与国内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和全世界进步人士的同情；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依靠了党的领袖毛泽东的英明领导。

就在这次警卫任务中，邬吉成感受到与前方的环境截然不同：在前方满眼是敌人的残暴与战友的流血牺牲，这里一派和平，可以听到激动人心的报告。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报告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郑重地提出了中国人民强烈希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基本要求。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报告还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周恩来充满信心地指出，我们是快要胜利的党，党的七大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将要保证胜利地领导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的胜利。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天傍晚 6 点左右，邬吉成正在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住所门前站岗，见邓发从隔壁的周恩来住处一出来就高喊：“日本投降啦！日本投降啦！”很快，邬吉成感到整个杨家岭沸腾起来了，所有人都十分激动。

不久，中共中央拟将中共领导核心从陕甘宁边区迁移到晋察热辽解放区的承德，由李富春先行赴热河，做中共中央大搬家的前期准备工作。为此，中央警备团也分为两部分，抽调二营五、六连和团机关部分干部，并从中央社会部办的培养公安干部的西北公学抽调一个连，共 400 余人组成一个先行中央警备团。留守延安的警备团工作一下子繁重起来。

进入 1946 年后，内战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这时，邬吉成开始执行保卫毛主席等以及苏联设在枣园西山上的与莫斯科联络的电台的安全任务。他说：“在枣园，毛主席住的窑洞外有院墙，与他的小院紧挨着的东边，是朱总司令的小院。当时只有毛主席和朱老总有单独的警卫班，负责他们院子里面的警卫。我们则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首长的院子外面站岗，负责外围警戒。”

从 1947 年 3 月 11 日到 18 日，敌机对延安的狂轰滥炸接连不断。后来人们才知道，蒋介石把他的空军三分之二的轰炸机都投入到对延安的轰炸。邬吉成回忆道：“毛主席、周副主席、彭老总以及被毛主席、周副主席招来谈话的第二纵队司令员王震等是最后走的。毛主席、江青和警卫排长阎长林及几个警卫，坐一辆吉普车；周副主席和他的几个警卫，坐另一辆吉普车。我所在的班，成为保卫毛主席的两个班之一。我们乘坐一辆美国造的中型吉普车，一辆带拖斗的小吉普车紧随后面。这时的延安城里已经不太安全了，胡宗南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吴家枣园。”

在转战陕北期间，其他领导人的夫人都没有跟随前委行动，唯独江青一直跟着毛泽东。在邬吉成印象里，整个队伍里也许有个别的女译电员，几乎看不到女性，于是跟在毛主席身后的江青比较显眼。“转战陕北的那段日子，生活异常艰苦。有时没有粮食接济，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就和全体指战员一起嚼喂牲口的黑豆。”

在西柏坡，中共领袖的警卫班子进行了调整，成立了警卫处，由汪东兴任处长。“警卫处下设警卫科，李树槐任科长、毛崇横任指导员。中央的 5 位书记，每人都配一个警卫班，合称警卫排，排长由阎长林担任。”

1949 年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一结束，中共中央各机关部门就开始了进京的准备。在这之前，邬吉成被调到中央警备

刚进京时的邬吉成。

团团部工作。

邬吉成所在的中央警备团团部驻地在香山的卧佛寺。邬吉成说，由于党中央在香山附近，但许多重要活动又必须在城里进行，于是香山一带以及从香山进北平城内的沿线也成为警卫工作的重点，由第四十七军二〇七师派出2个团6个营的兵力负责。此外，华北军区高炮二团一营3个连的12门高炮和12挺高射机枪保卫香山上空，以防敌机袭扰；北平市公安局负责香山周围和香山至颐和园、西直门的便衣警卫。

出于警卫范围的扩大、工作的加重，以及北平城市的公安工作等统筹考虑，以中央警备团为基础，扩编为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师长刘辉山、政委张廷桢、副政委张耀祠。邬吉成被任命为新五团二营某连副连长。

此时的北平并不太平。由于是和平解放，傅作义的军队虽然在城外进行了改编，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也趁机潜伏了下来。新全国政协会议召开时，邬吉成所在的二营防区是从玉泉路到石景山一线，不停地做防备巡逻。邬吉成找出当年身着戎装的老照片回忆道：

10月1日凌晨5时，整个天安门广场，城楼下，金水桥后，东西观礼台，包括后来的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广场向南到前门箭楼，红墙中间的松树林地带，全部严密警戒，封锁各路口，禁止任何车辆行人通行。

从干部到每个警卫战士，都感到责任重大，压力很大，都在紧张地忙碌，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保卫天安门广场的安全上。而邬吉成所在的新五团则在外围处于一级战备状态，“随时准备执行紧急任务，但白天并没有发生什么异常情况。但我记得在那天晚上，八宝山方向突然传来零零星星的几声响。团里立即派了一个排到枪响方向搜索，但现场已经没有人迹发现，估计是特务在捣乱”。

邬吉成（中）刚到北平时与警卫二师副政委张耀祠（左）、副参谋长古远兴合影。

二 见证“改变世界的一周”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总统尼克松入住白宫后想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开展“均势外交”，增强美国对付苏联的力量，并调整其亚洲政策，多次做出寻求“与中共改善关系”的姿态，包括主动建立了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与中国互传口信的渠道。

1970年10月末，美国向中国表示愿意派特使赴北京。毛泽东在12月间同美国作家斯诺的谈话中讲到，尼克松坐上飞机就可以到中国来。1971年4月，邬吉成在中央警卫处一次党委常委会上，正式得悉美国政府要派重要人物来华。5月中旬，尼克松表示，为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问题，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人进行直接交谈，并建议由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赴华与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议。

接待基辛格秘密来访的工作，从当年6月末就悄悄地动起来了，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亲自部署成立了对美工作的领导班子，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负责，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等参加。邬吉成曾回忆，当时，周总理亲往钓鱼台国宾馆选定了他情有

独钟的、距北门不远的 5 号楼作为基辛格一行的下榻之所，周总理选择在 4 号楼办公，便于会谈。在晚年，邬吉成还经常翻出一些在钓鱼台国宾馆负责警卫工作时留下的珍贵照片，追忆红色岁月。

邬吉成（左二）与警卫战士在钓鱼台 17 号楼前合影。

为了确保基辛格一行的安全和秘密来访的消息不外泄，作为钓鱼台国宾馆警卫工作负责人的邬吉成，根据上级的有关指示，对钓鱼台国宾馆院内的各哨卡做了新的部署：北门除参加基辛格接待的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准通行。5 号楼与 6 号楼之间的一座小桥，新添设哨位，与此次密谈无关的人员，不能通过小桥进入 5 号楼区域；区域内的人员，也不从此桥外出。同时，接待负责干部对参加这次接待工作的所有人员，包括警卫人员、服务人员和司机，均作了严格规定：严守秘密，保证安全，在执行任务期间不回家，不能往外面打电话，不准做记录。

邬吉成回忆说：“5 号楼的部分房间，立即被组织人力粉刷一新。沙发、窗帘和一些家具，也全换了新的，空调等设备也做了全面检查。基辛格房间的客厅里，增摆了酒台，放了各种中外名酒和香烟等。当然，这些都得到了周总理的指点。”“文化大革命”时期，钓鱼台各楼内都

摆放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但接待人员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把这些语录撤走了，将“文革”色彩强烈的红卫兵瓷像和宣传画等工艺品换成了文物、字画。然而出乎接待人员意料的是，后来住在这里的基辛格一行临走时，竟特意向我方提出想要《毛泽东选集》。

据邬吉成讲，基辛格等在京两天的菜谱，都是事先定好的，每餐不重复。以总理名义宴请的菜谱，则由周总理亲自审定。周总理还提出，应该让美国人尝尝烤鸭。考虑到去烤鸭店不方便，接待组就请了北京烤鸭店的一位老厨师，在钓鱼台搞了个小烤炉。

这年 7 月 9 日，基辛格秘密访华。邬吉成说：“刚刚在 5 号楼安顿下来的基辛格等人即得知周总理下午 3 点要来宾馆会晤。他顾不上休息，就把随员拉到院子里面，以散步为由商讨有关问题。此后，他们始终采取这种方法商量问题，哪怕是晚上很晚，仍要在外散步。在室内偶尔交谈时，也要打开收音机，放大音量。”邬吉成认为，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害怕交谈的内容被窃听。

周恩来对基辛格一行的生活起居十分关心，接待人员每次向他汇报有关事宜时，他总要询问客人习惯不习惯，反复交代要保证客人的身体健康。接待人员自我感觉所有准备工作都已经十分周到完善，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意外。

一天下午，基辛格的助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助理约翰·霍尔德里奇，拿着一叠新华社英文新闻稿，找到接待组负责联络的人员，指着封面上的毛主席语录，问这是怎么一回事。联络人员一看，那段语录摘的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霍尔德里奇说：“这是从我们个人的住房里搜集到的，我们希望这些新闻稿是被错误地放到了房间里。”

很显然，美方人员误以为这是中方怀有什么用意特意这样做的。其实，给下榻的外宾房间送新闻报刊是国宾馆的例行公事，但这件事还是被汇报到周恩来和叶剑英那里。周恩来明确交代，以后所有报纸、杂志均放在走廊，由下榻的外宾自愿选择提取。

这件事后来又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听罢哈哈一笑，对在场的人说："你们告诉他们，那是放空炮。他们不是也整天在喊要消灭共产主义吗？这就算是空对空吧。"邬吉成说："从那儿以后，'报刊事件'和毛主席'空对空'的妙论，就成为参与中美关系'解冻'过程相关人员聚首时要反复学说的'笑话'。"

7 月 10 日上午，中国方面安排基辛格等到故宫博物院参观，这是秘密之行中唯一的一项外出活动。邬吉成说："按照美方的要求，中方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对外关闭了故宫的部分景点，沿线只安排了几名便衣保卫人员。陪同基辛格参观的，只有黄华等少数几位外交官员。不知内情的基辛格在参观时说，今天的故宫显得格外清静和宽敞。中国方面特意安排了一名摄影记者，给大家拍照留念。可只拍了几张，基辛格就开玩笑说：'还是少照一些为宜，否则白宫知道后，还以为我们在中国只顾游山玩水，不务正业呐！'"

以基辛格为"先导"的中美高层第一次接触会谈，是在严格保密和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基辛格等在北京停留了 48 小时，同周恩来的会谈就占用了 17 个小时，平均每天会谈 8 小时以上。根据周恩来的安排，会谈在基辛格住地钓鱼台国宾馆和人民大会堂两地轮流举行。

邬吉成回忆说："最后一次会谈，是在钓鱼台国宾馆的 5 号楼进行的，一直延续到 11 日上午 10 点多，超过了预定时间。在外面等候的相关人员都十分着急，盯着会谈室的门，不断让服务员送湿毛巾、咖啡和浓茶

进去，并探听一下会谈的进展。3 个多小时过去了，门终于打开。会谈双方人员面带笑意走出大厅，基辛格把周总理一直送上了汽车。这时，大家心里已经明白了八九分，谈判取得了预期的结果。”

4 天之后，也就是 7 月 15 日，一份“让全世界都震惊”的公告，由中美两方同时向外界发布。美国时间当晚 7 点，总统尼克松突然在电视屏幕上出现。他对美国观众说：“我要求占用今晚的这段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为了建立世界持久和平而做的努力中的一件大事……我现在宣读的公告将同时在北京和美国发表。”

公告说：“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亨利·基辛格于 1971 年 7 月 9 日至 11 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 1972 年 5 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1972 年 2 月 21 日上午 11 时 30 分，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专机“空军一号”在东郊机场准点着陆。按惯例，国家元首来华访问，仪仗队为 120 人到 155 人，而此次欢迎的仪仗队员多达 360 人。这种少有的高规格，令尼克松非常高兴。欢迎仪式后，周恩来和尼克松同乘一部红旗轿车，直驱钓鱼台国宾馆。

尼克松一行刚刚到达钓鱼台国宾馆 1 小时，周恩来告诉基辛格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毛泽东主席破例要在中南海马上会见尼克松。

得知毛泽东即将会见他们的消息后，尼克松一行赶忙起身前往中南海。由于行动匆忙，总统和他的随从没有想起招呼保管核按钮密码箱的副官，而将核按钮留在了总统的住处。让总统远离核按钮，这在二战后

的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自“文革”开始后，毛泽东的接见通常是安排在外宾临走的前一天，而此前定下的日程表也是按尼克松到京第二天下午排列的。也恰恰是由于毛泽东亲自决定的意外，所以中方当时没来得及事先和负责尼克松警卫的官员打招呼，甚至连美国国务卿罗杰斯都被排除在外，几辆负责接送的车子，悄无声息地把美国总统尼克松、基辛格几个载去了中南海。

尼克松、基辛格等走了以后，美方负责警卫的官员才发现，他们的总统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等不见了。把国家首脑、头号警卫对象给丢了，这可是要命的失职，随行的警卫人员顿时慌作一团。中国外交部礼宾司的人员见美方的警卫人员在钓鱼台住地范围内，像没头苍蝇似地撞来撞去，便告诉他们不必紧张，他们的总统受着很好的接待，安全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虽然作了这样的解释，但从他们的神情上，还是可以看出有几分惴惴不安。

在这以后美国安全人员的神经始终绷得紧紧的，但一如中方事先承诺的什么意外也没发生，所以他们不得不佩服中国的安全保卫工作搞得好。

当尼克松的车队一进入中南海的大门，法新社和路透社抢先发出了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消息。原来，那些常驻北京的记者早已摸透了规律，尼克松一到北京，就派人在新华门前轮流把守。一见车队进入，就抢先发布消息。

当美国客人进入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的寓所后，毛泽东说：“今天谈话的范畴是你定的，吹哲学。”于是，双方海阔天空。当尼克松把话题拉到越南问题、海峡两岸的关系等具体问题时，毛泽东当即制止：“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他指了指周恩来说：“那是他跟你谈的事。”

美国人又提起“放空炮”的笑话，毛泽东说：“大概我这种人放空

炮的时候多。无非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套。”尼克松笑着指指自己：“就是（打倒）像我这样的人。”毛泽东说：“就个人来说，你可能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和敌对了 20 多年的美国首脑第一次会面，竟然谈得那样无拘无束，轻松自如。基辛格把这次会面比作瓦格纳歌剧的序曲，必须加以发展才能显示出其涵盖的意义。

但就在这时，美方一个在场人员的口袋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响。他把手放进衣服口袋里摆弄了几下，却无法使声响停下来，只得无奈地把口袋里的东西拿了出来。原来，他在口袋里悄悄地装了一个微型录音机，也许是带子到头了，或出了什么故障，所以发出了声响。此人本想把声响制止住，但没有做到，只好把录音机拿出来，尴尬地当众关上。邬吉成说：“偷偷摸摸地录音这种行为，毛主席历来是比较反感的，但此番哲学泛论也没什么秘不可宣的内容，他便大度地继续着原来的话题，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

同尼克松的会谈原定 10 分钟，但由于宾主双方谈得尽兴，不知不觉 1 个小时过去了。在会谈中，尼克松对毛泽东赞叹地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毛泽东却淡淡地答道：“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谈话结束时，尼克松说：“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做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听到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句子，毛泽东露出了笑容。

说完这句话，尼克松起身告辞。临别，尼克松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我

们的会面改变了世界。”

这天晚上，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盛大的场面，通过国际通信卫星直接传到了美国的千家万户。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军乐队演奏了尼克松最喜爱的乐曲《美丽的亚美利加》。尼克松事后回忆：“当我听到这首我熟悉的美国民歌时，心头不禁涌起一股暖流。因为这首曲子正是我在就职仪式上选择演奏的乐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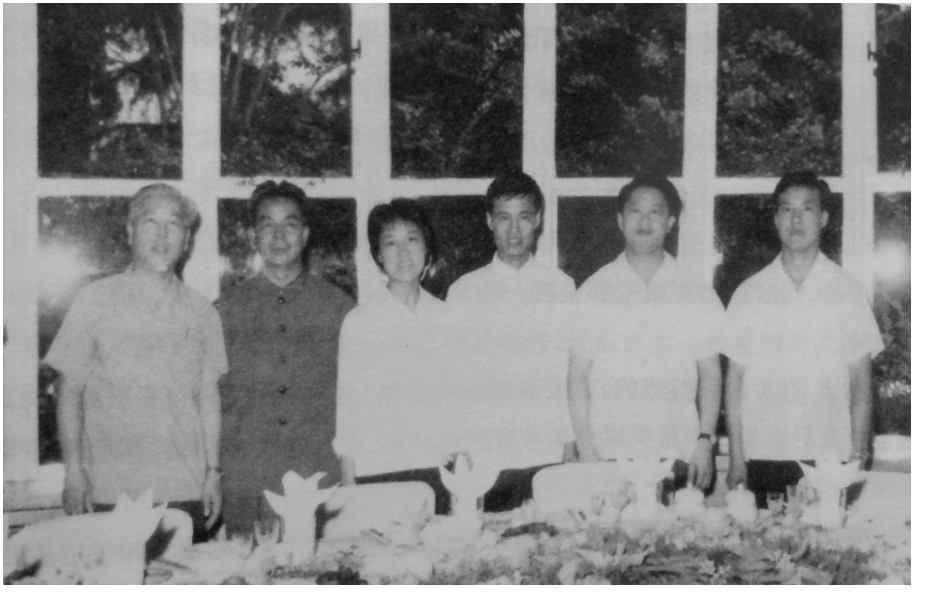
在祝酒词结束前，尼克松援引了毛泽东的一首词：“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并借题发挥说：“让我们两国人民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本着这样的精神，让我们共同举杯为毛主席和周总理，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世界所有人民的友谊与和平干杯。”

席间，周恩来指着画有熊猫的烟盒对尼克松夫人帕特里夏·尼克松说：“我想送给你这个。”“你是说……送我香烟？”尼克松夫人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

“不，不是香烟。我要送你们两只熊猫。”周恩来解释。帕特里夏·尼克松惊喜万分，对尼克松说：“理查德，周恩来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熊猫，真的熊猫。”

这个现场通过卫星直播美国，《华盛顿邮报》立即发表评论：“周恩来通过可爱的熊猫，一下子把美国人的心征服了。”后来，尼克松决定，把两头麝香牛送给中国作为回赠。

据邬吉成讲：在盛大的国宴上，美国人大都不会使用中国人的筷子，只好拿着吃西餐的刀叉笨拙地对付着中餐；唯独尼克松不同于他人，不紧不慢地用筷子夹取美味佳肴。原来，为了这次访问的成功，尼克松很费了一番心思。为了表示他对这次访问的重视，他在出访前埋头苦练了



邬吉成（左二）与管理处副处长韩智生（左一）、首长秘书曹万贵及服务人员在钓鱼台 18 号楼大宴会厅合影。

一阵用筷子进食的技巧。然而，在场更有心计的大概要算是加拿大《多伦多环球报》驻北京记者伯恩斯。宴会结束，尼克松刚起身离席，他便快步走到尼克松的座位旁，一把将尼克松用过的筷子揣入怀中。据传后来有人愿出 2000 美元买那双筷子。

接下来的几天里，周恩来和尼克松在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进行了 5 次政治会谈。其中，2 月 23 日的会谈在钓鱼台国宾馆 18 号楼。邬吉成说，钓鱼台 18 号楼会谈后已是晚上 8 点，周恩来陪同尼克松一行在首都体育馆观看了由国家体委组织的体育表演。就在看表演的时候，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而且越来越大。如果雪一直这样下的话，明天长城、定陵的游览还能去吗？几位负责接待的人员一时拿不定主意，最后还是周恩来一锤定音，不管想什么办法，明天还是按原定日程进行。

于是待体育表演一结束，吴忠、杨德中紧急动员了几十部洒水车，连夜对次日游览要经过的路面进行喷洒盐水和清理工作，同时还安排人力，对登长城的步行道上的积雪进行了清扫。

次日上午 8 时，参观游览的车队出钓鱼台国宾馆北门，按照预定的路线奔八达岭而去。沿途整个路面已经被清扫得干干净净，但公路两侧的原野依然银装素裹，白雪皑皑。车队平安抵达长城，尼克松和他的随员们兴致勃勃地登上高高的烽火台，眺望观赏长城内外的景色。

2 月 26 日，尼克松在周恩来陪同下，乘坐中国领袖使用的伊尔 –18 涡轮螺旋桨专机前往杭州。邬吉成说：“本来，在双方就尼克松访华安全问题谈判时，美方曾提出总统在中国去杭州和上海访问时，要乘坐美国‘空军一号’总统座机，是周总理亲自做的说服工作，他说：‘中国有句俗话，客随主便。尼克松总统既然访问中国，应该乘坐中国人驾驶的专机。你们说美国总统过去没有乘坐过外国飞机，这次到中国来坐一坐，体会一下也很好嘛！我们飞行员的技术也不错。你们尽管放心。如果你们觉得不放心，我陪总统先生一起乘坐。’话已至此，美国人再也不好有什么说辞了。”邬吉成还讲，为了保证尼克松外出行动的安全，

邬吉成在钓鱼台迎接外宾时留影。

邬吉成（左二）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左三）等在北海合影。

专门从北京空运过去两部红旗防弹汽车。

邬吉成回忆说，在杭州发生过一件比较棘手的事：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等国务院专家，突然对即将于第二天在上海公布的《中美联合公报》发难，要求再做修改。罗杰斯如此节外生枝，有借此发泄对尼克松、基辛格与毛泽东会见时将他撇下的不满之嫌。《中美联合公报》此前已经毛泽东、尼克松分别予以同意批准，这个时候再提出修改，岂不显得反复无常吗？尼克松气得要死，在刘庄宾馆的客厅里踱来踱去，脸色铁青。最后，他还是无奈地让基辛格再找乔冠华商量。

乔冠华马上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又随即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思考片刻，说："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他要周恩来对美方明确表示："任何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于是，乔冠华和基辛格分别在当晚修改公报稿，吸

收了罗杰斯等的部分意见。第二天，修改稿再次经中美两国首脑批准。

1972 年 2 月 28 日，作为中美关系重要里程碑的《中美联合公报》正式签订。尼克松在归国前的告别宴会上，高举斟满茅台的酒杯，踌躇满志地说：“我们在这里已逗留了一周时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邬吉成说，自己有幸见证了“改变世界的一周”。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美中苏三角外交的态势开始形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决定国际形势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当时美中和解使苏联不得不加紧同美国和西欧实行缓和，迫使日本急切地要求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终于推动中日两国于 1972 年 9 月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三 成为周总理最后想见的人

1976年1月8日早晨，邬吉成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值班室副主任东方、民航总局副局长张瑞霭、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江明、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聚集在首都机场，正在开会研究那里的现场警卫事宜。

会议刚开不久，邬吉成就接到中办警卫处警卫值班室的电话，说总理逝世了，要他们立即回城。听到这个消息，当时邬吉成的心头像被重器捶击，沉重万分，没想到他老人家就这么突然离去。

就在周恩来辞世前6天，即1月2日中午，处在弥留之际的周恩来醒过来时，用含混而微弱的声音说："找Wu……Wu……Wu……"但究竟是"Wu"什么，身边看护的人都听不清。

人们顺着"Wu"的发音推测，以为周恩来是要见一位姓"吴"的。周恩来用神情，一次次否定看护人员的猜想后，突然聚集起更多的力量，嘴里又多迸出了几个字："钓鱼台的Wu。"人们才明白他要见的不是"吴某某"，而是负责钓鱼台警卫工作的邬吉成。

但人们还不敢确定，就又询问了一声："您要见的是不是钓鱼台里的邬吉成？"周恩来点了一下头。于是周恩来的卫士长张树迎马上给邬

吉成打了个电话说：“你马上到 305 医院来，总理要见你。”

邬吉成立即叫上司机小王，拉他赶到了 305 医院。进了医院的楼里，邬吉成径直进了周恩来病房斜对面的护士和随身警卫的值班室。值班室的人告诉他：“总理又昏迷了，请你在值班室里等候。”邬吉成一面等着，一面猜想着周恩来召他前来，究竟是要做些什么嘱托和吩咐。

自下午两点一直等到大约黄昏的时候，有人来通知邬吉成说：“总理醒过来了。要先服点药，医生做一些简单的处理，你就可以进去了。”可邬吉成等到的不是进入的消息，而是“总理又昏迷了，你再等一等吧”。

由于惦记着总理的召唤，邬吉成怕自己睡着了，在值班室里靠一会儿，就到走廊里转一转。到了约莫次日凌晨五六点钟时，他在走廊里碰到了邓颖超，还有作为医疗组组长的卫生部长谢富治的夫人刘湘萍。

邓颖超见邬吉成还在苦等，就对他说：“总理还没醒过来，你已经等了太长的时间，就别在这里等下去了。你先回去吧，总理再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再通知你。”邬吉成这时向邓颖超提出一个请求：“让我在门外看一眼总理。”邓颖超同意了，邬吉成走到半敞开的周恩来抢救室门边，看见病榻上处于昏迷状态的周恩来，平抑住心头的万端思绪，默默地敬了一个军礼，就悄悄地离开了。

1 月 5 日，周恩来做了第 6 次大手术，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手术。

1 月 7 日晚 11 时，当医生们来到床边进行治疗时，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微微睁开眼睛，凝视了一下，认出了其中的医疗组专家吴阶平，声音极为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生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根据医生的回忆，周恩来的心脏在微弱地跳动，呼吸浅而短促，真是脉如游丝，他再不可能提出见什么人了，直到他与世长辞。

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在与病魔的搏斗中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丝精力之后，怀着对许许多多造福于人民的美好设想，怀着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深关切，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离开了人世。

心脏监护仪上划出了一条直线，跳动了78年的心脏停止了。顿时，病房里痛哭声一片。邓颖超用哆嗦的双手摸着周恩来的面颊，最后用嘴亲吻他的额头。她边哭边说："恩来！恩来！你走了……"

邓颖超说着、哭着，悲痛欲绝，病房里一片抽泣声……

晚年，每当回顾起这段往事，邬吉成就抑制不住长长的叹息：总理为什么会在弥留之际提出要见我？见我究竟要嘱咐些什么？我是多么希望能完成总理的最后嘱托啊！邬吉成在和作家王凡交谈时，曾苦苦穷究周恩来要对他做怎样的嘱咐："我负责钓鱼台的警卫，当时江青、张春桥、王洪文都住在那里，我觉得总理要交代的事与'上海帮'有关。总理在临终前召我去，是对一个警卫工作者的最大信任。"

当年1月8日，邬吉成和东方立即从首都机场往城里赶，车行至东长安街南口时，正碰到移送周恩来遗体去北京医院的车队。他们随之调转车头，跟着车队到了北京医院。在医院，邬吉成和相关的工作人员一道，安放好周恩来的遗体后，才进中南海。

1月8日下午3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讨论治丧办公室提出的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治丧委员会名单、遗体告别、吊唁活动和追悼大会方案等，会议由邓小平主持。经过讨论，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讣告。接着，讨论通过了治丧办公室提出的周恩来治丧委员会名单、遗体告别、吊唁活动和追悼大会方案等。

在商议周恩来治丧事宜的会议上，邬吉成被指定为安全组的负责人之一。邬吉成曾回忆说："当周总理的遗体从北京医院移送八宝山火化时，

我和警卫处另一位副处长武健华同乘一辆汽车紧跟在周总理的灵车后面。我亲眼看见了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的十里长街，沿途群众自发形成的送殡队伍的壮观场面。人们虽然悲痛万分，可秩序井然，人民群众对总理的感情，是难以用文字表述出来的。”

1 月 15 日下午 3 时，5000 人参加的周恩来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隆重举行。作为安全组的负责人之一，邬吉成在追悼会开始前，接到了毛泽东可能参加追悼会的通知，汪东兴亲自给他下了指示：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和台湾厅做好准备和安排，以供毛泽东到达时落脚休息。

邬吉成在晚年回忆说：“正是因为等待毛主席的到来，追悼大会开始的时间比原定的时间推迟了一点。但毛主席最后为什么没有到场，我无法推测，这是个谜。”

在追悼大会现场，邓小平表情严肃、面带哀伤，以低沉悲痛的声音宣读悼词。当读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这句话时，他声音颤抖、眼含泪水，稍事停顿，极力抑制着自己的巨大悲伤。这时会场上一片哭泣呜咽声。邬吉成注意到，邓颖超在追悼会上眼泪不断地流淌着，但她坚强地咬着牙，忍着悲痛没有哭出声来。

追悼会的最后，全体与会者郑重地向周恩来遗像深深三鞠躬。

当晚 7 时，邓颖超用颤抖的双手捧起周恩来的骨灰，含着热泪说：“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大家听到这里都哭了，都知道这是大姐在同总理作最后诀别。邬吉成在晚年还记得，为了让送骨灰的车子出人民大会堂后不被群众发现而出现拥堵，他向汪东兴建议追悼会后推迟撤除警戒，待飞机起飞后再撤比较安全。

当晚 7 时 50 分，几辆不起眼的车子避开记者，载着周恩来的骨灰直

邬吉成（最前一位鞠躬者）等悼念周恩来总理。

接驶抵东郊通县的机场。根据周恩来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向他深深热爱着的祖国的江河大地。他个人没有留下任何有形的遗产，然而他的精神、他的风范在中国人民心中，乃至全世界人民心底都耸立起一座巍峨的无字丰碑！

第五章
资深外交官见证伟人风采

1950 年，当新中国外交事业百废待兴的时候，为了更好地发展与亚非拉国家关系，时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周恩来决定，培养非通用语言干部。于是，1952 年 8 月，正在北京外国语学校英语系学习的程瑞声，被派往中国驻缅甸使馆担任学习员，开始了“不正规的学习”，以当地华侨为师，从缅甸语小学课本学起，加上阅读当地报纸……

日后，程瑞声成长为新中国第一批缅甸语高级翻译，有幸亲身经历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与缅甸领导人吴努、吴奈温等的历史性会晤。程瑞声家有关外交的历史照片极多，似乎他家成了一个小小的外交档案馆。透过一张张老照片，不仅可以看到程瑞声的外交生涯，而且可以感受到周恩来等共和国领导人的外交风采。言及周恩来，程瑞声激动地说：“我给周总理当翻译的次数真是难以计算，总理曾 9 次访问缅甸，仅我陪同的就有 7 次。”

一 翻译生涯见证中缅“友谊树”根植沃土

1954 年 6 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缅甸，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共和国总理第一次对这两个国家进行访问。那时，正在缅甸学习的程瑞声刚满 20 岁。在周总理访缅前，缅甸国内舆论普遍对新中国持怀疑态度，中缅两国之间还有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缅甸政府十分担心新中国会威胁缅甸的领土安全，并支持当时的缅甸共产党推翻政府。

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来到缅甸时，缅甸领导人对此十分重视，国内报纸也都做了大量宣传。双方总理举行会谈时，缅甸总理吴努将中国比喻为“大象”，将缅甸比喻为“羔羊”，坦言对中国“感到害怕”。周恩来向吴努介绍了中印两国刚刚在联合声明中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明确指出中国实行的是和平外交政策，按照五项原则与世界上一切国家友好相处，并强调革命不能输出，输出必败。与周恩来的会谈打消了吴努的疑虑，也消除了缅甸人对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恐惧。会后，中缅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

1956 年 10 月 25 日，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和缅甸领导人吴努在酒会上（右二为程瑞声）。

关系的原则。周恩来的这次访问成为中缅关系的重要里程碑。从此，中缅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两国关系朝着和平、友好、稳定的方向发展。

同年 12 月，吴努访华。之后，中缅友好往来逐渐增加，1952 年至 1956 年一直在驻缅甸使馆工作的程瑞声对此深有感触地说：“从 1955 年开始，中缅之间官方和民间的代表团互访不断增多，中国驻缅大使馆每天人来人往，比以前热闹多了。”从那时开始，程瑞声为中缅互访的代表团担任翻译，从而使他一生中经历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历史事件。

次年底，在中缅边界南段未定界的黄果园附近，中缅两国的前哨部队因误会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中缅边境局势一下子变得异常紧张。1956 年 10 月，时任中国驻缅甸使馆翻译的程瑞声和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一起陪同吴努访华，谈判中缅边界问题。由于吴努在当年已辞去了总理职务，他是以缅甸执政党反法西斯自由同盟主席的身份访华，但中方仍给以最高规格的接待。

周恩来同吴努就中缅边界问题进行谈判时，程瑞声担任缅甸语翻译，但他忆起当时谈判，缅甸语并不是第一使用语言，当时主要用英语翻译，由浦寿昌担任翻译。中缅边界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程瑞声在缅甸工作过，了解一些情况。然而在谈判时，程瑞声惊讶地发现，周总理对中缅边界问题非常熟悉。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缅边界问题最终解决后，当时程瑞声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有一天周恩来办公室给外交部送来了一箱材料，让外交部归档。负责此事的正是程瑞声，他看到箱内都是有关中缅边界问题的资料，其中有些是历史书籍的有关记载，有些是学者的研究文章，每一份材料都有周总理阅读时用毛笔所做的圈点。后来，程瑞声才知道，为了对中缅边界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周总理查阅了汉朝以来的有关历史记载，弄清了中国历代政府对中国边境地区的管辖情况，搜集了各种地图，并请教了龚自知、王季范、尹明德、于树德等专家，弄清各个时期地图画法的不同和原因。除此之外，周恩来还调查了 19 世纪以来有关中缅边界的历次纠纷和交涉经过，弄清了中缅边界未决问题的由来，研究了中缅边境地区双方居民的民族分布、居住和耕作情况，以及国际法有关边界问题的论述和国际惯例。周恩来细致入微的调查精神也成为程瑞声日后从事研究工作的指针。

程瑞声说：“同吴努谈判时，周总理根据互谅互让、友好协商的方针，就中缅边界问题提出了一个既考虑历史背景，又考虑当前实际情况的公平合理、切实可行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并提出中方从有争议的 1941 年线以西地区撤回所驻军队，而缅方则从连英国也承认主权属于中国的片马一带撤出驻军。”吴努在外交上是相当灵活的，对中方的方案表示同意。他记得吴努曾非常坦率地说：“现在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缅甸是一个弱小的国家，中国能提出这样合理的方案，我非常满意。”而后，中

缅双方在联合新闻公报中宣布，从 1956 年 11 月底到 1956 年年底，中国军队撤出 1941 年线以西地区，缅甸军队撤出片马、岗房、古浪，中缅双方就边界问题达成的初步协议为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8 年 5 月，缅甸执政党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分裂为“廉洁派”（即吴努、德钦丁派）和“巩固派”（即吴巴瑞、吴觉迎派），使缅甸的议会民主出现了危机，政局动荡。同年 9 月 26 日，缅军总参谋长奈温（后称吴奈温）将军发动不流血政变，迫使吴努辞职，并由奈温将军组成看守政府。奈温担任看守政府总理后，认为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在缅甸即将举行大选之际，于 1960 年 1 月访华，签订了中缅边界问题协定和中缅友好互不侵犯条约。

负责勘界和定界的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应运而生，联委会中方的首席代表为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驻缅甸原大使姚仲明，缅方首席代表为缅军副总参谋长昂季准将。这时，程瑞声刚从驻缅甸使馆调回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工作，姚仲明当即通过干部司将他调去任中方代表团的翻译。从 1960 年 6 月至 9 月，边界联委会双方代表团在两国总理的亲自指导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中缅双方派出大批人员组成联合勘察队，不怕疲劳，跋山涉水，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勘察工作。双方代表团则先后在仰光、北京、昆明、畹町等地多次开会，飞行里程有几万公里。通过双方友好协商，互谅互让，以一揽子解决的办法使双方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获得了圆满解决。但谈判毕竟是很艰苦的，程瑞声记得有一次在缅甸开会，由于谈判未能按预定时间结束，中方代表团所乘的中国民航班机不得不推迟一天起飞。

在当年的中国国庆节签署中缅边界条约，是吴努提出的要求。当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中缅边界条约的签字仪式。两国总理讲话后，

1960 年 4 月 19 日，周恩来总理离开缅甸仰光前在机场会见记者（周恩来之左后为程瑞声）。

于下午 6 时签署了中缅边界条约。中国历届政府所长期解决不了的复杂的中缅边界问题终于获得了全面彻底的解决。程瑞声感慨：“从 1960 年 1 月底中缅边界问题协定的签订，到 10 月中缅边界条约的签订，一共只有 8 个多月的时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中缅边界条约迅速签订，程瑞声说双方领导人在互访交往中也建立了深厚友谊。1954 年 12 月，吴努访华，同毛泽东会谈，程瑞声担任翻译，他回忆会谈的情景，感觉“他们已经是老朋友了”。当吴努表示中国是大哥哥、

缅甸是小弟弟时，毛泽东表示：“我们不是大哥哥同小弟弟的关系，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时生的兄弟。”毛泽东的这番诚恳的谈话使吴努深为感动。

如今在关于周恩来在缅甸参加泼水节的资料图片中，人们都能领略到总理当时身着缅式服装的风采。程瑞声曾 7 次陪同周恩来访问缅甸，他说：“周总理是我记忆里那时唯一曾穿过缅甸民族服装参加活动的外国领导人。”

1960 年 4 月，周恩来再访缅甸，当时程瑞声还在驻缅甸使馆工作，再次为总理担任翻译。当天下午，周恩来不顾旅途疲劳，和陈毅副总理等

1960 年 10 月 3 日晚，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出席缅甸总理吴努的告别宴会（左五为程瑞声）。

全体随行人员在吴努总理的陪同下参加泼水节活动，并换上了缅方特意准备好的缅甸民族服装。程瑞声先后在缅甸工作 14 年，可以称得上是“缅甸通”，他介绍说：“缅甸的民族服装十分别致，男子上衣为无领马褂，下装为纱笼（筒裙），头戴头巾。缅甸男子的上衣从中国传入，纱笼从印度传入，头巾则是缅甸民族固有的，因此缅甸民族服装融合了三种文化。”

程瑞声记得，那天周总理穿的是布料方格纱笼，缅式上衣，头戴头巾，肩上还披了一条浴巾供泼水时用，十分潇洒。可是，在穿缅甸民族服装之前却因着装的习惯问题而出现了两个小难题，程瑞声回忆说，一是缅甸纱笼是用手打结系住，大家担心纱笼不小心会掉下来，出洋相，程瑞声建议仍系上皮带，内紧外松，大家这才放心。二是周总理、陈老总不习惯穿夹脚趾的缅甸拖鞋，行走不便，当时恰好王泽总领事和我穿的是中国拖鞋，当即换给两位领导人穿，解决了这一难题。他还记得陈毅副总理在穿上缅甸民族服装后风趣地说自己这辈子什么衣裳都穿过，就是裙子没有穿过。大家穿上缅甸服装后，一向幽默的陈老总一句‘好生风凉呐！’引起大家一片笑声。缅甸朋友也打趣说，张彦（时任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就像缅甸外长藻昆卓，乔冠华（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则像缅甸剧中的丑角，乔冠华听后乐得哈哈大笑。

由于周恩来种过牛痘，不宜泼水，人们建议他象征性地泼一下就可以了。但周恩来从友好出发，到每个彩棚都兴致勃勃地和缅甸群众相互泼水。程瑞声说，仪表非凡的周总理穿上缅甸民族服装，对于缅甸人民来说，显得那么可亲可敬。而周总理参加缅甸泼水节，也已成为最能体现中缅友好的佳话。

周恩来对缅甸人民的深情厚谊感动了缅甸人民，也感动了缅甸领导人。4 月 17 日中午在宴会上，吴努在祝酒词中说：“为了对周总理表示敬意，

我用中国话祝酒，而请貌瑞新（程瑞声的缅文名字）译成缅甸语。”他接着用中文高呼：“缅中友好万岁！周总理万岁！刘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程瑞声当即译成缅语，全场一片欢腾。

在程瑞声的记忆中，1961 年 1 月周总理到达仰光访问时，当时担任缅军总参谋长的奈温将军亲自拿着手枪保护周总理，两国领导人如此亲密的友谊在国际关系史上恐怕也是少有的。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逝世，奈温约见我国驻缅甸使馆代办，流着泪水说：“这几天是我有生以来最难过的日子。”他恳切要求到中国最后见见周总理的遗容，却未能如愿。很少写文章的奈温，为了悼念周恩来，亲笔写了《我所了解的周总理》一文，语言朴实，充分表达了奈温内心对周恩来的怀念和崇敬。程瑞声回忆说，1 年后，邓颖超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出访缅甸的时候，缅甸破格给了她国家元首的最高待遇。当时在欢迎宴会上，奈温致辞时哭了起来，全场为之静默了整整 10 分钟。

1956 年 12 月，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在缅甸北部某地用冷餐（左四为程瑞声）。

KLEENEX

周恩来是深受世界人民尊敬的中国领导人，他同样博得了缅甸人民的推崇。1956 年 12 月 10 日至 20 日，周恩来访问缅甸，这是程瑞声作为翻译第一次陪同周总理访问缅甸。周总理这次访问缅甸的时间较长，他除了同吴努、吴巴瑞等领导人就中缅边界问题继续会谈外，还将访问的重点放在促进中缅两国边境人民的友好上。程瑞声说：“除仰光、曼德勒等大城市外，周总理还访问了同中国接壤的缅甸克钦邦的首府密支那和八莫、掸邦的首府东枝和腊戍等地。”12 月 15 日，周总理和吴巴瑞总理一起从缅甸进入中国云南，到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芒市，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中缅边境人民联欢大会。

在程瑞声的回忆中，半个世纪前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那天上午，两位总理先乘飞机从东枝到达腊戍，在腊戍受到群众夹道欢迎，然后乘汽车从腊戍出发，于当天下午 3 时到达中缅两国交界处的云南畹町镇。在畹町桥头，两位总理下车步行，进入畹町。当时，我国边境的 2000 多名各族群众在畹町街头热烈鼓掌和欢呼。程瑞声仍然清楚记得，那天周总理身穿深色中山服，吴巴瑞则穿缅甸民族服装，使这一历史性时刻显得更加隆重。在群众的欢呼声中，两位总理登车前往芒市，于当晚 8 时抵达。吴巴瑞总理下榻于芒市宾馆。程瑞声说：“在世界外交史上，两个相邻国家的领导人在边境城市会晤是常有的事，但两国领导人一起从一国步行越过边界，进入另一国却是少有的，是多么富有想象力的创举啊！”

次日，天气晴朗，从下午 1 时开始，来自云南的傣族、景颇族、拉祜族群众和来自缅甸的掸族、克钦族群众就欢天喜地地陆续来到芒市的大会广场。下午 3 时，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和缅甸吴巴瑞总理、藻昆卓副总理、吴觉迎副总理在雷动的欢呼声中走上主席台。大会上，周恩来发表了讲话。他强调，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我们应该

采取更多的主动措施，以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一贯信守不渝。在芒市期间，两位总理还出席了中缅边境少数民族公众领袖座谈会，并在芒市宾馆前亲手种植了两棵缅桂花树留念。程瑞声说，周总理这次访问缅甸并同缅甸总理到芒市出席中缅边境的人民联欢大会，有力地促进了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边境人民之间的友谊，在中缅关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90 年 9 月，程瑞声担任驻缅甸大使期间曾到云南边境地区考察，入住的芒市宾馆就是他在 1956 年陪同吴巴瑞总理下榻之处。今天这座宾馆已修缮一新，安装了各种现代化的设备。让程瑞声特别感到惊喜的是，1956 年两位总理在芒市宾馆楼前种的两棵缅桂花树已长成高约 10 余米的大树，这就是中缅两国人民友谊美好的象征啊！他记起一次替周总理会见奈温担任翻译时，周总理对奈温说："中缅友好在我们这一代已没有问题"，又指着程瑞声说："将来就看他们这一代了。"欣赏着眼前枝叶繁茂、青葱翠绿的中缅友谊树，回想起周总理的希冀，作为历史亲历者，程瑞声为中缅友谊树的长青而感到欣慰。

1996 年，缅甸联邦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主席丹瑞大将访华，程瑞声作为前任驻缅甸大使参加了江泽民主席为欢迎丹瑞大将和夫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在人民大会堂这座庄严建筑内，程瑞声曾参加过无数次中缅友好重大活动，这天晚上他再次感受到空气中到处洋溢着中缅友好的热烈气氛。席间，江泽民主席建议我和另一位前任驻缅甸大使梁枫去主桌向丹瑞主席和其他缅甸贵宾祝酒。程瑞声感慨，当看到中缅两国新一代领导人欢聚一堂的情景，更让人怀念为中缅友谊奠基的两国老一代领导人。

二 毛泽东眼中的“外国人”也是周恩来心中的“老朋友”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缅甸语高级翻译，程瑞声曾为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在工作与生活方面得到这些伟人的鼓励与关怀。在伟人们身边工作，程瑞声拥有普通人难以企及的特殊经历，他的人生篇章也因为这些伟人而生动传奇。

1956 年 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访问印度后访问缅甸，程瑞声作为缅甸语翻译陪同她访问。“宋庆龄当时已 63 岁，但看上去要年轻得多，待人热情，很有风度”，程瑞声记得宋庆龄抵达仰光是在 1 月 2 日，“她在机场受到吴努总理和缅甸国父昂山将军的夫人杜庆芝的热烈欢迎”。宋庆龄那次访问缅甸的时间长达 21 天，陪同访问多日，程瑞声对宋庆龄仰慕更深。在宋庆龄的访问即将结束时，程瑞声向她的秘书提出能不能送一张宋庆龄的相片留作纪念。使人惊奇的是，“秘书进她的房间汇报后，立即出来送了一张宋庆龄签名的相片”。这张珍贵的照片至今还是程瑞声的珍藏品。

在上海上中学的时候，程瑞声读过不少介绍毛泽东生平的书籍，对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非常爱戴和崇敬。1956 年 10 月，缅甸领导人

1956 年 1 月，宋庆龄访缅（左一为程瑞声）。

吴努访华，当程瑞声得知自己将为毛泽东与吴努的会见担任翻译时，心情异常兴奋，激动之余不免有些紧张。

“11 月 4 日中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吴努一行。毛泽东同缅甸客人握手后，也同我握了手”，谈及那个历史性场面，程瑞声仍激动万分。他说，“当时看到毛泽东一脸慈祥，我的紧张心情消失了”。由于那次程瑞声是初次参加国家最高层领导人会见，那天的翻译安排是“双重制”，“毛泽东的话由中联部主管缅甸的黄里同志翻译成缅甸语，吴努的话则由我翻译成汉语”。程瑞声还记得，吴努在谈话中突然向毛泽东提出他心中的一大疑虑，“他说，据说中国在缅甸 1956 年大选中曾向缅甸的左派反对党提供了资助，不知是否确实。毛泽东从容不迫地回

答说，中国不干涉缅甸内政，不会做这种事，如果吴努不相信，双方可以一起调查。吴努这才放心”。

次年 12 月，缅甸副总理吴巴瑞（当时吴努已重任总理）、副总理吴觉迎访华，当月 14 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了吴巴瑞、吴觉迎。使程瑞声惊讶的是，毛泽东还没有同外宾对话，却先问程瑞声：“你的缅文是在哪儿学的？”程瑞声告诉毛泽东自己是在驻缅甸使馆学的缅语。毛泽东略微有点惊奇说：“噢，很好。”与毛泽东的首次直接对话虽然简短，却使程瑞声受到很大的鼓舞。

程瑞声深感自豪的是，自己曾为毛泽东专门翻译解说过一场演出。1960 年 10 月 9 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缅甸文化代表团为他举行的专场演出，程瑞声被派去担任毛泽东的翻译，解说演出的节目。由于没有缅甸贵宾在场，程瑞声就坐在毛泽东身边，他的心情自然分外激动。毛泽东对程瑞声的解说很感兴趣，并问程瑞声缅甸人名字中的“貌”是什么意思。程瑞声告诉他，缅甸人只有名，没有姓，“貌”（原意“弟”）是男子自己的谦称，“吴”（原意“叔”）是别人对男子的尊称，“郭”（原意“兄”）是男子平辈相称，“波”（原意“将军”）则为对军人的尊称。以吴努为例，他自称“貌努”，其他人尊称他为“吴努”，关系密切的平辈人则称他为“郭努”。对奈温将军则尊称“波奈温”。“听完我的介绍，毛泽东表示这很有意思。”

身为外交官，程瑞声一直注重仪表，他曾被毛泽东调侃为“像个外国人”。1965 年 7 月 26 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会见访华的缅甸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将军。在同奈温谈话前，毛泽东问起程瑞声的名字。同奈温谈完话后，毛泽东又将话题转向程瑞声，他很幽默地对程瑞声说，你的样子长得像外国人。程瑞声将毛泽东的话译给在场的奈温听，

奈温对程瑞声说大概是因为你会说缅甸语。毛泽东又问程瑞声是哪里人，程瑞声回答说自己原籍安徽，在上海长大。回到家后，程瑞声在镜子前照来照去，心想自己并不像外国人呀，可能是因为那天自己刚好穿的西服，毛泽东便说像外国人。程瑞声为毛泽东担任翻译的次数虽然不多，但每次都使他感到十分亲切，更增加了对一代伟人的崇敬。

刘少奇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核心成员，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杰出的理论家。在为领导人任高级缅语翻译期间，程瑞声对于刘少奇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他与缅甸领导人奈温将军的一次“树下会谈”。1963 年 4 月 24 日，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缅甸进行国事访问，同缅甸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将军在缅甸西部的避暑胜地额勃里海滩会谈。至今令程瑞声感慨的是，那一次两位国家领导人的会谈没有通常那种“官式的礼节”，“会谈不是在华丽的会议厅内，而是在海边一种名叫‘蓬涅’的大树下面进行，充满亲切友好的气氛”。

那天傍晚，刘少奇和奈温在大树下又举行了单独会谈，只有程瑞声作为翻译参加。在听取奈温介绍了缅甸国内形势以及缅甸将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意见之后，刘少奇针对奈温宣布的“缅甸的社会主义道路”，谈了让奈温最为关注的中方看法。程瑞声记得，刘少奇对奈温谈话中提出，马克思以前有各种社会主义，马克思以后也有各种社会主义。各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可以不一样，可以试验，彼此相互学习。并表示，缅甸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进行试验。如果你们试验好了，成功了，我们也可以向你们学习。刘少奇还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先进行民主改革，第二步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第三步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建议缅甸是否可以先消灭封建势力和外国帝国主义势力，把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和私人所有制作为第二步。刘少奇还表示，中国是真正尊重缅甸

独立、平等对待缅甸的，中国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做损害缅甸的事。

“刘少奇这一席非常诚恳而又中肯的谈话显然打动了奈温。奈温听了表示很高兴，也很感谢，表示中国的态度是最好的。”今天，程瑞声回忆起刘少奇这次访问时，不禁心潮澎湃。“从过去 40 年国际风云的重大变化看，刘少奇关于苏联、中国都在进行社会主义的试验，这种试验并没有完结，缅甸也可以试验的思想是多么正确啊”！

数年前，我国上演了一部关于刘少奇出访缅甸等国时的电视故事片，片中编造了台湾特务在刘少奇访问缅甸时数次企图行刺的故事。并且，该片把刘少奇访问时摄制的访问记录片和现在的故事片交叉编排，以假乱真——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镜头，纪录片中程瑞声作为翻译坐在刘少奇座车的前排，而紧接着是故事片中台湾特务用枪瞄准了程瑞声的脑袋。片中，还有大陆特工人员在缅甸境内和缅甸政府的特工一起到处自由行动，大打出手的情景。这部电视片播出后，作为历史事件亲历者，程瑞声经常被朋友们问起电视片情节是否真实的问题。对此，程瑞声郑重表示：“完全是胡编乱造；台湾特务确有暗害阴谋，但根据我方提供的情报，奈温政府在访问之前早就把他们统统抓起来了，因此访问并无险情。”

程瑞声说，由于刘少奇那次访问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出访，出访前又传来台湾特务多方策划对刘少奇访问进行破坏的消息，无论是中方或缅方，都采取了严密的安全措施。中方除将有关情况及时向缅方通报，请缅方采取必要措施外，代表团本身也加强了安全保卫工作。根据陈毅副总理的指示，特别挑选了两位彪形大汉担任卫士。代表团有关领导并强调保卫工作人人有责，要求大家提高警惕。在访问的过程中，程瑞声除了担任翻译外，经常提醒自己多观察四周动向，以防不测。

在老一辈的领导人中，程瑞声为周总理担任翻译的次数最多，他说：

1964 年 2 月 14 日，周恩来总理和缅甸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一家观看文艺演出（左三为程瑞声）。

“从 1956 年我初次为周总理担任翻译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由于中缅高层友好往来频繁，我几乎每年都为周总理出访缅甸或接待缅甸来访的领导人担任翻译。我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时，周总理在北京会见缅甸大使，也由我担任翻译。”

在为周总理担任翻译时，程瑞声感受到周总理对翻译人员的照顾和体贴。程瑞声至今珍藏着一份周总理的手迹，每当看到那熟悉而亲切的字迹，他的心中便涌动着一股暖流。那一次周总理在同缅甸领导人谈到“非洲——马尔加什经济合作联盟”时，由于该联盟成员国较多，程瑞声对

1964 年 2 月 15 日晚，缅甸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在额勃里为周恩来总理举行露天宴会（左一、左二为陈毅夫妇，右三为程瑞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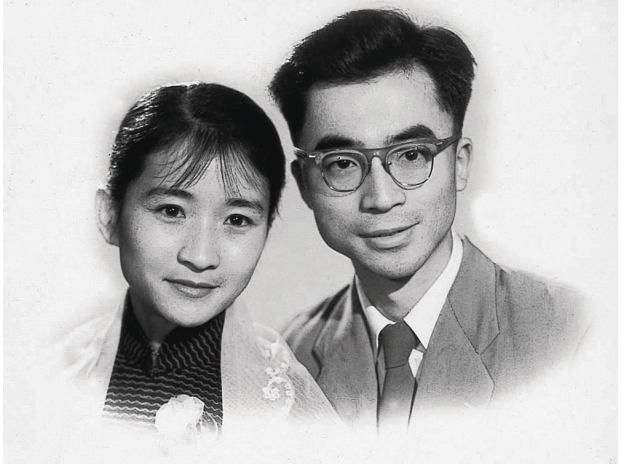
非洲情况又不熟悉，周总理当即在他的小本子上写下“马非经济联盟八国：1. 塞内加尔；2. 象牙海岸；3. 尼日尔；4. 上沃尔特；5. 加蓬；6. 多哥；7. 乍得；8. 马尔加什”。另外还写了“布隆迪、卢旺达”，将这页纸撕下给程瑞声。完成翻译任务后，程瑞声将周总理的这份珍贵手迹永远地收藏起来。

为毛泽东担任翻译时，程瑞声有时听不太懂毛泽东的湖南口音。每每看到这种情况，周恩来总是主动替程瑞声“翻译”，使程瑞声了解毛泽东谈话的确切意思，从而能准确地翻译。让程瑞声更为难忘的是，周总理还曾指出过他的不足之处。1965 年 7 月，周总理在昆明陪同奈温将军游昆明湖，在汽艇上玩笑说程瑞声注意力太集中，有许多周围事物未看见，要偷他一件重要东西，看他是否发现。周总理还问另一位女翻译刘秀英，程瑞声的爱人喜欢他是否因为他注意力集中，把大家都说笑了。

另外，程瑞声身体太过于瘦弱也是周总理常提起的事情。参加宴会时，周恩来常提醒程瑞声吃菜，有时程瑞声因翻译忘记吃菜，他便说：“你为什么不吃菜呢？”有一次，周恩来指示陪同访问的北京医院大夫替程瑞声好好检查一下，于是程瑞声到北京医院去做了全面检查，结果各方面都正常，周恩来才放了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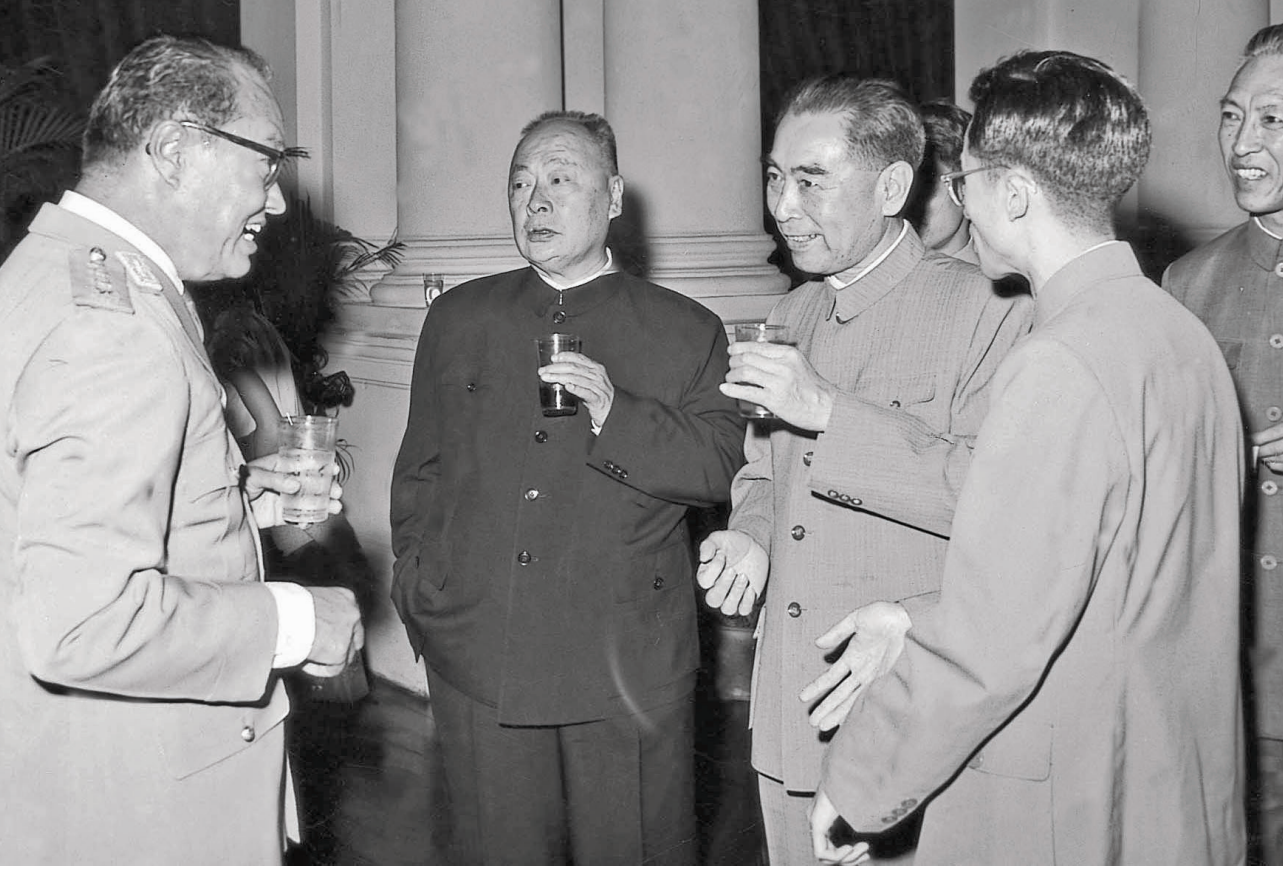
在关于周总理的记忆中，最使程瑞声感动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两件事。1970 年 11 月 25 日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事口同志。当时，周总理接连谈了 4 个多小时，虽然医生提醒他谈话时间已经很长，他仍不知疲倦地对大家进行指导。在谈话过程中，周总理问了外交部亚洲司任组长人员的情况。当问到程瑞声时，周恩来亲切地说：“和你好久不见了。你最近缅文又精进一些了吧？”程瑞声回答：“是的。”周总理说：“喔，你英文也懂。”这时，亚洲司司长刘春在旁边说：“他现在还学了日文。”周总理说：“噢。”

不久的一天下午，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室会见外交部核心小组和地区业务司部分人员，程瑞声也参加了。他亲切地称呼程瑞声为“我的这位老朋友”。



1961 年，程瑞声与李路结婚照。

一声“老朋友”，令程瑞声又惊又喜。过去自己虽替周总理多次担任翻译，但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中缅友好来往



1964 年 2 月，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访缅时和奈温主席在一起（右二为程瑞声）。

一度中断，他已很少见到周总理，更何况总理又是一位日理万机、事物繁重的领导人。因此，程瑞声认为自己在周总理的记忆中应该早已淡化了。陈瑞声激动地说：“然而，情况却恰恰相反，他不仅没有忘记我，而且非常亲切地称我为‘老朋友’，还记得我除了缅文外，还会英文，这怎么能使我不感到万分激动呢！”

一提起“缅甸程”，程瑞声的眼前便浮现出邓颖超大姐那慈祥可亲的面容，“缅甸程”是大姐送给程瑞声的昵称。1977 年 2 月，邓颖超访问缅甸，拜会缅甸国务委员会秘书山友将军时，因程瑞声正在翻译，邓颖超在介绍中方人员时漏去了程瑞声，山友提醒说还有他。这时，邓颖超说：“程瑞声同志不需要介绍，他讲中文时，我们把他看作中国人，他讲缅文时，我们把他看作缅甸人。”这时大家都笑了。邓颖超还问大家同意不同意，缅

方朋友都表示赞同。程瑞声笑着说：“我不同意。”邓颖超风趣地说：“你不同意不行，要讲民主。”大家又都笑了。后来，在蒲甘参观时，邓颖超又亲切地对程瑞声说：“我总是把你叫作‘缅甸程’。” 邓颖超的话更是一种鞭策，令程瑞声深受鼓舞。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同东南亚国家建交的过程中，由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曾多次出面主持接待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其他代表团，这使程瑞声便有很多机会见到他。程瑞声感到，邓小平同外国领导人谈话能抓住要领，以简洁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思想，很少长篇大论，解决问题果断利索，确实是一位举重若轻的领导人。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再次受到批判并被打倒后，邓小平于 1977 年 7 月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

1977 年 2 月 8 日 , 邓颖超副委员长在缅甸蒲甘和吴奈温总统会谈前（右二为程瑞声）。

1977 年 9 月吴奈温顺道访华时，邓小平出面主持欢迎宴会和会谈。9 月 19 日下午，陪同吴奈温访华的缅甸外长吴拉蓬约程瑞声“聊天”，主要就邓小平访问缅甸问题进行了试探。程瑞声当即向上反映。当晚在吴奈温的答谢宴会上，吴奈温在祝酒词中表示期待着在缅甸欢迎和接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祝酒词中也表示欢迎吴奈温今后在方便的时候，再次到中国来访问或休息。在宴会交谈中，邓小平和吴奈温谈了两国领导人互访问题，邓小平访问缅甸就基本确定了。

由于 1978 年 1 月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缅甸是“文革”结束以后我国主要领导人首次出访，确实如外电评论所说“是有历史意义的”。邓小平以缅甸为出访的第一个国家，体现了中缅的传统友好关系。1 月 31 日，邓小平圆满地结束了对缅甸的正式友好访问回国。在专机回国的飞行途中，邓小平从缅甸领导人赠给他的大幅照片中选了十几张，让身边的同志给程瑞声留作纪念。这份礼物令程瑞声感到惊喜，因为每张都有程瑞声为邓小平做翻译的镜头。陪同邓小平访问后，程瑞声于 1979 年调到驻印度使馆担任参赞，此后，缅甸语高级翻译就由年轻同志来担任。结束了自己作为缅语高级翻译的工作经历，为邓小平做翻译的那些照片便尤显珍贵，“既是我陪同邓小平访问的纪念，也是我结束长达二十余年缅甸语高级翻译工作的纪念”。

三　在与东南亚国家建交热潮中成了热门人物

1971 年 7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中美双方宣布尼克松将于 1972 年访华，震动了整个世界。同年 10 月，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1972 年 2 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了《上海公报》。在这一系列事件的推动下，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个建交高潮。东南亚国家也不甘落后，纷纷向中国伸出了友谊之手。

20 世纪 70 年代初，程瑞声在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东南亚处的工作，并于 1973 年 7 月被提拔为亚洲司副司长，继续主管东南亚事务。除缅甸外，还主管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成员国。“当时的东盟不是现在的‘大东盟’，成员国只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程瑞声说，在东盟国家中，马来西亚是最早提出同我国改善关系，也是最早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如今，马来西亚是同中国有十分友好关系的周边国家。

当初，马来西亚开始主动试探改善对华关系时，中国政府需要处理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改变不承认马来西亚国名的立场，把平时所使用

的“马来西亚”上的引号去掉。据程瑞声介绍，我国长期在马来西亚国名上加引号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1963 年 9 月 16 日，马来亚联合邦同新加坡、沙捞越、沙巴合并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当时印尼在苏加诺总统的领导下，认为北加里曼丹（即沙捞越、沙巴）同印尼领土接壤，并入马来西亚，对印尼国家安全是一个威胁，因此对马来西亚采取了对抗政策，积极支持北加里曼丹争取独立反对马来西亚的斗争，指责马来西亚是“新殖民主义的产物”。中国积极支持印尼对抗马来西亚，同意马来西亚是“新殖民主义的产物”的观点。从此，中国报刊在提及马来西亚国名时都加上了引号。

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东南亚形势同 60 年代已大不相同。1965 年印尼发生的“九三〇”事件导致苏加诺下台，苏哈托上台，1967 年 10 月中国和印尼关系中断。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则在 1970 年 9 月在卢萨卡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提出：在美国、苏联、中国三大国的保证下，实现东南亚地区的中立化。但在三大国中，马来西亚尚未同中国建交，是马来西亚在东盟国家中率先考虑改变对中国的政策，期望同中国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

去掉马来西亚国名上的引号已势在必行。1970 年底至 1971 年初，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及其他几个州发生了 40 年来最严重的水灾，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较大损失。中国政府以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向马来西亚红十字会发出慰问电，并向灾民捐赠价值 50 万元人民币的救济物资，慰问电上马来西亚当然不能再加引号。经过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发的这一慰问电不仅表达了中国人民对马来西亚人民的友好情谊，而且也比较自然地解决了马来西亚国名问题 。

1971 年 5 月，马来西亚政府派出以东姑・拉扎利为首的贸易代表团

参加广交会，并访问北京。拉扎利系拉扎克总理的亲信，向中方转达了拉扎克的口信，说中马建交时机已到，建交的3个步骤是：通过民间往来，增加相互了解；发展两国贸易；正式建交。在接待该团时，中国开始正式使用马来西亚国名，并公开见诸报端，表明了中国对马来西亚的实际承认。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程瑞声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访问马来西亚的第一个代表团——中国贸易促进会代表团，担任代表团的秘书，于1971年8月访问马来西亚。代表团由外贸部、外交部官员以及银行、保险、一些进出口总公司等有关业务的代表组成，团长是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张光斗，副团长为游扬。程瑞声回想当年说："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马来西亚，经济尚未腾飞，还是较为落后的，吉隆坡还没有很多高级饭店。中国代表团所住的美伦饭店是当时最好的饭店之一。"他还说，那时马来西亚为了开启同中国的关系，对中国代表团的接待十分热情友好。8月24日下午，拉扎克总理在总理办公室会见了中国代表团。

在代表团访问马来西亚后，同年9月，马来西亚在第26届联大上投票赞成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进一步推动了中马建交的进程。在其后中马两国进行的建交谈判中，经过周总理亲自同马来西亚来访人员深入交谈，马方对中国的立场增进了了解，两国终于就建交有关问题达成了协议。应周恩来总理邀请，1974年5月28日至6月2日，拉扎克总理访华。5月31日，周恩来总理和拉扎克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马来西亚成为东盟中第一个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国家。

中国与菲律宾在建交前的关系有其独特之处：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菲律宾为数众多的代表团纷纷来中国访问，有经济、贸易、商

会、文化、议员等。周恩来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会见了他们，为中菲改善关系创造了良好的气氛。然而，中菲建交则是在菲律宾的第一家族——马科斯总统家族的一手包揽下实现的，可以称为“家族外交”。其中主要人物有3位：马科斯总统，他的夫人伊梅尔达·罗穆亚尔德斯·马科斯，伊梅尔达的弟弟本哈明·罗穆亚尔德斯。本哈明·罗穆亚尔德斯成了程瑞声经常打交道的对象。

1972年2月5日至12日，本哈明·罗穆亚尔德斯作为菲律宾总统的代表访华，由外交学会出面接待，谈判则由外交部负责。2月5日晚，中国外交学会副会长周秋野和程瑞声去机场迎接。程瑞声回忆说：“罗穆亚尔德斯那时40多岁，过去曾担任菲律宾驻美国大使，并数次任马科斯特使。他留有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式的长发，言谈举止也很像美国人。”中菲建交期间曾发生了程瑞声勇斗罗穆亚尔德斯取得成功的有趣插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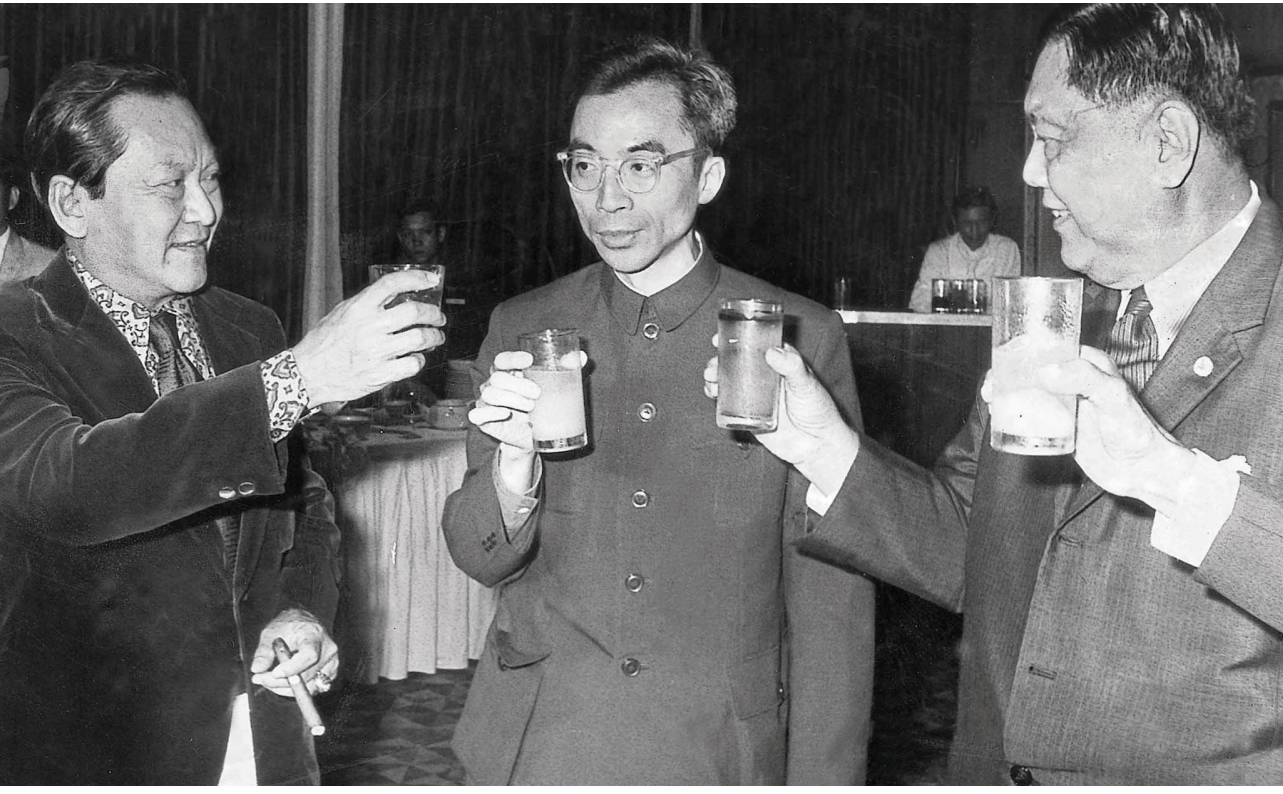
1975年6月，马科斯总统偕夫人伊梅尔达访华，实现了中菲建交。在访问前，本哈明·罗穆亚尔德斯率先遣组乘一架小飞机先行抵京，同中方商谈访问日程，并将建交公报定稿。罗穆亚尔德斯原来已答应在5月30日将菲方对中方建交公报修改稿的答复交来。但那天晚上程瑞声约见他时，他却以中方在有关日程上未给予答复为由，诡称菲国内对中方公报修改稿尚未答复，进行拖延。他所说的日程问题，实际上是指菲方要求预先明确毛泽东会见马科斯夫妇的时间。而当时中方的习惯做法是，毛泽东会见任何外国客人的时间和地点都只能在对方抵达后临时确定，不可能预先写入日程。

由于当时离马科斯访华只有几天，情况已很紧迫，面对罗穆亚尔德斯的“耍赖”，程瑞声十分生气，当即拍了桌子，表示如菲方对公报修改稿再不给答复，就不谈了。程瑞声和中方其他人员当即拂袖而去。这

一斗果然有效。罗穆亚尔德斯回到饭店后才 5 分钟，就告诉中方接待人员，已收到菲国内答复，要求次日上午约见程瑞声。次日上午，罗穆亚尔德斯约见程瑞声，果然交来菲方建交公报修改稿和菲方关于同中国台湾“断交”的单方面声明稿，使双方商谈得以继续进行。事后，程瑞声向外交部韩念龙副部长汇报了有关情况。韩念龙表扬说：“你这桌子拍得好，把对方的修改稿拍出来了。”应该说，在外交谈判中拍桌子是不可取的，而程瑞声这次拍桌子是他外交生涯中唯一的一次，可以认为是一次“例外”。这件事也没有影响程瑞声和罗穆亚尔德斯的友谊，双方继续为马科斯访华成功进行了友好的合作。

马科斯总统夫人伊梅尔达被人们称为“铁蝴蝶”，她曾应周总理邀请于 1974 年 9 月以总统特别代表的身份访华。程瑞声印象里，伊梅尔达既是菲律宾政坛一位野心勃勃的政客，又是一位出色的演员，“伊梅尔达生于 1929 年，当时已 45 岁，但仍很美丽，善于交际”。9 月 21 日上午，程瑞声陪同伊梅尔达一行参观北京市郊区双桥人民公社的稻田、果园、小学、医院等。每到一处，众目睽睽之下伊梅达尔都充分展现自己。程瑞声回忆说，在稻田参观时，伊梅尔达拔起一束稻子说要带回菲律宾去试种；来到果园时，果园负责人送给伊梅尔达一篮苹果，她风趣地说，按照菲律宾人的说法，每天吃一个苹果就不必找医生，现在送我那么多苹果，我将永远不找医生了。“她的话引起众人大笑，公社人员感到特别高兴。”

令程瑞声印象更为深刻的是，为了争取会见毛泽东，伊梅尔达甚至连眼泪也派上了用场。9 月 23 日晨，本哈明·罗穆亚尔德斯约见程瑞声和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再次提出伊梅尔达希望会见毛泽东。“当天上午，李先念副总理同伊梅尔达单独会谈，告诉她由于毛泽东不在北京，这次



1973 年 6 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曼谷（中为程瑞声）。

就不见她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伊梅尔达竟哭泣起来。当中方不得不表示再考虑毛泽东会见的可能，伊梅尔达又破涕为笑。

9 月 26 日晚，程瑞声陪同伊梅尔达一行在延安访问，从北京传来消息，毛泽东可能会见伊梅尔达，要求一行人次日一早飞往西安。“27 日上午，我们到达西安后，唐闻生已在西安机场等候。然后伊梅尔达在韩念龙、唐闻生陪同下坐另一架三叉戟专机前往武汉，会见了毛泽东，使她的访问达到了高潮。”当晚，程瑞声在电视上看了毛泽东会见伊梅尔达的报道，“毛泽东在见面时还按西方礼节，吻了伊梅尔达的手背，一时传为佳话”。

和中美乒乓外交一样，中泰两国之间的乒乓外交也打开了中泰友好往来的大门。程瑞声幸运地担任了1973年到泰国访问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副团长。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访问泰国的第一个中国代表团，在泰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程瑞声成为中泰乒乓外交的“主角”之一。至今他还珍藏着当时泰国中英文报刊和中国的报刊所登载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泰和他个人在泰国活动报道的剪报，有厚厚的一大沓，他还记得当时有的同志称他为“程旋风”。

1972年9月初，在北京举行了亚乒赛。泰国派乒乓球代表团参加了这一邀请赛。该团的顾问巴实·干乍那越是一位特殊人物，受泰国领导人的委托来向中方试探改善中泰关系的可能，可以说是一位特使。当时程瑞声在亚洲司担任东南亚处副处长，以中国人民对外友协理事名义全程陪同他们。巴实的中国之行揭开了中泰乒乓外交的序幕。1973年5月，中国决定派乒乓球代表团于6月访问马来西亚，泰国乒乓球协会闻讯后邀请代表团顺道访问泰国，中方同意。

外交部本来并没有计划要派程瑞声或其他同志参加代表团。但在国家体委确定由全国体总负责人、中国乒协副主席庄则栋为代表团团长后，庄则栋给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打电话，希望外交部能派一位熟悉东南亚情况的同志参加代表团。部领导决定派程瑞声参加，用对外友协理事名义，担任代表团的副团长。

代表团于6月17日中午抵达曼谷机场。从抵达泰国开始，中泰“乒乓外交”就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虽然程瑞声参加代表团是以友协理事的名义，但无巧不成书，泰方事先就知道程瑞声是中国外交部官员，在同程瑞声接触方面表现十分积极主动。在泰国乒总主席举行的便宴上，为代表团访泰担任中间人的泰国乒总财务叶祥龙向程瑞声提出，泰国副

外长差猜（原译“差提猜”）想见程瑞声，不知是否同意。程瑞声表示，此行主要是协助代表团工作，愿意同差猜副外长进行非正式接触，但前往泰国外交部有所不便，希望能在泰国外交部以外的地点会见。

6 月 18 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去参观著名的北览鳄鱼湖，敏感的记者发现程瑞声不在场，猜测纷纭。原来当天上午泰国外交部政治司东亚处处长德·汶纳到饭店来找程瑞声，表示泰国外交部有关官员愿同他谈谈。程瑞声表示可以非正式接触。于是，德·汶纳随即约泰国外长秘书阿沙·沙拉信和政治司副司长素提来饭店，在泰方预订好的一间房间内共进午餐。这是一次友好的“工作午餐”，也是中泰两国外交部官员的第一次非正式会晤，双方无拘束地就中泰关系和东南亚形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6 月 21 日晚，差猜副外长在他的私邸宴请了程瑞声，泰方阿沙、素提、德·汶纳也来参加。程瑞声同差猜除就中泰关系交换意见外，并表示，欢迎他有机会到中国访问。宴会快结束时，外面已有记者等候。差猜提出泰方将发表一篇短消息，程瑞声表示没有意见。次日，泰国报纸刊载了泰国外交部新闻司就差猜同程瑞声会见发布的新闻公报，公报表示差猜和程瑞声“曾就有关各项问题交换意见，有利于未来加强泰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友好关系”，“双方之非正式会谈，进展非常顺利，并获得重大成就，气氛融洽”。同日曼谷《星暹日报》报道称，差猜向记者表示：会谈非常成功，感到非常满意，强调双方是在亲切诚恳的气氛中谈话。报道又说，差猜少将以中国菜式款待程瑞声副团长，席间他们均不必用翻译员通话，而纯以英语对讲，“程瑞声的英语，令外交部高级官员甚惊奇，坚信程瑞声副团长必曾留学外国”。

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同泰国乒乓球运动员在曼谷举行的两场友谊比赛，使访问达到了高潮。曼谷的吉滴卡宗体育馆虽然有一万个座位，可是由

于前来观看比赛的人太多，不得不在比赛场地周围增设大量座位，使得每场比赛的观众达到了 15000 多人。观众中有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并不是球迷，而是特来看看中国朋友的风采。每次比赛结束后，许多观众还不愿离开，等候在出口处，热情地同中国代表团成员打招呼。在离开曼谷前一天晚上，泰国运动员主动到中国运动员房间聚会，畅谈到深夜。据泰国报纸报道，由于中国代表团访问，泰国群众对乒乓球这项运动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体育用品商店的乒乓球拍和乒乓球成为畅销的热门货。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泰国，为中泰两国进一步改善关系开辟了道路。同年 12 月，差猜副外长率领泰国贸易代表团访华。1975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6 日，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对中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会见了他。邓小平副总理与克立·巴莫举行了会谈。差猜这时已担任外交部部长，也陪同克立·巴莫访华。他以他夫人的名义送给乔冠华外长和程瑞声各一大盆兰花。那只置放兰花的白色大塑料盒上印有烫金的泰文和中文“泰国兰花”和中文的“中泰人民友谊之花”等字，至今仍是程瑞声珍贵的纪念品。

1975 年 7 月 1 日，是程瑞声永远难忘的一天。那天晚上 7 时，周恩来总理在医院和克立·巴莫总理签署了中泰建交联合公报。当时，周总理签字时的双手不断地颤抖。公报文本上“周恩来”3 个字不是一笔一笔写成的，而是一点点地点成的。外宾离开后，周恩来在参加仪式的人员中看到了程瑞声，十分高兴地向他挥手招呼，并且说：“程瑞声倒办成了几件事。”周恩来语重心长的勉励，使程瑞声感到非常激动。可是当时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

第六章
“左右手”感受别样的魅力

黄华曾作为向导和随行翻译协助埃德加·斯诺完成了名噪全球的《西行漫记》的采访工作。当年，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共领导，对斯诺的到来很重视，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亲自为斯诺安排采访计划，因为这既是对外宣传中共主张的最好机会，也是中共外交的一次演练。作为翻译的黄华协助斯诺不但采访了毛泽东，还采访了上百位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指战员。

1949 年后，黄华成为周恩来领导下的外交部一员。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对中国外交有着开创意义的两次国际会议——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黄华都作为代表团的顾问和新闻发言人随行，深受周恩来赏识。作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黄华参与新中国的诸多外交决策。参与中美建交谈判，是他外交生涯中浓重的一笔。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左右手”，黄华深得周恩来的教诲，很多开拓性工作周恩来委派他处理，他完成了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外交工作。

一 见证“头戴红五星八角帽”经典照片的诞生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于 1928 年身挎一架旧式的柯达照相机来华后，目睹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种种现状，开始同情与支持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他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 年 4 月到 1935 年 6 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燕京大学是中共领导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斯诺积极参加燕大新闻学会的活动，黄华等北平学生运动骨干都是他家的常客。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胜利结束长征，到达陕北。但是，由于蒋介石的严密封锁和反动宣传，广大地区的中国民众不可能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

1936 年 6 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斯诺在美籍医生乔治·海德姆（马海德）的带领下首次访问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最高指挥部的临时驻地——陕北保安（今志丹县），拜访了许多中共领导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显然，斯诺到西北苏区，绝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这是中共和毛泽东为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歪曲宣传而进行的一次战略行动。

黄华在晚年回忆说：“1936 年 6 月中旬，我正在准备毕业考试。一天，埃德加·斯诺秘密地告诉我，中共中央已同意他的请求，去陕北苏维埃地区参观采访。他虽然会说一些中国话，但还不怎么行，问我愿不愿意陪他去陕北采访，帮助他做翻译。真是喜从天降，我不假思索，立即高兴地一口答应了。”

当年，黄华提了一个皮箱悄悄离开学校，宿舍内的一切原封未动，也未告诉任何同学和亲友。在西安，黄华如约找到斯诺和海德姆下榻的旅馆——西京招待所。“在等待出发去陕北的通知之际，我们利用短暂停留的几天时间一同去开元寺、碑林、大雁塔等地游览。之后，斯诺和海德姆就由一位东北军上校军官和中共驻东北军的联络军官陪同，乘坐东北军军车向延安出发。我留下来等待下一批交通员带领北上。”

7 月 20 日晚，黄华到达陕甘宁苏区东部的前沿指挥中心——安塞县的白家坪。次日，到达保安县，被安排同斯诺和海德姆住在一起。“我很高兴与他们重逢，我们热切地交谈别后的情况。斯诺告诉我，他已几次采访过毛泽东。毛主席侧重谈了当前中国形势和共产党关于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准备对日作战等方针政策，还谈了他自己的历史，是吴亮平和陆定一同志帮助翻译的，他收获极大，记录了好几本。只是他觉得一些重大的政策问题和人名、地名还记得不太准确，希望我帮他查询订正。”

黄华也曾与毛泽东见过面，毛泽东对他说，一二九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只是因为消息闭塞，在一二九之后好久才知道。

黄华在晚年还记得，斯诺在保安采访毛泽东之后，访谈了上百位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指战员，整个采访计划由周恩来亲自帮斯诺制订。林彪、蔡树藩、罗炳辉、张爱萍、耿飚、黄镇、伍修权和许多红军干部、战士

和红小鬼向斯诺畅谈了红军在长征中创下的大量不可思议的人间奇迹。

毛泽东给斯诺的印象是：“他是一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于一般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斯诺和毛泽东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谈话，毛泽东无情地剥去蒋介石在中共和红军身上涂抹的“赤匪”的厚重油彩，并对斯诺说：你自己去周围参观一下，你到任何地方去看看，你找任何人问问，请他们谈谈对中共和红军的看法。在对毛泽东的采访中，毛泽东对他说：“你到苏区来，这个险冒得好，我们这里一切都是新闻，你真是撞上大运了，肯定能出一本畅销书。”

8 月下旬，斯诺在陕北保安的采访计划已大体完成，就要出发去红军在宁夏的前线，那里有国民党包括马鸿逵的 20 多万大军同红军对峙着，战斗频繁。斯诺在黄华的陪同下去向毛泽东告别，斯诺提议给毛泽东照一张相。

当时，红日已升到了中天，艳阳直射到窑洞里，显得十分明亮。毛泽东走出窑洞，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然后在窑洞前站住。斯诺按下快门，为他拍下了一张全身照片。斯诺希望再给毛泽东照一张半身的照片，向毛泽东跟前走了几步，对好了焦距，抬起头来说：“主席，你的头发太长了，最好戴上帽子。”毛泽东说：“我的军帽多久没戴，不知放到哪里去了。”只好向在场的人借戴，但是没有一顶能够戴得下去。最后，站在旁边的海德姆摘下斯诺头上缀有红五星的崭新的八角帽，递给毛泽东。只听“咔嚓”一声，斯诺拍下了毛泽东身穿黑蓝色军装、头戴红星帽的珍贵照片。后来，随着《红星照耀中国》出版，这幅“毛泽东在陕北”的照片让世界领略到了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风采。

美国记者斯诺 1936 年拍摄《毛泽东在陕北》。

几十年来，斯诺把这顶军帽视为家珍，从红区带到白区，又从白区带到美国、瑞士。斯诺逝世后，他的夫人将这顶军帽赠送给中国政府，陈列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成为见证中国革命的一件极其珍贵的文物。

黄华曾回忆说：“离开保安前，毛泽东曾交代请斯诺先把他（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与政策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要我译成中文，即时派通信员专程送回保安，他好核定。我们利用去前线路上中午休息时间，在阳光底下，斯诺用打字机打出笔记记录，我一面就译成中文，译完一篇就卷起封好，请红军派通信员送保安交毛泽东。这样工作了 3 次，完成了毛主席交代的任务。”

在宁夏前线的预旺堡，斯诺访问了一方面军和前敌总指挥部，他用敏锐、客观、深刻和探索的眼光观察和采访了红一方面军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左权、政委聂荣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红一师师长陈赓、红军骑兵一团团长张爱萍、第一师政委杨成武、第二师师长杨得志和红二师政委萧华等许多干部战士，参观了部队训练和防空演习，他在访问苏区前拟定的 90 个问题都找到了解答。黄华生前回忆说：“在采访中，斯诺十分注重眼见为实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并拍摄了大量照片。他原想把我和海德姆也纳入镜头，但我和海德姆一到苏区即下决心不再离去，

所以向斯诺提出，请他在报道中不要提及我们的名字，也不要给我们照相。因为海德姆还有亲属在美国，我也考虑，如果组织上派我到国民党地区做秘密工作，斯诺任何照片和文字报道对我以后的工作都是不利的。所以我叮嘱斯诺写文章、写书都不要用我的名字和照片。斯诺遵从了我的要求，我也注意在他照相时总是避到一旁。”

10 月底，斯诺回到北平家中。毛泽东的谈话和苏区的观闻，深深地使他激动，以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的精神都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他要立即把在西北苏区的美好印象写出来，把毛泽东和他的谈话写出来，向全世界公布真相。11 月 12 日起，美国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分期刊登了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上海《大美晚报》立即予以转载。为此，许多报刊头版头条连载斯诺的报道外，还配以大幅照片和有关的社论。

1937 年 10 月，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样一本全面报道中共、红军和苏区的专著的英文本首先由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1 个月内销售了 5 版。1938 年 1 月，美国兰登书屋发行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版，连印数次。这使西方人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有人甚至评价说，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

1938 年 2 月，上海复社翻译出版中译本时，由于当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考虑到联合统一战线等情况，书名改为《西行漫记》。中译本出版后，在中国同样产生巨大的反响，成千上万个中国青年因为读了《西行漫记》，纷纷走上革命道路。该书先后被译为 20 多种文字，几乎传遍了全世界。他的书在新中国成立后再版时才提到黄华与马海德的参与。这时，经组织批准，黄华已不再使用“王汝梅”的名字，乔治·海德姆也按宁夏

三十四年后，黄华陪伴埃德加·斯诺重访保安，在毛泽东旧居前留影。

人的大姓改姓马名海德了。

20世纪70年代，斯诺作为第一个西方记者来看“文革”中的中国。当年，他对中国怀着深厚的友情，一直关心中国发生的一切。西方传媒关于中国“文革”的报道使他迷惑、忧虑，他想亲自到中国来看一看。他写信给在中国的老朋友，甚至写信给毛主席，询问访华的可能性。

1970年6月，中央决定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邀请斯诺夫妇访华。周恩来通知黄华回北京参加接待工作。8月中旬，斯诺夫妇到北京。黄华曾陪同斯诺夫妇在北京和外地参观、访问。10月1日，黄华陪斯诺夫妇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游行，并与毛泽东主席作了一些交谈。

这年12月7日，周恩来给黄华写信，要黄华向他报告斯诺夫妇访华的具体情况，访问了什么地方、工厂、学校；接触了什么人，还有多长时间留在北京，以便主席考虑何时见斯诺并同他谈些什么问题。总理特别提醒黄华，在报告中不要建议林彪、江青见斯诺，更不要提请总理见斯诺。黄华起初不解其意，以后终于明白。须知彼时正是庐山会议之后，斗争正处于相持阶段！且总理深知斯诺报道的巨大影响力，而不能让斯诺被林、江利用，但此中深意又不能明说，只能用写信的办法。

在上海，出面接待的是上海革委会负责人徐景贤，徐景贤津津乐道地叙述“文革”在上海发动的经过，介绍造反派夺权的“安亭”事件，讲批斗老干部的情况，说那些老家伙根本就不触及灵魂。斯诺对徐景贤说：没有老干部就没有你的今天。并忽地站起来说：我们要老革命触及灵魂，可他们的灵魂是干净的！讲完就告辞。黄华还从来没有见过斯诺这样生气。

1971 年 2 月，斯诺结束这次长达半年的对中国的访问，回到瑞士。他的访华报道，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同他的谈话，先后在意大利的《时代》杂志、美国的《生活》杂志等报刊上发表。4 月间，美国白宫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尼克松总统已经注意到斯诺文章传达的信息，他希望有一天能访问中国。

1972 年 2 月初，黄华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正在亚的斯亚贝巴出席安全理事会会议，接到北京的特急电报，说斯诺因胰腺癌病危，周总理要他赶往瑞士去看望斯诺，代毛主席和周总理本人向斯诺问候。此时，北京日坛医院为斯诺准备好了病房，去瑞士迎接斯诺的 6 人医疗小组由马海德率领，已抵达斯诺家。

黄华赶到斯诺家，斯诺刚从前几天的昏迷中清醒过来，马海德对斯诺说：“你看谁来了？是黄华！”斯诺立即睁大眼睛，脸上出现极兴奋的笑容。斯诺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紧抓住黄华和马海德的手，用尽全身的气力说：“啊！咱们 3 个‘赤匪’又凑到一起来了。”原来，1936 年，他们 3 人一起在保安时，斯诺常把反动派咒骂红军为“赤匪”当作笑料。

黄华在斯诺家看望他两天，同斯诺的儿女谈了很久，讲述他们的父亲如何同情中国人民在旧社会遭受的苦难，如何不畏艰险去偏远的中国西北，探访和了解中国的革命道路，向全世界传播了中国的革命伟业。

这年 2 月 15 日，斯诺在日内瓦病逝。

二 外交生涯的开启

1944 年 6 月，美国决定派美军观察组赴延安。中共中央十分重视美军观察组驻延安，毛泽东亲为《解放日报》改写社论，把美军观察组热情称为战友。为接待美军观察组，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为组长的延安中央军委外事组，成员有柯柏年、陈家康、凌青和黄华，马海德为顾问，黄华任翻译科和联络科科长。应该说，接待美军观察组是中国共产党外交工作，特别是与西方外交工作的重要开端，也是黄华个人从事外交工作的起点。

1949 年 4 月中旬，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黄华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上，周恩来见到黄华，当面点将调他到南京外事处，周恩来说：“这几天南京就要解放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吧。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你还可以作为燕京大学校友同司徒雷登（司徒雷登 1919 年创办燕京大学，担任校务长长达 27 年）进行私人接触，看看他有什么要求和愿望。”南京解放后的第二天，黄华到了南京。

一到南京，黄华就听说有几名解放军战士进入了司徒雷登的住处，

1944 年 10 月，中方驻美观察组工作人员合影（左二为凌青，左四为黄华，右三为何理良）。

引起一些外国使节的不安。根据中央的指示，南京外事处宣布不承认国民党时期的任何外国驻华人员的外交身份和特权，对留在南京的外国原外交人员均按一般外侨看待，同时宣布保护外侨的一切合法利益及人身安全。关于建交问题，声明按照平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为了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黄华召集南京军管会各单位的干部开了一次会，传达中央的对外政策，宣布了几项外事纪律和注意事项。

黄华曾以私人身份前往司徒雷登住处，同他会晤。期间，黄华对司徒雷登说，在军管期间，解放军有权进入一切可疑的中外居民住宅检查。在未同新中国建交前，原外国使节不再享有外交特权，但作为外侨，安全自会得到保护，请他放心。黄华认为，司徒雷登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扮演过多种角色，但他是美国利益至上主义者。淮海战役之后，蒋介石

1945 年 8 月 27 日，张治中（后左三）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专程到延安陪毛泽东同机赴重庆谈判。图为毛泽东接客人至住所途中。左一为参与接待工作的黄华。

率残部迁至台湾，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司徒停留在南京，观察动静，企望与中共领导层接触，摸清底细。说到底，司徒雷登、艾奇逊等是为在美苏争夺中打中国牌，意在把新中国拉到美国方面。

南京外事处成为黄华从事新中国外交工作的起点，从此新中国成立重要的外交工作都闪现着他的身影。1960 年，他成为中国驻加纳首任特命全权大使；随后，任驻埃及、加拿大大使。“文革”中，黄华是唯一没被召回的大使，但 1969 年 7 月他回国之后仍难逃厄运，他先是进了“学习班”，旋又赴位于湖北钟祥的外交部干校。

1971 年 10 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后，黄华为中国首任常驻

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的代表。

作为周恩来的老部下，黄华在外交工作上受周总理影响是全方位的，乃至个人作风都深受影响：一是风格上的不卑不亢，时刻铭记国家的利益、自己的立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外交政策的指针，广交朋友，争取支持。二是随时准备请示汇报，外交工作无小事，做过的事要如实汇报，主动请领导给予指示。三是作风上要特别严谨，细节应该特别注意。有一次，周恩来因为着装批评了黄华。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时候，黄华的中山装有点不太好了，而且他觉得穿中山装进入有些场合显得过于庄重，正好有两匹料子，就做了很讲究的西装。结果，黄华受到周总理的批评，说必须穿中山装，这是代表中国。

三 两位“失踪”者的友谊始于谈判和“交锋”

2008 年 8 月 11 日，北京医院病房。黄华比平日起得要早，身体虚弱的他，坚持在护理人员的帮助下开始一丝不苟地做准备：临时撤掉氧气管，脱掉病号服，换上雪白的衬衣、笔挺的裤子和紫红色的唐装，然后是刮胡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端坐在沙发上。他告诉夫人何理良，“要让自己精神些，像正式的外交官一样”来迎接他的老朋友、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一家。早在 3 个月前，基辛格就写信给他：他会带家人来北京看奥运，并拜访黄老，“我想知道黄老在这 70 多年的革命和外交活动中，是怎样非常潇洒地走过来的”。

基辛格带着夫人南希、儿子戴维、孙子塞缪尔、孙女索菲如约来到病房，黄华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作为“见面礼”——他拿着奥运开幕式提供的拨浪鼓，快捷地摇着表示欢迎，而后使尽全身力气站起来与基辛格握手、拥抱。

两位老朋友的话题从奥运开始。因身体原因不能到现场看开幕式成为黄华最大的遗憾，由于视力不好，又无法看清楚电视画面，在开幕式当天，他愣是坚持听完了直播，后来又让去现场看开幕式的何理良仔仔

细细地向他汇报。

基辛格告诉黄华，自己强烈建议布什总统来参加北京奥运会，中国值得他来访问！“虽然我们两国并不是在每个具体的政策细节上都能完全达到一致，但是我们对彼此都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共同努力缩小差别，避免对抗。”黄华不住地点头，两个老朋友的手始终紧紧地握在一起。

“我看到的一切超出了我的想象，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基辛格向老朋友谈起自己的感受。他告诉黄华，“开幕式场面非常壮观，同时又十分感人。”在基辛格看来，只有对自己充满自信的人民，才能做出这个融合历史与未来的表演，并以极具冲击力的方式表现出来。两人谈到开幕式中表现的中国的四大发明，黄华说：“中国有 5000 年的历史，中国人喜欢记录所有的东西，人的活动，日食月食，包括地震，都有文字记载。”基辛格认为中国是很了不起的民族，文化悠久，创造力强。

黄华很认真地与基辛格讨论，“你说开幕式的时间是不是有点长？”基辛格幽默地回答：“对于美国的电视台来讲，可能不会这么想。因为他们花了近 9 亿美元买来奥运会的独家转播权，当然时间越长越好。”基辛格还告诉黄华，在开幕式结束后的 12 小时，他就接到了一系列积极的评价，他认为，奥运会“对中国确立在国际上的地位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此时，黄华的思绪回到了 37 年之前自己作为中央外事领导小组成员之一接待基辛格来访的情景。

1971 年年初，黄华被任命为驻加拿大大使，但黄华未能马上成行，而是关在钓鱼台国宾馆 4 号楼 1 个多月，潜心准备迎接基辛格秘访中国，被毛泽东戏称为“玩失踪”。在“失踪”的 1 个多月中，黄华和为谈判而成立的专门班子的成员仔细分析国际形势与美国情况，反复讨论了会谈方案，对尼克松、基辛格的政治观点、个人历史、个性和特点都做了研究。

1971 年 7 月 9 日，叶剑英到南苑机场欢迎基辛格秘密访华（左起：冀朝铸、叶剑英、熊向晖、黄华、基辛格、章文晋、唐闻生）。

这年 7 月 8 日，基辛格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突然失踪秘密飞抵北京，开始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7 月 9 日至 11 日，周恩来总理同基辛格进行了 6 次会谈。7 月 16 日，双方发表了会谈《公告》。

多年后，两个不再年轻的“谈判对手”在北京医院轻松地叙谈友谊时，不约而同地提到“获悉”一词，回忆起这个“公告”背后并不轻松的故事。

当时，根据 6 次会谈结果，双方各自先提出了一个公告草案。中方的稿子比较简单，说基辛格来中国同中方进行了会谈，尼克松总统准备来中国访问。美方的稿子渲染基辛格同中国的会谈，涉及亚洲和世界和

平的基本问题，是以诚挚、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的；而尼克松的来华访问将有助于重建两国人民的联系，并对世界和平做出重大的贡献。黄华对此表示不同意见：台湾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其他问题怎么谈得上？

最关键的争议出在关于尼克松访华的措辞上，美方的稿子强调是“中国邀请”，中方认为是“同意邀请”，基辛格认为中方的稿子很像是尼克松自己邀请自己访华。在黄华的回忆录《亲历与见闻》中，记录了这段历史：“我根据周总理事前的指示，直接去见毛主席向他汇报。当主席听我说，基辛格认为中方的草案的意思是尼克松自己邀请自己访华时，大笑着说，要改要改。”

而谈到此，黄华笑着做了一个动作：弯腰抱膝。原来，是当时谈完这件事，黄华告别主席走出他的书房时，回头看了一下，主席当时坐在沙发椅上俯身向前，双手抱膝。“我当时问王海容，主席在做什么。她说，主席在向你们行大礼呢，我们忙说，真不敢当，希望主席健康长寿。”可以看出，毛主席对中美关系的顺利开始是相当满意的。

基辛格和黄华一直把公报中的“获悉”一词称之为周恩来总理的“杰作”。这个词避开了谁主动提出访华的问题，基辛格因而在尼克松总统“接受了这一邀请”之前加上了“愉快地”这一副词，投桃报李。最后发表的公报中这样表述：“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 1972 年 5 月前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1972 年 2 月 21 日，尼克松偕夫人帕特里夏在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等的陪同下乘美国总统专机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 7 天的历史性访问。

在尼克松访华发表《上海公报》后，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1966 年 6 月，周恩来访问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右一）到机场迎接中国代表团。

由于黄华当时常驻纽约（常驻联合国代表），基辛格建议在他俩之间建立一条与巴黎渠道平行的、中美间的另一条秘密联系渠道——纽约渠道。

此提议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作为鲜为人知的“纽约渠道”的当事人，黄华曾回忆说：1972 年和 1973 年，我和基辛格在纽约有许多次避人耳目的秘密会晤，多次会晤是在约定的时间在纽约曼哈顿 43 街的一所公寓里进行。美方会派一辆陈旧的轿车直接开到我驻联合国代表处的地下车库接我们去 43 街。基辛格和洛德两人准时在二楼的一间会客厅里等候我们，并为我们准备了茶点和咖啡。双方各自坐下后，寒暄一番，即进入正题。会晤的内容，主要是基辛格向我通报美苏核会谈、在巴黎的美越会谈、美日关系等情况，我们也就一些国际关系问题互通信息。我还曾就美机入侵广西、投弹、发射导弹、炸沉中国渔船等事向基辛格提出中国对美国的强烈抗议。会晤情况，基辛格直接向尼克松和白宫报告。我们向国内的报告也是绝密的。这种会晤是中美两国在没有正式建交的情况下进行的特殊形式的外交往来。它避开了媒体，免受外界干扰，又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

基辛格 1971 年的北京之行成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一次破冰之旅，也成为他和黄华友谊的起点。

自从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两国的关系开始了历史性的正常化过程，而黄华视能参与其中而一生引以为荣。据何理良回忆，黄华和基辛格不仅在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几十年来他们多次见面，基辛格还邀请黄华去美国访问，向美国公众谈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中国的发展情况。

2008 年，黄华很珍视这次会面。得知来中国前，基辛格刚刚过完他的 85 岁生日，黄华一家特意请著名画家娄师白和他的儿子娄述德作画一幅，为老朋友祝寿。娄述德画出 9 个栩栩如生的大红桃，“大寿”两个篆字由娄师白先生亲自题写。基辛格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份真诚的祝福，

晚年喜爱养花栽草的外交家黄华。

还忍不住用手摸了摸画上的桃子。基辛格还得到一份特别的礼物：一张DVD，记录了他秘密访问中国，及第二次访问中国见到毛主席时的情景。

会面时间远远超过了医生规定的 15 分钟，两个老朋友相拥道别。平日里只能偶尔起来坐坐的黄华，不知道哪儿来的力量，竟然自己站起来，拄着拐杖稳稳地向前走了好几步。他要像以往那样送送远道而来的老朋友。恋恋不舍中，基辛格回过身来再次与老友相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他们两人的永别。

2010 年 11 月 24 日，一个平淡的日子。这天凌晨 3 点 08 分，传奇的外交帅才黄华在北京病逝。当天，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悼念文章，文章称：作为举世闻名的周恩来总理的左右手，黄华是一位中国迈向开放时值得尊敬的外交家。

1963 年 12 月，周恩来出访埃及。

第七章
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

新闻摄影家钱嗣杰离休前曾是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中央记者组记者，新华社驻开罗、阿尔及利亚、刚果分社摄影记者，新华社驻联合国摄影记者，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中央新闻组组长兼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副组长，新华社驻东京分社摄影记者。

早些年，作为新华社外事记者的钱嗣杰以娴熟的摄影技巧拍摄下无数珍贵的历史镜头，见证了开国总理周恩来的独特魅力。周恩来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1月8日离开人世，一直担任政府总理，并在相当长时期兼任外交部部长之职。他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奠基人。建国初期，国际局势动荡，由于缺乏交流和沟通，左邻右舍都对中国产生疑惧和误解。为了加强联系、促进了解，并推动邦交的正常化，周恩来亲自率团出席了日内瓦会议、亚非万隆会议，随后本着“亲善四邻，安定友邦”的精神，又从1956年11月到1957年2月开展百日外交行动，风尘仆仆地走访了欧亚十一国。这些空前的壮举不仅为新中国打开了外交局面，而且使周恩来本人在世人的心目中树立起一个光辉的外交家形象。在钱嗣杰家里有一本特别的相册，里面有大量照片是自己当年拍摄的有关周恩来在外交场合的历史瞬间，且还有几张他本人和周恩来的珍贵合影。走近这位新闻摄影大家，俨然回放一个个有关红色传奇的镜头。

一 与同行相约在印尼

1954 年 12 月，由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倡议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得到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一致同意，5 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的会议上正式提出召开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并一致同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参加。这对于尚未恢复联合国应有的席位且被许多国家孤立的新中国来说无疑是个喜讯。周恩来复电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告之中国决定参加亚非会议。随后，参加亚非会议的具体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作为新华社摄影部中央记者组记者的钱嗣杰被通知即将前往印尼，采访亚非国家首脑会议。

亚非会议定于 1955 年 4 月 18 日至 24 日在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万隆市召开。谁去，怎样去——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的书房里，毛泽东、周恩来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商谈着亚非会议有关事宜。

毛泽东手中夹着一支烟，含笑向周恩来问道：“恩来，去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亚非国家会议的成员都定了吗？”周恩来掏出一份名单递给主席，说：“我同陈老总已经商定了一个名单。主席，你看看这些同志行不行？”

“可以嘛，我看挺好的。”毛泽东看后点点头，接着说：“恩来，去万隆参加会议，美蒋都虎视眈眈，这次肯定是个危机重重的行程，你们打算怎么走。今天瑞卿在，大家好好商量一下，一定要确保安全。”

毛泽东、周恩来等都知道：帝国主义的态度十分明显，其中美国为了达到阻止亚非会议的召开，把矛头首先对准新中国。美国就捏造说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领导权”，已对远东“构成了尖锐、迫切的威胁”，极力挑拨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人为地制造对中国的恐惧和疑虑。美国的意图是，即使不能阻止亚非会议的召开，也要给会议制造种种难题使其“分裂而瓦解”。

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方针和政策，是妥善处理会议可能出现的变化多端的事态、挫败有些西方国家的阴谋或企图、开好会议的前提。自 1955 年 2 月开始，周恩来就着手抓了会前的准备工作，为中国代表团确定了总方针：和平共处，求同存异。

周恩来生前卫士长成元功接受笔者专访时回忆说：当时，他被安排作为总理的随身警卫出席万隆会议，正当在紧张为周恩来这次出行做准备之际，中国有关部门获悉——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特务机关正策划趁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恩来及随行人员，并已分头行动，其行动代号为“1”号。

情报确实、可靠。情况十分严峻！到底还去不去，成了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周恩来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去。他提出由香港坐船走海路去，那样可以在船上休息两天。经与有关方面的同志研究，认为走海路不行，因为当时来往于香港和印尼之间的船只只有荷兰的两只小型商船，单程要走 1 个星期，如蒋介石特务机关派出特务沿途破坏，则安全很难保障。于是，放弃了坐船走海路的设想，改为由香港乘飞机去印尼。由于当时

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既没有大型飞机可坐，也没有去印尼的国际航线可用，只能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经与印度航空公司商谈，决定租用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商定：4 月 11 日中国代表团乘该机启程时，该机作为正常航班，上午飞抵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于 1 时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飞往雅加达。

正在周恩来主持起草出席会议方案的时候，他突患急性阑尾炎，不得不于 3 月 12 日至 28 日住院接受手术治疗。出院后，医生对他作了几次身体检查，认为虽然恢复很好，但给他本人和中央留下了几条重要建议：如乘坐汽车两三个小时需休息 1 小时；腹部应包腹带；注意饮食；除有黄树则同志（时任卫生部保健局局长）照顾外，另派外科专家王励耕主任（时任北京医院外科主任）送至我国边境。

中国正全力以赴进行准备之际，周恩来接到了缅甸总理吴努发来的电报。电报邀请周恩来去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前，先在仰光休息两天。并称，届时他将派飞机到昆明来接，将安排一个由中国、缅甸、印度、埃及和阿富汗等国总理参加的小型非正式会晤，研究一下出席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吴努总理对中国如此尊重，周恩来自然接受。

国际社会对周恩来将出席万隆会议并从香港出境一事早有关注，但周恩来将先到缅甸参加小型会晤一事，并未让外界知晓。只有印度尼西亚大使莫诺努图最早得知周恩来的行踪。

中缅尚未通航，如何去缅甸？一是按原计划从中缅边境坐 5 天的汽车过去，一是加紧试航。两个方案，都必须从西南边陲的昆明出境。

于是，中国代表团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先去昆明，待缅甸所派飞机试航成功后（当时中国与缅甸之间尚未通航），再启程去仰光，之后由仰光飞雅加达；另一路按原计

划从香港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抵雅加达。

不久，周恩来会见将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并讲话。在讲话中，周恩来讲了与会的目的、重要性、要求和注意事项，以及如何在会议期间做好各自的工作，为会议的顺利召开做出努力。

全团人员约 30 人。钱嗣杰在这时才知道新华社准备参加万隆会议前方报道的工作人员是：沈建图为中国记者团团长，全面负责万隆会议的前方报道工作，黄作梅、李平（原名李炳衡）负责会议文字报道，自己负责摄影报道，刘茂俭负责译电工作，雅加达分社彭迪、钱行、谭岱生负责会外报道。他们相约在印尼见。

会后，代表团成员到东交民巷 28 号的“红都服装店”，每人定做两套中山装，一套灰色，一套黑色，此外还各定制两件衬衣。中山装的缝制，除直向缝合用缝纫机缝制外，其余各道工序大都用手工缝制。缝制时边缝边烫，工艺精细。钱嗣杰和同事在这里量好尺寸后，过了两天才拿到服装，试穿起来，感觉中山装外形美观大方，穿着高雅稳重，爱不释“身”。

二 死里逃生后号啕大哭

因为还要补充采购一些摄影器材，钱嗣杰得提前动身到香港转乘“克什米尔公主号”到雅加达。他带上了心爱的禄莱 120、徕卡 135 相机和一些闪光灯泡。向有身孕的妻子告别时，钱嗣杰一步三回头，一再叮嘱妻子好好照顾好自己，陈惠嫣则希望丈夫在国外注意安全，注意劳逸结合。

于是，在中国记者团出发前，钱嗣杰和译电员刘茂俭作为“先遣队”于 4 月 1 日抵达香港。香港是自由港，被称为“购物天堂”，世界各地物资都运来竞销，有些比原产地还便宜。香港也汇聚了世界各地的美食，什么口味的餐馆都有，开遍大街小巷，愈热闹的地方就愈多。钱嗣杰这是第一次到香港，只见充满亚洲风味的餐馆遍布香港，辛辣的泰国汤、香浓的印度咖喱、丰腴的韩国烧烤、清新的越南沙律卷、鲜美的日本寿司等等特色美食，数之不尽。香港文化和历史遗迹遍布每个角落，有传统的祖先宗祠、新界氏族围村，以至坐落闹市的庙宇。钱嗣杰也想借在香港采购一些摄影器材和记者团所需物品之余感受一下香港建筑物的中西文化荟萃特色，然后再与后期而至的记者团会合乘飞机去雅加达。

可是，待钱嗣杰和刘茂俭采购完一些摄影器材和记者团所需物品准

备逛一逛的时候，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就通知他们两人，说：“你们的行程有些变化，外交部有两位信使要去万隆，随身携带了外交文件、礼品等很多重要东西，需要你们陪同保护前往。”一听，钱嗣杰无奈地对刘茂俭摇了摇，两人心照不宣，清楚在香港多看看、多走走的计划泡汤了。这时，黄作梅补充说：“你们把采购的东西都交给我吧，我来替你们办。”

钱嗣杰和刘茂俭两人不太情愿马上离开香港，硬着头皮作启程赴万隆的准备，一个晚上闷闷不乐。第二天天一亮，有情绪的他们便乘荷兰的“芝万谊”邮轮起航了。

4 月 5 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参加亚非会议的准备情况，充分讨论并批准了《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等有关文件，并授权周恩来视会议情况的变化采取灵活应变的策略和办法。

4 月 7 日上午，周恩来带着尚未完全恢复健康的身体，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一部分人离开中南海驶向西郊机场。成元功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道，由于当时敌情复杂、多变，中央决定加派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随总理去昆明。

与此同时，一个由台湾国民党特务制订的谋杀周恩来的方案也已出台，他们盯住了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断定周恩来必走香港无疑。

在周恩来一行登乘伊尔 –14 飞机前往昆明前，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匆匆赶到，将刚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周恩来。情报说，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飞机油箱里，以暗害周恩来和代表团人员。

周恩来阅后，极为重视，当即指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

4 月 8 日，周恩来一行抵达昆明，等待中缅航线的开通。

次日，喜讯传来：试航成功了！大家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一来可以由昆明飞仰光，省得总理在滇缅公路乘车受颠簸劳累之苦。

但周恩来并没有忘记先行到达香港的代表团其他同志的安危，就在试航成功的当晚 9 时多，周恩来打电话给北京嘱咐邓颖超：“我虽不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走，但先行到达香港的同志要坐，务必转告罗青长同志（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将情况查清后，让外交部通报给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请他们务必采取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并要邓颖超设法把此情况通报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团的同志们。邓颖超把周恩来的电话指示转告罗青长后，罗青长便找到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告知有关情况。董越千当晚便将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转告给新华社香港分社。

4 月 10 日上午 9 时半，外交部又派西欧司张越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通报有关情况，并告艾惕思：中国记者等 11 人将于明天由香港搭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希望英国代办处提请香港当局注意，对他们的安全给予关注。艾惕思当即表示，他会尽快将这一情况转告给香港当局。

敌人的破坏计划使所有人为周恩来一行的万隆之行感到担心。4 月 10 日，邓颖超写信给一生“最亲爱的人”周恩来：“这次蒋贼是蓄意决心下毒手施行暗害的，他可能从各方面着手。因此，往返途中停留时，飞机着陆后严加封锁，起飞前的严密检查，是必须而不可疏忽的。在逗留地区对所用交通工具，亦应请看守与检查。你外出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

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也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我衷心地祝福你胜利平安归来！”落款是“你的知己兼好妻”。

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恩来的紧急电话指示后，在当天晚上就将情况通报给了香港当局。他们怕没有得到落实，并于次日凌晨 1 时半又派潘德声专驰赴印航驻港经理住宅向他通报有关情况。印航经理将信将疑，说：“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飞机 12 时到达香港，下午 1 时即起飞，在香港加油停留时间只有 1 个小时，而且光天化日之下，谁敢胆大妄为！”中方人员严正交涉后，这位印航经理表示届时派印方工程师对飞机进行检查，而他自己则亲自去机场进行监督。

新华社香港分社觉得印航经理态度勉强，于 11 日上午 10 时再次派人去见印航经理，提请印航务必严加防范。印航经理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港停留之际，绝不允许任何非印航人员接近飞机，就连上食品、加油、押运行李也都由公司派人负责。至此，新华社香港分社才释怀。

当天下午，还在昆明休息的周恩来接到北京打来的第一个电话，说“克什米尔公主号”已从香港启德机场按时起飞，未发生任何问题。周恩来、陈毅和中国代表团在昆明的成员都松了一口气，因为该飞机终于安全离开了香港。

但是，到了下午 6 时左右，北京打来的第二电话情况就有些不妙了。电话说，已和“克什米尔公主号”失去了通讯联系，且有家通讯社报道说在南海上空曾听到有大的爆炸声，不知是不是和“克什米尔公主号”有关。这一下，大家放下的心都又提了上来。周恩来十分关注，立即指示北京，要迅速与有关方面取得联系，查明情况。如飞机确系失事，要敦促有关方面火速进行救援，寻找失事人员。当晚，大家都没有吃好，

忐忑不安。

晚上，北京打来第三次电话，证实“克什米尔公主号”确已失事。据境外通讯社报道，“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坠于南海，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 11 人全部遇难。

接到这个电话，大家就像一块铅压在心头，从总理到每一个在昆明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无不感到十分悲愤，既对因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代表团成员惨遭不幸而悲痛，又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中国代表团成员横下毒手异常气愤，同时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的阴谋能够得逞而迷惑不解。不幸中的万幸，周恩来由于接受缅甸总理的邀请而临时改变路线赴亚非会议，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而幸免于难。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原来，为了实施爆炸计划，国民党保密局专门准备好了一批炸药，其中包括 4 枚美国制造的“钟形定时发火器”，即定时炸弹。保密局将炸弹交给一个在“四川号”货轮上当厨师的小特务，由他从台湾基隆偷偷运到香港，然后交给以“就记电料行”为掩护的香港情报站“第五联络组”。接下来的事，是要选择一个实施爆炸计划的人。这个人要能够自由进入机场和接近飞机，并可以把炸弹安放在飞机上。

特务机关认为，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是计划成功的关键。这个人最好是长期在机场工作，而且一定要是个不为人注意、不起眼的“小人物”。于是，特务机关开始秘密探访，寻找在机场工作能“担任一项具有国家性重要意义的工作”的人选。

经过一段时间侦察，一个叫周驹（又名周梓铭）的人进入了特务机关的视线。周驹，20 多岁，受雇于香港航空工程公司，一直在启德机场

做清洁工。他光棍一个，是个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烂仔”。据说当时公司正准备把他开除。选定目标后，特务机关立即开始接近周驹。

早在当年 3 月 27 日到 31 日，国民党香港情报站一个姓吴的特务头子多次找周驹，先是跟他闲聊，对他的个性、嗜好、人品进行了观察。接下来，开始详细地询问他在机场的工作情况。几次下来，特务机关完全摸清了周驹的底细。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人可以利用。

3 月 31 日，姓吴的再次找到周驹，这回姓吴的没有再兜圈子，而是直接摊牌，明确提出让周驹“担任破坏一架共产党的飞机的任务”，问周驹是不是愿意。周驹一听这话，顿时吓了一跳。他虽说是个整日吃喝嫖赌的“烂仔”，但这件事情的分量他心里还是知道的，弄不好是要蹲大狱、掉脑袋的。周驹连连摇头说：“这太危险了，不干！”

见此情形，姓吴的开始软硬兼施。他告诉周驹，既然特务机关选中他了，他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同时又对周驹许诺，事成之后，他可以得到 60 万港币的奖赏，而且还可以安排他去台湾定居，等等。

周驹最后终于答应下来。

就在美蒋特务加紧进行破坏准备的时候，我情报部门也获得了美蒋特务阴谋在香港对我实施破坏行动的情报。有关部门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得此情报后，周恩来立即进行了研究和部署。然而，周恩来和大家一样万万没有想到不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

4 月 11 日上午近 12 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自印度孟买飞抵香港启德机场。这是一架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制造的星座式 749A 型飞机，已经飞行了 11163 小时，飞机状况良好。

正值中午，飞机停稳后，机组人员除了机械师卡尼克留在飞机上以外，其他人通通下飞机用餐。虽然事先中国政府已经通报港英当局，美

蒋特务可能会对飞机实施破坏活动，要求港英方面加强保护措施。然而，此时香港警方却并没有对飞机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特别是对机场的地勤人员，并没有进行认真的检查和监控，只是派了辆警车停在离飞机很远的地方监视，把观察的重点放在了行李检查处和机场入口处。

机组人员下飞机后，卡尼克发现机组的行李少了两件。在他印象里，这种事情在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于是卡尼克赶紧离开飞机，去告诉准备用餐的其他机组人员，让他们找找行李。据卡尼克事后回忆说，当时他离开飞机有十来分钟，如果要放爆炸物至机内，两分钟即够。卡尼克估计，炸弹应该是放在了飞机右翼两引擎之间，因为该处机板只要两分钟便可打开。

炸机事件发生后，周驹的同乡、知情人周仕学和周国辉二人怕遭特务机关暗算，先是向港英当局投案寻求保护，后来又通过《大公报》的关系来到广州，向中国有关部门报告了当时的情况：

4 月 11 日上午 5 点多钟，由姓黄的特务把一定时炸弹（约茶杯大用鸡皮纸包好）交给周驹携进机场。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抵机场时，周乘进行打扫的机会，把定时炸弹放于飞机右边轮头的上头（引擎部位）。周骗其领班余培说，这包是西药，还表示以后对余有好处等。得手后周把自己的咭纸（报到用的纸张）交给余培，不等放工时间即由铁丝网爬出机场。而当时特务分子黄、邓二人驾驶一汽车停于黄大仙靠近机场的地方接应周离开机场，故周由铁丝网爬出后即乘该车返太子酒店。途中，黄、邓对周大加奖励，说回台湾后向上级报告，并表示周可带其家人及在国内的弟弟周锡培等到美国，如其弟不能来港，可由特务机关派人在国内办好出境手续。至于 60 万港元待回台湾后才给等。

据悉：当天中午 12 时 45 分，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的中国代表

团工作人员和记者等 8 人，以及波兰、奥地利的两名记者和 1 名越南工作人员乘坐航空公司的专车抵达机场。按照事先跟印航商定的，代表团可以免除检查，直接登机。于是，汽车直接开到飞机跟前。

这时印航经理已经站在飞机旁边，新华社香港分社班干部潘德声上前询问："一切都没有问题了吗？"印航经理答道："OK！"潘德声又问："引擎也检查过了吗？"印航经理答："检查过了。"两人随后登上飞机做进一步的检查，之后开始办理登机手续。

紧接着，代表团登机。随机还托运了 30 多个箱子，里面是钱嗣杰等在香港采购摄影器材和为亚非会议期间准备的一些宣传资料等。一切进行得似乎都挺顺利。

下午 1 时 15 分，"克什米尔公主号"从启德机场起飞，前来送行的人们望着渐渐远去的飞机，不由得舒了口气，大家谁也没有想到，悲剧即将发生。

飞机升空后平稳飞行，一切正常。起飞后，飞机和地面电台进行了例行通报。

下午 6 点 40 分，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突然接获英国路透社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 100 海里上空爆炸坠毁，除 3 名机组人员外，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当天，黄邓二人带周驹离开太子酒店，先往 ABC 餐室饮茶，并给了周一些钱，要他往新新酒店居住。姓黄的特务分子于 12 日即先回台湾，留邓、甘两人在港与周联系善后工作（负责周离港等事）。但过后不久，邓、甘二人见情势恶化，而飞机爆炸也没有周恩来受难，不能达到其原阴谋目的，邓、甘两人就没有与周联系，这时周的父亲周瑞维曾四处找其踪迹，但邓、甘已偷偷返回台湾，把周驹抛离不理。

因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安排钱嗣杰和刘茂俭提前去万隆，而让他们侥幸躲过了这场劫难。钱嗣杰他们两人坐了 7 天 7 夜的船先期于 4 月 8 日到达了雅加达，4 月 11 日他们二人到了万隆住进旅馆，在旅馆里焦急地等待飞机到来，可左等右等都没有中国代表团的消息。

谁也没有想到，中国代表团成员和随同采访的中外记者共 11 人踏上的是一条不归之路。他们是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还有中外记者 7 名，分别是：新华社对外部第一任主任沈建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对外部记者李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杜宏，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记者郝凤格，波兰《人民论坛报》记者斯塔列茨和奥地利《人民之声报》记者严斐德。此外，包括印度机长贾塔尔上尉在内的大部分印度机组人员同时遇难。

该机空难发生后，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空军闻讯派出军用飞机在出事地点搜寻。英国皇家空军、海军派出多架飞机和多艘军舰前往出事地区营救。仅其中的 3 名机组人员被英国皇家“丹波尔号”驱逐舰在一个小岛被发现而营救出来。

此时，钱嗣杰还不清楚，却一直在等待新华社的同事来万隆会合。当天下午，他和新华社雅加达分社首席记者彭迪、钱行前往雅加达玛腰兰机场迎接中国代表团，可是过了飞机预定的抵达时间，左等右等不见飞机的踪影，便请彭迪询问情况。就在当天下午，旅馆方面的说，听说有架飞机爆炸了。钱嗣杰听后心里一震，不久得到中国使馆的消息，证实中国代表团所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发生空难，是国民党特务机关蓄谋破坏所致。

“这些人搞这种谋杀、破坏，太卑鄙了！”钱嗣杰不能接受事实，一下子就懵了，非常震惊！愤怒！！“牺牲太大了，飞机上的可是我们

社里的主力记者呀！”当年在战场上很少流泪的铁血男儿钱嗣杰，这时禁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这次空难中丧生的 3 位新华社记者都是与钱嗣杰有过交往或很深交情的：大他 13 岁的沈建图 1951 年至 1952 年曾任朝鲜开城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新闻处长。小他 1 岁的李平，就是原来的李炳衡，1951 年与 1953 年曾两次赴朝鲜参加战俘问题和停战谈判的报道，且多次与自己出生入死在朝鲜。已任 6 年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黄作梅，是他让自己逃过了一劫，要自己和刘茂俭提前乘“芝万谊”邮轮离开香港的。当时，自己不理解而带着怨气前往万隆的。

想起在朝鲜战场相处的日日夜夜，想起离开香港时的告别情景，钱嗣杰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悲愤交加。他坚信，历史不会忘记自己的同行，一切阴谋是吓不到所有追求友好和平和独立自由的人。

据在这次事件中幸运生还的 3 名机组人员后来回忆，在飞机失事前的最后时刻，11 位乘客都坐在各自的座位上表现得非常镇定。牺牲的同行用勇气和忠诚，用生命履行着党和人民的记者的神圣职责，这事迹激励着自己走在新闻的路上。钱嗣杰宛若看到，同行的鲜血，化作了新华社记者桂冠上美丽的花朵。

痛定思痛，钱嗣杰在万隆赶紧补充采购一些摄影器材，因为此前购置的东西就由黄作梅带上飞机后炸毁了。

三　“雅加达见”成为破碎的梦

4 月 11 日当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以代表团顾问的身份随团去印尼，全权负责会议期间周恩来和代表团的安全警卫及情报工作，并增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作为总理的随身警卫。空军也派人以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名义同机去印尼以负责飞机的安全。

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对劝说他不要再去万隆的代表团其他成员和云南省党、政、军的相关领导说：“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进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

当时，缅甸总理吴努也曾致电周恩来，劝他慎重考虑是否参加亚非会议，电报说：“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人可能做任何事情，特别是加害于你，我请求你极端慎重考虑，你参加万隆会议是否适当，会议对和平很重要，但如对你个人安全有危险，你可委托副总理代表中国出席会议。”但是，周恩来意志坚定。

周恩来针对已经发生的问题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开了个动员会，提

请代表团每一个成员都要提高警惕，加强组织纪律性。为了使飞机多带一点汽油，周恩来还要求大家尽量少带行李，每次行动都要对自己的行李自行负责，严格检查；并要求不准给任何人随机捎带东西……

4 月 12 日凌晨，周恩来深情地给邓颖超复信：“你的来信收阅，感谢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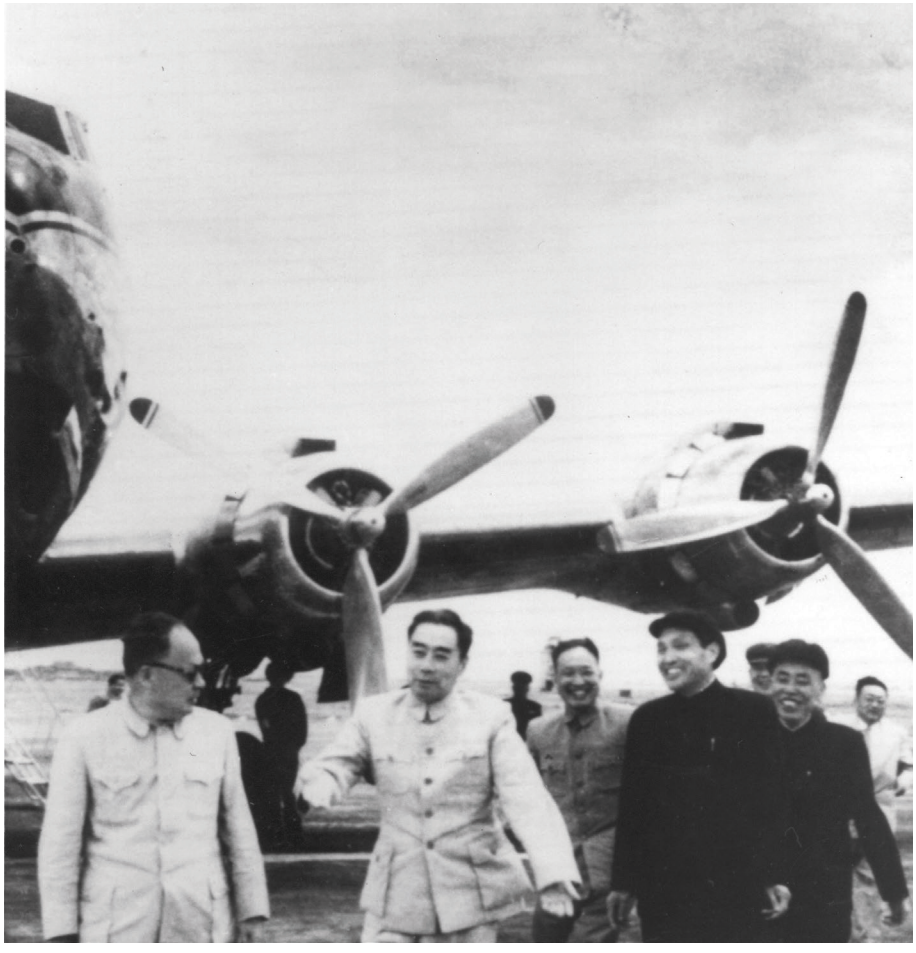
寥寥数语的信笺，把周恩来一生都在忠实实践的崇高思想境界和盘托出，这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恩来当然清楚，敌人暗杀阴谋的主要目标是他本人，从他特意将

1955 年 4 月，周恩来、陈毅等在云南。

邓颖超的来信和自己的回信一并寄回给邓颖超，“免得失落”这一举动来看，他当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同天，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这一野蛮行径，指出：“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次不幸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我们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查究，将参与这一阴谋暗害事件的特务分子逮捕法办，以明责任。美蒋特务机关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人员和记者的预谋杀害，不仅是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疯狂表现，而且是对于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的卑鄙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一定要同与会各国代表团一起在亚非会议中为远东和世界和平而坚决奋斗。美国和蒋介石匪帮的卑劣行为，只能加强亚洲、非洲和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自由的共同行动。”

围绕这一事件，新华社迅速展开报道，及时充分地反映了事态的最新进展情况及有关各方的反应。在国内报道方面，新华社除播发了飞机失事消息及我外交部的声明外，还播发了国内一些机构、团体，如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发表的声明，北京等地人民追悼遇难烈士的活动，还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就事件发表评论的消息。报道一方面对国民党特务杀害我方人员、破坏亚非会议的罪行予以严厉斥责，另一方面要求英国有关方面彻底查明真相，尽快将凶手绳之以法。在国际报道方面，新华社紧密跟踪事态最新进展，及时报道了印度尼西亚调查委员会发表关于印度飞机失事的报告，香港政府关于飞机失事的声明，英国政府发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破坏事件调查的声明等消息，并较为充分地报道了印度、印尼、越南、朝鲜、波兰等国家对这



1955 年 4 月，周恩来、陈毅一行抵达昆明机场。

一事件强烈谴责和对中国政府的有力支持。

4 月 13 日晚，周恩来再次找到代表团成员谈话，进行安抚。随后，他又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告诉邓颖超：“何谦（随身警卫）昨日忽患慢性阑尾炎，今日似转为亚急性，决留昆请王大夫于明早动手术，由伍全奎陪他，望告林玉华（何谦夫人）放心。现由李福坤代何出国。附上

云大学生来信和戏单各二纸，俾知我们在昆明的生活一斑。”

尽管形势险峻，但这无法阻拦周恩来等新中国外交战士为了世界和平而努力的决心。4 月 14 日清晨 7 时 15 分，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一行 26 人毅然乘坐从印度航空公司租借来的另一架专机“空中霸王号”自昆明起飞，前往仰光。当飞机进入缅甸境内后，4 架缅甸空军的战机升空护航。 当地时间上午 10 点 30 分，“空中霸王号”安全降落在仰光机场。

为安全起见，事先跟缅方商量妥当，取消了群众欢迎场面，也没有通知外国使团，只有少数缅方高级官员前往机场迎接。抵达仰光后，周恩来稍事休息，当天下午就和陈毅一起拜会了缅甸总理吴努，随后参加了缅甸的泼水节。成元功接受笔者采访时说：“那天，正好是缅甸的泼水节，相当我们的春节。起初，我对总理参加泼水节很担心的，因为人多，难免鱼龙混杂，弄不好就会出岔子。后来才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所去的地方全都是吴努总理特意安排的，向我们泼水的群众不是缅甸官员的眷属就是他们的子女。”

同日，中央专门就周总理的安全问题给有关使馆和代表团发去指示，要求所有同志都要提高警惕，担负起保卫团长的责任。此时，从中央到外交部，每个人都为周恩来的安全捏着一把汗。外交部一日数电，随时同大使馆保持联系。

安全形势的严峻并没有影响周恩来的工作。4 月 15 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并告外交部，对“克什米尔公主号”遭破坏后的善后工作提出 3 点意见：（一）由外交部致电随机遇难的越南工作人员、波兰和奥地利记者 3 人的家属表示哀悼；（二）由外交部建议越南政府外交部参照波兰外交部的做法对飞机遭破坏事件发表一声明，要求英国政府迅速追究破坏分子，以明责任；（三）对此次牺牲的我国工作人员和记者家属由外

交部代表政府慰悼，并请内务部议定抚恤办法。

当日晚，缅甸、中国、印度、越南、埃及和阿富 6 国领导人在缅甸总统府召开会议，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带来的影响，商谈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可能出现的形势等重要问题。

“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的消息传开以后，不仅给中国代表团每一个成员的心头笼罩上了一片乌云，个个心情沉重，就连应邀出席亚非会议的其他国家代表也都惴惴不安。特别是东道主国印度尼西亚更加紧张、忙碌，生怕在哪个地方或环节出现闪失，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有的国家担心亚非会议开不成了，有的国家认为即使开成了也不一定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还有的国家领导人则担心参加这次会议可能遭到破坏。

针对亚非各国领导人中普遍存在的疑虑和恐惧情绪，周恩来冷静分析了召开亚非会议的有利条件，和悦地指出：“敌人对亚非会议搞示威性破坏，并不说明他们强大，相反这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亚非国家有着共同遭遇与经历，如今又面临建设各自国家的艰巨任务，我们只要从彼此的根本利益上去求大同，只要用已经开始深入人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国家团结的精神反击殖民主义挑战，亚非会议就一定能够开好，一定会成功。”周恩来建议在亚非会议上不要提共产主义的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使会议没有结果。与会的其他国家领导人一致赞同周恩来的意见，决心为推动亚非会议的胜利而努力。

4 月 16 日凌晨，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又由仰光登上“空中霸王号”，飞往雅加达。起飞后，大家便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有的由于连日劳累很快进入了梦乡。

“空中霸王号”大约飞行了 8 个小时，进入新加坡空域，不料正赶上航线前方有雷雨区。由于“空中霸王号”是印度空军所属的一种双引

擎无密封的小型飞机，时速仅为 360 多公里，不能超高空飞行，无法飞越雷雨区，机长要求在新加坡加冷机场降落，待雷雨过后再继续飞行。考虑到飞行安全，周恩来同意在新加坡机场作短暂停留。于是，通过无线电话与新加坡机场联系，得到应允后临时着陆与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国民党特务活动比较猖狂的新加坡机场。中国代表团没有按时抵达雅加达，可急坏了中国驻印尼使馆大使黄镇及使馆工作人员，不安的气氛笼罩在人们心头。

渐渐地，雷雨停歇，天空出现片片白云，已不再妨碍空中飞行。“空中霸王号”又飞行了 3 个小时，于当地时间下午 5 时 30 分终于徐徐降落在印尼雅加达玛腰兰机场。当顺利到达的周恩来出现在机舱门口的时候，前来迎接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各界人士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对周恩来的勇气表示极大的敬佩。

周恩来一走下飞机，就被几十个宪兵等团团围住，就连新华社记者钱嗣杰也不得靠近。无奈之下，钱嗣杰只好站在两个大汽油桶上拍下了一些照片。后来冲洗出来后，只见照片里主要是一圈一圈的宪兵，远处才出现周恩来的头部，他们把周恩来团团围着。

远远地看到一个个熟悉的面孔，钱嗣杰没有多少激情与兴奋，相反心里像有一块铅压在上面。是的，队伍中缺少了沈建图、黄作梅、李平……他们本是应该在这里。10 多天前，自己离开北京时，曾同他们握手说：“雅加达见！”还计算好了自己在这里欢迎他们的，现在自己到了，可是他们却不在。他们在哪里呢？还在沙捞越的海底。想起这些，一阵绞痛攫住了钱嗣杰的心。

思维回到现场，钱嗣杰看到周恩来被整个围着，一看自己站在大汽油桶上俯瞰着拍也不行了，便赶紧往回跑，拍个远景。

在人山人海的热烈欢呼声中，周恩来的车队向中国驻印尼使馆驶去。一路上，街道两旁、楼台房顶，处处挤满了欢呼致敬的人群，人们都挥动着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国旗及周恩来的肖像：“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车队开道的 8 辆军警摩托驶过之后，是迎接周恩来的车队，打头的 3 辆黑色的奥斯汀小卧车，第一辆崭新的奥斯汀预安排的是周恩来总理的座车，车头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车窗上挂着黑窗帘。夹道欢迎的群众向车子欢呼着，有的人向车子扔撒着鲜花，花瓣落在车头及顶篷上。

但在这一辆总理座车里，并没有坐着周恩来，除了司机外，乘车的只是一个穿着旗袍的中国女人。她就是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的夫人朱霖。原来，这是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和黄镇在雅加达复杂特殊的环境下，为保卫周恩来的安全所做的巧妙安排。这辆崭新奥斯汀，是由黄镇提议，经国内批准，为周恩来在印尼出席亚非会议而购置的，另外两辆奥斯汀是爱国华侨借用的——每一辆车上都挂上了五星红旗。富于保卫工作经验的杨奇清和黄镇研究，安排了乘车顺序：由大使夫人朱霖乘坐第一辆车先行，黄镇大使陪同周恩来乘坐第二辆车，陈毅副总理乘坐第三辆保卫车，再后面跟着使馆的多辆汽车。当周恩来一下飞机时，到机场欢迎的中国驻印尼使馆工作人员与中国代表成员形成人墙，将周恩来夹在中间，最外一层是新闻记者，护送着周恩来与印尼外长作了简单的礼仪握手后就上编好号的车，迅速关上了车门……

中国驻印尼使馆坐落在雅加达市中心，在著名的独立广场附近的加查玛达大道。为了预防意外，确保周恩来的安全，就下榻在这里，在使馆逗留一个晚上，次日再赶赴万隆。

周恩来一行一到达雅加达，对于亚非会议所面临的问题的感受就开始强烈起来了。从雅加达人民所表现的热情上可以看出这个会议包含的

钱嗣杰（后排右二）等与外国记者在万隆会议期间。

巨大希望，而从另外一面也可以看出这个会议所必须克服的困难。钱嗣杰注意到，在雅加达的报纸上登载着这样的消息：虽然美国并没有参加亚非会议，它却派出了一个最大的“代表团”——一个由近 70 人组成的“记者团”。在这个“记者团”中不仅有在朝鲜板门店谈判和日内瓦谈判时活动了很久的间谍，而且还有什么议员、警察、军人、使馆职员、公司雇员及从香港、台北等地调来的职业特务。此外，在印尼国内离万隆几十公里

还有一支反动武装，也制定了阴谋袭击亚非会议的计划。然而，钱嗣杰相信：和平事业绝不是任何卑劣的阴谋所能破坏的。

自从抵达雅加达以后，此次担任周恩来警卫工作的成元功和李福坤，随时保持高度的警惕，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两人所带的手枪的子弹都顶上了膛。

周恩来总理到了雅加达后，使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去万隆，是坐飞机还是乘汽车？开始，当地有人建议周恩来乘坐汽车去万隆。从雅加达至万隆，100 多公里的路程并不算长，沿途森林茂密，山峦起伏，途经美丽的茂物和临海的苏加武眉，还经过两个著名的火山——格德火山和唐库班柏胡火山。一路都是绮丽的景色和迷人的风光，当地人认为应该让周恩来欣赏着风景进万隆城。

对此，黄镇考虑得很周到细致，认为沿途游览异域美景是次要的，而总理的安全是绝对重要的。他让使馆武官了解到，在乘车去万隆的途中所经过的苏加武眉地区，山里有一支反政府武装经常出来搞骚乱和破坏活动。接着，又有进一步的消息说，台湾的特务在苏加武眉城里也比较活跃，自从确定要在万隆召开亚非会议后，台北也派了特务头子潜入苏加武眉，国民党特务有与那支武装土匪勾结的迹象。

这样，经过调查研究，并与印尼当局商量，得出结论：如果周恩来和代表团乘汽车去万隆，途中容易遭受叛乱武装的袭击，确定周恩来和代表团还是坐飞机比较安全。

4 月 17 日上午 10 时，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乘飞机离开雅加达，前往万隆。不到半小时，飞机就降落在万隆的安第机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亲自到机场迎接。钱嗣杰看到代表万隆 120 个团体的万隆欢迎亚非会议人民委员会主席阿末向周恩来的到来致了颂辞，

然后看到一位印度尼西亚女郎给周恩来戴上花环，两名华侨女学生献上了鲜花。这时，钱嗣杰用手中的装备——外观小巧而又携带方便的 135 相机进行连续“扫射”，力求最佳瞬间的“命中率”。

当周恩来出现在万隆机场，各国记者从他在机场发表的讲话中听出了中国人为促进国际合作不畏危险的坚定信心：“中国代表团是抱着对于和平和友好的热烈愿望，前来参加即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的。我不能不指出有些人是不喜欢我们这个会议的。他们正在力图破坏我们的会议。亚非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随后，周恩来乘车离开机场，前往位于达曼沙里路 10 号的当地华侨的一幢别墅居住。一路之上，街道两旁挤满了欢迎的人群，其中有不少当地华侨，他们一个个眼含热泪，向着周恩来欢呼、跳跃，热烈的场面令人感动。

钱嗣杰和中国代表团的一部分代表到了万隆市中心的豪曼饭店，这个旅馆和紧挨着的普里安格尔饭店是各国代表团的专用旅馆，离亚非会议主会场独立大厦不过百步之遥。细心的钱嗣杰只见在这两个旅馆的门前竖立着 29 根旗杆，哪个国家的代表团到了，哪个国家的国旗就在那里升起来。

四 大家都是总理的警卫员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后不久，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在一篇吊唁文章中回忆了与新华社 3 位记者临别时的情景。文中写道：“10 多天以前，那是一个深夜，他们在飞赴广州前夕到办公室来和我告别。我和他们，先是作梅和炳衡，然后是建图，谈到了目前国际局势的主要情况和对亚非会议的看法。我知道他们已经为准备启程而忙碌了一整天，本来想叫他们早点去休息，但是他们是那样的认真和一丝不苟，我们仍然详细地研究了有关报道工作的最后安排。作梅同志和炳衡同志谈到了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不过他们坚定地表示，只要更虚心些，更谨慎些，任务是一定可以完成的。我和建图同志再一次考虑了如何把新华社的几位记者很好地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特长，做好亚非会议的报道工作。然后，我问他：在短促的会议期间，是否可以写一些像过去在日内瓦和开城写的那样的特派记者述评。他说：‘没有问题，至少可以写 3 篇。’看看他那闪闪有光的眼睛，看看他那薄薄的微笑的嘴唇，我毫不怀疑任务会被他出色地完成。我们的谈话一直继续到 24 点以后。”从此段描述中可以看出，3 位新华社记者都是满怀信心奔赴万隆报道一线

的，新华社总社对他们圆满完成报道任务也抱有极大的期望和信任。但灾难的来临如此猝不及防，这给即将全面展开的亚非会议报道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使得中国对万隆会议的报道平添了很多突变性。

由于“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中国记者团里只剩下钱嗣杰一位记者了（译电员除外）。加上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彭迪、钱行、谭岱生这 3 位记者还是显得报道力量不够，于是上级迅速调用了新华社驻印度新德里分社首席记者张维冷、《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吴文焘、《人民中国》杂志记者张彦及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吴梦滨等作为补充。万隆会议前，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李慎之本来也要与记者团一同到印尼，但行前周总理让他跟在身边，作为代表团成员前往，虽然李慎之拿的是记者护照，但实际身份是中国代表团秘书。由于形势发生变化，李慎之被指定主持整个会议的报道工作。大家共同组成了新的中国记者团，工作上互相配合，又各有分工。

亚非会议召开前，中国大使馆突然收到一封署名“觉醒了的国民党暗杀队员”的检举信，信中说：3 月初，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奉国民党总统府之命，组织了 28 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谋杀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并称，暗杀队已于 3 月 10 日在红溪组成，成员均系国民党逃亡在印尼的中下级军官。他们不但每人从美国驻印尼大使馆领到无声手枪一支，而且还领到印尼币 20 万盾，且事成之后每人加发 20 万盾，打中周恩来的加发 40 万盾。还说，本月 19 日在红溪党部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将决定出发日期。其实，这是一封匿名信。

尽管此信内容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是根据当时的安全形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必须采取措施严加防范。黄镇大使看完匿名信后，立即送给陈毅。“他们还要搞暗杀！”陈毅气愤地说，随即告诉黄镇和

杨奇清，“你们先研究个意见。”

陈毅迅速召集中国代表团成员，召开内部会议制定安全防范措施，做紧急动员：“人人都要做保卫工作，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大家都是总理的警卫员。”

经周恩来、陈毅和代表团、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同志研究，决定向印尼政府递交备忘录，把匿名信的内容转告苏加诺总统和印尼政府，依靠驻在国加强保卫工作。杨奇清根据周恩来和陈毅的指示作了全面的部署。

苏加诺和印尼政府对此非常重视，指示万隆所在的第三军区加强对万隆的外围警戒，对国民党暗杀团成员进行临时性拘留；特别派一名陆军上尉做周恩来的安全副官、5 名警察为随身警卫；在周恩来的住地配备宪兵和机动警察各 8 名，外加 3 名便衣警察，调来 7 辆摩托车进行现场警卫。

为配合印尼方面做好安全保卫工作，陈毅让杨奇清代表周恩来和他请印尼政府派来的保卫人员吃中国饭，赠送具有中国风格的纪念品，在生活上给予适当照顾：安全副官和司机可以与中国代表团人员一起用餐，给他们搭了专供休息用的棚子，并以烟、茶招待。陈毅特别强调通过加强一系列的防范措施，不给国民党特务下手的机会。

为保证亚非会议的安全，万隆警方此前就进行了积极的准备，投入大量警力整肃治安。从 3 月下旬开始，万隆警方通令全体市民，凡持有军火的，包括 5.5 厘米口径的气枪，都必须要在月底之前交到警察局，违者将受到严惩。钱嗣杰看到，在进入市区的每一个路口，军警都设立了检查站，盘查和登记来往行人，检查过往的车辆。同时，对各国代表团即将下榻的宾馆饭店进行了检查，配备了保安，并派出大批便衣警察进行巡视。

1955 年 4 月，杨奇清负责保卫周恩来参加亚非会议。

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私下里告诉钱嗣杰等工作人员处处要保卫周总理。于是，不论周恩来出现在什么地方，大家都跟着他前前后后，尽量能贴身在他身边，感觉上好像一旦有危险也能挡个枪子儿的感觉，所有的人始终都很警惕。

世界上许多人期待的亚非会议就要开幕了。在万隆，家家户户挂起了红白两色的印度尼西亚国旗，在华侨居住的地方还挂起了五星红旗。

4 月 18 日上午，“花城”万隆的独立大厦里气氛显得庄重而肃穆，让人感受到重大的事件就要在这里发生。还没到会议时间，会议厅的来宾席和记者席上已经坐满了人。

钱嗣杰举目四望，白色拱形的会议厅布置得朴素而庄严。主席台后挂着紫红色的天鹅绒幕，29 个参加国的国旗按照国名的第一个英文字母的次序整齐地排列在幕前，其中五星红旗挂在左起第 5 根旗杆上。台下正中是各国代表团的座位，同样按照字母的次序从左到右、从前到后排列，其中中国代表团席次是在第二排左端。

1955 年 4 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亚非会议上致开幕词。钱嗣杰 摄

现在，代表团的席位空着，楼上的记者席早已挤成一片了。会场里的人和会场外的人一样以迫切的心情等候着各国代表团的到来。

差不多到 9 点的时候，门外传来了一阵又一阵的鼓掌和欢呼，各国代表陆续进入会场了。单单是注视着一个一个的代表团走进来，就可以在人

1955 年 4 月，万隆亚非会议会场内景。钱嗣杰 摄

们的心里引起一种不平凡的感觉，各种各样的肤色在钱嗣杰眼前展现。

很快，钱嗣杰注意到身着中山装的周恩来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等中国代表团成员的陪同下，镇定自若地走进独立大厦，如期出席在亚非会议的开幕式现场。这时，钱嗣杰不失时机地抢拍历史性瞬间。

9 点 30 分，会议正式开始。在印尼国歌的伴奏下，身着白色制服、头戴黑色贝芝帽的苏加诺总统神采奕奕，在缅甸、锡兰（即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 5 个发起国总理的引导下步入独立大厦会场。

苏加诺是应邀向会议致开幕词来的，他在长达 50 分钟的时间里发表了精彩的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演说，引起各国代表的共鸣。苏加诺说：“在我环顾这个大厅和在此聚会的贵宾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激动的感情。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在我看来，这个大厅不仅容纳了亚洲和非洲国家的领袖们，而且容纳了先我们而去

的人们不屈不挠的不可战胜的不朽精神。他们的斗争和牺牲为世界上最大两洲的独立主权国家最高级代表的这个集会开辟了道路。”

苏加诺说：“我们属于许多不同的国家，我们有许多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我们的民族特性、色彩或主旨……是不同的。我们的种族是不同的，甚至我们的肤色也是不同的。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大家是由比表面上使我们分裂的东西更为重要的东西联合起来的。例如，我们是由对不论以什么形式出现的殖民主义的共同厌恶联合起来的，我们是由对种族主义的共同厌恶联合起来的，我们是由维护和稳定世界和平的共同决心而联合起来的。”

他还说：“我希望，会议将证明这样的事实：我们，亚洲和非洲的

1955 年 4 月 18 日到 24 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首届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图为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上。 钱嗣杰 摄

领袖们都了解到，亚洲和非洲只有在团结起来以后才能得到繁荣……我希望，它将证明，亚洲和非洲已经再生了，新亚洲和新非洲已经诞生了。我们的任务首先是彼此取得谅解，从谅解中将产生彼此间的更大的尊重，从尊重中将产生集体的行动。……兄弟姊妹们，让我们记住，为了这一切，我们亚洲人和非洲人必须团结起来。”

苏加诺总统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他的演说。五国总理把他送出了会场。会议暂时休会。

会议在 11 点 45 分复会以后，首先一致选举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亚非会议主席。他接着就开始了他的演说。他特别强调会议的责任是对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做出坚实的贡献。他最后说：“如果我们能够用毫不含糊的言辞表明我们争取和平的愿望和决心……那么，这次会议就是

1955 年 4 月，钱嗣杰在万隆会议会场外和华侨朋友合影。

完成了它的历史性的任务。”

亚非会议的开幕式就这样在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演说以后结束了。随后，代表团团长又举行了秘密会议。直到下午 1 点 30 分，各国代表团才离开独立大厦。

下午，各国代表进行一般性发言，阐述各自国家对亚非和世界和平的看法及原则立场。绝大多数代表都表示了他们对开好亚非会议的良好愿望，希望会议能有助于消除殖民主义，促进世界和平。

但是，钱嗣杰注意到，发言中也有另外一种声音。伊拉克代表法迪尔·贾马利在发言中，把矛头指向了中国，他宣称，共产主义是一种所谓“新殖民主义”，指责中国对邻国进行“威胁”和“渗透”，他要求各国一起采取“防御措施”，直到“共产主义在思想上解除武装”时为止。钱嗣杰紧蹙双眉，内心显得极不平静。

在此后的发言中，其他少数国家也发出了与会议精神不和谐的声音。会议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身上。人们在关注中国代表团如何应对目前的局面。

此时，钱嗣杰看到周恩来沉着、耐心地听着各国代表的发言，不时在纸上记着什么，悄悄与陈毅交换看法。

美国媒体则幸灾乐祸，《纽约时报》的评论借机煽动，要各国代表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上，而应当放在遏制共产主义上，不要去打“殖民主义的死马”，要去打“共产主义的活老虎”。

各国代表和采访会议的记者们此时都在猜测，中国代表团会讲些什么，有的记者甚至预先发布消息：周恩来将会针锋相对，给予贾马利等人以猛烈的驳斥。

面对这些无端的攻击，中国代表团的一些同志也有点沉不住气了，

而此时的周恩来却表现得十分镇静。他心里明白，此时中国代表团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关系到亚非会议的成败。由于各国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各异，相互之间又缺乏了解，加之帝国主义的暗中挑拨，出现这些不和谐的声音不足为奇。此时，如果我方针锋相对跟其他国家的代表打口仗，那么会议就可能走入歧途，使敌对势力的阴谋得逞。周恩来和大家认真分析了形势，决定要坚定地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绝不能让会议偏离既定的方向。

五 3 分钟的拍摄和 18 分钟的激情演说

4 月 19 日，在记者室里黑板的公告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列在当天预定要发言的代表团的名单里。于是，会议还没有开始就已经伏在打字机上“紧张工作”的美国记者们，正在忙着把有关“消息”发出去：“亚非会议将在今天碰到难关”、“周恩来将在今天驳斥贾马利”……

各种各样的猜测在流传着。中国人民的声音注定是今天会议上注意的中心。

9 点 50 分，会议正式开始。

首先是会议秘书长宣布会议收到了许多贺电，其中有一个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贺电。

这时，有人将眼光转到了挂着记者徽章坐在来宾席上的美国众议员鲍威尔身上。有消息说，这位众议员曾经要求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亚非会议送一个贺词。但是美国国务院在上星期五给了他一个答复：“我们并不认为美国政府同万隆会议的关系是值得向会议送这样的贺词的。”据说，当时鲍威尔曾气得狠狠地骂：美国政府在外交上做了一桩“愚蠢的行为”。现在，这位先生呆呆地坐在那里，脸上毫无表情。

美国所派出的这个“记者团”，成员很复杂，从官员到记者等等都有，给会议带来很多的不安全因素，每一个都可能带来致命的打击，在印尼期间，钱嗣杰感到每天都是“心提到嗓子眼”工作。

会议秘书长宣读贺电后，各国代表团团长开始发言。仔细听来，绝大部分的发言者都提到了对和平的愿望，对友好的愿望，对殖民主义的憎恨。但是，也不是没有人加入了贾马利那样的合唱队，菲律宾的罗慕洛尽管没有抹杀菲律宾曾经是美国殖民地的事实，但是他却竭力赞扬美国对菲律宾的“良好的信用”。在他那冗长的发言中，罗慕洛似乎是在卖弄他在联合国内惯用的辩才，口若悬河地按照他自己的想象来描写，然后又按照自己的愿望来诽谤共产主义。在他看来，亚非人民当前的任务不是去向殖民主义斗争以取得独立，而是要同像美国那样的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

此时，钱嗣杰等记者似乎嗅到了亚非会议开始紧张起来的空气，担心会议会陷入无休无止的争论而不能得到什么成果。

中国代表团上午并没有发言。在记者室的黑板公告上擦去了已经发过言的国家的名字，中国排在预定要在下午会议上发言的头一个。大家似乎都在以焦灼的心情等待听中国人的声音。

午后 2 点钟的时候，万隆突降暴雨，给一时炎热的天气洗了一个澡似的，一下子变得凉爽起来。在将近 3 点钟的时候，独立大厦前的人群已挤得满满的，狂风暴雨并不能丝毫降低他们的热情。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要在今天下午发言。

下午会议首先发言的是并不是中国的周恩来，而是叙利亚的阿泽姆，接着是泰国的旺亲王和土耳其的佐鲁。

在旺亲王和佐鲁发言的时候，钱嗣杰看到有许多人不时转过头来望

中国代表团的席位，只见周恩来急速地在他的发言稿上写着什么。

差不多一切报名发言的人都讲完了。会议主席宣布：“我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发言。”

突然，会场里爆发了一场从来没有的暴风雨似的掌声。环顾全场，每一个座位现在都坐满了人，没有座位的地方也站满了人。当周恩来走上讲坛的时候，水银灯一齐亮起来，照相机一齐动起来。没有人不意识到这一刻的重要，钱嗣杰更是举起调好焦距的徕卡 135 相机，准备拍摄。

本来周恩来事先已经准备好了一篇发言稿。但是面对新的情况，周恩来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发言稿不念了，交由秘书处印发与会代表。他拿起一张便笺，这是他刚才起草的一份补充发言，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上了亚非会议的发言席。会场里鸦雀无声，钱嗣杰感受到，此时如果有根针掉到地上似乎大家都会听得见。这时，不仅是代表、新闻记者，就连来宾席上的有些外交官们也都掏出了笔记本……

周恩来作了简要的说明之后转入正题，他首先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给周恩来做翻译的是年轻的英语翻译浦寿昌。浦寿昌原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新中国成立后回来报效祖国。周恩来那通情达理、心平气和的语调，配之以浦寿昌那纯正、柔和、清晰的现场英语翻译，使周恩来的话很能打动人心。

周恩来没有避开有人攻击共产主义的锋芒，这点让大家非常钦佩。他们想听中国总理怎样解决亚非各国的不同看法，全场都在屏息倾听周恩来下面的发言：“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

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在共同的基础上，会议的目的是什么呢？周恩来以他独特的视角提出：“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根据这些原则，周恩来进一步提出了中国解决一些有分歧的问题的观点：“我首先谈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

周恩来接下来一一解决了人们对中国的误解：

——有无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国家所共同承认的原则。我们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

1955 年 4 月 19 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讲话。钱嗣杰 摄

——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蒋介石至今还在利用极少数的华侨进行对所在国的破坏活动。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

——如何认识新中国：“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这就是中国的态度，中国的人民和政府对一切怀疑以至诽谤的态度。会场异常静默，整个大厅的人都在屏息倾听周恩来的发言。听着这些话，似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心与心之间的距离都在缩短。

在周恩来的书面报告和补充发言中，会场上的人们多次听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在保证实施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国际的争端没有理由不能够协商解决。

——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

——我们现在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

无论与会的国家是主动接受还是被动接受，或是不愿意接受，但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深地印在了所有人的脑海中。

进会场来的人越来越多了。最靠边的人很多站在椅子上，望着周恩来。全场静悄悄的，大家静听周恩来讲，有人频频点头。钱嗣杰被特批进到

一楼会场，拍摄时间是 3 分钟。他看到几乎所有人把目光集中在周恩来的身上，认真地听，没抬头的人则是在埋头记录，而周恩来正满怀激情地高声发表自己的演说，目光凝重而炯炯，充满特有的力量，带着自信。钱嗣杰迅捷地拐到会场一楼的左后侧，这时一种思想感情将他带入通过手中的相机镜头构成新闻形象所反映的情境之中。他将镜头不仅在对准会议的主席台，还把焦点对在会场下的代表现场，心里暗暗表示：要抓住这难得的 3 分钟近距离拍摄机会，用独特的构图来展示大国总理在国际会议上的独特风采，抓出独特的典型瞬间。

“咔嚓！咔嚓！”随着几声清脆的快门声，钱嗣杰在有限的时间内拍摄了一系列的精彩瞬间，记录了中国领导人在亚非会议的永恒风采。

为了节省时间，周恩来的发言，除了第一段之外都是由译员以英文宣读的。最后，周恩来用洪亮的声音说：“16 万万的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周恩来这篇避免陷入意识形态争议的发言只有 18 分钟，却成为两天以来会议的高潮，使与会国代表认识了新中国同亚非国家发展友好合作的诚恳与善意和对和平的真诚愿意，看清了新中国确实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

周恩来的话音刚一停住，会场上立刻响起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与欢呼声，整个独立大厦沸腾了。许多代表纷纷离座，同周恩来热烈握手、拥抱，表示祝贺。钱嗣杰发现，一位美国记者也主动过来跟与会采访的《人民日报》记者吴文焘握手表示祝贺。

楼上楼下，代表席上、来宾席上、记者席上同时爆发了经久不息的

掌声来回答这个代表着 6 万万中国人民的意愿的发言。钱嗣杰看到，当周恩来从讲台上走下来的时候，很多记者也赶着冲出了会场。毫无疑问，这是会议迄今最重大的新闻，一定要以一切途径，以最快的方法发出去。至于接在周恩来之后发言的南越代表阮文瑞在说些什么，已经没有人关心了。

第二天，钱嗣杰注意到不止一家报纸在报道中强调周恩来所说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这句话，“求同存异”成为报道的关键词。中国代表团团长的发言几乎是当天所有报纸的头条和社论的中心，它们几乎一致以赞扬和希望来对待这个发言。

20 日，万隆的视线从独立大厦转到了红白旗大厦（又叫退休金大厦）。经济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及由代表团团长组成的政治委员会这 3 个小组委员会，分别在这里举行会议。

记者们在这里也得到一切便利，每一个主要的通讯社都有专用的办公室。9 点钟到了，代表们陆续走进会场，但是钱嗣杰和其他记者一样只能站在门外，因为小组委员会开的是秘密会议。

直到中午过了很久，政治委员会上午的会议才告结束。等候了半天的记者们不算完全没有收获，他们从会场里出来的代表们带着笑容的脸上知道今天会议的进展是顺利的。

不过，许多代表团不多久就公开地向新闻界发表了会议的情况，消息就在记者室中传开了：政治委员会今天上午讨论了人权和自决问题，而且在经过不多的争论以后已经大致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亚非会议要宣布支持联合国宪章中所提出的人权的基本原则以及人民和民族自决的原则。

早在 19 日就开始工作的经济和文化两个委员会进展得还要更快些。

经济委员会已经指定了一个 7“国”小组委员会来起草关于经济合作的报告。文化委员会也已经指定了一个 12“国”小组委员会来进一步审议各国对文化合作提出的建议。

周恩来的 19 日发言奠定了亚非会议成功的基础，也使敌对势力破坏亚非会议的图谋彻底破产，会议一直朝着成功的希望跃进。

4 月 23 日整个上午，在红白旗大厦的记者们眼睁睁地看着第二号会议室紧闭着的大门。直到 12 点半散会的时候，传来了消息，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上午会议上以 1 个半小时的时间作了一篇重要的发言。

原来，为使会议不至于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破坏，从而最终达成协议，周恩来在发言中以求同存异的精神说：“在座的有些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的名词，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而不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在联合国宪章的前言中有‘和平相处’的名词，这是我们应该能够同意的。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

周恩来的这种精神，消除了会议的重要障碍，为会议达成一致通过的最终协议扫清了道路。各国代表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制定了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部内容的关于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

23 日中午，印度、缅甸、锡兰、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和中国的代表团团长一起参加了印度尼西亚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的午宴，并且对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进行了会谈。

从亚非会议开会前夕，就已经流传着要举行这样一次会谈的消息了，所有的记者都在等待它的结果。

当日下午会议将近开始的时候，刚刚参加了 8 国代表团团长会谈的

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首先到了红白旗大厦。他刚走下汽车，记者们就一拥而上："总理先生，有什么消息？"穆罕默德·阿里边摆了摆手，笑着作答："我没有什么要说的，周恩来总理倒要发表一个声明……等着瞧吧。"从他笑着的面容中，大家知道一定有一个好消息。

不久，钱嗣杰等记者从中国代表团那里得到了周恩来在 8 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短短的 69 个字的声明，立刻震动了万隆，而且这种震动立刻通过电波传到全世界。在万隆的各国代表团几乎是一致地对这个声明立刻表现了积极的反应。

从亚非会议开始到现在，都一直可以感到有一种跃跃欲试的阴谋，想利用亚非会议假借和平的名义来阻挠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仅仅在亚非会议开幕前一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和他的国务卿杜勒斯会谈以后曾就台湾地区局势问题发表声明说：他希望"万隆会议将注意世界各国人民普遍的和平愿望，并将设法谴责以武力实现国家野心的做法"。然而，阴谋家可耻地失算了，事实与他们的愿望恰巧相反。 现在，29 个国家的代表听见了，并且信服了中国人的和平意愿。

当日下午的团长会议顺利地通过了经济委员会所提出的经济合作报告和文化委员会所提出的文化合作报告，也通过了支持也门在亚丁和也门南部地区问题上的立场的决议，以及主张联合国成员应该具有普遍性，安全理事会的代表权应该以公平的地理分配原则为根据的决议。

会议休息间隙，许多人找周恩来签名留念，在他们看来中国总理是会议的"明星"。周恩来来者不拒，热情地签名，有时写上"和平"或"团

1955 年 4 月，各方人士在万隆会议期间请周恩来总理签名留念。钱嗣杰 摄

结”或“友谊万岁”等字。一时间，排队签名的越来越多，钱嗣杰被这一场景所感动，拍下了这一沸腾的场面。

4 月 24 日下午 6 点 35 分，亚非会议最后的一次全体会议开始。在一致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写入了十项原则。历史上第一次以亚洲、非洲 29 个国家的名义发出的文件在暴风雨般久久不息的掌声中被全体一致通过了。

在当天，所有的代表都强调指出会议的成就，指出会议取得一致协议的意义，指出会议对于加强亚非人民的友谊和世界和平所做出的贡献。对万隆会议上的周恩来，有人这样评价：“周恩来那准确选择时机的外交才能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会议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刻脱

1955 年 4 月，首届亚非会议（万隆会议）会议主席、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 ·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致闭幕词。钱嗣杰 摄

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一位路透社记者曾报道：“大家都承认周恩来才智至高无上地主宰着会议……代表们惊叹地说：‘他是以怎样的洞察力能够察觉并道破大家心窝里想说的话啊！’”

当晚 9 点半，万隆亚非会议胜利闭幕。会议闭幕后，5 个发起国总理在豪曼饭店联合举行酒会，款待亚非各国代表团。酒会的气氛十分热烈、欢欣。

一个星期以前，当人们从各个遥远的地方到万隆来的时候，他们中间有许多从来没有见过彼此的容貌，从来没有听过彼此的语言，然而，

在分手的时候，他们已经不是那样陌生了。 在这段时间内，人们进行了接触，取得了了解。许多人带着猜疑和顾虑来，带着善意和谅解回去。

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建交的还是没有建交的、友好的还是不友好的，周恩来在亚非会议期间都想方设法地与之接触，探讨相互间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吐肺腑之言，消除隔阂和疑惧。频频的对外接触与交往，使周恩来结识了几乎所有国家的代表团团长，并且收到了显著效果。其中有很多团长包括最初有对立情绪的，都同周恩来建立了友谊。

在万隆会议上第一次品尝周恩来带去的茅台酒的西哈努克亲王，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感叹万隆之行：“作为柬埔寨王国代表团团长，我在那里认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他那高超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文雅的风度，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了。他向我介绍他的助手陈毅元帅，陈也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当年明确反对共产主义的菲律宾代表团团长罗慕洛，后来这样回忆说：“亚非会议上，我发表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长篇演说，可是周恩来不但没有和我争论，而且还主动和我在会外进行深入的讨论，使我深深地感动。虽然当时菲律宾同中国还没有建交，而我和周恩来从那时起就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

六 出色工作是对死者最好的纪念

会议圆满结束了，钱嗣杰长长吁了一口气。在 7 天会议过程中，作为记者的他在本子上如是记录着：周总理参加了大小会议 16 次，会见各国领导人 15 次，出席宴会 15 次。从这记录里，可想而知中国总理与会期间的工作强度，总理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白天出席活动，晚上准备第二天的发言，更何况还顶着生命受威胁的压力。作为采访报道的中国记者和其他工作人员，由于“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失事，人手不够，但大家化悲痛为力量，表示一定要做到最好。作为唯一的摄影记者钱嗣杰，担着旁人无法想象的工作压力，其中 5 天 5 夜没有合眼，也记不清吃了几顿饭。他事后回忆，也不知道当时哪来的这么一股劲。

为进一步提高新闻时效，新华社总社和前方报道组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要新闻先发简讯，再发详细消息；总社编辑组分段编稿、分段送审，审稿人直接审对外稿，翻译人员一面翻译一面核对；总社编辑、翻译、审稿人集中办公等。由于增强了时效观念，采取了较为有力的措施，稿件时效超过了朝鲜停战的报道。

日后，钱嗣杰接受专访时感慨地说：“很多国家总理好像没那么多事，

周总理就是忙不过来，29 个国家与会，他要会晤的太多了，可以说很多国家排不上队。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与会各国元首都希望能接触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哪怕谈上简单几句，都愿意接触。周总理的确是那个会上最吸引人的‘明星’，仿佛谁接触到他谁的地位就提高了似的。当然，这样总理就比较忙了。所以，这样我也忙。”

周恩来很不轻松，既要参加会议，应付来自帝国主义仆从国家的代表提出的各种挑衅，又要在一些代表团之间做工作，求同存异，还要广交朋友，进行一些必要的应酬。此外，周恩来还要过问中国代表团成员的饮食起居以及安全，包括对印尼当局派来的安全服务人员的关怀。

值得欣慰的是，直至亚非会议胜利结束，美蒋特务的暗杀周恩来的阴谋没有得逞，且亚非会议圆满成功。一个外国代表说：“万隆会议闭幕了，但周恩来的旗帜将永远在万隆飘扬！”

边回忆，钱嗣杰边掐指而算：“我是上午参加会议，报道会议；中午总理会见各国代表团，我就拍照片，然后吃点饭马上去会场；散了会以后，晚上总理又要会见各个代表团，我回来差不多就是十一二点。印尼那个地方特别潮湿，所以那阵我们摄影器材也落后，那胶卷现在用风干机就风干了，那时候没有，拿电扇来回吹，吹完了以后自己到卫生间还要放大、漂洗，然后再烤干，再写说明，第二天早上赶到邮局，基本上就到天亮了。寄出后，再回到会场继续采访。我们当时没有恐惧心理，没有个人的考虑，就是希望把工作做好。”钱嗣杰回忆说，战友殉难后，在这种化悲愤为力量的精神驱使下，觉得每一篇报道、每一张照片都寄托着战友的一份未了心愿，认为只有出色地完成摄影报道任务，这样才是对死者最好的纪念。

当然，在周恩来身边的那段拍摄时光，成为钱嗣杰最宝贵的一段记忆。

在钱嗣杰眼中，总理不是高官，倒像个慈爱的长者，没有架子，没有矫情。无论什么活动，只要一结束，总理周围肯定围满了记者，问新闻稿怎么写？照片怎么发？有一天，周恩来对钱嗣杰说：“小钱，你真是辛苦啊！”一句话把钱嗣杰的眼泪差点说下来，他有些激动：“有了总理这句话，累死我也心甘。其实，您更忙更辛苦。”

在万隆会议上，由于飞机爆炸，摄影器材也泡了汤，于是现从当地买了许多闪光灯泡。那时的闪光灯泡不能连续使用，用完一次必须马上更换灯泡。采访时，钱嗣杰的口袋里装满了小灯泡，拍一张照片换一个灯泡，不小心就会把手烫得起泡。一次，在拍摄埃及总统纳赛尔与周恩来合影时，灯不亮了，钱嗣杰换了一个又一个，连换 3 个都没亮，当时，汗“唰”地流了下来。周恩来看他这么紧张，非常专业地提醒：“你用慢速照。”钱嗣杰这才冷静下来回答：“我已经用了。”这样，一张珍贵照片才问世。

万隆会议闭幕后的次日，即 1955 年 4 月 25 日，周恩来、陈毅率中国代表团与印度尼西亚爪哇省省长山努西和万隆市市长恩诺一起出席了万隆华侨在广肇

1955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图为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闭幕大会上发言。钱嗣杰 摄

会馆举行的招待会。让钱嗣杰感动的是，70 多岁的陈郁章老先生已经路都走不动了，但还是要由家人搀扶着来看一看祖国的亲人。

周恩来做了热情讲话，说：“今天的中国不是旧中国而是新中国。在推翻了殖民地和封建的统治以后，中国人已经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中国在政治上是革命成功了，但是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仍旧很落后，中国需要长时期的建设，才能赶上今天世界上工业先进的国家，因此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并指出：“新中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而旧中国奉行的是怕强欺弱的外交政策。旧中国的政府看到比自己强的帝国主义就叩头屈服，看到比自己还弱的就想欺负占便宜。现在，如果有人欺侮我们，我们一定要抵抗，而对于那些以平等待我的国家，我们就伸出手来，同它们友好合作。在这次亚非会议上，中国代表团采取的就是这种态度。”又说：“中国强大了。但是，中国人民不论在国内，在海外，千万不能因此而骄傲。我们对一切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应该平等相待。”

周恩来最后谆谆告诫全体侨胞，尊重印度尼西亚国家的主权、政府的法令，与印度尼西亚人民团结友好，和睦相处。他特别强调说：中国的国际地位越高，中国的人民就越应该谦虚。

钱嗣杰掐指暗算了一下，周总理在 1 个多小时的讲话不时被一阵又一阵的掌声打断，掌声不下 20 次。每当礼堂里一鼓掌，大街上也就跟着鼓掌，而且更久更响。当周恩来和代表团其他人员走出广肇会馆的时候，街上在烈日下站了几小时的侨胞再一次发出了暴风雨似的欢呼。

4 月 26 日，中国代表团离开万隆。这时，谁都不得不多看这个城市一眼，故意让汽车经过独立大厦、红白旗大厦……

万隆，古称“勃良安”，原意为“仙之国”，现名意为“山连山”。

它是爪哇首府、印尼第三大城市，位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西部海拔 715 米的万隆盆地中，四面群峰环绕，植物繁茂，环境优美。虽地近赤道，但因地势较高，气候相对而言比较凉爽，空气清新。这里景色秀丽，清静幽雅，被誉为印尼最美丽的城市，素有“爪哇的巴黎” 之称。这个城市引起中国代表团成员深深的爱，不仅因为它景色的美丽，不仅因为这里的人民的热情，还更因为它是亚洲和非洲团结的见证。

钱嗣杰和大家一样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向这里的人们，向一早就赶到安第机场来的万隆群众告别。半个小时以后，中国代表团回到了雅加达，并访问了这个城市。雅加达市市长苏迪罗向周恩来总理赠送了一把金钥匙。

当晚 7 点，苏加诺总统在独立宫举行国宴，欢迎中国代表团全体代表。国宴后，又在国家宫举行了印度尼西亚的歌舞晚会表示欢迎。

4 月 28 日，周恩来、陈毅等到独立宫向苏加诺总统辞行，随后乘专机从雅加达玛腰兰机场起飞，离开印度尼西亚。专机仍然不走香港，而取道仰光回国，于 29 日下午抵达昆明。

当天，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主席，报告代表团平安抵达昆明。电报说：“出国半月，因时间短促，工作紧张繁忙，许多重要会谈未能一一及时电告。准备在昆明休息几日，把重要会谈情况按专题写出报告。”

从万隆回到云南昆明后，周恩来一天在驻地的院子里散步时对警卫员成元功说：“这次出去很紧张，比较忙，睡觉少一些，休息几天就补上了。大姐（邓颖超）身体不好，不要对她讲，免得她担心。”成元功听后，含泪默默点头。

出于安全考虑，周恩来离开印尼时建议代表团余下的工作人员坐船回国。于是，钱嗣杰等购好了船票，准备于 5 月 5 日乘坐“芝利华号”

船回国。没想到，不久得到消息：国民党特务准备在公海上劫持船只，船上就藏着 300 多发子弹和一些枪支。中国驻印尼使馆迅速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国内。

5 月 2 日，钱嗣杰等正在印尼的茂物植物园参观，中国大使馆派人来通知大家立即返回雅加达。当晚 8 点，黄镇请大家吃完饭后即往机场赶。当晚 10 点，乘飞机离开印尼。

原来，已回国的周恩来得知有关情况后即安排总理专机飞返雅加达，接尚在印尼的工作人员回国。原以为要等好几天，钱嗣杰没想到总理专机调回来了，十分激动。自己送洗过的一套新西服还在旅馆，来不及取，就匆匆登机了。

马达响了，飞机从跑道上急驰而过，腾空而起。钱嗣杰从舷窗看到，很多印尼群众的手还在向天空不停地挥。印尼的土地从大家眼里渐渐消失，但是对于这个国度的记忆长留在大家的心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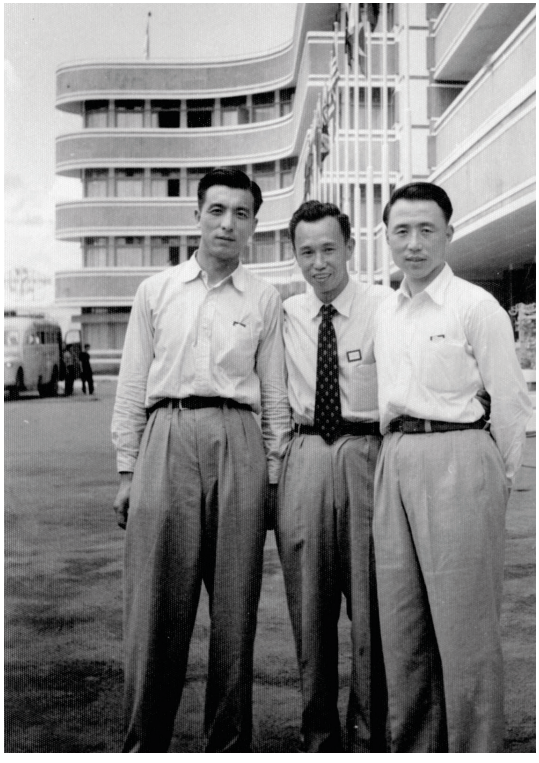
正是由于周总理的周密考虑，让钱嗣杰又避免了一次不幸。起飞后，使馆才办理了船票退票手续，此前担心不能顺利离开印尼。钱嗣杰等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到昆明后，转乘国内航班回到北京。

安全回京后，陈惠嫣看到整整 1 个多月不在的丈夫，扑在钱嗣杰的怀里喜极而泣。

已怀孕的妻子是迷人的，虽然她此时原有的婀娜身姿改变了，却总让在域外的钱嗣杰深情地牵挂着！然而，钱嗣杰哪里知道，妻子一直惦记着自己的安全。

钱嗣杰离开北京去万隆的时候，陈惠嫣只知道丈夫采访报道亚非会议，对于走什么路线起初是高度保密，于家属也不例外。陈惠嫣在医院工作，本身很忙，加上个人对新闻也不是很敏感，当看到报道说去万隆

出席亚非会议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后，十分惊恐，有时暗自流泪，常常呆呆地望着遥远的天空：愿老天保佑我新婚不久的丈夫平安、健康回到身边。



1955 年 9 月，钱嗣杰和新影摄影师吴梦滨（左）及印尼记者在万隆采访期间留影。

很快，新华社打来电话，告诉陈惠嫣：“陈惠嫣同志，你好。飞机失事后，你不要担心，你的丈夫钱嗣杰同志平安无事，他早在之前乘船离开香港的，已顺利到达万隆。”尽管这个电话让陈惠嫣稍稍放松内心的紧张情绪，但是这之后她注意到大量有关万隆会议的报道，得知丈夫的工作环境其实很险恶，有很多特务组织盯着这次国际会议，准备破坏会议的进程。一想到作为摄影记者的丈夫在重要场合都要抛头露面，陈惠嫣又开始担心起来……

今天，看到活生生的丈夫就站在自己眼前，陈惠嫣真的还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只是注意到丈夫比出门前瘦了不少，想必他在印尼除了安全上的防范外，还要没日没夜地加班工作。能活着回到家就是幸福，陈惠嫣以激动的泪眼相迎……

回到北京，组织上特地安排钱嗣杰要多休息几天再上班。一想到很长时间没有陪伴新婚不久且已有身孕的妻子，钱嗣杰总感到自己有一种说不出的歉意。看到妻子渐渐“中部崛起”，他充满了无比的甜蜜和幸福，尽可能给予她更多的爱抚。妻子正孕育的不只是新的生命，也是他们两人生活的希望与美好的憧憬！

七 难以释怀的生死情

在紧张的亚非会议当中，周恩来仍同时关心着“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调查情况。当时，奉命前往新加坡处理善后事宜的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参赞申健来到万隆，周恩来在听取了他的情况汇报后，满怀深情地说：“烈士们的光荣姓名，将永远写在亚非各国人们和世界先进人类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历史上。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是为亚非两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独立自主的事业牺牲的。”周恩来嘱咐申健，要把烈士的骨灰留下，他将亲自把烈士的骨灰带回北京。

5 月 7 日上午 11 点，周恩来一行乘坐的专机满载着向全国人民汇报的累累果实，在和煦的阳光下徐徐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陈云、林伯渠、董必武、邓小平等早已等候在那里了。

回到北京后，他立即了解“克什米尔公主号”调查的进展情况。5 月 8 日，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和印度方面负责事件调查工作的印度国家情报局副局长高。高向周恩来介绍了他在香港期间所了解的有关事件的情况。周恩来让高转告印度总理尼赫鲁，请尼赫鲁致电时任英国首相艾登，希望英国政府告诉香港当局在调查上予以合作。如果英国方

面愿意合作，中方可以把迄今调查所得的材料以及今后调查可能得到的材料提供给港英方面。

5 月 9 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主持会议，讨论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相关的斗争方针和策略。

经过研究，确定了下一步的方针：争取破案，以使美蒋在世界人民面前声名狼藉。破案的关键在于争取英国与我合作。如英表示愿与我合作，则我可向他提供有关情报，否则，供给他情报不但无益，反而可能使凶手跑掉。如英国故意不破案，则可视情况同英国进行斗争。在对英策略方面，大家认为，英对此事一方面有投鼠忌器的想法，对美有顾虑，不敢破案，但也考虑到中英关系。因此，应采取“压”与“拉”相结合的策略。

按照既定方针，当天，周恩来接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要他转告英国首相艾登以下口信：中国政府希望英国政府能够指示香港当局同我们密切合作，使“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事件能够破案。如果我们把现有的材料提供给香港当局，是能够破案的。同时提出 5 点要求，主要是香港当局对得到的材料要严加保密，对材料中提到的涉案人员要严加监视，以防逃跑，对涉嫌的主要人物应严格审讯，并要求审讯时有中方人员在场。

5 月 15 日，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拜见周恩来，带来英国首相艾登对周恩来口信的回复，表示英国政府愿全力同中国政府合作。

当天晚上，周恩来将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和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熊向晖找来。周恩来对熊向晖说：“艾登已经同意合作破案，尼赫鲁派高氏作他的代表去香港，你就作我的代表去香港。你去后有三项任务：第一，把有关‘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情报材料提供给香港当局；第二，

把香港当局破案的情况及时报回；第三，代表中国政府对香港当局处理这个案件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件事要抓紧。这件事也非常复杂，牵涉到“台湾”以及英国和美国。所以一定要拉住印度，共同促进英国破案。”

熊向晖接受命令后，于 5 月 18 日下午 1 点 30 分经罗湖口岸抵香港，港警察司署政治部主任威尔考亲自到罗湖迎接，并派两个便衣警察专车护送，做出非常配合的姿态。

然而，就在同一天，香港警方接到在台湾的美国民航公司保安员电话，称他们在从香港飞来班机的行李舱里发现一名“潜乘者”。经查，此人系香港航空工程公司职员周驹。

本来周驹在事发后非常紧张，一心想着赶紧离开香港去台湾。这时，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给香港情报站下达指令，要他们采取隐蔽措施，同时让特务转告周驹，要保持镇静。特务机关让周驹照常上班，如果被警方传讯，只要咬住不说，就不会有事，并准备从当月起，每月给他 200 港币津贴，以示安慰。

港英警方也曾传讯过周驹两次，但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使其一直逍遥法外，并得以逃脱。中方得知周驹潜逃台湾后，立即向港英当局表示抗议，并要求其将周驹引渡到香港受审。而港英方面则称，香港跟台湾没有引渡条约，无法引渡。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中，周驹不过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收买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并非幕后的罪魁祸首，而港英当局在随后的结案声明仅仅指控周驹一人有罪，将一些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驱逐到台湾。该案最终未能将凶手绳之以法，成为历史的一大遗憾。

在苍松翠柏掩映下的八宝山烈士公墓，至今仍然矗立着一个高高的纪念碑。纪念碑前镶嵌着一块汉白玉浮雕，浮雕上一只和平鸽在展翅高翔。

钱嗣杰在“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悼念同事。 陈惠嫣 摄

它的正面镌刻着周恩来的亲笔题写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背面刻着烈士们的姓名与简历。石碑上还刻有记载烈士们殉难经过的碑文，最后一句是：“为和平、独立和自由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晚年，一谈起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失去的朋友，钱嗣杰的声音总会不由自主地低沉下来。他说：“要感谢黄作梅，要不是他，我们就葬身海底了。然而，黄作梅走了，殉难了，那时他的妻子已经怀了9个月身孕；沈建图，很了不起，他是中国对外新闻的开创者之一，最擅长写英文稿，又快又好——我们从朝鲜战场就一直在一起合作，他躲过了敌人的明刀明枪，却没能防备特务的暗箭伤人；李平，年轻热情的好同事，临走时，他答应我，到了万隆就帮我写照片说明、冲洗胶卷……

要是他们还在，该多好啊！可惜他们都魂归大海。”

如今，一头银发的刘茂俭老人拿着已经泛黄的记者证，感慨万千。记者证封面上的“亚非会议·万隆”字样依旧清晰，只不过证件持有人已从当年的青年变成白发老人。回忆起当年的往事，老人仍然难以掩饰心中的愤怒和哀伤。

2005 年 4 月的万隆，花木繁茂，气候凉爽。这个素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印尼第三大城市，迎来包括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内的亚非两大洲共 105 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盛大聚会，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出席了 2005 年亚非峰会和万隆会议 50 周年纪念活动。通过央视新闻看到活动盛况，钱嗣杰的思绪又回到了这之前 50 年岁月，1955 年 4 月 18 日至 24 日，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在首次万隆会议上第一次向世界展现了她崭新的面貌。然而，就在这光芒背后是一段令人心酸的历史。

这些年来的清明前后，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揣着鲜花来到芳草萋萋的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中的一块石碑前，久久伫立。他就是“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幸免于难的新华社老记者钱嗣杰。在这里，他似乎还能看到那一张张鲜活的面孔浮现在面前，还能感受到那天噩耗袭来时的巨大的悲痛。岁月流逝，头发已由青丝变成白发，但钱嗣杰难以释怀这段生死情。

八 记录中国领导人首飞非洲第一站的风采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曾被称为“黑暗大陆”的非洲正在觉醒，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非洲国家相继挣脱殖民主义的羁绊宣布独立。对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新中国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毛泽东和周恩来纷纷电贺与承认非洲独立国家。到1963年底，非洲的独立国家已有34个，中国已同12个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这时，美国、苏联以“经济援助”、“技术合作”为名，加紧对非洲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渗透，并挑拨这些非洲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在错综复杂、激烈动荡的国际形势面前，作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出访这些国家，支持它们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打破美国、苏联、印度企图孤立中国的局面，便提到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日程上来。

1963年12月14日，开罗烈日当空，酷似盛夏。这天中午，周恩来一行所乘专机经过10多个小时的飞行抵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71年9月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首都开罗，停泊在欢乐的海洋。此时，钱嗣杰在机场正背着多台相机在欢迎队伍里寻找最佳拍摄角度，心想：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非洲，而这里是访非行程的第一站，得好好

1955 年 5 月 16 日，应我国政府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邀请前来我国访问的阿联政府宗教事务部部长巴库尔（戴白帽者）和开罗大学教授卡迈拜访周恩来总理。 钱嗣杰 摄

拍摄一些照片，记录中非的友谊。

只见身着中山装的周恩来精神饱满地出现在舷梯上，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钱嗣杰拉近镜头，不断地“咔嚓”。身边的很多记者忙乱着拍摄，一场“新闻大战”就此打响。

据解密的外交档案记载，由于我国当时的民航专机尚未飞出国境，不可能承担这样的跨洲国家旅行。在周恩来总理出访前 1 个月，外交部指派中国驻荷兰代办处与荷兰航空公司接洽，商定包租“波罗的海号”飞机事宜。解密档案中有关包机事务的文件就多达 107 页，而且每份文件均标明“绝密”等级。为安全起见，外交部在与荷兰代办处的往来电报中，多次强调总理出访行程“万勿外泄”。据悉：在包机合同中，这次出访周恩来和陈毅的名字分别以“赵、钱”为代号。

中国访问团成员，钱嗣杰大多都认识。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原等，其中还有随访的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10 多人缓缓走下舷梯，钱嗣杰的镜头跟着“追踪”。

受阿联总统阿卜杜勒·纳赛尔的委派，阿联部长执行委员会主席阿里·萨布里等高级官员专程到机场迎接周恩来一行。

萨布里主席与周恩来是熟悉的，当年 4 月，他曾访问过北京，受到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正是那时，周恩来向萨布里系统地阐述了著名的“中国人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要等待，不要将己之见强加于人”、“决不先开第一枪”、“来而不往非礼也”、“退避三舍”……他使外国人了解到，“我们中国人办事，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

此前，陈毅副总理应邀访问肯尼亚，并由肯尼亚飞抵开罗，他正同

热烈的人群一起迎接周恩来所率的中国代表团。这时，钱嗣杰听到尼罗河上轮船齐声鸣笛致意，船员们拥上甲板挥手欢呼。

在阿联高级官员的迎接下，周恩来与陈毅分别站在前后的敞篷车上，沿路群众像密集捆扎的篱笆墙绵延数十里长，不断摇晃手旗欢迎。群众高举的横幅标语上写着："阿联的朋友周恩来，欢迎你！""阿联和中国的友谊万岁。"钱嗣杰一边沉醉在快乐之中，一边用镜头见证中国代表团首次访非的每一个难忘的瞬间。

当天下午，纳赛尔在住所接待了周恩来所率的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并把一枚精制的"共和国勋章"亲自挂在周恩来胸前，且授予陈毅"尼罗河勋章大绶带"。

随后，纳赛尔夫妇举行盛大晚宴，为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接风洗尘。纳赛尔怀着真挚的情感说："我亲爱的朋友，你在这里将会看到有许多人早就期待着你们前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访问；你将会看到，他们全都对伟大中国的革命和她的决定性胜利怀着无限的钦佩和赞赏。"

在招待会上，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是我第一次正式访问友好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24 年，当我从欧洲回国途径苏伊士运河的时候，阿联刚刚摆脱保护国的地位，几乎整个非洲大陆还处在帝国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今天，当我们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来到非洲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觉醒的大陆，一个战斗的大陆。在这一片被帝国主义者叫'黑暗大陆'的辽阔土地上，自由的晨曦已经升起，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土崩瓦解。"

中国总理铿锵的声音回荡在大厅，激起大家热烈的掌声。钱嗣杰在热烈气氛的感染中，一次次举起相机……

12 月 16 日，周恩来出席了阿联第九届科学节大会。纳赛尔在会上称

周恩来和阿联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在一起。 钱嗣杰 摄

赞周恩来为“亚洲的杰出战士（英文报纸译为‘杰出的领导人’），人类最初思想、世纪古老的先锋文明创造者和目前站在现代历史潮流有影响力量以及其动力的中国革命创造者、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活生生的象征”。

12 月 17 日，代表团访问具有光荣反帝传统的北方大城市塞得港。18 日，参观了正在建设中的阿斯旺水利工程。这个大坝的蓄水量是世界第一，由苏联设计援建。参观中，周恩来突然流鼻血不止，只好中途停止参观，返回住地。

12 月 19 日上午，周恩来、陈毅一行在阿联总统会议委员会委员里法特陪同下，来到开罗郊外，参观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和开罗塔。金字塔的建造年代遥远，经历漫长岁月依然巍峨矗立，有“世界七大奇景”之称。

此时，气温很高，钱嗣杰看到烈日下的周恩来身着中山装，风纪扣紧扣着，陈毅身着西装、戴着墨镜，都保持着庄重的风度。

当来到金字塔下时，钱嗣杰注意到周围除了陪同参观的官员外，几乎没有游客。此时，看到几名身着白色运动衫的阿联运动员站在金字塔下，个个身强力壮、精神抖擞。起初，钱嗣杰也不知道这几位运动员要干什么，忽然间见他们健步如飞地冲上金字塔，不一会儿就站在了塔尖上，随后又从塔尖飞速奔到塔底。精彩的登塔表演，赢得大家的热烈掌声。掌声似乎在提醒钱嗣杰“可要拍下这精彩的瞬间呀”，于是才开始拍照。

运动员表演完毕后，钱嗣杰看到周恩来快步走过去和还气喘吁吁的运动员一一握手，夸奖道：“你们身手不凡啊！ 7 分钟就在 146 米高的金字塔上下跑了个来回。”原来，自一开始周恩来就在为运动员们计时。总理真细心，钱嗣杰感慨。

周恩来拉过一名运动员的手，用中国老中医特有的方法给这位运动

20 世纪 60 年代初，钱嗣杰在阿联开罗金字塔前留影。

员号脉，看自己的手表秒钟转了一圈后惊奇地告诉大家：“哎，还真的是脸不变色心不跳！脉搏和正常人的一样，1 分钟 80 多下，这就叫生命在于运动啊！我们不运动有时还心跳不正常哩。”说着，周恩来拿出中国产的英雄牌金笔给运动员作纪念。运动员们受到中国总理的夸奖，露出得意和自豪的表情。

周恩来站在金字塔前说：“金字塔和中国的长城一样，是两国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雄伟的金字塔令中国外交部部长陈毅诗兴大发，当场赋诗，在场所有人都称赞不已。

在与阿联领导人会谈中，周恩来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即：第一，支持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第二，支持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第三，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统一的愿望；第四，支持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各国人民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第五，主张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各国的主权应当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周恩来会谈中的每一个强有力的手势、每一

个特有表情，都被钱嗣杰用镜头记录下。

12 月 20 日，就在中国代表团将要结束对阿联的访问前夕，周恩来在开罗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出席的有阿联、美国、英国、印尼、印度、法国等多家报社、通讯社、电视台、电台的记者。面对各路记者的提问，钱嗣杰只见周恩来思路清晰，反应敏捷，机智应答，妙语连珠。

记者招待会上，周恩来畅谈了对阿联的印象：英雄的城市，灿烂的文化，现代的建筑，英勇、热情、勤劳、智慧的人民，有能力的领导人，团结的力量以及新兴的气象。一些西方国家的记者提了一些刁难和尖锐

钱嗣杰前往新华社开罗分社的新华社记者们途径莫斯科时合影（右一为钱嗣杰）。

1963 年 12 月，周恩来、陈毅等向阿拉伯烈士纪念碑献花圈。钱嗣杰、杜修贤 摄

的问题，周恩来都坦诚而又巧妙地一一回答。钱嗣杰感受到，周恩来诚恳、谦逊的态度给在场的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被问及此次访非的目的时，周恩来说：“我们是第一次到非洲访问，而新中国建立已经 14 年了。我们来得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我这次来到阿联首先要向纳赛尔总统表示我来晚了的歉意。这就是我访非的第一个重要的任务。”看到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自己的身上静静地听，周恩来提高嗓门说：“我们访问非洲国家的目的，是寻求友谊，寻求合作，多了解一些东西，多学习一些东西……我们自远东来到非洲，路很远，不容易，既然来了，就多访问一些国家，以表达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友好愿望。”

九 果断的声音和共患难的友情

12 月 21 日下午，中国政府代表团飞抵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这是一座傍山而建、俯视蓝色地中海海面的秀丽山城。当中国代表团飞抵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机场时，阿总统本·贝拉已亲率在首都的所有政府部长和 30 万名群众在机场迎候多时了。周恩来刚下舷梯，本·贝拉总统即迎上前去与周恩来亲切握手，相互拥抱，激动地说：“总理先生，您是阿尔及利亚人民最好的朋友，今天终于把您盼到了，我们欢迎您的到来。”其真挚之情，犹如久别的亲人相逢，令人十分感动。

随后，本·贝拉亲自主持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在仪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赞周恩来是阿尔及利亚人民最好的朋友。他这样说是有深刻含义的。中国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独立与解放战争始终给予了大力支持。1962 年 3 月，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中国又向它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帮助它恢复战争创伤、发展民族经济。对此，阿尔及利亚人民一直深表感激。

12 月 22 日，阿尔及利亚人民用两件事来表达他们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总理的感情：一是专门把首都阿尔及尔的一条街道命名为“北京大街”，

一是阿尔及尔市政府授予周恩来“阿尔及尔荣誉市民”的称号。这一荣誉既是给周恩来本人的，也是给中国人民的，所以周恩来欣然出席市政府的授予仪式，并接受了这一称号。

在阿尔及利亚，钱嗣杰只见周恩来十分繁忙，除了同阿方领导人进行许多非正式会谈外，还同本·贝拉举行了 4 次正式的政治会谈。阿方急切地想了解中国的情况，想从社会主义的先驱者那里学到一些有益的建设经验。12 月 24 日，第三次政治会谈开始时，本·贝拉便请求周恩来“赐教”。周恩来风趣地以“提出一点意见”谦让，说：“才学习 3 天，第 4 天就讲话，发言权是很低的。对于阿尔及利亚，我们是刚刚进课堂的小学生。”他称赞：“阿尔及利亚的革命胜利，是继中国和古巴革命后 60 年代的伟大事件，也可以说是奇谈。”并说：“任何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应该依靠自己。我们历来这样主张。”

应本·贝拉的请求，周恩来也介绍了新中国经济建设、政治思想建设和外交政策等方面的情况。本·贝拉越听越感兴趣，觉得这些经验对于阿尔及利亚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于是又要求周恩来给阿方的干部们做一次报告。周恩来答应了，并细致地做了准备。当周恩来在台上给阿方干部们做报告，介绍中国的建设经验时，钱嗣杰看到本·贝拉和其他高级领导人则在一旁认真地做笔记，做了一回“学生”。

中国客人在阿尔及利亚受到极高礼遇时，突尼斯作为阿尔及利亚的邻国沉不住气了。尽管突尼斯同中国并未建立外交关系，他们派人向中国政府代表团传递了信息：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突尼斯，并愿意建立外交关系。这一信息正如周恩来、陈毅之意，他们立即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取得了共识，并立即给“中共中央并外交部”电传《关于中突建交问题的报告》，明确提出：鉴于突尼斯方面表示过同中国建交的愿望，

并邀请访突，“我们同团中同志做了研究，认为可以借这次访问非洲机会顺道访问突尼斯，解决同突建交问题”。

12 月 27 日上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离开阿尔及利亚前往摩洛哥访问，本·贝拉率阿政府高级官员前往机场送行，并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临行前，本·贝拉将一套铜柄皮鞘钢剑送给周恩来作为纪念。钱嗣杰透过相机取景器看到剑身为钢质，铜柄后端尖顶，柄把后档呈上翘飞翼状，皮鞘染成绿色，与阿尔及利亚国旗左半部颜色相同，极具阿尔及利亚民族及传统工艺特色。周恩来欣然收下了这珍贵的礼物，并视其为两国人民友好情谊的见证。

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年轻的国王哈桑二世打破惯例去市郊“和平宫”迎接中国客人，并打破西式“两菜一汤”的接待外国元首的惯例，改用“烤全羊”、“巴斯提拉”、“古斯古斯”等早已废止的极其奢华的宫廷大宴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这令许多作陪的外国使节大开眼界。

摩洛哥的传统饭菜是用手抓着吃，哈桑国王依照本国的风俗与主宾周恩来围着一张矮脚长方桌席地盘膝而坐。一只烤好的整羊已经放在直径八九十厘米的瓷盘中，哈桑国王首先用手挑选一块最好的

1963 年 12 月，周恩来和阿尔及利亚烈士之家的孩子们共进茶点。钱嗣杰、杜修贤 摄

羊肉放在周恩来的食盘里，以后每上一道菜都如此进行，以示对中国贵宾的尊重。钱嗣杰知道，周恩来有流鼻血的毛病，“上火”的东西很少吃，在国内也极少吃羊肉，但是主人的盛情，周恩来入乡随俗，乐意客随主便。钱嗣杰看到，每次上菜后，周恩来照样回敬主人哈桑国王。

陈毅与国王弟弟、一位 19 岁的亲王同桌。这位亲王放言无忌，批评中国对外政策太强硬，中国这么一个伟大国家，不应如此，等等。旁边几位年长的摩洛哥部长很担心，几次想阻止他。以坦诚爽直的外交风格闻名的陈毅倒欢迎这种年轻人的坦率，他耐心认真，逐一向亲王解释中国的外交立场，以至饭几乎未吃。起身告别时，亲王说：“元帅阁下，我很年轻，而你很有名望，经验很多，我讲的话请你不要见怪。当初我们能够复国独

1963 年 12 月，周恩来参观摩洛哥卡萨兰卡市郊的糖茶公司。钱嗣杰、杜修贤 摄

1963 年 12 月，周恩来和陈毅等在摩洛哥拉巴特王宫中。钱嗣杰、杜修贤 摄

立，跟你们帮助越南人在奠边府打败了法国人，有很大关系，所以要感谢你们。”此事使陈毅更具体地感到了非洲政治局面的复杂性。各种力量和观念交错着、较量着，陈毅说：“需要我们学习的事物很多啊！”

宴毕，哈桑国王把周恩来、陈毅请进他的会客室品茶。摩方所饮的茶是中国供应的绿茶“喜珍眉”加上一把鲜薄荷和一些“面包糖”，放入特制的大铜茶壶里用木炭火煮。室内有茶官专司此职，经他品尝认为合乎标准后，再斟入特制的精美的银托玻璃杯内，送到客人面前。哈桑二世说：“这是 80 多年前流传下来的吃法。面包、茶叶、糖，是我们生活的三大必需品，光绿茶就年需 12000 吨，没有茶叶，人民会造反的。

因此，希望中国多供应一些茶叶。”

周恩来客气地说：“贵国喜欢的那种绿茶品种，在中国只产在一个不大的特定地区，产量有限，国内市场没有出售，统统供应了贵国。我回国后一定请有关人员再研究一下能不能扩大生产，如能，问题就好解决了。”

摩洛哥从历史上就延续了王国制，这一体制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将如何发展？哈桑国王无不考虑。趁这位对世界局势有所影响的东方大国总理在此，他突然提问：“当今世界像我们这样的国王、皇帝已为数不多了，不知以后会怎么样？”周恩来和陈毅听了都笑了起来。周恩来心想，中国向来尊重他国人民对国体的历史选择，于是机智而风趣地回答：“你们可以组织一个委员会，开个会商量商量嘛！”陈毅笑了笑，说：“亚洲有个西哈努克亲王，我们是好朋友，可邀请他参加。”周恩来又说：“陛下可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嘛！”钱嗣杰跟着他们大笑起来。

结束摩洛哥之行后，周恩来等在 12 月 31 日开始到地中海北面的阿尔巴尼亚访问。这是首访非洲期间唯一访问的欧洲国家。周恩来同霍查、谢胡等阿尔巴尼亚党政领导人举行了 8 次会谈，就国际形势和两国经济建设中的问题交换意见，还访问了斯库台和发罗拉等城市。两国总理共同签署了《联合公报》。

在阿尔巴尼亚度过新年之后，中国代表团原本拟直飞西非对加纳等国访问，不料出发前发生了意外事件：1964 年 1 月 2 日加纳发生了谋刺克瓦米·恩克鲁玛总统的案件，总统受了伤，卫士长被打死，刺客是一名被外国势力收买的卫士。加纳局势一下变得十分紧张，总统不得不搬入一所坚固城堡里居住，并停止了一切外出活动。

钱嗣杰心想，在当前这种情况下应该取消原定的访问。可是，不久，

钱嗣杰就听说周恩来提出自己的意见：按原计划前往加纳访问，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暂时的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不尊重人家，不支持人家。

这下，钱嗣杰还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心里嘀咕着：如果加纳再政变，总理的风险就更大了。按照惯例，这时的访问取消是名正言顺的。

可是，不久就亲耳听到周恩来的果断声音："这个时候去才能体现我们是真正的友好、真正患难的友情。至于外交仪式，我们可以打破通常的礼宾惯例。"

陈毅表示赞同总理的意见，并欣赏总理的胆略。然而，代表团的好些成员却不同意，他们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一再劝说：加纳政局仍不稳定，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危险，总理不能冒险。

经过深思熟虑的周恩来最终说服了大家，决定按原计划前往。为了了解情况并把我方的意见通知加纳方面，周恩来派黄镇作为特使，先行前往加纳。1 月 9 日，黄镇坐另一架由荷兰租来的专机飞抵加纳，即与中国驻加纳大使黄华取得联系，随后前往恩克鲁玛的秘密住处面见这位总统。

这时的恩克鲁玛惊魂未定，住在奥苏城堡里，伤势仍然明显，脸上还贴着纱布，缠着绷带。黄镇和黄华代表周恩来对恩克鲁玛遇刺表示关切和慰问，并与恩克鲁玛商量周恩来访问加纳的具体安排。他们向恩克鲁玛转达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一个独特的建议：为了照顾恩克鲁玛总统的安全，我们打破礼宾常规，凡有总统参加的一切活动都在总统住地进行，总统不必到机场迎送，也不要在城堡外面举行会议和宴会。这一建议，充分照顾到了恩克鲁玛的困难处境，体现了一个大国总理的风度和胸怀。原以为在目前加纳局势如此动乱的情况下，中国总理不会再来访问，因为前一次遇刺后印度总理就曾取消过原定对加纳的访问，恩克鲁玛听了这些，非常高兴和感激，表示完全同意，深深感到中国的真诚：中国领

袖能这样细致地照顾我们的困难，在最紧张时刻来表示支持，唯独不提自己的安全，非常难得啊！

在代表团出发去加纳访问前，中共中央也十分关注加纳的局势发展，担忧代表团的安全。1 月 9 日，专机由阿尔巴尼亚直飞西非。因为距离 5000 余公里，飞机中途在突尼斯必须加油。行前，周恩来收到中共中央和外交部有关同意中突建交的报告。此时，突尼斯方面又一再热情邀请中国客人把“停机加油”升级为正式访问。中国政府代表团接到中共中央和外交部的答复后，立即决定前往突尼斯边给飞机加油，边正式访问，完成建交。

当日上午，中国代表团飞抵突尼斯，在机场受到突尼斯政府全体部长和新宪政党全体政治局委员的欢迎。在突尼斯的国宴上，布尔吉巴总统在讲话中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若干异议。一时间，钱嗣杰感受到气氛有些不很协调。然而，周恩来却完全能谅解，并当场作了具体、圆满的答复，博得一片掌声。钱嗣杰看到布尔吉巴总统也很满意。

中国和突尼斯过去相互都缺乏了解，为了深入探讨对方所关心的一些敏感问题，中国方面建议，由周恩来同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进行单独会谈，以增进相互间的了解。

当日下午，周恩来在会谈中提出在国际会议上要努力寻找共同点的问题。他说：“不论什么国际会议，只要能找到共同点就有意义。亚非国家有共同目标，这就是摆脱殖民主义强加给我们的落后状态，实现经济发展，促进友谊。不论各国属于什么制度，只要这个制度是人民自己选择的，亚非各国之间就一定能找到共同点……我们这次访非是为了寻求友谊与合作，我们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愿意和突尼斯发展友好关系。”

周恩来“求同存异”的精神终于打动了布尔吉巴。布尔吉巴说：“我

同意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帝反殖。突尼斯需要伟大的友谊，并一定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代表团离开时，欢送的规模特别盛大，钱嗣杰所拍的镜头里都是彩旗招展、鲜花缤纷、群众欢跃。

十 珍贵合影背后的感动

1 月 11 日上午 8 时，周恩来所乘的专机徐徐降落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加纳共和国首都阿克拉。这时，钱嗣杰的心里怦怦直跳，不知总理这次到访是否安全。

走出机舱，钱嗣杰放眼望去，只见机场和街道两旁都是热情欢呼的群众，哪里有刚刚发生过谋杀所产生的恐怖气氛。于是，一颗绷得紧紧的心才放松下来。

在阿克拉机场，遵照周恩来的建议，恩克鲁玛没有露面，他特派三人委员会成员代表率阿克拉各界人士来迎接中国客人。由于各国记者得知有预谋政变的发生，早已云集加纳，对周恩来的到来也引起他们极大的报道兴趣。钱嗣杰仗着自己身强力壮的优势，以步代车，跟着缓缓而行的车子，一边奔跑，一边拍照。

当日下午，尽管刺杀事件带给人们的余悸未消，周恩来和陈毅等人还是在代表总统的三人委员会成员——外交部部长博齐约和交通部、工程部部长本萨以及加纳驻华大使麦耶的陪同下，乘车从容地视察了阿克拉市容。随后，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周恩来的率领下乘车直奔阿克拉城的

另一端，去恩克鲁玛总统居住的奥苏城堡。

进入奥苏城堡时，钱嗣杰只见周围戒备森严，门口的士兵全副武装，四周停放着许多军用车辆和轻重武器。这时，钱嗣杰感到空气似乎特别凝重、沉闷，好像门口的士兵在将枪口对准每一个代表团成员。

不一会儿，恩克鲁玛身着中山装走了出来。钱嗣杰后来才从代表团成员中得知，这是恩克鲁玛于 1961 年 8 月访问中国时对中国穿的中山装很欣赏，为此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给恩克鲁玛特做了一套。年轻的总统激动地快步走上前，紧握着周恩来的手，许久没有松开。钱嗣杰抓准机会拍摄。

入座后，恩克鲁玛歉意地向周恩来解释门外的情景，周恩来微笑着表示理解。随后，周恩来面交了毛泽东给恩克鲁玛的慰问信，并告诉他："首先，我要对总统阁下最近遇刺表示关心。毛主席给阁下发了慰问电，今天已广播。"

为感谢周恩来一行冒着危险前来，恩克鲁玛在城堡举行了便宴招待中国政府代表团。奥苏城堡是 17 世纪贩卖黑奴的丹麦商人所建，在那阴森的地牢里，石桩上用铁链拴捆过数以千计的黑奴，等待押解上船运往美洲。看到这一切，周恩来被这些殖民主义酷刑和监牢深深震撼。陈毅心潮难平，在会谈间隙提笔填词一首《满江红·黄金海岸》，词曰："惊世间残暴竟如斯，两洲血。"并祝愿："独立非洲西北始，揭竿而起相踵接。看涤瑕荡垢土重光，全无敌。"

为了冲淡地下室的殖民主义恐怖气氛，恩克鲁玛破例引导周恩来、陈毅等人上楼，到夫人和孩子们住的房间参观。一到楼上，气氛就大不一样了。他的家庭，是一个"种族团结"的家庭，除恩克鲁玛是黑种人外，他的夫人是一位漂亮的埃及白种人，孩子的皮肤则呈棕色。恩克鲁玛把

夫人介绍给周恩来认识，并亲切交谈。钱嗣杰为恩克鲁玛全家和代表团成员拍了合影。

从楼上下来，周恩来意外地发现城堡里还放着一台乒乓球案，知道恩克鲁玛与自己有着同样的爱好，立即提议两人“赛”一场球。他们愉快地拿起拍子上阵，由陈毅当裁判，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当副裁判。于是，你一来，我一往，乒乓球桌上发出了轻快的、有节奏的响声。钱嗣杰等随行记者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拍摄机会，这可是国际乒乓球赛中级别最高的一次球赛，尽管双方球技并不是很熟练。钱嗣杰心想，总理提出的这轻松愉快的建议于处境维艰的恩克鲁玛的紧张心理是一个极好的调节，也很富有政治含义。

以后的每次会谈都是周恩来亲赴奥苏城堡进行，周恩来劝恩克鲁玛不必到宾馆回拜。对中国总理在最危难的时候送来巨大的力量和慰藉，且处处体谅和照顾对方，恩克鲁玛甚为感激，钱嗣杰从自己所拍摄的每一张照片上的恩克鲁玛的神态看得出。

1 月 15 日，周恩来同恩克鲁玛会谈时，首次提出了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并在答加纳记者提问时向国际社会宣布：“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时候，严格遵守以下八项原则：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第三，中国政府对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

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第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中外记者听得出，这八项原则包含着真诚、无私、平等、互利、公正、合理等的中国精神，它同帝国主义国家以实现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为目的的“援助”有根本的区别。

1 月 16 日上午 11 时，周恩来抵达马里共和国访问。当晚，马里总统凯塔在首都巴马科举行了一个有 1000 多人出席的盛大招待会。在洋溢着友好、团结的气氛中，周恩来深受马里人民的热情所感染，带头和马里总统一道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尽管在国内见过周恩来优美的舞姿，但是这种在异国他乡融合了中非舞蹈各自特点的舞步，钱嗣杰是头一次见到，于是赶紧用相机记录下来。

在马里，凯塔等领导人曾试图让周恩来对社会主义的马里共和国提些看法，周恩来明确地说出了中国政府对非洲国家道路选择的态度：“尊重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任何人不得干涉。换句话说，友好的国家、友好的人民只有尊重你们的义务，没有干涉或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你们的权利。”

1 月 21 日，中国和马里政府发表《联合公报》。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正式写进公报中。

21 日上午 8 点 30 分，周恩来“满载马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并留下“独立和自由的亚洲和非洲，一定能够一天一天繁荣富强起来”的

1964 年 1 月，周恩来访问几内亚，检阅仪仗队。钱嗣杰、杜修贤 摄

祝福，飞离马里，前往“世界火炉”几内亚共和国访问。

10 点，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亲自到机场迎候，并让礼兵鸣放 21 响礼炮，沿途受到科纳克里群众倾城而出的欢迎。钱嗣杰看到从机场到宾馆的 15 公里的公路旁，欢迎的群众密密匝匝的，

他们高呼：“几内亚 — 中国友谊万岁！”成千上万的市民热情洋溢地向中国客人挥舞手帕的时候，大街变成了一条白色的河流，有许多人爬到沿街的屋顶上向中国客人欢呼。

一路上，都有男女老少表演各种民间歌舞，尽情地敲打着在欢庆节日和欢迎贵宾时用的“塔姆塔姆”鼓，向中国贵宾表示欢迎。鼓声、巴利风（木琴）声以及其他各种非洲乐器的动人的音乐，给这个城市增添了节日的欢乐。在这热烈欢呼的场景中，周恩来由塞古·杜尔总统陪同，在敞篷车上以生动的笑容，向欢呼的人群频频挥手致意。钱嗣杰奔跑着拍摄……

好不容易，汽车才缓缓开到位于海滩旁边漂亮的“美景别墅”。这是一座按几内亚民族风格建造的宾馆，客厅里挂着毛泽东主席和杜尔总统的巨幅画像。当晚，塞古·杜尔举行盛大文艺晚会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接风。文艺演出开始前，周恩来发表讲话，大加称赞“几内亚共和国是富饶和美丽的，几内亚人民是勤劳和富有才干的”，并说：“正如塞古·杜尔总统所说，几内亚是一个没有被打开的‘百宝箱’。我们深信，几内亚人民一定能够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将这个‘百宝箱’打开，一定能够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起来。”他表示，“几内亚人民可以相信，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将永远是几内亚人民可靠的、忠实的朋友。”钱嗣杰看到，周恩来在文艺晚会上的心情显得十分舒畅、轻松。

苏丹位于非洲东北角的红海之滨，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1 月 27 日下午 3 时，钱嗣杰作为随访记者随周恩来所率代表团抵达苏丹首都喀土穆。当时，正值苏丹局势动荡不安，但是苏丹政府有意安排了极富政治意义和高礼仪的接待方式，提议周恩来和陈毅从机场到市区再到宾馆

1963 年，钱嗣杰和新华社记者言彪在苏丹赤道线上采访。

一路上乘坐敞篷车行进，好让喀土穆人民一瞻中国贵宾的风采，也表明苏丹现任领导人的政治影响。然而，代表团负责安排礼仪的官员考虑到安全问题，对苏丹政府的提议表示了异议，并未让周恩来、陈毅知晓就改变了苏丹的计划。

进得城来，周恩来才知道改变了苏丹政府原先安排的事，非常生气，认为错过了一个与苏丹喀土穆人民直接、亲近的见面机会。他严厉地批评了有关人员，说他们顾虑太多，没有从大局考虑，并立即指示代表团有关人员，尽快同苏丹官员协商离开喀土穆时重新安排类似的活动方式。在周

恩来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个礼仪问题，他要通过这个行动来表示声援一个处境困难的被压迫国家的领导人，也支持苏丹人民的正义斗争。

这天晚上，通晓中外历史的周恩来在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布德为他举行的国宴上讲话时，从中国和苏丹两国人民有着深厚友谊的角度，赞扬苏丹人民惩罚了中国和苏丹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英国侵略军军官查尔斯·戈登。戈登在 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曾参与英法联军火烧北京圆明园的活动。1874 年，他被英国派到苏丹担任总督。1885 年，苏丹人民起义军在民族英雄马赫迪率领下，攻克喀土穆，戈登在总督官邸被起义军用长矛刺死。

1 月 30 日上午，周恩来为满足喀土穆人民的愿望和挽回上次改变苏丹政府安排的影响，周恩来和陈毅在阿布德的陪同下，坐上了敞篷汽车。由宾馆到机场，一路有摩托车队护卫，沿途有群众夹道欢送……

同日上午 11 点 12 分，中国代表团的专机在 6 架埃塞俄比亚战斗机护航下，飞抵埃塞俄比亚东北部的阿斯马拉机场。

当时，埃塞俄比亚并未同中国建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政府的控制。尽管埃塞俄比亚向周恩来发出邀请，希望同中国发展关系，但是他们又怕美国施加压力，影响埃美关系和美国对埃方的援助。迫于外来压力的影响，70 多岁的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建议把会谈地点安排到远离首都的北部城市阿斯马拉。阿期马拉坐落在海拔 2400 米的高原上。按照国际惯例，对一个国家总理如果不安排在首都接待是不礼貌的，但是周恩来充分体谅东道主的难处，决定前往阿斯马拉，并微笑着给代表团成员做工作。

当中国代表团到达阿斯马拉市时，美国的报刊趁机大做文章，叽叽喳喳地说这是埃塞俄比亚有意降低对中国人的接待规格。周恩来等人却

一笑了之，对此置之不理。其实，埃塞俄比亚政府和人民都很友好，钱嗣杰注意到中国代表团车队经过处时常有花束抛来，一位男子为了把鲜花抛在代表团车上竟追车跑了半里路。

代表团到达阿斯马拉后，塞拉西很热情客气，把他的行宫让了一半给周恩来、陈毅下榻。因行宫房间不够，代表团的有些警卫人员只好睡在走廊里。

当天中午，塞拉西接见了周恩来。由于中埃双方彼此交流和了解太少，双方在会谈中出现了争论。会谈中，塞拉西皇帝指责中国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同索马里的边界争端中支持了索马里，理由是“中国援助索马里”，“索马里会利用中国的援助来反对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周恩来耐心地解释说：“我们一向坚持万隆会议精神，我在同索马里总理的谈话中，一再强调了我们对埃、索争端采取不介入的立场。”周恩来通情达理的一席话，驱散了笼罩在塞拉西皇帝心中的阴影。他表示感谢周恩来的承诺。

这以后，塞拉西皇帝努力推动中埃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两国终于在 1970 年正式建交。

2 月 1 日中午，周恩来抵达索马里民主共和国首都摩加迪沙，受到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总理和首都市民载歌载舞的欢迎。这天晚上，在舍马克举行的国宴上，周恩来追溯了中索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他说：“15 世纪中国的大航海家郑和，在他著名的远航中，曾多次访问过摩加迪沙和索马里的其他地方。在此期间，也曾有过索马里的友好使者到中国进行访问。所有这些历史上的友谊的佳话，为中索两国人民世世代代所传颂。”

次日上午 9 点，周恩来拜会了索里马总统欧斯曼，再次强调了“我们两国早在 1000 多年前就有了来往”的传统友谊。

钱嗣杰发现，这次出访中所接触到的所有非洲国家领导人，几乎都十分关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在索马里时，周恩来再次重申中国政府的坚定立场：虽然承认中国已成为一种趋势，但“联合国是否能多数支持恢复中国合法权利并且驱逐蒋介石，那还不能肯定”。他斩钉截铁地说：“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只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们绝不会承认把台湾割出去！”

对索马里进行友好访问，是中国代表团此次非洲之行的最后一站。在向法国新闻社总编辑特塞兰谈及对非洲大陆前景的认识时，周恩来满怀激情地指出：“到非洲以后，我们感到非洲觉醒了，站起来了，当然还有一部分国家未独立，正在为独立而奋斗。毫无疑问，整个非洲大陆各国一定会独立，不管多长时间，最后都会取得胜利。”

像以前在各国访问时一样，周恩来全力投入会谈、记者招待会等工作，而陈毅则尽力分担其他工作，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看望中国使馆工作人员，报告国内形势、国际动态、中央方针、出访成果等。这一次在首都摩加迪沙，在即将结束对非洲 10 国访问之前，陈毅在使馆做了整整 6 个小时的报告，详细总结了访问非洲的见闻。陈毅说：“我们看到了一个觉醒的非洲，一个革命的非洲，一个前进的非洲。非洲人有自豪感，对自己命运有信心，不像过去那样站不起来。他们产生了新的领袖和干部，产生了伟大的群众运动，不再跟着帝国主义和大国的指挥棒来考虑问题，而是根据自己整个大陆的翻身来考虑他们的建设，就像 1949 年解放了的中国一样，这是一种革命的苏醒！”

一天，陈毅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这次我们出访，小钱和翻译太辛苦了，有时他们两个连饭都吃不上，我们两个同他们照张相吧！”于是，陈毅要把钱嗣杰和翻译安排在自己与总理中间合影。钱嗣杰一见，

1964 年 2 月 3 日 , 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同钱嗣杰和翻译于索马里使馆合影。 李华 摄

认为很不合适，连连摆手说：“要不得！要不得！”这时，陈毅将他拉过来往自己右边靠，说：“要得！要得！”几经“挣扎”，钱嗣杰拗不过，最后与翻译站在周恩来和陈毅中间，其他同志站在外边，请随行的中国驻阿联使馆工作人员用自己手上的相机拍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2 月 4 日，周恩来结束了对非洲的历史性访问，带着摩加迪沙市政府赠送的“自由钥匙”，率中国代表团离开索马里回国。

周恩来出访归来，第二天在报纸上看到他回京的消息说“周总理神采奕奕地走下飞机”。看到此，周恩来紧皱眉头，当即叫值班秘书把写此报道的记者找来，指着报纸上的消息说：“我国现在国家遭难，人民受苦，我周恩来凭什么还‘神采奕奕’？”他还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现在天灾人祸闹得我们饭都吃不饱，我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居然还‘神采奕奕’！这样宣传上不合于国情，下不安于民心。”

周恩来的这次出访，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出访国家最多、时间最长、路途最远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这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罕见的，它由此掀起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的新篇章。尽管周恩来谦逊地说：“我们这一次去访问，可以说是走马观花，去做探路的工作。”但是他仍然充满信心地预言：“这个探路的工作，可以为以后政府的、民间的，从各方面去的人打开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影响会跟着以后的工作越来越发展。”

在中国领导人的这次出访期间，钱嗣杰为了多拍一些照片作为历史资料，几乎拍摄了周恩来、陈毅在非洲的每一个访问活动的场景。并且为了能及时报道出去，他牺牲休息时间，加班冲洗、放扩、选片、传真发回国内，忙得不亦乐乎！

中国代表团回国后，为了宣传新中国外交战线的这一伟大成果，中央决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一次图片展览。其中，很多照片是钱嗣杰拍摄的。乔冠华接受组织图片展览这个任务后，立刻组织新华社与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承办，并向周恩来提议在展览的图片上应该署拍摄记者的名字。这次出访，周恩来切身感受到了摄影记者的辛苦程度，一听乔冠华的建议，拍手称好：“有道理，摄影记者应当署名。”3 月 24 日，图片展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钱嗣杰和杜修贤所拍的大量镜头为参观者啧啧称道。

十一 送别前语重心长的三句话

1971 年 10 月 25 日晚 10 时许，美国纽约东河河畔的联合国总部会议大厅里，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第 2758 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自中南海回到新华社摄影部后，钱嗣杰再度担任中央记者组记者，但是他一直关注着国际新闻，毕竟自己曾较长时期从事过外事报道。看到新闻报道，忆及中国阔别联合国 22 年后重返，钱嗣杰思绪翩翩：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全理事会 5 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早在 1942 年 1 月 1 日，中、美、英、苏等 26 国代表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国宣言》。1945 年 6 月 26 日，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却依旧被蒋介石集团所窃据。自 1950 年第五届联大起，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大国一直在联合国内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外交种种压力，甚至采取经济威胁或利诱等手段，阻挠联合国恢复中国所应得的合法席位。

然而，这 22 年是世界发生深刻变化的 22 年。钱嗣杰心想：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在这股大潮的推

动下，一大批亚非国家取得了独立加入了联合国。他认为，没有这批国家的加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难以想象的。抚今追昔，钱嗣杰浮想联翩，感慨良多：联合国需要中国。不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不在联合国里，联合国有什么普遍性可言？世界面临着众多的问题，需要联合国发挥作用。如果联合国缺少中国这一块，显然在应对世界上大的问题时缺少了有力的支撑。当然，中国也需要联合国。

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历程充满了艰难，但最后的通过，却顺利得连北京方面都感到突然，有些措手不及。1971 年 10 月 25 日，第 26 届联大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 2578 号议案，台湾代表发表声明之后退出联合国。就在同一天，正在中国秘密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正准备结束访问。这一消息已经在联合国内部传开，据史料记载，很多美国的盟国得知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消息之后，有种被美国欺骗的感觉，因此干脆转为投中国重返联合国的赞成票。投票结果是 76 票赞成，36 票反对，17 票弃权。

消息传来，正是基辛格启程之时。周恩来把喜讯告诉了曾与基辛格会谈的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要求对基辛格保密，不想让正春风得意的基辛格难堪。但是在送行的路上，同车的乔冠华还是忍不住问基辛格：“您认为今年中国能恢复联合国席位吗？”基辛格回答说：“大概得再等 1 年，等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应该差不多。”乔冠华仰天长笑：“我看不见得吧？！”

当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电报到达中国政府时，中国外交部的领导踌躇了。国民党代表已在 23 国提案通过后，悄然收起文件包，离开了占据几十年的联大会场。此刻，联大中所设的中国席位就空在那，中国应不

应该坐上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已发来邀请电，中国要不要组团马上出席联大？

周恩来召集外交部领导成员开会，会议争论得很激烈。从每个人的心里讲，为之奋斗 20 多年的事业实现了，自然要扬眉吐气地到纽约去，到联合国的讲坛上一展新中国的雄姿。然而，这毕竟是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下的一次重大决策啊！“左”的阴云笼罩在中国大地上，“四人帮”动辄在外交系统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外交部的领导干部大多是刚刚从批斗中“解放”出来的。要他们建议去基本上被美苏控制的联合国与美苏坐在一起讨论天下大事，弄不好建议者很容易被扣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最后，毛泽东拍板：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并说：“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很快，中国组成了出席第 26 届联大的代表团，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兼中国常驻安理会代表。

这时，钱嗣杰注意到：经毛泽东同意，决定由新华社记者高粮率 5 人组成的先遣队赶去纽约打前站。于是，高粮一行带着介绍信和几面五星红旗，出发前往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美国的纽约。钱嗣杰很是羡慕同事能采访联大会议。

不久，钱嗣杰注意到关于中国先遣队的消息在国外各家电视、广播、报刊作为头号新闻，对队员如由谁陪同、穿着怎样、吃饭时怎样用刀叉、怎样付小费、付的是什么钞票……做了详细报道，宛如看见了一群“外星人”。其中，美国有家大报甚至用半版篇幅登载了高粮身穿中山装的照片，并称之为“毛泽东服”。

在中国代表团出发前夕，钱嗣杰和新华社文字记者叶志雄接到通知，将奉命随团采访。听到这个通知，钱嗣杰喜不自禁，立即为到联合国采

访做准备。

11 月 5 日晚 7 点，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中国代表团及全体随行人员。钱嗣杰认识其中的很多成员，注意到全团 52 人除副团长黄华因在国外其他人都到会了，从团长乔冠华到司机、炊事员等随行人员，成员相当精干（据说当时的苏联代表团有 200 人）。大家相聚在一起，接受这次光荣的使命，脸上都喜气洋洋，心中更是无比激动。

当时，“九一三”事件才过去 1 个多月，周恩来之忙可想而知。钱嗣杰看到总理比以前消瘦了，但是眉宇间仍是炯炯有神。在长达 5 小时的接见中，周恩来的高屋建瓴、平易近人、处事缜密以及惊人的记忆力，给钱嗣杰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天晚上，周恩来神采奕奕，心情特别愉快。他按照名单的次序，用亲切的口吻叫着每一个人的名字。特别对代表团中来自下面同志的询问得更加具体，如来自什么部门担任什么职务，准备在代表团做什么工作等。期间，问到钱嗣杰和叶志雄对这次报道有没有信心，两人异口同声说：“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出色完成任务！”这时，周恩来满意地笑了。

在谈到代表团成员服饰问题的时候，根据当时的情况，周恩来表情庄重地说，在出席正式会议的时候，中国代表要穿中山装，不要穿西服。你们可是代表中国啊。不过，为了方便，代表团成员后来还做了一套西服，以便上街时穿。

接见中，周恩来谈了许多重要问题，策略性很强。有几件“小事”也很感人。周恩来反复叮嘱大家，“要临事而慎，又要有信心”。他鼓励大家要重视学习，加强调研。“做好外交工作，一定要掌握外语，60 岁以下强迫学，60 岁以上自由学……搞外交，不看地理，不懂历史，怎么行……原则要鲜明，要坚持，具体问题要慎重，要调查研究。裁军、

中东、印支、印巴、种族歧视等问题，联合国讨论过多少年了，我们要心中有数。”周恩来一再强调：“一国的事本国人民管，世界的事各国管，联合国的事要所有会员国共同来管。这是历史趋势，历史潮流不可抗拒。”

接见期间，周恩来仔细查询了代表团的各项准备工作，并指示要增加一位负责向国内写简报的人。接见还未结束， 乔冠华的秘书程远行就应命来会场报到。周恩来很随和地说：“听说你笔头快，所以请你来。”程远行有点腼腆地答道：“总理，我写得不太好！”

接见的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好几个钟头，由于夜深，周恩来特地请大家吃夜宵。夜宵尽管只是绿豆稀饭和包子，大家吃得有滋有味。

代表团出发前夕，11 月 8 日晚 8 点，毛泽东约见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符浩、熊向晖等。期间，毛泽东还对周恩来说：“明天代表团就要出发了，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再加上几千名群众，到机场欢送，要大张旗鼓地热烈欢送。也通知外国使馆，去不去由他们自己决定。”

著名外交家周南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他当时作为代表团一等秘书也随团前往，“在启程前的一天晚上，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代表团的一些成员。毛主席说，你们是第一次去参加联合国大会，一定要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姿态，很好地宣传中国的外交政策。他说，中美还没有建交，你们是深入到帝国主义心脏去，处在别人的包围之中，是孤军深入。毛主席说，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古人讲的，叫作‘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另一句是阿庆嫂讲的，叫作‘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11 月 9 日中午，中国代表及全体随行人员踏上征途。首都机场热闹非凡，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成千上万穿着鲜艳民族服装的年轻人翩翩起舞。新华社当天的报道说：“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

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 、郭沫若、姬鹏飞等党政领导同志，首都革命群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4000 多人前往机场热烈欢送。”参加送行的还有 60 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

钱嗣杰十分兴奋，听到欢送队伍不时地高呼：“热烈欢送我国出席联大代表团！”“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欢呼声此起彼伏，处处是热烈的锣鼓声和掌声，机场上呈现出一派十分热烈的“革命气氛”。走在被欢送的队伍里，钱嗣杰边走连拍，异常激动。叶剑英当场赋诗以壮行色：“我队一行壮，任务亦艰巨；乘风飘万里，横渡亚欧美 。”

代表团成员绕场一周，对欢送领导与群众表示感谢。周恩来和每一

1971 年 11 月 9 日，钱嗣杰赴第 26 届联大时，周恩来总理紧握钱嗣杰的手叮嘱。 王敬德 摄

1971 年 11 月 9 日，周恩来等党政领导以及各界群众在机场欢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第 26 届大会的代表团。

位“出征战士”亲切握手送别，钱嗣杰和其他代表团成员一样绕场一周，向挥动着花束、彩带的群众和前来送行的各方面负责人告别。

周恩来一个个握手，让钱嗣杰十分的感动。当握到自己时，钱嗣杰看到平时习惯只用右手握手的周总理这次双手紧握自己，很有力量感。周恩来注视着钱嗣杰，语重心长地说：“小钱，我送你一句话——新的环境、新的工作，一定要把照片拍好！”钱嗣杰感觉到周总理话里的深意，责任感油然而生。钱嗣杰也紧握总理的双手，激动地说：“总理，我一定要更努力工作，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周恩来频频点头。这时，新华社摄影记者王敬德摄下了这一珍贵瞬间。

此时此刻，钱嗣杰意识到：中国代表团肩负 7 亿中国人民的重托与期望，这种隆重而破格的送行是在向全世界宣示——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是超级大国敌视、孤立和封锁新中国政策的破产，是中国在外交战线上取得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胜利，中国代表团便是“胜利之师”！

临登机时，代表团成员与前来送行的领导同志在机身上涂写有“毛主席万岁”标语的专机前合影。钱嗣杰认为这是历史性的一个时刻，应当用镜头记录下来，于是走出队伍，走到前边，准备用相机拍摄这张大合影。

近百人站在一起，长长地排在专机前，且远远超过了飞机的机长。如何拍下这张大合影呢？钱嗣杰思忖着，他尝试着拍摄接片。他想，拍摄这样的照片，不宜用广角镜头，最好采用 50–90 毫米的标准或中焦距镜头。很快，钱嗣杰固定好相机三脚架，旋转三脚架上的云台，确定从开始到拼接的镜头位置，校正好水平线，使在取景框内保持一定水平，保持同样的空间位置，然后开始分段拍摄。拍摄时，钱嗣杰每一个位置

连拍了多张，每两个相邻位置所拍摄的底片间位置重叠一部分，十分细心地拍摄，尽可能减少拼接时的困难。

钱嗣杰分 3 段进行了拍摄，没有更改光圈和快门速度，使用的是同样的滤光镜，保持了底片密度和景深的一致。后来在拼接时，他裁去了照片左右的一部分，以画面中央部分为准，依次叠合，十分细心地对准画面中的线条和人物肖像的细节，仔细贴好，随后在柔和的散射光下进行翻拍，经放大，一张完整的大合影就成型了。

11 日中午 12 点 30 分，中国代表团的专机徐徐降落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在机场，中国代表团受到联合国官员以及力主驱蒋和恢复我国席位的 23 个联合提案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的热烈欢迎。来自纽约、华盛顿、

1971 年 11 月 1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副团长黄华在联合国大会第 26 届全体会议上。钱嗣杰 摄

1971 年 11 月 1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第一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第 26 届会议。图为乔冠华在大会上发表讲话。钱嗣杰 摄

1971 年 11 月 9 日，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出席第 26 届联大会议，登机前周恩来总理等与代表团合影。钱嗣杰 摄

波士顿、费城甚至远自亚特兰大等地的数百名美国友好人士也赶到机场迎候中国代表团。数百名美国以及各国常驻联合国记者也早早来到机场，等候采访这一重大国际新闻。到机场欢迎的还有纽约市公共事务专员，以及众多的华侨代表……

1971 年 12 月 18 日晚，中国代表团完成出席 26 届联大的任务后，乔冠华率部分代表团成员离开纽约回国。此时，钱嗣杰与同事叶志雄两人作为中国派驻联合国总部的首批记者留了下来。

晚年，钱嗣杰十分欣慰的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么些年来，

1971 年 11 月 1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第一次出席了联合国大会第 26 届会议，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后，许多友好国家的代表到中国代表团座席前同乔冠华等握手，表示祝贺。 钱嗣杰 摄

1971 年，钱嗣杰在联合国第 26 届大会期间采访，正用“尼康”相机拍摄。

始终主张各成员国之间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致力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已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

十二 中美外交史上的“破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采取敌视、封锁、遏制和孤立新中国的政策，致使中美两国关系和中美两国人民交往断绝了 20 多年。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美国政府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为了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中美两国政府开始试探和接触。

1971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7 日，第 31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举行。中国乒乓球队如期赴日本名古屋参赛，一举荣获 4 项冠军，使世界乒坛为之震动。钱嗣杰看到了这一赛事报道，为中国运动员取得的佳绩而高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次比赛期间，中美两国乒乓球队员进行了友好的接触。在这种接触中，美国乒乓球队向中方提出了访华的请求。

为此，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就美国乒乓球队要求访华的问题，给周恩来写了报告，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主要是因为美国乒协坚持奉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前不久就支持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参加国际乒联。

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对美国乒乓球队的访华要求，也持非常慎重的态度，在报告上批示：“可以留下他们的通讯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

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在报告末端，他写了“拟同意”3个字，并将报告转毛泽东审批。

经过慎重考虑后，毛泽东亲自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队访华。对毛泽东的这一决定的意义，周恩来深有体会：美国乒乓球代表队访华的政治意义大于体育意义！

决定一经做出，周恩来迅速组织实施。4月7日，周恩来嘱告外交部立即用电话通知在日本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对外宣布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当天下午，美国代表团开会，团长格雷厄姆·斯廷霍文宣布：访华事已得到政府许可。这时，场外挤满了各国记者。斯廷霍文说：“我感到非常高兴，心情与其说是兴奋，毋宁说是惊讶。”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欢迎，认为这是中国要同美国改善关系的“一个认真的信号”，“这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事”。

一时间，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似乎盖过了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钱嗣杰看到美联社东京当日电说：“20年来在恢复美国和中国已经中断的对话方面所采取的最有意义的一个步骤，竟出现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乒乓球比赛场。”这时，长年从事时政新闻采访拍摄的钱嗣杰感觉到：乒乓外交可能会使改善中美关系的工作取得成功。在他看来，封冻22年之久的中美之间的大门似乎在缓缓开启。

这时，一场“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行动，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导演下有趣地开展起来。

4月9日下午，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离开东京羽田机场，当晚飞抵香港，受到中国旅行社人员的迎接。下飞机后，代表团团长、美乒协主席斯廷霍文说：“我们很高兴，喜欢得要发狂似的。我们希望此行将促进美国

同中国的关系。”国际乒协国际部主任罗福德·哈里森说：“我们把自己看作是促使美中两国达成较多国际谅解的先锋。”

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一起到达北京的，还有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和尼日利亚的乒乓球代表团。为向美国政府传递信息，周恩来给美国代表团以特殊的优待，抽出时间亲自接见了这些初次进入“红色中国”的美国人。整个会见，妙趣横生，笑声不断。所有在场的美国人都被周恩来的坦诚打动。中国总理并不强加于人但却让你心悦诚服的谈吐，令美国队员们由衷地敬佩。

会见快要结束时，周恩来称赞美国乒乓球队应邀来访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他充满信心地说：“我请你们回去把中国人民的问候转告给美国人民。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还断言：“中美关系，打开了新的一页。”

周恩来的举动和谈话很快通过美国人自己传到了白宫，也通过新闻报道传遍了全世界。钱嗣杰一直默默关注着事件的进展……

1972 年 2 月 21 日 11 点 30 分，一个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时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乘坐他的专机“空军一号”来到中国，开始他的对华访问。周恩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身份，亲自在北京机场迎接。

当尼克松总统和夫人走出专机时，他为了让世界记住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有意把其他随员先暂留在了机舱里。身着厚重灰色呢大衣的尼克松与身着红外衣的夫人帕特走下舷梯，身后没有任何人跟随，当走到离地面还有三四级台阶时，尼克松微笑着伸出手，急步朝站在舷梯外两三

步远迎接的周恩来走来。周恩来站在原地也把手伸出来了，中美两国领导人在隔绝了 20 多年后，终于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摄影师不失时机地拍摄了这一历史性的瞬间。

在一片掌声中，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含笑说：“总统先生，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 年没有交往了啊！”

在尼克松与周恩来的握手结束后，随尼克松访华的罗杰斯、基辛格等随员才获准走出机舱。军乐队这时奏起了《星条旗歌》和《义勇军进行曲》……

身在异域的钱嗣杰通过纽约的三大电视台看到了尼克松访华的种种细节。有关实况报道，共达 41 个小时 44 分。这对分秒是“金”的美国电视来说简直是难以想象。于是，钱嗣杰很快感受到了“中国热”在美国各地再度升温。

2 月 27 日晚上，中国方面为尼克松举行最后的宴会。在轻松舒缓的乐曲声中，周恩来与尼克松频频举杯，一周来的紧张情绪也怡然退尽。

尼克松端起酒杯，走到麦克风前作了这次访问中从未有过的即席讲话：“联合公报将成为明天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但是，我们在公报中说的话，不如我们在今后的几年要做的事那么重要。我们要建造一座跨越 16000 英里和 20 多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公报是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尼克松还不无得意地说：“我们访问中国的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2 月 28 日，就在尼克松即将结束访华回国的时候，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签署并发表。《联合公报》中美国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是：“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

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钱嗣杰这时意识到：这份《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的大门已经打开，开始走出对抗，走向合作和正常化。

这年 3 月 12 日，钱嗣杰注意到 NBC 用了两个小时播放了中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吸引了 1500 万观众，中国的芭蕾舞一时成了美国人的话题。此时，钱嗣杰意识到中美关系在一步步解冻中走近。

4 月 12 日，美国派一架波音 707 专机到加拿大渥太华机场，专程迎接结束在加拿大访问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飞机上用中文写着“友谊飞剪号”，悬挂着中美两国的国旗。这是中美关系被历史割断了 22 年之后中国第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进行友好访问，想到这些，钱嗣杰心底里表示要用镜头记录中美“乒乓外交”这一历史性壮举。

从底特律、威廉斯堡到华盛顿、纽约、孟菲斯、洛杉矶、旧金山，

1972 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美在纽约机场合影（二排左三为钱嗣杰）。

钱嗣杰全程陪同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访问。到处以政府代表团一般的规格来接待，美国白宫和国务院都派了专人陪同接待，乘坐的是专机。除了警车开道之外，在底特律和孟菲斯甚至还有直升机在沿途联络。

钱嗣杰看到赛场内外充满了中美两国人民久别重逢的热烈气氛，不少久居美国的老华侨同中国队员会面时更是热泪盈眶，问长问短。尼克松还在白宫接见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联合国总部还安排了中国乒乓健儿们在联合国大厦举行表演赛，这在联合国史无前例。

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美过程中，有些地方有少数亲台分子混进赛场，手摇青天白日纸旗，向中国运动员呼叫："XXX，投奔自由！"这时，钱嗣杰眉头一蹙，不过很快就舒展开来，看到来自伟大祖国的男女健儿反而更加精神抖擞，越打越精彩，赢得满座欢呼。连那些前来示威的亲台分子也情不自禁地放下小旗，鼓起掌来。

中美两国乒乓球队互访轰动了国际舆论，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钱嗣杰用镜头见证了以庄则栋为团长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美国的每一个细节。抚今忆昔，感慨多多。在晚年，钱嗣杰重温当年震惊中外的"乒乓外交"，再次感受到了友谊的力量，世界因友谊而改变。这些年来，中美关系一直在曲折起伏中向前发展，在我们每个人分享中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的同时，都不会忘记当年发生在中美两国乒乓球运动员之间的那段珍贵的历史记忆。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美时，钱嗣杰和庄则栋（左二）等合影。

中国武术团访美期间，钱嗣杰与代表团团员在一起。

1972 年，钱嗣杰在美国纽约自由女神像前。

第八章
“红墙医师”细诉伟人身边事

新中国成立以后，王新德、吴阶平等曾为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看过病。这些经历给他们的生活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早些年前，笔者走近了这两位德医双馨的老人，也似乎走近了中南海的红墙生活。在他们眼里，周恩来一直忙忙碌碌，但是没有一点是为自己。负责周恩来的卫生、保健的时光，是两位老人一辈子难忘的记忆。他们这些点点滴滴的回忆，让我们重温这位感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伟大人物的音容笑貌。

一 “王医生”尘封多年的红墙秘事

自 20 世纪 60 年代，王新德就一直作为“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小组的成员，直接参与或负责了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多位中央领导以及胡志明等外国元首的医疗保健工作。一般情况一周一两次，他要走进那道神秘的高墙，为保障、挽救、延长这些政治人物的健康和生命尽心尽力。相对自己的其他经历而言，这无疑是颇为传奇的而又值得浓墨重彩地一笔。来自中南海的故事总让人敬畏而神往，笔者渴望着王老能够讲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然而，无论我们如何追问，他只是笑着连连摆手：“不能讲的，不能讲的……”

当笔者质疑海外出版的李志绥著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中的某些情节时，一向保守“绝密”而第一次接受外界专访的老人终于打开话匣，好像有话必说，不说不可，得还历史一个清楚与明白。此时，那段尘封多年的红墙秘事豁然吐露。

“毛泽东的医疗组，是在他病情危重时，根据需要临时组织的。总共只有两次，每次时间都不长。第一次是 1971 年至 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主席病重期间组织的，时间一年多；第二次是 1974 年 6

月中旬由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时提出，经领导决定成立的，直到主席逝世，共两年多。我是第二次医疗组专家成员，当时是北京医院神经科主任、教授。李志绥是中南海的门诊大夫，我清楚第二次根本就没有宣布过李志绥是医疗组组长。”王新德边情绪激动地回忆，一边找些资料来证实，“李志绥那本书很多是假的，胡说八道，我看过。”

原来毛泽东的医疗组第一次是在周恩来的重视下组建的，李志绥在起初当过医疗组组长，后来决定由吴洁（曾任北京医院院长、心内科主任）担任这次医疗组的专家组组长，对保健、医疗、抢救等业务总负责，护理工作由日夜坚持在第一线的护士长吴旭君负责。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后，健康日渐恢复，各位专家陆续回到原单位，持续一年多的第一次医疗组就结束了。“凡是重要的医疗讨论和作决定的时候，或是在抢救的时候，李志绥都向后缩。毛主席心肌梗塞抢救时，李志绥又是向后缩。”王新德对李志绥在以后的表现很为反感。

王新德是 1974 年夏抽调为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的。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身边工作的人员，涉密的范围和程序是有严格规定的。只有机要秘书才能送给文件、报告与信件，未经他本人指示，任何其他人都不得翻阅，连他的亲属与子女也不例外。“我们作为保健专家，我心里很清楚，我是医生，这就决定了我在医疗范畴内，该问的就问，该做的就做。而不该问的，坚决不问，不该做的，坚决不做，一般只看病不问政治。对于中央领导人，找看病就看，看完以后，我们不会和他们主动联系。大夫，就是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我们和这些中央领导的关系，从来都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文革’中，对好些领导人，不管你上去了也好，下来了也好，我照样为他们仔细看病。”

1976 年初，周恩来总理病危，毛泽东无力相见。1 月 8 日上午 10 时许，

主席正在看文件，不觉听到总理病逝消息。“他一言未发，合上眼只是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这时的毛泽东的确已无法向周恩来这位患难与共的战友表露自己内心的悲伤，由于身体现状也无法出席追悼会。“在送审的总理追悼会报告上，主席在写有‘主席’二字的地方用铅笔沉痛地画了一个圆圈。”此时的主席，无法圈点的是自己的悲情。

王新德教授的爱人汤慈美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并出任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医学心理和生理心理研究室主任。在采访中，恰逢他老伴从外面回来，有关话题也因汤女士的到来而丰富起来，笔者为此了解到王老做保健专家的种种滋味：

一是苦。因为保健专家们的特殊位置，常常是在午夜睡梦中，他被一个紧急电话叫醒，只说是到“那里”一下子，至于是什么事情，则不得而知。等到事情处理完毕后回到家里，已是凌晨三四点钟。但是，无论头天夜里如何忙碌，第二天还要照常上班，一般不请假休息，因为他不能说，“我昨天晚上去给某某领导人看病……”云云。这是纪律，无论再苦也要坚持，这种工作的保密性和不定性给日常工作等造成的艰苦可想而知。

同时，作保健专家，思想上担负和压力也极大，精神上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如汤慈美所言，由于接触人物的特殊性，即使是在普通人身上不成问题的问题，一旦到了他们身上，也就成了问题；做的事情即使 100% 正确，别人也无法理解。

紧张到不能有正常人的喜怒哀乐，感受最深的则当属周总理去世那件事了。汤慈美回忆说，当时总理逝世，她沉痛之余，在家里摆了总理遗像和白花以寄托悼念之情。王新德从外面回来，看到此情此景，大声责问：“撤掉！马上撤掉！”汤不理解，委屈地说：“我在家里，放个

总理遗像怎么了？”王新德忧心忡忡地解释：他当时在毛主席医疗组，当时正值“四人帮”当道，如果这时他被“四人帮”找出一点点问题的话，就有可能被抓起来，这对于毛主席的治疗将非常不利；同时，万一出问题，别人不知晓内情，会猜测：你是怎么被赶出来的？面对种种想法，他无法说得清楚。

对总理有感情，却不能表现出来，连家属也不能表现出来。个人的儿女情长，在关系国家政治大局的时候，早已被置之度外，这是一种怎样的牺牲呢？

这些苦衷，如果不是汤女士的出现，笔者是不会听到的，王老的基本态度，就是那种一贯的微笑：“这些，没有什么好讲的。”只是偶尔做一点补充。他说，我只写学术论文，不愿讲“秘史”。我要是讲了，我可以出一本书，我可以因此而赚一笔稿费，可我不能因此而失了原则。于是，即使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今天，他依然坚持原则，不想讲。

说时，语气很淡，好像所有的艰辛，都不值得一提；对于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不管外界如何变化，形态如何难以捉摸，永远只能是一种背景，一种陪衬；他要做的，永远是尽到一个正直本分的医生的责任，挽救病人是他的天职。在此之外，默默地承受，默默地奉献，默默地做着他的“临床研究”和“经验医学”。让他没想到的是，笔者还是设法使他开了一个口子，也许今天他讲了，却是他心中的一个“痛”。

据说：有时中央保健局拿来一份病历让保健专家看，但就只是病历，没有姓名。“保健局的工作纪律非常严格，你看就是了，从病历资料上你看出什么就说什么，不该你问的，绝对不要问。不过，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在那样的一种氛围内，再看看病历上的具体情形，即使心里有时候也明白这是在为谁看病，不过，是绝对不允许说出来的。”王新德讲，

我们这些保健专家是机动的，不专门负责某一个人，而是哪儿需要就去哪里：“如重要会议（如中央政治局会议）、重要活动（如五一、十一观礼，还包括看节目）的值班；领导人外出（出巡、出访）期间的医疗保健。除了对主席负责，同时我还主要负责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江青、邓颖超等人的医疗保健工作。”

1975 年的一天，总理头痛，疼得厉害，王新德当时诊断为可能是带状疱疹。总理问：“你们神经科，研究过针灸没有？”他答：“没有，以后可以研究。”总理长叹：“哎，你们研究出来，我也看不到了。”王老说，当时听了总理的话，心里很是难过，这反映出总理对自己当时病情的不乐观，也寄望我们早日在医学上大有长进。王新德说时，刚才还笑意盎然的脸上，划过一丝忧戚，似有挥之不去的难过。

遵守医道、人品高尚、医术精湛、德高望重的医学专家王新德，在为伟人们保健期间，保持一颗平常心，严谨不苟地行医，为中央首长所患的疾病做出一次次正确诊断……由于他的卓越贡献受到了中央保健委员会的多次嘉奖。

采访中，言及家庭生活上的分工。汤慈美说：“平时我做饭，他只管洗碗拖地等闲杂小事，不过表现尚可。”王新德插话：“未结婚之前，因为少时母亲去世早，我做饭是一能手，而她在家里，根本是一五谷不分的娇小姐；嫁我之后，我教她学做饭，把她培养出师以后，就甩手不干了。怎么样，我还聪明？”

在二人这种调侃的幽默里，我们大笑。笑声里，笔者再次翻看王老影集。那些记载了二人相处时光的老照片，携着岁月的风尘扑面而来：这里，脸上溢满青春的光泽，二人在沙滩上并肩、 牵手与嬉闹；这里，是美丽的西双版纳，中年的他们，像两个天真未泯的孩童，夏风里津津有味地共

吃一个大椰果；这里，是走入老年的他们，在王老的生日宴会上，“汤老”在“王老”头上扣了一顶王冠，在王老的躲闪中，两人相对大笑，乐不可支……一张张照片，收藏着他们几十年点点滴滴的欢笑，无不默默诉说两人相依相伴的幸福时光和充满情趣的夫妻生活。在这种恩爱笃定的漫长时光里，他们一起慢慢地变老了，却神采依然，妙趣横生。

二 “吴大夫”与“ckl”的神交

吴阶平，著名科学家（医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泌尿外科的奠基人。他有过许多职务和称呼，然而他最喜欢的称呼是“吴大夫”或“吴医生”。由于精湛的手术技术，在美国留学时落下了一个“三只手”的荣誉称号。

在著名医学家、社会活动家吴阶平家的书柜一侧一直悬挂着一张周恩来总理的大幅照片；书柜顶上摆着周恩来和邓颖超赠送的银座、花篮。他生前总是说，总理的言行风度给了他“终生难忘的教诲”。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开始，吴阶平有幸在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下进行医疗工作。吴阶平对周恩来总理有着非同一般的深情。从 1957 年起，他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近 20 年。吴阶平多次担负为国内外最高领导人治病的特殊任务，事前事后总理都有具体指点。总理对人热情关怀，无微不至。不仅领导同志健康出现问题总理亲自过问，对普通患者也很关切。这给吴阶平触动很大。

吴阶平最不愿意的是敬爱的周总理做自己的病人。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他就参加了对总理本人的医疗保健工作，细致入微地关怀照顾着

吴阶平家的书柜一侧一直悬挂着周恩来总理的大幅照片。吴阶平 供图

总理的健康。“文革”初期的一天，中南海出现一张敦促周总理务必注意健康、保重身体的十分感人的“大字报”，吴阶平和同在总理医疗组的胞弟吴蔚然的名字出现在上边。他俩还专门写了饱含深情的意见书，语重心长地劝说周总理一定要有劳有逸，并且提醒周总理：这样夜以继日地超极限地忘我拼命工作会严重影响身体，对自己的健康无异于“走钢丝”。周总理完全理解实际情况，但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使他停不下来。

吴阶平先后在北京医学院、北京第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首都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等高校任教。最令人称奇的是，在经历“文化大革命”漫长的磨难与沧桑之后，不少知识分子都伤痕累累，但是吴

阶平却从来没有受到过揪斗。生前谈到其中的原因，吴阶平的回答十分玄妙：“我看没有什么别的道理，就是凭良心办事。凡是对的我就支持，至于不对的那就要看情况了。有的反对，有的就不支持。这个要有个区别，不能一概而论。”

新中国成立以后，吴阶平为许多国家领导人看过病。这给他的生活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他曾先后做过江青、康生、林彪等人的保健医生。这无疑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凭着冷静的头脑和机敏的反应能力，吴阶平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危险的难关。

在吴阶平的一个记事本上有用英文字母记录着的特殊岁月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吴阶平说：“ckl 代表周恩来，cc 代表江青，k 代表康生。”吴阶平明白，在 10 年动乱期间，他担任中央领导保健医生，的的确确在“走钢丝”，而保持平衡的杠杆两端，一头是高超的医术，一头则是高度的政治敏感和审时度势的本领。

1967 年 11 月的一天，中南海派车来接吴阶平。吴阶平认出来人是陈毅的保健医生，还以为是陈毅病了。然而，汽车没有驶向中南海，却直奔钓鱼台 17 号楼。周恩来走出来开门见山地对吴阶平说：“从现在起由你负责江青同志的保健工作。”

不久，吴阶平感到自己的工作岌岌可危。他对妻子说；“如果哪天我不回来，你就等，耐心地等我回来，千万不要去找谁闹。闹，于事无补，只有坏事。”

吴阶平之所以如此说，绝不是空穴来风。他曾亲眼看到，一位女护士在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被江青硬是撕掉领章、帽徽而投入监狱。有一天，江青突然对吴阶平说：“吴大夫，你去研究一下，为什么玉簪花可以防蛇？你看，我这门口有一圈玉簪花，从来就没有蛇。”吴阶平

哭笑不得，硬是捏着鼻子找来医疗人员拿着玉簪花跑到动物园里做实验，然后又派他们到东北蛇岛抓来蛇进行实验，研究结果是玉簪花和蛇毫无关系。

一次，汪东兴对吴阶平说："首长（指江青）说你没有笑容，不支持她，护士犯了错误，你也不批评。"原来，这是因为江青在一次发烧时，一位护士连续看护了几天，实在太疲劳，就趁江青睡觉时自己也吃了安眠药睡着了。江青醒来喊了几声无人答应，于是大发雷霆，说对她没有阶级感情，是医疗问题。由于江青性情古怪，吴阶平常常防不胜防。紧张的工作和精神状态哪里还能笑得起来呢！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天中午，周恩来把吴阶平叫到自己的西花厅办公室，很生气地问："吴阶平同志，你们是怎么搞的？"吴阶平一愣：周总理平时总是很客气地称自己"吴大夫"，今天怎么直呼其名？

周恩来告诉吴阶平说，江青刚打来电话，说给她写的体检报告不负责任。吴阶平这才明白，原来是江青每次要到外地去，都是用身体不好、需要休息的名义向毛泽东请示，同时还要医生写一份报告。前天，吴阶平给她写报告时，描写她积劳成疾的语气不够。吴阶平看到周总理这样生气，知道是江青在电话里又无理取闹了。他这样解释后，周恩来才平缓下来。等吴阶平要离开时，周恩来向他解释说："吴大夫，我是拿你们出气，我心里别扭。"

1971 年 9 月的一天，中南海门诊部又突然接到通知，说江青中毒了。按照江青的旨意，中南海门诊部顿时把所有的药都封存起来，关于江青的所有的病历都抱来让她逐条审查，吴阶平等人也被关了起来，由江青的警卫员看守着。直到晚上 9 点钟，有人喊道：把吴阶平带到 17 号楼。大家都为吴阶平捏了一把汗。来到 17 号楼会议室，吴阶平一眼看到周总理坐

在那里，心里踏实了许多。听了周总理的提问，吴阶平回答说，我作为医生，现在没有发现中毒的迹象。周恩来这才知道根本没有中毒问题，就将话题一转，讲起林彪和叶群逃亡的事。这一下把江青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她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插话、提问，把“中毒”的事忘掉了。到晚上 11 点，周恩来好像随口插了一句：“吴大夫，你休息去吧。”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吴阶平就这样被“解放”了。

吴阶平在晚年回忆说：“那个时候为他们做保健工作非常难，其中最难的是两个人——江青与康生。康生自比为苏联的捷尔仁斯基，特别坏的是他的老婆曹轶欧，在白区做工作的，所以她看人个个都是特务。”于是，那时候，吴阶平只有面对现实，见机行事。

就在“九大”上林彪被确定为“接班人”不久，吴阶平突然得到通知，请他到林彪家中为林彪治病。怕风、怕光的林彪还怕水，那天没有洗脸，再加上体质虚弱，脸显得又脏又灰暗。原来是林彪患了阑尾炎，正准备到解放军总医院动手术，特请吴阶平来与解放军总医院的专家会诊。经过检查，吴阶平感到从体征和病像看符合阑尾炎特点，但是尿检发现白血球数量很多。吴阶平根据十几年前自己给林彪治疗的经验，建议林彪先不要动手术，在家里按尿路感染治疗，密切注意白细胞的变化。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早晨林彪的症状就消失了。林彪和叶群非常高兴，把整个治疗过程都及时报告给毛泽东。

吴阶平要离开毛家湾时，周恩来也赶来了。他一方面是代表毛泽东来看望林彪，祝贺他免除了动手术的负担，另一方面是来向医生表示感谢。周恩来笑着对吴阶平说：“你立了一大功！”并传达了毛泽东对吴阶平的表扬。

在那特殊的年代，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终于积劳成疾。1972 年 5 月

19 日，经过专家会诊，诊断周恩来患了膀胱癌。当时，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是中央领导小组及其领导下的一个医疗组。医疗组除了给周恩来治疗外，还要将周恩来的病情报告给中央领导小组，然后由他们再及时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中央领导小组成员是叶剑英、张春桥等，而吴阶平是医疗组的组长。

医疗小组成员一致认为，为控制周恩来的病情，需要动手术，于是给中央领导小组成员打了报告，而中央领导小组却认为，周恩来年事已高，又有心脏病，主张用中医保守治疗。因此，给周恩来动手术的报告迟迟未能批转下来。

1973 年 1 月 13 日凌晨，吴阶平刚上床休息，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敲门人是医疗组的方圻和卞志强。1 月的北京滴水成冰，两人却是满头大汗。等吴阶平走出房门，两位医生异口同声：“吴院长，总理今天早上出现肉眼可见的血尿。”当时，吴阶平只觉得脑袋“轰”的一声。他哑着嗓子说：“咱们得立刻把情况反映上去。”

医生们明白，中央领导小组真正关心周恩来健康状况是叶剑英。医生们拿着周恩来的血尿试管、化验单，驱车直奔西山叶剑英住处。叶剑英赶紧拿着装有周恩来血尿的试管报告了毛泽东。于是，中央终于批准了医疗组为周恩来手术治疗的报告。

在对周恩来进行膀胱镜检查的前一天，医疗组接到指示，大意是为了慎重起见，做检查、观察和治疗要分“两步走”。吴阶平认为，真要分“两步走”，很可能就永远没有第二步了。这时，吴阶平灵机一动，就对邓颖超大姐说：“如果我在检查的时候看见有一块小石头，顺便拿出来就不用再走第二步了。是否还要留着走第二步？”邓颖超说：“当然就顺便拿出来了。”

这是吴阶平第一次为了敬爱的周总理斗胆冒险。手术时，当通过膀胱镜确诊为膀胱癌肿块出血时，医生们便对病灶认真地做了电烧灼，缓解了周恩来的病情。很快，电话里传来了毛泽东的声音：“医生们两步并一步走做得好，感谢他们。”

作为医疗组组长的吴阶平强忍悲痛，竭尽所能地细心治疗，充分发挥各方面专家的特长，集中大家的智慧和意见，千方百计为总理治病。但因为病情的发展变化多，几种癌症先后并发。吴阶平和医疗组各位专家一起，尽最大努力查阅文献资料，把世界上所能提供的最先进的治疗方法、最好的药品都用在总理身上。三四年之内先后做过几次手术，有关泌尿系统的都是吴阶平主刀。几十年来他为各种患者做过数不清的手术，唯独为总理做手术不同，那小小手术刀似有千斤重，他高度集中，一丝不苟，一刀一剪，一针一线，慎之又慎，绝不放过任何细枝末节，出不得半点差错啊！

1975 年入秋以前，总理的病日益加重，医疗组的专家们明白已回天乏术，但仍尽一切可能，盼望还有延长总理寿命的可能。吴阶平和同志们不分昼夜地轮流守护在总理床前。令人撕肝裂肺的不幸时刻终于来临，亲切的周恩来总理永远离开了。弥留之际，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首先认出了吴阶平，说了他一生最后的几句话：“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们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看到这生离死别的场景，吴阶平刺心的悲痛！追悼会过后，邓颖超大姐把总理的亲属和医疗组全体成员找到一起，讲了一番异常恳切的话，特别对医疗组的专家们说：“你们该做的都做到了，我感谢你们！总理也感谢你们！”

没能治好总理的病，吴阶平和其他专家们一样，抱憾终生。每每有人问起周恩来病逝的情况，吴阶平的眼里总是溢出泪水，手似乎也在剧烈地

抖动着。这时，他的思绪完全回到了 1976 年那个寒冷的晚上。几十年来，吴阶平每每看到书房里总理像那慈祥的面容、坚毅的神态，以及蕴含着无穷聪明睿智的浓眉慧眼，一种抑制不住的亲切感和崇敬之情便油然而生。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中共中央决定对其遗体进行永久性保护。吴阶平是毛泽东遗体保护小组的成员之一，从 1976 年 9 月到 1977 年 8 月，吴阶平等在地下工作了将近 1 年的时间，完成了代号为“一号任务”的特殊使命。吴阶平曾回忆说：“主席逝世后，当时没有说要保护遗体，只是说上级要求，要想办法让遗体能够在追悼会期间被瞻仰。医生处理这种问题，一般是往血里注射防腐剂，可是注射防腐剂后脸会变色。后来又有指示——主席的遗体不仅仅要能在追悼会期间被瞻仰，而且要进行永久性保护。这就很麻烦，因为防腐剂已经打进去了，只能尽量地冲洗。”社会上曾有人质疑现在供瞻仰的毛泽东主席遗体是假的，吴阶平断然否定：“不是。现在供人瞻仰的毛主席遗体是真的。我们不需要用假的。”

吴阶平夫妇与邓颖超。吴阶平 供图

周恩来总理逝世后，邓颖超曾亲自到吴家串门，春暖花开时节总要邀

中国泌尿外科的奠基人吴阶平。

吴阶平一家到西花厅赏花叙旧。一次，邓大姐深情地对吴阶平的夫人高睿说：“吴大夫为党为人民做出了特殊贡献，他是咱们的国宝，你可得好好照顾他，不然我要批评你呀！”吴阶平夫妇笑开了……

吴阶平生前曾告诫退休的老人，不要完全闲下来，要继续接触外界，联系社会，还要适当训练脑体、思考问题，这是维持健康体格的重要条件。他身材不是很高大，却透着博大深沉的气质；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双眼睛，蕴蓄着追索和求实，闪烁着睿哲和刚毅。

2011 年 3 月，一辈子孜孜不倦的吴阶平停止了自己的思考，停止了自己的脚步，完成了一卷多彩的人生传记，读来耐人寻味……

第九章
工人收藏家收藏背后的特殊情感

走进周铁男那仅仅 13 个平方米的居室，似乎走进的不是一位普通工人的家，走进的是一个“陈列室”或小小“博物馆”。小小居室内，墙上挂的，桌上摆的，柜子里放的，都是关于周恩来总理的图书、画册、照片和纪念品；目光所及之处的依然是周恩来的“形象”，唯独难见的是周铁男自家的照片。

笔者慕名前往北京朝阳区他那套狭小的一居室采访，深深被眼前无“家”的感觉所打动。于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这位与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结下“不解之缘”的平民收藏家接受了笔者的专访。

一 迎宾时刻成为一辈子的珍贵回忆

周铁男出生在中医世家，祖父是我国知名儿科专家，父母都从事医务工作，父亲是知名的内科疑难症专家。从幼时起，父母和家人对周恩来的崇敬之情时时感染着他。

中学时代，周铁男就从不少的新闻和纪录片中，对周恩来银幕上的形象，产生了亲切之感与敬仰之情。那时候，他常常望着画册、报纸上登有的周恩来的照片在想，如有一天能够亲眼见到敬爱的周总理，该是多么的幸福啊！为这，他总是对当时在北京长安街附近上学的中学生们，充满了羡慕——因为他们常有迎宾任务，能够看到迎接外国领导的周总理。

这样的迎宾任务，终于分给了周铁男所在的学校一次。身为北京 74 中学学生的周铁男也荣幸地被选入迎宾阵容，高兴的他在知道消息的那天夜晚，久久不能入睡。有过唯独一次经历的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回迎接外宾的情景。那是 1973 年 11 月 18 日下午，作为中学生迎宾队伍的一员，15 岁的周铁男所站的位置是长安街一侧的公安部附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乘车从机场迎接来访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阮友寿。“当时，总理坐在红旗轿车里，车窗的纱帘打开着。我看到了总理，虽

周恩来和毛泽东交流。周铁男的藏品

然只是个侧脸，可我还是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因为我亲眼看到了我所热爱的周总理。”周铁男就这样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亲眼看见了人民总理周恩来的风采。第二天，周铁男把印有周恩来总理和阮友寿在机场合影的《人民日报》找到一张，收藏起来。伟人独具魅力的风姿、光彩照人的形象，深深感染、打动了他。从此，一种不断去了解周总理的渴求，触发了周铁男的收藏意愿。

40 年来，周铁男珍藏有关周恩来的文史资料有 80 余个门类，其中，收藏有周恩来生平的图片资料 10000 余件，有关周恩来的各种书籍 1000 余册、报纸 1000 余份，怀念周恩来的纪念品 50 余种，还有纪念章、手表、香烟、泥壶、VCD、录像带、录音带、头像雕塑等等，不一而足。在周铁男家里，只见酒柜里摆放的不是酒，而是周恩来纪念币、纪念章及有

周铁男收藏的与周恩来相关的藏品。

关周恩来的著作、邮票、书签、手迹图书等。难怪，有人讲，周铁男是中国民间收藏周恩来文史资料最多的收藏家。

四面几乎见不到白色的墙面，四壁悬挂着一个个镜框里，尽是周恩来一生各个时期的照片，其中，有周恩来生平最早的照片。在兴致勃勃的介绍中，周铁男还把前些年收集到的国内最早出品的一幅丝制周恩来标准像展示出来。据他介绍，这件由杭州都锦生丝织厂制作的、10×15 厘米规格的丝织品目前已极为罕见。

二 后悔没有目送总理

痴爱收藏，日积厚重。在周恩来在世的最后几年里，周铁男天天听广播，看报纸，巴不得天天能看到周总理的信息，可是那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千方百计阻止人民总理与人民见面的机会。后来，周铁男见总理在电视、报纸上露面时，面容憔悴了许多，心里着实难受。一直惦念总理的周铁男，一天蓦然听人说：“周总理得病住院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得他心里“咯噔”一跳。难受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国家的许多大事一起涌上心头……

1976 年 1 月 8 日，对全中国来讲，是一个黑色的日子。这一天，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了我们。消息传来，同许多寻常百姓一样，周铁男哭得泪流满面。令他至今仍感到不安的是，由于难知周总理的灵车西行的确切时间，他错过了站在长安街旁目送总理的机会。使周铁男庆幸的是，当时他用诗句记录下了民众护送总理灵车时的场景与心境：“灵车队 / 万众相随 / 长安街上撒满泪 / 哭别总理心欲碎 / 敬爱的周总理呵 / 您今晚几时归？！”

囿于当时“四人帮”的干扰，周恩来逝世后的一段时间里，关于对

他的追忆与悼念的报道在媒体上很少出现。“1976 年，周总理逝世，使我的收藏有了新的意义。但当时找一张总理的照片及有关资料非常难，‘四人帮’可恶，尽捣鬼。”周铁男对“四人帮”所为非常气愤，他怀着对周总理深深的悼念之情，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在文章中写道：“周总理不但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革命家，而且还是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卓越的军事家，敏捷的思想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实践家。”

“由于政治原因，对总理的宣传采取的是低调处理。当时我对逝世后讣告中的评价很不满意。为此，我自己草拟了一则悼词。平时不多说话的我，鼓足勇气站出来，在班上开的追悼会上念了。追悼会后，同学们都走了，我一个人仍在教室里哭。不久，我也投身到了四五运动中去了。1976 年 10 月，粉碎了‘四人帮’，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为了庆贺，为

周铁男介绍自己所收藏的相关的藏品。

周铁男（中）夫妇、韩福裕夫妇与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左一）在一起。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与总理有关藏品收藏家周铁男夫妇。

了告慰敬爱的周总理，我利用自己的收藏品在自己家里举办了一个展览，在屋里挂起了 100 多张周总理的照片。左邻右舍的居民，也一睹了一代伟人的形象与风采。”

自从迷上收集，周铁男的所有注意力便都放在周恩来总理的身上。他可以忘记自己、爱人和小孩的生日，但是，每年 1 月 8 日与 3 月 5 日还没到，他就会自言自语：“又是总理的纪念日了。”要再看一遍全国人民送别总理的录像带。这期间，他往往会到总理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去参观、学习，体验总理当时的环境。

在周恩来 100 周年诞辰的日子里，周铁男独立编辑完成了大型画册《大地之子——周恩来》，将浩浩两千余帧珍贵照片奉献给全国人民。这是迄今为止收入领袖图片资料最完整的一部专著，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与收藏者的关注。有一位摄影者向周铁男提供了几张照片，但周铁男在出版时没经他的同意在自己主编的画册上刊发了，便认为侵权要对簿公堂。出版社的编辑得知这一情况后，便找到这位摄影者说：“你到周铁男家去一趟后，你会看到一个朴实的民间收藏家。环看他的家全是关于周总理的藏品，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几十年来他就只置了几组书柜，这也是为了收藏，为了永恒纪念人民的总理。”这位摄影师得悉后，非常感动。这时，以上下集的画册相送，一切在理解中冰释前嫌。

这是周铁男收藏的周恩来图片之一。周铁男不仅收藏有关周恩来的资料或纪念品，而且注重研究周恩来、学习周恩来。

三 不能因一点失误 玷污总理的一世英名

小时候，周铁男家境贫寒，但为了收集周恩来的藏品，他想尽了办法。为了购买资料，他在父亲仅有的60元收入中，向父亲要钱订购了《人民日报》与《北京日报》，仅仅为了从上面可以得到周恩来总理的照片。他收藏关于周总理的资料简直到了入迷的地步，走遍了北京的图书馆、新华书店和各个旧货交易市场。有一次，他见到地上随风飘来一张印有周总理照片的报纸，马上跑过去拾了起来；见到别人垫筐的报纸上印有周总理的照片，立即找人要来，剪下来，精心收藏起来。

1978年3月5日这天，他早早起床赴王府井新华书店，花16元买一本精装的《纪念周恩来总理》，营业员不放心地叮咛他："可不能退啊？！"他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掏光了，最后连一毛钱的公交车都坐不起了，只能捧着画册高高兴兴走路回家。这一年他的月工资是18元。那时还能见到许多外国画报，像阿尔巴尼亚的、朝鲜的，那上面也常有周总理的照片。周铁男指着一张张周总理图片说："这里有好多都是从上面剪下来的。"

周铁男不断地把视线所及的周恩来照片及资料当成宝贝收藏。收入没多少的他，节衣缩食，甚至从此开始不吃早餐。成家后，虽然他肩上

的担子重了，但是他的收藏范围却还不断地扩大，涉及周总理的文史资料，诸如绘画、日历、纪念品等无所不包。

在采访中，笔者看到有份 1946 年 5 月 2 日出版的《新民报》，文章题目为：正候马（歇尔）帅专机来接（肩题），周恩来明可飞京（正题），邵力子否认中原紧张消息（副题）。内容说的是周恩来将自重庆赴南京与国民党谈判一事。周铁男说：“20 世纪 80 年代，我在旧货市场发现了这张旧报纸时，欣喜若狂，但售卖者也很刁，硬给搭售另一张旧报，共需 20 块，这相当我当年月工资的一半，我不假思索地掏了钱。”

直观上看，他的收藏举动确实特别，这种本是有关部门为研究、记录伟人生平而做的一项工作，却成为一位普通人表达对伟人热爱的情感与方式。由于周铁男与周恩来同姓，日子久了，面对他收藏的痴迷，有人就猜测，他兴许在血缘上和周恩来家族沾亲带故。其实，周铁男家族世代均与周恩来的家族毫无关系，他的这一酷爱与痴迷，皆出自本愿。“在姓氏上能巧合，与周总理相同，也是我一生的一个荣幸。”周铁男如是对笔者讲。

郑州大学一位叫郑毅涛的教授，得知周铁男的收藏事迹后，与他取得了联系 。老先生甚至研究了周恩来与周铁男的名字，说在笔画上一样多。周铁男试着一算，还真巧。如今，这位老教授与他已成为“鸿雁知己”。

白求恩的故乡——加拿大电视网有限公司首席记者董好莉女士在 1996 年 5 月 15 日带着翻译和随访人员，特地到周铁男家中参观访问，周铁男满屋“总理藏品”深深感动了她。“为什么一个普通工人对国家总理如此热爱？这在加拿大是没有的。”为了解开这个迷，她反复向周铁男询问：“你是一个普通工人，为什么花费如此多年时间和精力苦心收藏国家领导人的珍品呢？”“你是不是周恩来的亲属啊？”“你是不是

这是周铁男的藏品之一。周铁男说，自己收藏的是人民对周总理的敬仰与缅怀之情。

因为和周恩来同姓，才有兴趣收藏周的珍品？”周铁男饱含着对周恩来的情意，深情地说：“我与周总理同姓是真的，但非亲非故。周总理是全国人民的亲人。我的收藏是人民的收藏，感情的收藏，是为了我们对周总理寄托永恒的怀念！”

周铁男展示自己的相关藏品。

当谈到白求恩时，董好莉说：“在加拿大，知道白求恩的人没有中国人那么多。”周铁男说：“白求恩是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在中国教科书上有他的位置，中国人崇敬他，是因为白求恩是为人民服务的化身。周恩来总理 1938 年 1 月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就会见了他，我这里还珍藏着周总理会见白求恩的油画呢……”

当访问结束时，周铁男特地将周恩来和邓颖超 1946 年在延安窑洞前的合影赠给了董好莉。她一面致谢，一面说：“我太激动了。你的收藏品对中国来说是个宝。我要把你送给我的周恩来照片，放在我的工作室里……”

在周铁男的藏品中，不少已属稀珍文物了。如 1950 年 3 月 5 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毛主席周总理访苏返京》一文，并配有大幅照片；1954 年首次发行的周恩来油画标准像，现在还见不到第二幅；56 枚连版、印有周恩来题词“传邮万里，国脉所系”的纪念邮票；杭州丝绸厂特绘

制的周恩来绣像……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他的家里是一个真真切切的“周恩来世界”，是一个难得的“周恩来藏品展览室”，让人目不暇接，令人回味不尽。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对于自己收藏的每一件藏品，周铁男都能讲出一个故事。正因为如此，现在有许多写周总理的作者在出书前都来找他借资料，作鉴定，他也总是有求必应。当然，有时也难免得罪人。

有一年，周铁男收藏了一套有关周恩来的图集，在翻阅中周铁男发现其中竟有 50 余处错误。他赶紧给出版社打电话，当时对方根本不把他这个普通读者放在眼里，于是他就一级级上告，直到出版社认错为止。

还有一次，周铁男收看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专题片《伟人周恩来》，发现一处画面说明有误后当即找到制片人要求更正，制片人坚持说片子经过有关部门多次审查不可能有问题，且几十位专家在片子播出前组织观看了。但事实证明，片子中确有错误。这位制片人终于服气了，对周铁男刮目相看，在片子翻译成外文之前及时做了更正。为向这名工人的指正表示感谢，该片负责人赠送给他一套电视录像带。自此，这位制片人与周铁男成了朋友。

“我并不在意别人是否看得起自己这个工人出身的收藏家，但我决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写周总理的书有错、记录总理的片子有误。那是对总理的不敬！”在采访中，周铁男十分认真地说，“周总理最注重外交，举世公认，不能因为我们的一点失误玷污了总理的一世英名！”

周铁男凭借丰富的积累，也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研究工作。他发现，对周恩来一生中各个历史时期的任职情况尚无人系统研究；而周恩来一生的任职经历对人们认识他全面、卓越领导才能的形成过程有很大帮助。为此，他凑了数千元购买大批史料，用了 3 年多时间，整理出周恩来一

生曾出任的党政军职务及社会职务 511 个，比权威的《周恩来辞典》中多 200 多个。其职务之多、涉及面之广，在我党历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罕见。经专家指点，周铁男写就了近 10 万字的《周恩来任职录》。某大学一位年逾七旬教授得知后，写信表示愿出资支持周铁男出版这一填补周恩来研究一项空白的书。

周铁男也曾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专家提建议，希望对周恩来的军事成就加大研究力度，多出版这方面的书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周恩来研究组组长力平同志回信予以了肯定。

1996 年，中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思想理论研究会，“淮安周恩来研究会”负责人在会议上同周铁男会见后，当场决定破例吸收他为第 70 位会员。要知道，前 69 位会员都是专家，只有周铁男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工人。

四 用心去怀念一代伟人

周铁男的举动，深深感动了周恩来的亲属和昔日好友、部下，以及研究周恩来的专家学者等 。他们认为，民间收藏周恩来的资料越多，说明周恩来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几位周恩来生前身边工作人员也主动与周铁男取得联系，无偿提供多年精心保存的珍贵资料。 曾跟随周恩来几十年的卫士长成元功获悉周铁男的收藏后非常高兴。老先生不顾年事已高，携夫人硬是从大老远挤公共汽车，特意登门造访，非要亲眼一识周铁男“真面目”不可。面对周铁男满屋的藏品，老人兴奋、激动得落泪了。随后，周恩来前卫士韩福裕也专程来周铁男家中参观其藏品。

一次周铁男的母亲在户外晨练时，结识了周恩来的贴身警卫刘玖洲。刘玖洲听了周铁男的收藏故事后，便拿出珍藏多年的自己与周恩来和邓颖超于 1951 年在万寿山的合影照送给周铁男。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周秉建闻知周铁男的收藏后，十分感动，表示以后遇到收藏有困难尽管言语，一定竭力相助，并适时邀请他去毛主席纪念堂周恩来陈列室参加亲友纪念活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的每位专家都与周铁男座谈过，

周铁男的收藏展。

得知他的经历后，这些专家把《风雨四十年》等书籍及《伟人周恩来》录像带无偿提供给周铁男，为的是让他省点钱买其他所需资料——这令他好生感动。

后来，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周铁男，国内外都有人想方设法找他，表示愿出高价买他的藏品。尽管他清贫，可是他说多少钱也不能卖，因为这些藏品属于人民，不能从中赚一分钱。如果让这些珍贵资料染上铜臭，就违背了他收藏的初衷。生活拮据的他说：“给我一百万交换这些藏品，我也不干！”

而有关研究部门、专业收藏单位找他时，他每次总是尽力提供藏品，

从不考虑报酬。1996 年 6 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天津建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的消息传出后，他表示愿提供有关资料充实馆藏，多次自费将照片资料批量运抵天津，供人翻拍、复印 5000 余张。此后，他还利用双休日去天津帮对方整理图片说明，同样不要报酬。

近年来，慕名而来与周铁男倾谈周恩来，表达敬爱之情的四面八方的信件，连绵不断，越来越多。至今给人提供了多少张照片参展、帮多少人复印过多少资料、回过多少份信函，周铁男已经记不清了，但有一点他很清楚，自己没要过人家一分钱，就是应邀办展览，也全部是自费。

“靠倒腾藏品赚钱的是贩子，可我是收藏，所以我从来没想过钱的事。照片不是我拍的，我没理由要钱；人民热爱总理，我不应该要钱。我的收藏取之于民，应该用之于民。仅 1998 年，总理百年，我给各地洗照片

周铁男的藏品室。

便花了 1000 多块。我收藏的是人民对周总理的敬仰与缅怀之情。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收藏，也是人民的收藏，是对总理无比热爱的感情收藏！”

采访中，周铁男谈自己很少，讲总理很多，仿佛在给我们做报告或上政治课，很地道，很专业。可是，无意中笔者得知周铁男还是非党员，尤为吃惊。他说：“收集资料，应该没有意识形态或政治面貌的选择。我认为，总理是人民的总理，作为老百姓的一员，我热爱自己的总理。我虽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但我关心党史，热心学习党史，周恩来的历史，便是党史的一个缩影。我认为自己同真正的共产党员差距很大，同党员标准还有一段距离。我会努力靠近的，做一个合格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1998 年 3 月 5 日，周恩来百年诞辰纪念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在天津风光旖旎的水上公园建成开放。周铁男知道后，高兴不已，激动得落了泪——不仅仅因为该馆收藏了从他那儿翻拍、复印的大量资料。

由著名电视艺术家、周恩来的侄媳邓在军出任总导演的大型电视片《百年恩来》拍摄中，采访了 300 多位当事人，挖掘了大量的珍贵资料、文献档案，实拍遍及周恩来战斗 、生活、工作过的地方，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身为工人的周铁男也被摄入了镜头，向人们倾谈他的收藏，表达自己对总理的深深热爱与敬仰之情：“我要用心去感受一代伟人，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

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周恩来总理侄女周秉德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讲：“周铁男，一个经济收入不宽裕的普通职工，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不计名利地执着于有关我伯父周恩来的资料的个人收藏，的确是一件难能可贵而又极不容易的事。他的这种行为，正如他自己所说，不是对周恩来的盲目崇拜，而是出于他思考后对总理的自觉热爱。”

对于周铁男的收藏，许多权威人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有关专家认为，

周铁男收藏之多、范围之广，在国内实属罕见。他的展品显现了他从敬仰到收藏、学习、研究的过程，这已超出一般收藏的单一内涵。

在收藏中，周铁男注重研究。他从自己珍藏的 1 万多张周恩来不同时期的照片中精挑细选 50 多张总理戴多种帽子的照片，编辑成 4 个大相框，通过这些照片展现总理丰富多彩的生活片段。从中，他还归纳出总理一生中的 10 幅标准像，并能从任何一幅中说出当时成像的年份，让笔者无不折服。

不知不觉，专访已近 5 个小时，该结束采访了，因为作为机修工的周铁男还要加夜班。临别时，他对笔者说：“周恩来总理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他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高尚情操、优秀品质于一身，为我们怎样做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希望更多的人，包括其他国家的人，知道周恩来，了解周恩来，学习周恩来，研究周恩来。”从他朴实而不失内涵的话语中，笔者找到了周铁男热衷周恩来文史物品收藏的真正答案。

周铁男向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负责人赠送有关周恩来的纪念品。周铁男 供图

周铁男向参观的嘉宾介绍收藏的有关周恩来的老报纸。周铁男 供图

第十章
生命的最后时光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噩耗传出，举国哀痛。

遵照周恩来的遗愿，他的骨灰被撒入北京、天津以及山东北部黄河入海口等处。周恩来逝世后，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政府和政党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对他为中国和世界所做的巨大贡献，表示深深的敬意。

这些年来，每年的1月8日或3月5日，周恩来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会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或在某处举行有关活动纪念周恩来。周恩来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最后一次手术、最后一次刮脸、生前的最后一句话……成为身边人永远的记忆。

一 病房内两位老战友常常促膝谈心至深夜

1975 年，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过之后，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经肠胃镜检查，除了以往的膀胱癌，又新增添了结肠癌。1975 年 3 月底，周恩来做了次大手术。

手术后，躺在手术床上包扎着伤口的周恩来刚醒过来，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人民的身体健康问题。当医护人员看到总理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微微抽动要说什么时，他们俯下身去，听到的是要找李克农的二女儿、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副院长李冰。

刚出手术室的李冰被召唤回来，侧耳俯身，贴近周恩来的唇际。“云南，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周恩来断断续续，讲完这句话，鼻凹处已经沁出汗。

因为云南锡矿工人有很多硅肺，硅肺可能转变成肺癌。周恩来知道癌症的痛苦，也知道硅肺工人的痛苦。听后，李冰用力抿紧嘴唇，点点头，喉咙壅塞着哑声地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她强忍着不让泪水在周恩来面前流出来，不敢久留，匆匆退出手术室。一到走廊，李冰再也抑制不住，放任眼眶里的泪水流淌下来。

其实，早在1971年2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代表时，就要求李冰他们树雄心、立壮志，攻克肿瘤难关，还说：“我看，你们还是到下边去调查好。”特地提到河南林县和西北地区的食道癌多的问题。后来，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科研人员走出了高楼深院，下到农村、工矿，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调查食道癌的发病情况。科研人员还特地绘制了一张我国食道癌高发区发病分布图。周恩来听到调查汇报后，十分高兴，并将这张图一直留在自己的办公室，他多么想将肿瘤发病区一个个地从图上抹掉……

这时，邓小平开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已经肆虐了9个年头，全国政治经济形势非常混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面对这种状况，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意见，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明确提出了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大刀阔斧地对全党和全国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整顿。

在邓小平雷厉风行地实行全面整顿的同时，周恩来在医院里与邓小平会见、谈话的次数也更加频繁，每两周就有一两次见面。病房内，两位老战友促膝谈心，共商国是，常常谈至深夜。此外，周恩来还时常找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国务院有关负责人谈话，了解各项工作情况，要求他们支持邓小平领导的整顿。

对于邓小平等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复出任职，“四人帮”心怀不满，掀起批判“经验主义”的恶浪，进行打击报复，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经验丰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服务。

对“四人帮”搞“反经验主义”的居心，邓小平洞若观火。当4月

上旬江青、王洪文找政治局一些成员谈“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时，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明：这是在政治局内一个一个动员反总理。

4月18日下午时，邓小平陪同刚从外地回京的毛泽东会见金日成后，利用这个机会反映江青、张春桥“反经验主义”的情况，并明确表示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说法。毛泽东当即赞同邓小平的意见。

4月20日，姚文元把他指使新华社写的一份强调“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自觉克服经验主义”的请示报告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送审的这份请示报告上，写下这样一段批语：“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并指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据此，毛泽东要求将“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4月27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叶剑英、邓小平等在发言中严词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反经验主义”的错误，并对江青在1973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进行其他“四人帮”宗派活动的问题提出尖锐质问。江青不得不在会上作了检讨。但是，会后他们就赖账了。

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诬告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总是把形势说得漆黑一团，说叶剑英、邓小平想把江青一棒子打下去，所涉及的问题都同“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联系在一起；王洪文还诬蔑说：政治局上的这场争论，实际上是叶剑英、邓小平他们把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说出来，目的是翻过去的案。

4月29日、30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先后同邓小平、华国锋等谈话，

了解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

5 月 3 日晚，毛泽东亲自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召集和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夜 23 时，政治局成员陆续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周恩来也抱病从医院赶到。

毛泽东对江青一伙大反“经验主义”和大搞宗派活动提出严厉批评。他说：“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当着全体政治局成员的面，他告诫王、江、张、姚：“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 200 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会议的紧张气氛，在毛泽东转入谈古论今以后才缓和了下来。周恩来说：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主席休息一下。于是，到会人员一一同毛泽东握别。毛泽东同王洪文握手时，王洪文表示：按主席的指示办。毛泽东做了个翻过来翻过去的手势，告诫他：“你不要再这个样子了！”

第二天，周恩来在医院同邓小平商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需在政治局内进一步批评“四人帮”。随即，他伏案写下书面意见，表示支持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随后，周恩来不顾身体极度虚弱，亲笔起草了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等。

二 一生中的最后一次签名

周恩来的病情更加严重，但他仍忘我地顽强抗争着，夜以继日地工作。5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在散步时，问身边的医护人员：“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医护人员一怔，马上竭力绽出笑，想用几句轻松的安慰话搪塞过去。

周恩来抬眼望天空，坦然地笑了。

他长长吁口气，渐渐收去笑容，换上一种严肃神情，重新望着医护人员：“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随刻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

即便是演员，面对周恩来这样严肃而又坦诚的目光，也是无法做戏了。医生眼里陡地涌起一层泪花，声音哽咽、颤抖：“怎么讲呢？总理，您叫我们怎么说……”周恩来脸上恢复一丝不易辨清的浅笑，缓缓点头；极轻极轻地说出一声：“不用说了。”

随后，他同侄女周秉德通电话，在谈到生死问题时说：“这有什么难过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

早在十几年前，周恩来就同邓颖超共同商定，相约死后把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这次在得知自己的病已不能挽救时，他又一再叮嘱，不要保留他的骨灰。他坚信唯物主义的观点：物质不灭，生息不已。他郑重地对邓颖超说：“我死了以后 ，我的骨灰不要保留，拿去作肥料。死后不要增加活人的麻烦和负担，而且也许还可以起点为人民服务的作用。我们以前相约好了，要相互保证。我可以保证你，你未必能保证我。”周恩来十分理解邓颖超的心情，为了实现自己的要求，他把自己的这种想法也对身边工作人员赵炜讲了。

但是，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十分清楚自己责任的重大，党和人民迫切地需要自己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在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的时候，他只有加倍地工作。为此，在 3 月至 9 月间，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以重病之身与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 102 次，会见外宾 34 次，离开医院外出开会 7 次，在医院召开会议 3 次，外出看望人 4 次。

6 月 9 日，周恩来坚决拒绝了所有医生的劝告，理发修面，拖着沉重的病体，同夫人邓颖超一起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参加为贺龙元帅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并亲自代表中央为这位含冤离开人世的战友致悼词。他百感交集，一连向贺龙的遗像鞠了 7 次躬。他为没有保护好与自己患难与共的战友而歉疚，也为生前能为贺龙平反慰藉。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所致悼词以及举行仪式的消息均未公开发表。

7 月 1 日，周恩来出席在北京医院举行的中泰建交签字仪式，同泰国总理克拉·巴莫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当时，一部分工作人员趁摄影记者还在，围住了周恩来，请求同他合影留念。周恩来答应了，但表示：“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画 XX。”一句话，说得大家心情沉重得都抬不起头来。

1970 年 5 月 20 日，周恩来、邓颖超和身边工作人员合影。杜修贤 摄

果然，一个多月以后，风浪再起。这年 8 月，毛泽东和文革派突然发起“评《水浒》运动”，说宋江受朝廷招安，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江青说得明白：“评论《水浒传》的要害是架空主席。”“宋江要架空晁盖”，“党内就有宋江”，指桑骂槐地攻击当时主持中国党政工作的周恩来和邓小平。

一次，周恩来对蔡畅说：“我周恩来绝不是投降派！”他指责说：他们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就在江青一伙起劲地掀起“评《水浒》”浪潮的时候，周恩来病入

1975 年 9 月，周恩来在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伊利耶·维尔德茨。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膏肓。这年 9 月 7 日，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周恩来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周恩来颇为感慨地回首当年：“时间过得真快，就在 10 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去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 4 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 4 分钟也走不了！”

在这次会见之后，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由于癌症的消耗，他的体重由原来的 130 斤下降到只有几十斤。在病痛的折磨下，他连散步的

力气也没有了。邓小平果断地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9月20日，医生不得不对他进行再次手术。

这是一次大手术，如果发生意外，他躺在手术台上将永远不会起来。周恩来意识到这一点，也意识到江青正咄咄逼人。为了防止后患，他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嘱令秘书调来那份他在1972年6月23日关于“伍豪事件”专题讲话的录音整理稿，用颤抖的手，在第1页上签了名，还写了：“于进入手术室，1975年9月20日。”病重的他，漏写了“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前”字。

他签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间的重要文件，也是他一生中无数次签名中最后一次签名。

签名后，他让邓颖超交给有关部门存档。他在这样的时刻，仍不忘那份讲话稿，表明了他对江青的严重不安。他知道，江青会闹事，会抛出“伍豪事件”往他脸上抹黑。

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躺在平车上，问身旁的工作人员：“小平同志来了没有？”邓小平立即上前，俯身向周恩来问候。周恩来久久注视着几十年风雨同舟的老战友，费力地伸出手，紧紧与邓小平的手相握，字字千钧地说：“你这一年干得比我好，比我强得多！”

在被推着往手术室走时，他突然使尽全身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周恩来的声音，在场的人都听到了。大家都明白，这是周恩来对邪恶势力的控诉，他签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间的重要文件，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签名。

三 完全靠输液以维持生命

10 月 24 日，周恩来又做了一次手术。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有能够起来。作为一个已经战斗了数十年、饱经风霜的政治家，他虽然躺在病榻上，但仍然十分关注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担忧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开始他还可以强撑着自己看报，后来便只能依靠医护人员读报了。

叶剑英经常到医院，既谈工作，也谈点其他的，陪周恩来减轻病痛。一次，周恩来对前来看望他的叶剑英等殷切嘱咐：“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

在周恩来病情恶化的日子里，毛泽东的病情也加重了。这年七八月间，毛泽东的一只眼睛，由北京广安门医院眼科大夫唐由之施行手术。手术是在毛泽东住处做的。动手术时，周恩来不顾病体，和邓小平一起在外间守候。手术很顺利，不久，毛泽东的一只眼睛复明了。

癌症的晚期是十分痛苦的。周恩来以极大的毅力同疾病进行顽强的斗争。每当难以忍受的病痛袭来的时候，他就紧紧地握住医护人员的手，一声不吭，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每咽一口饭，他都要付出极

大努力。为了党和国家的大局，他决意要顽强地活下去，哪怕是多坚持一天也好。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多吃几口，来，给我数数。”当费力地咽下一口后，他念叨着：“一！”又咽下一口：“二！”……

邓颖超每天都要到医院看望，因为她知道周恩来来日无多，她便尽量给他以安慰和温存。尽管邓颖超此时也遭受着高血压和眼结膜下水肿出血的痛苦折磨，但她依旧保持着往日的镇静和坚强，不给周恩来增加任何思想压力。

12 月中旬，周恩来已经不能进食了，完全靠输液以维持生命。癌细胞已经广泛扩散，剧烈的疼痛常常使得他晕了过去。为了减少他的痛苦，医生不得已动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叶剑英对吴阶平等医务人员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 1 天就延长 1 天，哪怕是多延长 1 小时 1 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

12 月 20 日早晨，周恩来的体温 38.7℃，仍然在病榻上吊着输液瓶子的他提出约见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罗青长谈对台工作问题。按规定，只有政治局委员才可以去探望周恩来。当时，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阻挠罗青长面见周恩来，邓小平听到这一消息，发话：“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

当罗青长驱车赶到医院时，周恩来正陷于昏迷状态。于是，他在外面等着，眼泪直往心里流，为总理的生命担心，为总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操心国家大事、关心台湾问题的解决而心痛。邓颖超这样叮嘱：“恩来病得很重，你要有思想准备，见了他不要太难过，一定要克制。他对外面的情况不太了解，你多听他讲。”一直等到中午，周恩来苏醒过来，罗青长在床前坐下。周恩来低声说：“青长同志，想不到我一病，就病

成这个样子，今天还能见到你……”听到这里，罗青长还是忍不住泪眼模糊，声音哽咽，但想起邓颖超事前要自己坚强的叮咛，他强忍悲痛，抑制着感情，连声对周恩来说：“党政军的同志们都问候您，全国人民都关心您，希望您早日恢复健康。”周恩来会意地点点头。

看得出，周恩来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凝聚起体内的最后一点精力，顽强地支撑着，听他汇报台湾的有关情况。前些时候，当他知道张学良眼疾几乎失明时，十分焦急，向有关部门询问张学良的病情，嘱咐罗青长一定要设法关注张学良。并说，蒋介石死后，蒋经国会怎样？要深入细致地研究台湾问题。周恩来在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和在台湾的老朋友后一再嘱咐：“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遂再次陷入昏迷。

经医生抢救，周恩来再度苏醒过来时，他对罗青长歉意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 10 分钟再谈。”听到这里，罗青长再也忍不住了，背过脸去，泪如雨下，心想：总理病到这种程度，还一心想着工作，他的心里只装着祖国和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罗青长守候在周恩来的病房旁，一直等到下午 1 点多钟，周恩来才苏醒过来，但神志已不十分清楚了。罗青长只好依依不舍地向他告别，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成了终生的诀别。

12 月底的一天，周恩来的精神好了一些，邓颖超轻轻地把他扶起来斜靠在枕上。看上去，周恩来的心情似乎不错，他用手摸摸脸上的胡茬说：“小超呀，我这脸不知成什么样子了，真想请朱师傅来帮我清洁一下。”

周恩来所说的朱师傅叫朱殿华，是北京饭店的理发师。他给周恩来理了 20 多年发，一般情况下，周恩来总是自己到饭店去理发，有时因为工作忙，或急需接待外宾，他才派人把朱师傅接到家里来。周恩来对朱师傅十分尊重，从不埋怨或指责，每次朱师傅走进屋来，周恩来总是说：“老

朱，又让你跑一趟，该耽误你的工作了。”每次朱师傅理完发，周恩来总会说：“谢谢！”

前些年，有一次，朱殿华去西花厅给周恩来理发，刚刮了一半脸，周恩来突然一咳嗽，朱师傅没提防，在他脸上刮了个小口子。朱殿华心里一紧张，不知如何是好。周恩来见状安慰他说：“这不怪你，怪我咳嗽没有向你打招呼。还幸亏你刀子躲得快。”为减轻朱师傅的思想负担，周恩来那天特意留他吃了晚饭再走。

周恩来住院后，朱殿华定期去医院为他修胡刮脸。可是到 1975 年底，周恩来病情加重后，朱殿华已经将近一个月没有去了，周恩来的胡须长了，他想见见朱师傅，请他为自己修修面、理理发。秘书似乎看透了周恩来的心思，忙问：“是不是请朱师傅来一下？”周恩来想了想，叹口气，又摇摇头说：“老朱给我理了二十几年发，看到我病成这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吧。”听到这里，身边的同志一阵酸楚，扭过脸去。

病情加重后，周恩来完全卧床，大便需要别人帮忙，但是他从来不让女护士为他帮忙。邓颖超劝他说：“这是她们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再说，你可以把她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啊。”但是，周恩来坚决不肯，以示对女同志的特别尊重。

四 佩戴黑纱的政治局委员们依次走进来

1976 年元旦，毛泽东于 1965 年写的两首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发表。邓颖超带来这两首词，并请秘书给周恩来朗诵。重病中的周恩来显然十分欣赏这两首词，多次让工作人员念给他听。当听到工作人员将词中的字音念错时，他马上给予及时纠正，听到有趣之处，他会轻微地笑笑，偶尔还议论几句。

元旦过后，尽管医务人员进行了全力抢救治疗，但周恩来的病情仍在继续恶化，生命垂危。处于病痛极度折磨之中的周恩来要来《国际歌》唱片，用微弱的声音低吟，并对守在身边的邓颖超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1 月 6 日，周恩来做了回大手术，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手术。

1 月 7 日晚 11 时，当医生们来到床边进行治疗时，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微微睁开眼睛，凝视了一下，认出了其中的吴阶平，声音极为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生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1 月 8 日上午 9 时 57 分，周恩来在与病魔的搏斗中耗尽了生命的最

后一丝精力之后，怀着对许许多多造福于人民的美好设想，怀着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深深的关切，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离开了人世。

上午 10 时，毛泽东正侧卧在病床上，听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昨晚他几乎彻夜未眠。负责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耀祠匆匆忙忙走进毛泽东卧室，他带来的是周恩来逝世的噩耗。

屋里沉寂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毛泽东只点点头，一言未发。对于他来说，周恩来逝世，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了。几年来，从医生一次又一次的诊断报告中，他预感到不妙。

过了良久，毛泽东目光滞惘地仰视着天花板，语无伦次地喃喃自语："走了，他也走了。"说罢，不禁潸然泪下，唏嘘而泣。

很快，中央一些领导同志来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最先来的是邓小平和李先念，其他人也陆陆续续走进来。江青来得最晚，可她一进门就在走廊里喊："大姐在哪里？大姐在哪里？"这时，邓颖超走出去，江青上来拥抱大姐，嘴里不知说些什么，谁也不知道。

上午 11 时，中央领导同志到齐了，邓颖超向在场的中央领导同志转述了周恩来生前提出的 3 点请求和她个人的意见："一、他十几年前的意愿，请求不保留骨灰，将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二、不要特殊，不要超过任何人（这是指对他的后事处理）；三、不要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对恩来同志的丧事要从简，数九寒天，群众太冷，死者什么也不知道，所有的一切只是为了给活人看，浪费人力、物力。上述 3 点请求报告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对恩来的丧事一切由组织决定，我个人没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希望能满足恩来同志的要求。"

邓颖超说完，李先念说："对总理不能不搞追悼会，今后如果不搞追悼会，现在也不能拿总理开刀，这是违背民心的事，我们无法向人民群众

交代。”紧接着邓小平说：“我同意先念的意见，追悼会一定要开的。”

很快，大家取得一致意见：悼念、告别、追悼会应该搞，一切都待请示毛主席最后决定。

周恩来的遗体，经过精心整理，于当日 12 时许转送到北京医院。

早在周恩来病情危重之际，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就受中央之命起草了有关总理逝世的讣告和悼词。周恩来病逝后，周启才又与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一起，对讣告和悼词初稿着手进行修改，并列席了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两个文稿的会议。

1 月 8 日下午 3 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讨论治丧办公室提出的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治丧委员会名单，遗体告别、吊唁活动和追悼大会方案等。会议由邓小平主持。经过讨论，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讣告。接着，讨论通过了治丧办公室提出的周恩来治丧委员会名单，遗体告别、吊唁活动和追悼大会方案等。随后，邓小平问汪东兴：“悼词准备好了吗？”汪东兴说：“在总理生前准备了一个初稿，正在修改，还没改好，今天会议讨论不成了。”邓小平说：“那就等修改好了另找时间开会讨论。”

在讨论周恩来丧事过程中，“四人帮”十分猖狂，他们极力压低周恩来的治丧规格，对治丧办公室提出的有关治丧方案和建议横加斥责。如治丧办公室提出请外地的李德生、许世友、韦国清和赛福鼎 4 位政治局同志来京参加周恩来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的建议时，江青、张春桥厉声厉色地责问：“你们什么意思？你们是不是还要把京外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也都叫到北京来呀？”当治丧办公室提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吊唁活动，时间安排 5 天，人数安排 6 万时，“四人帮”极力反对，硬是把时间压缩为 3 天，人数压缩到 4 万。

周恩来讣告和治丧委员会名单，报经毛泽东批准后，1月9日在全国各大报纸头版整版登出，当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反复向国内外进行广播，沉痛宣告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这一不幸噩耗，如晴天霹雳震惊了中华大地，举国上下顿时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国际社会也对这位备受世人尊敬的伟大政治家的逝世深表哀悼。

1月9日晚上11时30分许，理发师朱殿华给周恩来刮最后一次胡子。他边刮边哭，刮在总理的脸上，痛在自己的心里。元旦前，自己多次要求为周恩来理个发、修修面，让周恩来光光彩彩地过个新年。但是，周恩来怕朱师傅看到自己的病态难过而没有同意。想到这些，朱殿华哭得更厉害……

1月10日上午，北京医院，太平间大厅。哀乐低回，哭声起伏。周恩来神态安详地仰卧在一张白布平台上，挺直的躯体覆盖着一面鲜红的党旗，四周摆着一簇簇洁白的马蹄莲，两名手持钢枪的战士肃立左右。佩戴黑纱的政治局委员们依次走进来，朱德、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江青、陈锡联、姚文元……每个人都在周恩来的遗体前肃立默哀，鞠躬诀别，随后绕灵床半周，从侧门退出去。

佩戴着黑纱的邓小平随着低沉的哀乐慢慢走进大厅。他眼中没有泪水，神情显得凝重而平静。他走到灵床前，默默地望着闭目而卧的周恩来，久久不肯离去。他仿佛在静静地等待，等待着总理会和往常一样坐起来，微笑着向他伸出手；等待着那个熟悉的声音：“小平同志，你好！”他仿佛在静静地聆听，聆听着周恩来那语重心长的叮嘱和期望；他仿佛在静静思考，思考着要向总理汇报哪些工作，商讨哪些事情。是啊！他心里还有许多话要向总理倾诉，还有许多事要向总理请教，他忍不住轻轻唤了声：“总理！”

1976 年 1 月 10 日，周秉德、周秉建向伯父周恩来遗体告别。

周恩来沉睡着安然不动。陪同的秘书小声提醒：“首长，走吧，后面还有好多人等着向总理告别。”

终于，两颗硕大、晶亮的泪珠沿着邓小平棱角分明的脸颊缓缓地滚淌下来。他向着周恩来的遗体深深鞠了三躬，绕过灵床走到门口，忽然又返了回来，抓起周恩来放在胸前的右手用力握了握，随后转身大步走去。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后边，是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的各界代表，黑压压的人群排成长蛇队，在狭窄的太平间过道内缓缓地移动着。

政治局委员们被让进一侧的休息室。江青一进门就倒靠在沙发上，捶着大腿呻吟：“哎哟！我的两条腿都站肿了！”叶剑英走到她面前，语气严厉地责问：“江青同志，刚才向总理告别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摘帽子？”

江青脖子一扬，嘻嘻笑道：“我感冒了，正发高烧，不能受凉呀！”老态龙钟的朱德用力敲打着手杖，愤愤地说：“感冒了就不要来嘛，你这个样子，让群众看见很不好。”

江青骄横地翻翻眼皮：“这有什么不好？难道总理去世了，把我也要折磨死！”坐在一旁的张春桥也不满地摇摇头，扭脸对姚文元果断地说：“朱老总说得很对，文元同志，你马上通知电视台，今天晚上播发消息时要把江青同志的镜头剪掉。”

姚文元胆怯地望望江青，见她没反对，便点头答应了一声。

周恩来遗体旁边摆放着邓颖超献上的花圈，飘带上款写着“悼念恩来战友”，下款写着“小超哀献”。邓颖超带着坚定刚毅、从容镇静的神情，为周恩来守灵。她穿着已经褪了色的黑服和一双家制的布棉鞋，站在周恩来身旁。看得出，她忍着内心极大悲痛。

五 总理悼词诞生的前前后后

郭连江，出生于河北邯郸，曾任北京卫戍区某部战士、通讯员、副班长、班长等职。郭连江在邯郸曾接受过笔者的专访。

退休后的郭连江每次到北京，一定要在天安门广场这里走一走，毕竟自己曾在这里及周围区域的岗哨上以军人的身份执勤过近 8 个年头。如今，每当他漫步在天安门广场，仰望高高飘扬的“祖国第一旗”，欣赏四周那宏伟的建筑，感受那磅礴的气势，就会从心底涌起一种激情。在“祖国第一哨”上，他经历了许多重大国事风云。有关红色往事的记忆尽管零零碎碎，但是不变的是那永远的红色情结。

这天上午，天安门地区的警备骤然升级，所有不知情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在凛冽的寒风中传来噩耗，郭连江与战友们都哭了。“大家望着天安门广场，泪如雨下。每位战士都明白，周总理再也不能与国宾同乘敞篷车在天安门广场与欢迎群众同欢乐了，再也不能不分昼夜前往人民大会堂处理内政外交事务而在天安门广场四周的路上来回奔波了，我们再也不能为这位共和国首位总理站岗上哨、执勤警卫了。用‘日理万机’

来评价周总理每天繁忙的工作再恰当不过了，无论酷暑寒冬，不管是中午还是深夜，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总理的车从天安门前匆匆驶过，我们担任路线警卫的同志都向从眼前驶过的总理车致以深情的注目礼。”

这天下午，郭连江和战友把平时衣袖上的臂佩红色执勤袖章换成了黑色袖标。郭连江站在天安门广场东北角的马克思、恩格斯伟人像下执勤，望着天安门广场哭泣的人群，回顾前几年周总理在天安门广场迎宾时的英姿，不禁潸然泪下。

郭连江 20 世纪 70 年代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1 月 11 日下午 4 时 40 分，寒云低垂。在几辆前导车的指引下，周恩来灵车从北京医院开出。灵车四周挂着黑黄两色的挽幛，上面缀着白花，庄重肃穆。后面跟着邓颖超、汪东兴和治丧委员会工作人员及一些老同志坐的车辆。

这天下午，郭连江所在连队按照上级

百万群众在长安街上哭别周恩来。

安排，被抽调部分兵力到天安门前执行周恩来遗体到八宝山火化的警卫任务。郭连江清楚地记得：“我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东侧的长安街北路沿上，战友也与我一样站在天安门东观礼台到南池子胡同口一线排开，负责周总理灵车通过时的安全，维护现场秩序。”

郭连江和战友布哨时，已有不少群众站在了天安门前和长安街的人行道上。他说：“当我们布好哨时，大家便知道这是警戒线，于是警卫人员与站立群众出现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配合，我们一不用手势二不用喊话，前面的群众自觉走在我们身后，后面的人们默默移到哨兵后面，自然而然地形成一条直线。上哨前，上级领导就给我们讲，这次任务非常特殊，人们的心情都很沉痛，在执勤中除发现带有破坏性的问题及时果敢地排除外，对一般群众在送别总理时无意中的拥挤、越线等情况尽可能用手势示意，或到跟前小声劝说，不要大声喊话。”但是，在现场，郭连江没有想到不但不用喊话，而且连手势都不用打，大家都自觉有序地默默排列好，好似有谁在长安街的冥冥苍穹中下了一道默令似的，难

以尽数的人流虔诚地默守着这首默令，无人越雷池一步，在沉默中站成一道笔直的人墙、人堤、人坝，为周总理的英灵守住最后的坚固防线。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行进着，郭连江和战友身后的群众越聚越多，1 层、3 层、5 层、10 层……人墙在不断加厚、加宽，放眼东西，一眼望不到边，如同一条静止的人河。天气依旧十分寒冷，人们虽然穿着厚重的衣帽，但长时间站在寒天里，自然是寒冻难耐，但听不到一人跺脚或搓手声。随着长安街的禁行令下达，整个长安街空无一车，在郭连江目及的视野内，除偶尔有一辆警卫或警察的督导车驶过外，仅有一名戴着白袖的交警站在天安门广场东侧路与长安街交汇处的长安街中心指挥台上。此时的天安门前，宽阔的长安街上，恭候着一代伟人最后一次经过。

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的几十里长街上伫立着近 200 万群众，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抱在手里的小孩，人们都臂戴黑纱、胸佩白花，闻讯赶来为总理送行。大家肃立在寒风中，站在街道两旁默默等待灵车通过。随着灵车的缓缓而至，男女老少都不约而同地脱帽致哀。悲痛万分的群众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开始抽泣，哭声由小渐大，由近及远，很快变成哭的海洋。大家顾不得擦去腮边的泪水，虽然看不见总理的遗容，但多看几眼他的灵车，对无边的哀思也是一种最大的寄托和安慰。郭连江回忆说，人们在热爱总理的信念支撑下，直到最后，完整的队形始终没有变、没有乱。

晚上 10 时 30 分，火化结束时由两位工人仔细地把骨灰收集起来，装入骨灰盒。当周恩来的骨灰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时，邓颖超在军乐团所奏的哀乐声中将骨灰盒抱在怀里，缓慢地一步步登上大殿的台阶，安放在早已布置好的吊唁大厅里，三鞠躬……接下来 3 天，是群众吊唁活动。

周恩来灵车经过长安街向八宝山行驶。

“在骨灰到达劳动人民文化宫之前，我们便由连队干部带队，到达文化宫门前至文化宫内通往大殿的通道上执勤，主要任务是在外围保护周总理骨灰的安全，维持吊唁人员进出秩序，防止没有吊唁证情绪难以自抑的群众硬闯文化宫大门进入大殿。”郭连江所在哨位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南大门门口，面东而站，这是参加吊唁人员唯一的必经大门。

12 日早晨起，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的群众络绎不绝。大家在沉痛的哀乐声中低着头，迈着沉重的步伐步入文化宫。哀乐声伴着哭泣声，许多人止不住自己的眼泪，还有不少人哭得只能由旁边的人搀扶着走，还有些人用已经湿了的手帕掩着脸。郭连江回忆说：“这天上午，吊唁秩序井然。下午，有些不能吊唁的群众悲痛地聚集在天安门东观礼台东侧，我们担心人越聚越多会影响吊唁活动，便以理解的心情将他们劝说到天安门广场。这天晚上，不少人聚在天安门广场东北角，远望着已经关闭大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放声大哭，哭声在寒风中飘荡，我站在文化宫门口的哨位上听得清清楚楚，不由得泪眼朦胧。”

13 日，仍有不少群众因无吊唁证滞聚在文化宫大门不远处，其中有不少啼哭者经过郭连江等耐心说服而离开。也有个别没有吊唁证的人随持有吊唁证的人到达门口时，突然以失控的号啕大哭拼命往大门里冲，警卫人员迅速将这些人拦下，先进行安慰劝说，然后将他们送到文化宫大门外东侧的平房里，由那里的地方同志做细致的劝解工作，让他们离开。

14 日，无吊唁证而冲闯文化宫大门的人有增无减，有的哭声嘶哑，声嘶力竭；有的精神恍惚，出现幻象之感；有的躺在地上，悲恸过度而抽搐。看到这些人因未能与自己心目中最敬爱的总理告别而做出此类激动难抑之举，使得郭连江这些与他们深有同感的警卫人员在拉劝中也哀情难控，默默流下了热泪。京剧演员洪雪飞在“文革”期间因演样板戏《沙家浜》的女主角阿庆嫂而闻名，郭连江在执勤时看到自己喜欢的演员洪雪飞来到大门外警戒线后，找到有关负责人自我介绍后，提出想进去吊唁总理，终因无证被婉言谢绝，后在原地徘徊了很久带着泪眼离去。郭连江回忆说：“有一位日本朋友拿着吊唁证匆匆赶到文化宫时，时间已晚，停止入场。他告诉有关负责人，再过两个小时他就有要事飞往东京了，能否通融一下让他

进去，但是负责人遗憾地摇了摇了头：不能破例！这位日本友人在门口停留了好久，最后只好在门口向里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以表示对中国总理的深切怀念。”

自 1 月 12 日下午 3 时起，由邓小平主持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恩来悼词和追悼大会的有关事项。会议开始，邓小平先声夺人：“总理悼词文稿，会前已经发给大家，为节省时间会上就不读了，请大家发表意见。”接着又说：“这篇悼词我仔细看过多遍，我认为写得是不错的。对总理一生的评价，对总理的革命简历，对以总理为榜样，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总理学习的几段话，都符合总理的实际。我同意这篇悼词，认为可以用。大家有什么修改、补充意见，请讲。”短短数语，对悼词给予了充分肯定，也等于给多数政治局成员交了底。

接着，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都相继发言，表示同意悼词文稿。江青在会上以所谓“路线问题”对周恩来进行恶毒攻击和诬蔑，妄图贬低周恩来的伟大形象和丰功伟绩，但她只是放空炮，除王洪文、姚文元跟着帮腔外，其他与会人员对她的“发言”不予理睬。

当讨论悼词即将结束时，邓小平再次发言。他说：“大家讲得差不多了，对悼词文稿大多数同志表示赞成，会上没人提出具体修改或补充意见。我提一点具体补充意见，加一个字，印件中 1922 年总理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应是总支部书记，加上个‘总’字，符合实际。大家没有新的意见，悼词文稿就讨论到这里，政治局通过。个别文字修改后，报请毛主席审批。”并指示周启才修改后先送邓颖超大姐过目，看她还有什么意见。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由谁来致悼词。开始“四人帮”反对由邓小平致悼词，江青提出由王洪文致悼词，王洪文

认为自己不行，张春桥也感到王洪文不够格，提出请叶剑英致悼词。叶剑英带着怒气说：“给总理致悼词，应该是小平同志！他是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无论从规格上还是从资历上，小平同志给总理致悼词是最合适的。我提议由小平同志来给总理致悼词！”参加会议的其他政治局成员都表示同意叶帅的意见，赞成由邓小平给总理致悼词。“四人帮”只好不吱声了。

散会后，周启才和李鑫走到大会堂北门口，张春桥从后面赶上来对他们说：“悼词号召向总理学习的那部分，不必那样展开写，不必写得那样实，你们改一改，压缩一下，笼统地写几句虚的话就行了。”周启才和李鑫听后一愣，没有马上回答。张春桥又说：“你们听清我的话了吗？”周启才和李鑫心里十分愤怒，但又不能把愤怒表现出来，只好不软不硬地说：“听清了。我们是做具体工作的，悼词政治局已经讨论通过，我们无权做任何改动。您的意见也没在政治局会上提出，现在要我们做这样重大的改动，我们不能做。如果您认为必要的话，可以将您的修改意见向政治局提出，政治局如果同意，我们就按政治局的意见改。”张春桥无言以对，怒气冲冲地走了。

会后当晚，周启才和李鑫遵照邓小平在政治局会上的指示，对悼词的个别文字进行了修改。印好后，周启才给邓颖超秘书赵炜打电话，请她报告邓颖超：“总理悼词今天下午政治局讨论通过，个别文字做了修改，小平同志指示改后的印件先送邓大姐过目，看大姐有什么意见。我马上派专人将印件送过去。”次日上午，周启才正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大厅值班，邓颖超亲自给周启才打电话说：“悼词我看过了，很好，我没意见。请转告小平同志。”

于是，悼词就要进入最后的报批程序了，即由邓小平审阅后报送毛

泽东审批定稿。周启才日后回忆说：“‘四人帮’在政治局会上讨论悼词时，曾恶毒攻击和诬蔑周总理不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考虑应该在悼词中加上一句‘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样悼词报经毛主席批准后，如果‘四人帮’再敢在路线问题上造谣诬蔑周总理，就有了尚方宝剑制约他们。可是悼词政治局已经讨论通过，按组织原则，我们无权加上这句话，但在未报毛主席批准之前，应该大胆提出这一建议。考虑再三，我们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汪东兴，得到了他的支持。他说：‘我赞成你们的想法，加上这句话有必要。但这个事要报告主持中央工作的小平同志。你们最好带上悼词印件去小平同志家里，当面向他报告我们的建议，请小平同志定夺。’经联系同意后，我们驱车赶到当时小平同志在东交民巷 17 号的家中，当面向他汇报了我们的建议。小平同志看了一遍改好的悼词印件，亲自提笔在‘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句话的后面，加上了‘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句话，并在悼词首页写上‘请主席审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时间。”1 月 14 日，毛泽东圈阅同意了这份重要文件，给了处心积虑地反对周恩来的“四人帮”一个沉重打击。

在举国哀悼的日子里，“四人帮”下令，不准群众戴黑纱，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不准地方开追悼会，不准挂周恩来遗像。甚至下令各单

周恩来和邓颖超用过的炊具和餐具。

位严查，不准个人在家里挂周恩来的遗像和戴黑纱。更有甚者，“四人帮”的党羽文化部部长于会泳竟然强迫文艺单位照常演出，还通知公安机关追查群众打来的抗议电话。

此时，邓小平专心为准备周恩来的治丧活动和完成周恩来的遗愿忙碌着。1 月 14 日，他致信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兴同志就总理骨灰撒散地点事宜与邓大姐商议。据查玉泉山已无水流，他们商议改用安 –2 型飞机撒到江河大地，邓大姐本人只送到机场，由工作人员上机撒散。以上办法比较于撒在固定一地好，应予同意。东兴同志已按此准备。”14 位政治局委员在此件上画圈表示同意。

1 月 14 日下午 5 时 30 分，群众吊唁活动结束。当晚 7 时许，邓颖超手捧周恩来的骨灰盒慢慢走下台阶，登上周恩来生前乘坐的红旗车，将骨灰盒送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暂放，准备第二天移到追悼大会。

追悼会的最后，全体与会者郑重地向周恩来遗像深深三鞠躬。

当晚 7 时，邓颖超用颤抖的双手捧起周恩来的骨灰，含着热泪说：“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大家听到这里都哭了，都知道这是大姐在同总理作最后诀别。

晚 7 时 50 分，几辆不起眼的车子避开记者，载着周恩来的骨灰直接驶抵东郊的通县机场。执行播撒骨灰任务的空军运输团的一大队二中队已在白天做好了充分准备，机组成员包括：正驾驶、副中队长胥从焕，副驾驭、飞行员唐学文，领航白海坤，通讯员、空中机械师、机务副中队长陈宝森。使用的飞机是苏联制造的安 –2 型飞机，编号 7225。

晚 8 时许，罗青长和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及周恩来生前卫士张树迎、高振普 4 个各抱 1 包装有总理骨灰的白布口袋，在空军领导干部的护送下上了飞机。

晚 8 时 15 分，邓颖超目送飞机起飞，直至飞机消失在眼帘之中。飞机经过密云水库上空 500 米高时，胥从焕第一次拉了播撒把手，将一部分骨灰撒出。在飞经天津市塘沽上空时，第二次拉了播撒把手，又将一部分骨灰撒在周恩来青年时代学习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在黄河边的北镇，第三次将骨灰播撒在代表伟大的中华民族历史摇篮的黄河沃土上。飞机越过高山峻岭、平原大地，飞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15 日零时 45 分，飞机安全返航。

根据周恩来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向他深深热爱着的祖国的江河大地。他个人没有留下任何有形的遗产，然而，他的精神、他的风范在中国人民心中乃至全世界人民心底却耸立起一座巍峨的无字丰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私家相册里的开国总理 / 吴志菲 , 余玮著 . -- 北京 : 中国摄影出版社 , 2014.11
ISBN 978-7-5179-020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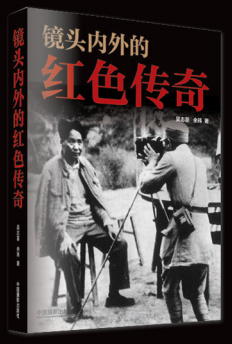
Ⅰ . ①私… Ⅱ . ①吴… ②余… Ⅲ . ①周恩来（1898 ~ 1976）—生平事迹 Ⅳ . ①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276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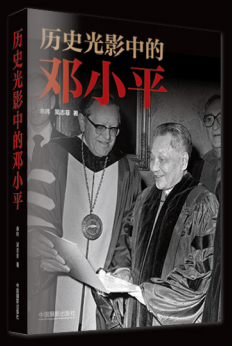
私家相册里的开国总理

作　　者：吴志菲 余　玮
出 品 人：赵迎新
策　　划：高　扬
责任编辑：常爱平 杨小华
装帧设计：刘　铮
出　　版：中国摄影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二条 48 号　邮编：100007
发行部：010 - 65136125 65280977
网址：www.cpph.com
邮箱：distribution@cpph.com
印　　刷：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6 开
印　　张：22.5
字　　数：350 千字
版　　次：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79-0206-5
定　　价：4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追寻红墙摄影师的影像记忆
重现伟人传奇一生的精彩瞬间



历史光影记录峥嵘岁月伟人胸襟
亲历者细述见证传奇人生英雄本色

私家珍藏照片定格开国总理的别样风采
亲历者的回忆还原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受访者翻动各自的私家相册，讲述着开国总理令人难以忘怀的点点滴滴。全书通过作者专访过的许多曾工作在周恩来身边的摄影师、警卫员、医护人员、外交官和亲友，以及一些研究周恩来生平事迹与思想的专家、学者所收藏的私家照片，还原出周恩来总理的传奇人生和别样魅力。这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定格的是一代伟人传奇的红色瞬间，记录的是一个个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ISBN 978-7-5179-0206-5
9 787517 902065 >
定价：49.00 元